

馬克思主义史

上

[南]普·弗兰尼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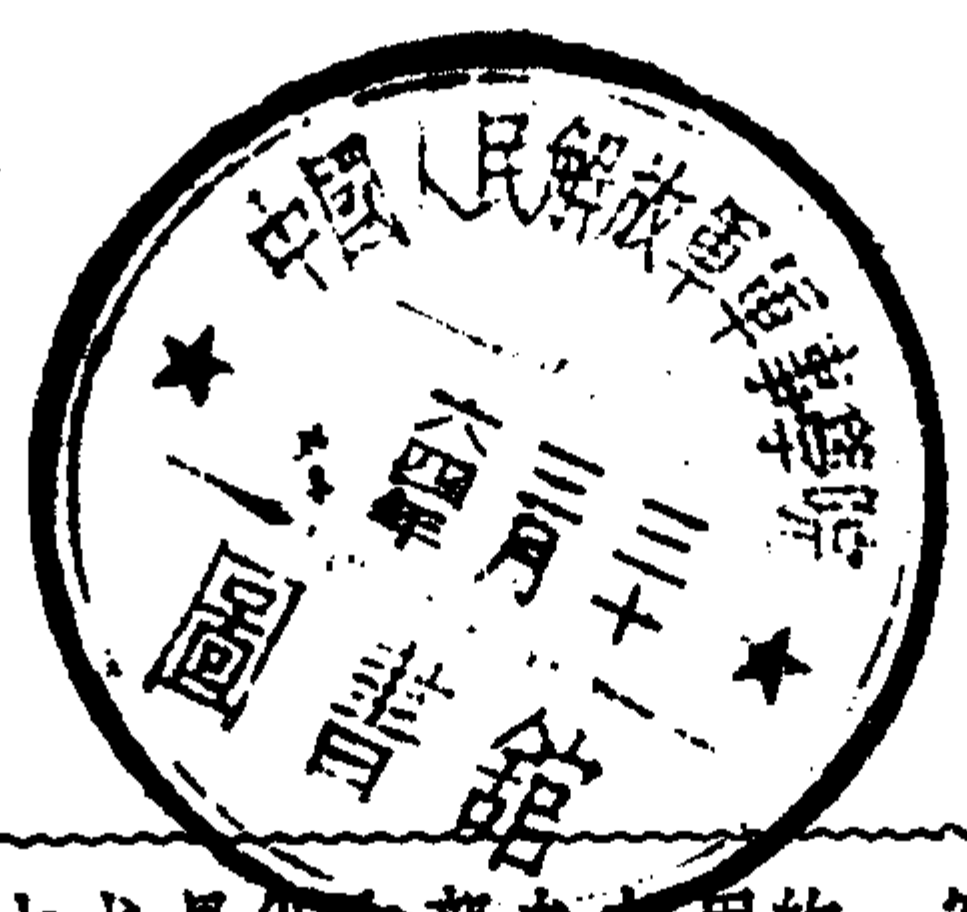




馬克思主义史

上

[南]普·弗兰尼茨基著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前 言

在对馬克思主义进行长期研究以后，我决定写一部有关当代这一最重要的思想的历史，虽然我也知道，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首先是还没有一部有关任何一个国家或一定时期的馬克思主义史，可以用来作为进行比较全面的綜合的基础。

因此，我主要是依靠我过去对馬克思主义发展的研究和我自己的經驗，来独立地划分时代、确定人物和問題，并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迄今为止的各种各样的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观点。完全可以理解，我在某些方面也引用了我所同意的某些最杰出的馬克思主义者过去所写的批判性的著作。

首先必須強調指出，这本书既不是社会主义史，也不是工人运动史，而是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历史。但是，对馬克思主义史本身也要求进行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第一，要明确什么是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观点和立場，以及在过去的一切观点中哪些是属于馬克思主义的；第二，必須从一定的社会历史方面来看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且指出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和傾向的产生根源；第三，要有批判性，这是現代最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即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特点。

我們在这本书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馬克思主义当中，在第一个問題上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意見分歧。我的看法，特別是我在馬克思主义哲学問題上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完整的馬克思主义，因为我认为，自从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辯证唯物主义者以后，他們在各个阶段的思想实质上都是統一的和始終一貫的。因此，我在專門的理論著作中把他們的思想統一起来，并且明

确指出，強調馬克思主义和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一点，都必然是片面的（不过这种片面性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关于第二个問題，很明显，在任何时期，馬克思主义思想都不仅和工人运动、資本主义以及国际局势发展的特殊的和一般的情况密切地联系着，而且也和資產阶级的哲学、科学以及整个思想体系的发展密切地联系着。我认为，尤其在問題涉及到这样多的方面的情况下，沒有必要对个别情况和傳記进行細微的研究，因为这样并不能說明发展的基本方向。重要的是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气氛、阶级关系、一般政治經濟和思想的发展情况等。

每个时期的运动和发展都有一个基本的傾向，但是在現代的复杂的結構中，也存在着許多往往是完全矛盾的傾向。因此，不同的人就可能有不同的判断，这当然是由每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影响决定的。但是，每个人的品质、智力和道德力量决不只是消极的、被塑造的东西。在我看来，个人的这种品质恰恰是决定性的因素，它給我們提供了有关个人发展道路的答案。我在书中力图表明，一些历史傾向是既存的，我們將从中选择一种傾向，并进一步积极地表現它。然而，在一定的时期，不同的人把历史发展中的不同的可能性看成是基本环节，这主要是因为他們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同样也是因为他們的智力和道德力量不一样，結果对这种环节的揭示和理解也就不同。

在指出上述发展中促进各种傾向的一定社会历史基础的同时，我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在理論方面。首先，我认为有必要在一个地方闡明和估价那些具有某种国际意义的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論点以及这些思想的发展阶段和成就。在各国馬克思主义史方面，任务在于也研究其他許多特殊的問題以及一些在本国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並沒有从事具有更广泛的、国际的意义的理論活动的人物。

因此，既然这是闡述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論的通史，我所提到

的就只是一些主要問題和一些从事某种具有国际意义的理論活动的思想家。由于这种打算，尽管本书原来計劃的篇幅被大大地超过了，但我仍然想把全书的篇幅限制为一卷，而且这也是有一些原因的。一部比較詳細的馬克思主义史不仅要包括某些国家的許多特殊情况，而且也要闡明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些国家中的各个发展阶段，因而要求許多卷的篇幅和相当多的人力。但是，根据这种想法，正像任何一个科学部門的情况一样，就必须对这个內容广泛的問題进行这样全盘的分析，这种分析一方面更能为讀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从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和爭論的发展情况看来，我认为除了历史上和理論上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提供一幅比較鮮明的批判性的图画，来描繪我們自己，描繪我們的世界观和社会观、我們的缺点、积极的傾向和消极的傾向，描繪一切促进或阻碍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思想和實踐的东西。因此，必須說明我們当前的地位、我們的任务和要求，我們要真正地做到馬克思主义者所應該做到的那样：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符合时代要求，在复杂的、多方面的和革命的历史运动中具有先見之明。

至于第三个問題，我們無須特別強調，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要是自由的思想。它的最深刻的本质就在于批判精神——对別人和对自己的批判精神。因此，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也只能是批判的思想史。如果不以自由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它的发展的各个时期，要写出一部馬克思主义史就是一种幻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說明了，为什么近四十年来那些至少已經具备了写作条件的人至今还未能写出这样一部历史。

显然，我的这个嘗試不仅是我过去对这些問題的研究的綜合，而且也是我对当代主要的思想即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的个人見解。我的这些見解包括我对于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对于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的偏差、迷誤以及使这种思想获得进一步发展并处于总的历史发展水平之上所作的探討和自觉努力

的看法，包括我对于臆造出了自己的聖徒和異教徒的馬克思主义經院哲学的看法。

要得出这样的見解和对馬克思主义的許多重大問題进行批判性的考察，除了必須以批判的态度来熟悉和掌握具有世界意义的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以及有关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外，必須具备在人們生活的社会环境中有着創造性的气氛这种先决条件。如果我們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它应该成为的那样——理解为現代世界的真正的复兴运动，那末它就必須創造出一种社会的和文化的的生活气氛，并且在这种社会和文化的的生活气氛中充滿着具有批判精神的馬克思主义的思想。

个人对于历史問題，特别是对于馬克思主义問題所抱的批判性的見解，实际上也总是在本身中包含着使許多有价值的东西經受考驗的、批判性的历史实践。从本书完全可以看到，迄今馬克思主义的任何創造性的思想，总是以一定的批判性的历史实践为前提的。不論个别思想家的思想、观点和概念在形成时所經歷的道路如何复杂，他們总是不仅充分表現理論的傳統和經驗，而且也充分表現他們的历史实践的生活（或者是停滯不前的历史实践）。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可以指出，如果沒有我国的革命运动和十分丰富的經驗（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不仅表現了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而且表現了突出的創造性），对我來說，丰富、复杂而又常常含有矛盾的馬克思主义史的某些重大篇章，在很多方面就会是不可理解的。对于其他許多人來說，想必也是如此。

这里沒有必要一一列举应该解决的种种困难和問題。馬克思主义包括若干广泛的理論領域以及馬克思主义迄今的实践本身极为錯綜复杂这一事实就充分表明了問題的复杂性。至于馬克思主义迄今有过的各种流派、各种爭論、截然相反的观点和各种变形，当然我們更不用說了。

馬克思主义同时也包括一定的方法論的观点，这种方法論的观点使許多馬克思主义者能够更深刻地闡明人类历史和思想方面的各种問題，而为了更明确地強調理論問題，就必须相当突出在个别科学領域內对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这种运用。因此，我对于几乎所有比較重要的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活动中的許多值得重視的方面只是提了一下，因为一部著作的构思和篇幅是不可能闡明在学术史的各个不同方面对这种方法的运用的。

另一方面，我要強調指出，由于本书的叙述方式，讀者只有对本书加以全面的研究，才能弄清楚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或問題，因为本书的每个部分几乎都討論到一些重大的問題。

每个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面临的另一重要問題，就是馬克思主义发展的分期，問題和人物的选择以及对所获得的成就的批判性的估价。关于分期問題，我认为用專門的章节来表述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及其思想的发展是合乎邏輯的。其次，正如我能够断定的那样，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极其复杂的过程，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和工人运动发展中的各个国际的时期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可能发生的傾向和实际上存在着的傾向相符合的，因此，我把这种思想的发展放在專門的章节里来論述。

列宁的思想是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轉折点，所以也把它放在專門的一篇里来論述。

現代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理論思想在“社会主义陣营”內部和它的外面的发展，因此，我把这个时期进行了划分。本书有專門的一篇論述我国的馬克思主义，因为我认为，不仅我作为一个南斯拉夫作者有理由更多地注意我們的努力，而且最近二十年来南斯拉夫的理論和实践的出現，是現代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轉折点。因此，我在对这一运动的整个論述里也談到了南斯拉夫最知名的馬克思主义者，并且比較詳尽地闡述了他們的有獨創性的思想。

鉴于这一切情况，这里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而且很明显，对一个这样复杂的过程的分析和考察，几乎任何时候也不能认为是最后完成了的。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必须首先表明，在一定的时期中，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在何种程度上是创造性的解决办法，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方案在历史上最为正确，并且是历史上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方案。

但是，这样的一部历史还必须说明更多的东西：每个历史时期是怎样提出新的问题的（这些新的问题在任何一种理论中都不可能完全具体地被预先认识到）？一种复杂的、丰富的和全面的历史辩证法是怎样同时也要求有全面的和灵活的思想的？以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批判性地开放的思想？

必须再次强调指出，而且从本书中也可以看到，我自己的一切见解和估价，都是以原著为依据的，当然，有时我只能根据译本来了解原著。至于我引用的我国的译文，我经常核对原文，因为我在比较出处时，有时作了一些修改。本书后面所列的书目仅仅包括本书以某种方式引用了的著作。此外，我力求不重复提到同样的版本，而是尽力在每一著作的后面仅仅注明初版的年代，但在某些情况下，我现在还不能做到这点。因此，书目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向读者指出了特别丰富的、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及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著作，并且也指出了新材料的来源。同时，我要特别强调指出，尤其是在本书的第一、第二篇，我基本上是以修订和补充的形式利用了我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等问题所作的研究的成果。

最后要说一下，我的这部著作是在对于南斯拉夫人民、而归根到底也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年代完成的，因此我不能不以这一微小的贡献来纪念所有在我国和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以及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牺牲的英雄战士，他们在现世

界艰难的和非人道的形势下，由于自己忘我的牺牲和对今天人类的坚定信念，而成为预告未来的使者。

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

1961年4月15日于萨格勒布

上册目录

前言	1
----------	---

第一篇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1
第二章 几个发展阶段	23

第二篇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第一章 哲学	51
根本立场问题	53
思维和实践	55
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	62
哲学上的结论	64
物质和运动	68
空间和时间	72
量和质	73
量到质的转化规律	77
整体和部分	79
决定论问题	81
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	84
必然性和偶然性	86
对立面渗透规律	91
否定之否定规律	94
人和自由	96

第二章 社会学	107
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性	107
社会经济形态范畴	111
阶级斗争规律	113
革命概念	115
国家的产生、实质和消亡	117
社会主义和异化理论	121
思想体系	125
道德	131
宗教	133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	137
剩余价值问题	138
资本积累	141
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后的各种矛盾和过程	146

第三篇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 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一 德国的初期马克思主义	155
约瑟夫·狄慈根	155
二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	161
保尔·拉法格	161
若尔日·索列尔	170
三 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	175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175

第二章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179
奥古斯特·倍倍尔	180
路德维希·沃尔特曼	187

爱德华·伯恩斯坦	188
弗兰茨·梅林	194
卡尔·考茨基	200
罗莎·卢森堡	217
亨利希·库诺夫	231
第三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236
麦克斯·阿德勒	237
鲁道夫·希法亭	243
卡尔·伦纳	250
奥托·鲍威尔	256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	270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初阶段	270
格·瓦·普列汉诺夫	272

第四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乌里扬诺夫·列宁

第一章 社会主义运动和党的问题	291
第二章 哲学问题	302
第三章 帝国主义问题	319
第四章 国家、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	329

第一篇

卡尔·马克思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卡·马克思及其朋友和战友弗·恩格斯对哲学、社会学和经济问题的观点的体系，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也是许多世纪以来欧洲思想发展的相对的结果。它以自己的彻底的理論克服了过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局限性，表现了历史的轉折过程，并从思想上預測到历史上一个新的篇章。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提，是十八、十九世纪整个欧洲社会和思想的蓬勃发展，而这种复杂的发展也是人們为不断改造自己，为揭示和实现使他們成其为人的一切因素，以及为解决人本身产生的一切問題、怀疑和神秘化的現象所作的經常努力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斗争中表现了光明和阴暗的两面。今天的情形也是如此。然而，人类关于作为創造者的人的崇高思想，关于使整个自然界一体化的人的崇高思想，关于以人生为唯一合理的目标和乐趣的人的崇高思想，在一切障碍和困难面前都能战胜阻碍人类发展、使之陷于抽象幻想以及在人类追求进步时使之停滞不前而丧失人性的一切东西。

人类的行动和精神的一切方法、努力和成果，人类的气魄和勇敢，有着重大的意义。人已經彻底摆脱了宗教神秘的帷幕，并且发

現了自己——人——是最高生物。因此，人也不得不担負起更多的責任。从布魯諾、培根、霍布斯到爱尔維修、霍尔巴赫、狄德罗和費尔巴哈，由于自然界的最高級的行为，即由于人的思想，一切非现实的可能性都变成了现实可能性。而伽利略、哥白尼、笛卡儿、牛頓、毕丰和拉馬克的天才，則使人理解了他所在的宇宙的结构和起源，黑格尔的大胆的思辨又更加深入到自然历史过程的規律性和决定因素中。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人类每天都在占領新的地盘，探索新的真理，因此，欧洲的历史也日益受到这种科学发展的影响。如果没有这种科学的发展，今天的情况是不可設想的。

在人类进步的这条道路上(不能在这条道路以外，也不能越过这条道路)，馬克思的天才通过他青年时代的巨大努力，解决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即在很多方面对人类带有根本轉变意义的时代的重大問題。从直接的科学基础来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成就里集中了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欧洲思想的主要的进步流派，特别是法国的唯物主义、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欧洲的政治經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

这种新的世界观和社会观具有这样全面的理論基础或前提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表明，它們的創造者同当时人类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問題有着深刻的联系。

上述前提的大部分都是在資产階級社会蓬勃发展和它的理論成果丰硕的时期，由資产階級的人士創立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普魯士的公民，正是在德国資产階級壮大的时期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当时德国資产階級也日益开始意識到本階級的历史作用，意識到西欧資产階級在十七和十八世紀蓬勃发展的时期已經轰轰烈烈地和富有民主色彩地实现过的作用。

但是，如果說荷兰、英国或法国的資产階級由于各种情况的凑

合,当时已經統一起来,并且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反抗旧的統治階級和封建制度,那末德国的資產階級則直到十九世紀初还感觉到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貴族內部的經濟竞争(尤其是在普魯士)、德国諸邦的长期分割状态以及拿破侖的占領所带来的后果。拿破侖一方面带来了法国資產階級的偉大历史行动的精神和結果,但是他的占領也有其相反的一面,由于这种占領及其他种种原因,特别是他在俄国的失敗,推动了德国群众的起义。1813—1815年人民的这种革命情緒又被德国社会中最反动的一部分人即封建貴族所利用,从而使他們在德国人民中的威望进一步抬高了。

尽管存在着这些事实,但是欧洲在十九世紀最初几十年所发生的事件在德国生活中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施泰因和哈登堡的改革敕令,城市終於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农民开始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虽然只是一些較富裕的农民得到解放,貧苦的农民則成为德国容克地主庄园的雇佣工人),而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本人也被迫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允諾实行宪法^①。

正当所有的人在拿破侖失敗之后都期待着出現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复兴时期的时候,欧洲的反动势力却賜給了自己的臣民一个神圣同盟。在近代,神圣这种裝飾始終是一切反动势力的迷惑人心的外衣。

普魯士的封建反动势力很快就忘却了自己的諾言。可是,这时的德国生活已經不同于五十年前了。資產階級,特别是在萊茵区,正处在不断壮大的时期。对不久以前的往事的鮮明回忆,以及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使得德国、特别是其中实力最最强的

^① 1807年的施泰因敕令廢除了农民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但是,农民对封建主的一切义务仍未取消,而1811年、1812年和1816年的哈登堡敕令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还限制了施泰因敕令。尽管如此,这些改革对于在农村中建立新的經濟关系和开始实行众所周知的普魯士独特的农业資本主义发展,还是具有深远的后果的。这些改革是对拿破侖作战的时期普魯士的严重政治情况和經濟情况的必然后果。

王国——普鲁士的政治和思想气氛日益活跃起来。当时的封建反动派还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来镇压一切重大的政治示威或政治企图。因此，1817年的瓦特堡游行和1832年汉巴哈游行等事件，都没有取得直接的效果，虽然它们唤醒了沉睡中的德国公民的政治觉悟。

反抗运动，特别是在巴黎七月革命(1830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巴黎的这一事件，在德国得到了有力的反应，它首先受到了德国思想复兴的两位领袖——路·白尔尼和亨·海涅的热烈祝贺。

他们在七月革命后从巴黎的来信，对革命青年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进步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影响^①。在他们的影响下，在德国文学界中掀起了一个名为“青年德意志”的新的运动，参加者有：鲁·文巴尔克、卡·谷兹科夫、亨·劳贝、泰·蒙特等人。他们和以往的作家不同，主张在艺术创作中贯穿政治利益，要求文学与生活相联系，争取妇女解放，而在政治上他们是立宪政体的拥护者。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白尔尼和海涅对“神圣德意志帝国”及其封建君主的猛烈抨击，以及他们利用种种机会对一切不合政治潮流、目空一切、不学无术的封建臣僕进行的指责，那末就很容易理解，普鲁士反动派是决不会长期容忍这种思想上的叛逆在国内存在下去的。

由于沃·门采尔对自己过去的朋友、上述整个文学运动的领袖谷兹科夫进行告发性的攻击，于是迫害就开始了。德意志联邦于同年即1835年颁布命令，禁止印刷和出售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的作品。

这个运动虽然因而遭到了失败，但是对那些信仰自由、民主甚至是立宪思想的人，这一切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样的人在德

^① 指白尔尼的著名的《巴黎来信》和海涅的《法国状况》，其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的政治和思想状况。

国日益增多了。

在德国，哲学革命及其后果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正如海涅早已天才地預見到的，黑格尔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①。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德国的哲学生活是在黑格尔的創造活动的影响下开展的。1831年黑格尔死后，他的学派就分裂为所謂左右两派，即青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鲍威尔、費尔巴哈、馬克思、恩格斯、施蒂納、科本、梅因、魯滕堡、赫斯、奥本海）和正統黑格尔派（盖伯勒、辛利克斯、格歇尔）。

通常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两重性，即他的体系和他的辯证方法，使得后人有可能或者发展他的哲学的这个方面，或者发展另一方面。正統黑格尔派继承了黑格尔体系的全部保守观念，并进一步把它教条化；可是另一派却没有进一步发展黑格尔的辯证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做的除外），而是发展了他的体系的一个部分，首先是他的宗教哲学。

黑格尔左派（青年黑格尔派）在宗教哲学方面进行了特別有成效的批判性的研究，因为从这方面来批判整个社会制度，要比直接从政治方面进行批判容易得多。并且黑格尔在这方面也給他們提供了相当多的材料。

黑格尔对宗教現象的看法，实质上具有激烈的无神論的性质。在他看来，宗教是絕對、絕對观念的認識的一种要素，也就是他的哲学中的这一实体精神要素的絕對自我認識。关于絕對观念的認識的这种观点表明，在这里，黑格尔的唯理論也占着优势，因为他认为哲学的認識比宗教的認識更重要。在黑格尔看来，艺术的認識是通过个别来达到絕對的認識的最初阶段，宗教的認識是以已經具有普遍性质的观念的形式来达到絕對的認識的观念，而只有

^① 海涅在其著名的《論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写道：“我們的哲学革命結束了。黑格尔完成了哲学上的偉大革命。”（《海涅全集》第4卷，埃耳斯特德文版，第290頁）

在哲学中，绝对观念才达到绝对知识的最高阶段^①。

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既综合了斯宾诺莎的因素，又综合了费希特的因素，既综合了作为一切生活和生活现象的实体的绝对观念的因素，又综合了通过个人的自我意识而得到表现的自我意识因素。

黑格尔左派除了通过抽象的哲学外衣，再也不能以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进步愿望和思想了，因而他们正是把全部的争论转移到这个领域中。

大·弗·施特劳斯(1808—1874)以其划时代的著作《耶稣传》(1835年)发展了前面的这个实体因素，他认为，基督教是最初的基督教徒团体的自发的产物，并且具有明显的神话性质。

施特劳斯在初版序言中写道，不应该再用陈旧的、超自然的和自然的方式考察耶稣的历史，而应该提出一种新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神话。但神学家不能这样来看问题，因为他们缺乏基本的东西，即“他们没有从精神上、思想上摆脱一定的宗教的和教条的观念；而作者在早期的哲学研究中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神学家们可能会认为，他的著作中缺乏这些观念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他(施特劳斯)却认为，他们的著作中的神的观念是不科学的。”^② 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思潮已经产生了，这一思潮反映了业已发生变化的社会情况和过去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批判工作。

施特劳斯在其著作中以出色的分析表明，圣经上的一切信条

^① 黑格尔在他的《宗教通信》中明确地写道：“精神本身为自己规定的方式和方法就是观念；这一因素就是像宗教这样的绝对意识的形式。相反，如果精神不是通过观念的形式，而是通过思维的形式认识本身的话，那末哲学就是这种意识。”(《宗教通信》，1925年莱比锡德文版，第67页)接着又写道：“观念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是以思想的形式提出的，但这一内容还不是作为思想提出的。观念消极地对待感性的、映象的东西，但也不是绝对地摆脱了感性的东西，而是以观念的方式提出感性的东西。这是只有在实际思维中才会发生的事情。……”(同上书，第115页)

^② 施特劳斯：《耶稣传》第1卷，1840年杜宾根德文版，第4页。

几乎都是不可靠的和荒謬的，因此他把它們說成是神話。从耶穌降世和誕生、魔鬼折磨、奇迹出現直到复活——这一切都是通过基本的、深刻的分析而被称之为神話的，于是施特劳斯最后作出結論說：“因此，通过迄今所作的研究，破除了基督教徒对耶穌的信仰的最大的、最重要的部分，消除了基督教徒由上述信仰而产生的一切鼓舞，并夺走了基督教徒的一切安慰”①。

施特劳斯在他的这种无疑是“瀆神的”神話理論中，对福音书作了精辟的分析，并且指出其中有許多地方是互相矛盾的和不合邏輯的，从而否定了它們的历史性和真实性。他的这一行动对进步的思想家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不待說，人們对这两大卷书的反应是異乎寻常的，施特劳斯也因此失掉了自己的职位。

与施特劳斯的神話理論不同，在三十年代末，布·鮑威尔(1809—1882)在批判福音书时，創立了自我意識哲学，他宣称福音书乃是个人故意虛构的产物，而自我意識則是历史的基本动力②。

無論如何，強調“自我意識”这一因素的事实表明，德国資產階級的意識在逐漸发生变化。德国資產階級的最进步的人物的自我意識日益发现，本階級成为国内的主要因素，它将去迎接在历史轉折关头必然出現的历史事件，因而他們认为自我意識的哲学，无疑

① 施特劳斯：《耶穌傳》第2卷，第663頁。

② 鮑威尔认为，黑格尔把斯宾諾莎的实体和費希特的我合而为一，这是他的偉大之处，但也是他的哲学的弱点、局限性和不足之处。鮑威尔认为，上述矛盾的解决在于克服两重性，他主張或者采用实体因素，或者采用自我意識因素。他說：“或者是自我意識必須重新銷毀于实体的火焰中，也就是說必須确立并保存純粹的实体性；或者必須指明个性就是自己的屬性和自己本质的創造者，指明一般个性的概念本来就要对自己加以限制，然后又消除个性由于自己的普遍本质而加上的这种限制，因为正是这个本质只是个性的內在的自我区別的結果，只是个性的活动的結果。”（布·鮑威尔：《路·費尔巴哈的特点》，1845年。轉引自《德意志意識形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2頁）（引文刪去了原文中的着重号。——譯者注）

要比黑格尔哲学中仅仅作为绝对发展的一个因素的个人意识，更能恰当地表现自己的地位和愿望。

但是，在三十年代末，德国哲学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在发展和批判地探讨黑格尔的哲学时，达到了唯物主义。这就是路·费尔巴哈(1804—1872)，他在《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年)、《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哲学改革的预拟提纲》(1843年)等书中，宣告了德国唯物主义时代的开始^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马克思在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城，恩格斯在1820年11月28日生于巴门市，他们基本上受到了同样的影响。马克思在波恩开始学法律，以后到柏林继续深造，他在那里很快就参加了在布·鲍威尔周围形成的青年黑格尔小组(“博士俱乐部”)^②，并成为自我意识哲学的热烈拥护者，这从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1841年)中，以及他回到莱茵区以后在1842年为《莱茵报》撰写的文章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③。

① 对当时的历史事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思想影响作了最精辟、最广泛的分析的著作有：弗·梅林著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著作遗产》(第1—4卷，190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第1—4卷，1897—1898年)和《卡·马克思》(1918年)这部专著以及关于普鲁士和德国的历史论文；古·迈尔著的《弗·恩格斯》(第1—2卷，1934年)；奥·科尔努著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附详细书目)(第1卷1955年，第2卷1958年)。在我国的著作中可参看我写的《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一书(1953年)。

② “博士俱乐部”中的主要人物是被公认为黑格尔的继承者的布鲁诺·鲍威尔。在他周围的人首先有：阿·鲁滕堡、爱·梅因、克·弗·科本、路·布尔、卡·瑙威尔克、伊·卡·施米特(麦·施蒂纳)、鲍威尔的兄弟埃德加尔等人。卢格和艾希特迈创立的《哈雷年鉴》是他们的文学机关报。施蒂纳的热烈拥护者伊·恩·马凯在他的《麦克斯·施蒂纳的生平和事业》一书(1898年)中描述了这些人。

③ 这特别可以从下列论文中看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79号〈科伦日报〉社论》(应为《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译者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3年发表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文集》，这个文集中也收有费尔巴哈的著名的《哲学改革的预拟提纲》)。

恩格斯在較早的时候就因在谷茲科夫創办的不来梅《德意志电訊》杂志上撰写文章而嶄露头角。施特劳斯的书给了他特別深刻的印象,使他在1839年底接受了黑格尔的学說。我們从他写給格拉貝兄弟的信中可以知道,在家里一向受到宗教教育的年輕的恩格斯,曾經经历了一場多么激烈的内心斗争。可是他追求人类解放和追求真理的愿望终于战胜了狹隘的空虛的家庭教育的偏見^①。

1841年底,在馬克思已經离开柏林的时候,恩格斯来到柏林服兵役。在这里他也加入了馬克思在不久前加入过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組。

我們从恩格斯批判謝林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这一哲学的热烈拥护。謝林应普魯士政府的邀請到柏林反駁黑格尔的哲学,他当时代表着已經具有明显反动性质的“实证哲学”,因此,他来到柏林只是表明了用基督教伪装起来的哲学思想的軟弱无力。

1841年12月,恩格斯馬上在《德意志电訊》上发表了反对謝林的文章(《謝林論黑格尔》),次年,又出版了两本小册子:《謝林和启示(对絞杀自由哲学的最新反动企图的批判)》(1842年4月)和《謝林——基督的哲学家》(1842年)。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尖銳地指出,謝林企图貶低黑格尔并建立一种新的、神秘实证哲学。恩格斯尖銳地批評了謝林想把信仰带进权威和感性的神秘主义中去,反对这种新的二元論。恩格斯以极大的热情捍卫了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捍卫了黑格尔的继承者——青年黑格尔派,他当时也是青

^① 特別重要的有他于1839年3月和4月登在《电訊》杂志上的《烏培河谷来信》(烏培河谷是恩格斯的故乡)。其余的文章大多写到当时的德国文学:評論卡·倍克、奧·普拉頓、伊·雅科比、阿·格律恩、恩·摩·阿倫特等人。同时他也为其他报纸撰稿。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拥护“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和发展自我意識哲学,但有批判性的保留。这一哲学的发展特別表现在他于1838—1841年給弗·格拉貝和符·格拉貝等朋友的信中,他在这些信里热烈贊揚施特劳斯,称他为天才,从而招致自己的朋友格拉貝兄弟的反对。这些信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已經刊入我們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选集》一书(1956年薩格勒布塞文版)中。

年黑格尔派的一分子。在恩格斯看来，与黑格尔及其继承者同时，出现了新的黎明和新的时代。他相信永恒真理必然获得胜利，相信“人类的自我意识”乃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年轻的恩格斯身上充满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的情感，当时他曾热情地写道：人民作出伟大的决定和进行战斗的日子即将来临，胜利一定属于人们即属于这种新哲学^①。他的战斗精神在这里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

1842年底，恩格斯来到英国，在激烈的阶级分化、共产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的影响下，他很快就转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来了^②。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的期间（1842年10月他已任该报的主编），已经逐渐摒棄了唯心主义。他在研究许多迫切的政治和经济

① 恩格斯这样表达了他对自我意识哲学的热情：“……而这个宝座、这个未婚妻和这个圣物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和新的圣杯。人民围绕它的宝座高呼着集会……人类的自我意识的思想，是一只奇妙的不死神鸟，它用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燃火自焚，并带着青春的气息，从毁灭了一个旧的时期的火焰中飞起。”（《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2卷，1930年柏林德文第1版，第226—227页）

有趣的是，因为当时恩格斯使用了弗·奥斯瓦尔德这个笔名，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些文章是谁写的。后来，人们首先猜想，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巴枯宁。为巴枯宁作传的內特劳也得出了这个结论，因为他认为这些文章和巴枯宁的文章在风格上没有区别。以后，符·帕本海姆和爱·伯恩施坦断定，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应该实有其人。经过古·迈尔和德·梁赞诺夫的研究，特别是在恩格斯致格拉贝兄弟、致自己的姐妹玛丽亚和阿·卢格的信（在1842年6月15日给卢格的信中谈到这些著作）被发现后，这个问题才弄清楚了。原来弗·奥斯瓦尔德就是年轻的恩格斯。

② 必须注意到，当时德国已经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流亡者在法国创立第一个德国工人同盟——“流亡者同盟”（1834年），该同盟是由雅·弗奈迭和泰·舒斯特尔博士领导的。这个同盟很快就分裂为左、右两派，此后，左派在舒斯特尔领导下组成“正义者同盟”（1836年）。在这个同盟的队伍里涌现了德国空想共产主义的最大的理论家威·魏特林，以及著名的革命者和后来的马克思的朋友卡·沙佩尔、亨·鲍威尔、尤·沃尔弗、奥·艾韦贝格等人。此外，起来进行公开的社会批评，反对容克地主的专制和迫害的有：路·加尔和格·毕希纳（《丹东之死》一剧的名作者）以及牧师弗·魏迪希。毕希纳和魏迪希于1834年写了《黑森农村消息》，这是当时最具有革命性的传单之一，其中尖锐地攻击了德国的王公和国王。

問題時日益看出，法、宗教以及整個思想體系都取決於階級狀況和經濟利益。1843年3月，馬克思因為同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作鬥爭沒有結果，離開了《萊茵報》編輯部，而該報也在同年3月底被封閉。這時，費爾巴哈的《哲學改革的預擬提綱》對他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從馬克思1843年3月13日寫給盧格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是贊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的。但是在同一封信中他也指出，他不贊成費爾巴哈迴避政治問題的態度。這一點就向我們說明了當時這兩位思想家之間的本質區別。馬克思在給盧格的信中寫道：“我不同意費爾巴哈的格言，只是在於他過多地論及自然界，而過少地論及政治。而這却是使當前哲學能夠成為真理的唯一結合。”^①費爾巴哈把宗教問題（這是他研究得最多的問題）僅僅歸結為人本主義的原則，可見他的興趣是非常狹隘的，這就妨礙了他徹底地了解這個問題，妨礙了他在這個問題上得出純粹社會學的看法。由此他就產生了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人的歷史問題，只有通過思想的途徑才能解決。

馬克思却已經沿着新的道路前進，他看出政治和哲學之間的本質的和唯一有成效的聯繫。由於這一工作當時還完全沒有人做，於是他就於1843年花了一部分時間來批判地分析黑格爾的國家觀。這一分析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下來，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才被發表。這份手稿表明，當時馬克思已經完全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上來批判黑格爾的觀點，但是，對他來說，民主的問題、人類自由的問題仍然是沒有解決的問題^②。

① 1843年3月13日卡·馬克思致阿·盧格的信，《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選集》，1956年薩格勒布塞文版，第54頁。

② 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黑格爾的著作《法哲學原理》的第二六一節至第三一三節，即關於國家的部分，這是與社會問題有關的最重要的部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費爾巴哈的影響，但同時也可以看到克服了費爾巴哈的狹隘的人本主義的觀點。特別有

馬克思与卢格談妥出版一种进步的杂志之后，就于同一年年底迁居巴黎，着手为該刊物編輯第一期。

只要我們注意到，人的解放是馬克思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力求解決的中心問題，并且德国当时还不具备解决这一問題的充分前提，那末我們就会清楚地認識到，比較发达的法国对馬克思的观点的形成是具有重要意义。法国人的优越性就是他們拥有发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而馬克思的优越性則在于他拥有一个昌盛的哲学时期的全部丰富的遺產及其基本成果——辯证法，同时他还具有一个天才的人物和坚强的性格的不可动搖的决心：即一定要解决人、人的历史和解放的問題。

法国的现实立即向馬克思提供了足够的材料，证明根据资产阶级的公民民主来解决人的問題，只是一种局部性的解决。法国生活中的新的矛盾清楚地表明，必須克服那种实际上在德国还刚刚开始成为现实的关系。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已經向无产阶级展开了尖銳的斗争。在工人队伍中已經开始傳播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其中有一些是馬克思在德国时就已經知道了的），但是它們基本上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其中流傳最广的是圣西門（1760—1825）和沙·傅立叶（1772—1837）的空想社会主义。

他們是天才的思想家，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庄严地預告其蓬勃发展的开始时，他們就已經发现了它的灭亡的先兆。他們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的分析是很出色的。我們如果考虑到他們想創立

意思的是对官僚政治的批判。馬克思批評黑格尔不能表明，如何把一般观念联系具体事物，并批評黑格尔把一切結果和謂語都变成主体。“他把身为理念的主体的东西当成理念的产物，当成理念的謂語。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邏輯領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維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黑格尔要做的事情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現成的特定的理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和抽象理念发生关系，使政治制度成为理念发展鏈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9頁）

一种有关历史发展及其規律的統一的观点（在这方面他們往往接近于唯物主义对这些問題所作的解釋），那末我們就可以完全有理由肯定，他們对馬克思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他們在解釋历史方面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这一点在他們試圖解决現代社会的矛盾时表現得特別明显。在这里，法国启蒙运动也发生了作用。他們不是把階級关系看作这种社会发展的杠杆，却幻想出現个别的慈善家，以为当这些慈善家認識到这个世界的一切罪恶之后，就会以自己的力量来拯救世界。可見，他們的学說具有空想的性质是无容置疑的。

馬克思很快就認識到，近代史的实质就是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的斗争；因为他一直是个深刻的辯证的思想家，所以主張采取具体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矛盾，而不对历史抱任何的幻想。例如，他在和卢格共同出版的《德法年鉴》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就已經宣布无產階級是这样的階級，它必将实现社会的复兴，即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沒有人压迫人和人剝削人的无階級的社会。

馬克思在这篇著名的論文中写道：“哲学把无產階級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產階級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沒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論出发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產階級。哲学不消灭无產階級，就不能成为现实；无產階級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①

恩格斯在英国也得出了同样的結論。在英国，貴族、資產階級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頁。（引文删去了原文的某些着重号。——譯者注）

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一情况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使他看出阶级斗争是发展的杠杆，至少在当时的英国是如此。他还根据对经济的分析得出结论说，这个社会不可避免地要灭亡，他并且看到了无产阶级是将把这一过程进行到底并且建立起无阶级社会的历史力量^①。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表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载于马克思和卢格合编的《德法年鉴》上）。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你们是像人那样有意识地生产，而不是像那些连类意识也没有的分散的原子那样，那末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但是只要你们继续照目前这样无意识地毫不思考地全凭偶然性来进行生产，那末商业危机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因而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样就必然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②

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就分别独立地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必须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性结论。这就大大超过了以往流行的关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的思想，也超过了那种认为不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幻想。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解决社会问题的态度就已经完

^① 在1842年底刊登在《莱茵报》上的通讯中，特别是在1843年刊登在《瑞士共和主义者》上的《伦敦来信》中，这些思想就已经成熟了。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指出了英国社会主义的肯定发展、各党派与社会阶级的联系、一个阶级的进步性取决于它的社会地位的事实、社会下层的进步性较大以及对于各种利益将推动新的社会革命的信念等。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4页。

全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在德国的同道以及費尔巴哈本人。这是用唯物主义的和辯证的观点考察历史問題的結果，因此他們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已經有了本质的差別。在这方面他們終于同坚持唯心主义和空想思想的蒲魯东和魏特林也发生了尖銳的分歧和冲突。完全可以理解，馬克思在这一基础上对人的宗教異化問題(這個問題是由費尔巴哈首先着手解决的)的理解也远为深刻得多。

費尔巴哈正确地看出，宗教实际上是人的自我異化的一种形式。他肯定說，一切宗教观念无非是人的观念，这些思想的产物(神)的一切特性无非是人的特性，人从自我本身中把它們異化出来，并认为它們是人自己創造的。

費尔巴哈在他的主要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写道：宗教是“人对本身本质的观念(这种本质不是最后的、有限的，而是漫无边际的)”^①；“人在本身之中找到自己的本质以前，首先把这一本质轉移到本身以外”^②。接着又写道：“你相信爱是神的特点，因为你自己在爱着；你相信神是聰明的、善良的本质，因为你不能从本身認識到任何比善良和理智更好的东西；你相信神是存在的……因为你本身是存在的”等等^③。人沒有意識到他自己就是这一切的創造主，是无限的自然界的最高主宰，于是就貶低了自己，并在

① 費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83年萊比錫德文版，第35頁。

② 同上书，第49頁。

③ 同上书，第56頁。在同一著作中，費尔巴哈作了如下的結論：“宗教，至少是基督教，是人对自己本身的关系，确切些說，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但这种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表現为对某种其他的本质的关系。神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是人的本质，或者說得更清楚一些，是从个别的即现实的、肉体的人的局限性中分离出来的人的本质，是物化了的即被設想和神化为某种其他的、和人不同的、自我的本质——因此，神的本质的一切定义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定义。”(同上书，第50頁)接着又說：“神是从人分离出来的最具有主观性、最具有自我性的本质，因此，人不能超乎本身而有所作为，因此，一切善良的东西都来之于神。主观性愈强，神愈具有人性，人就愈益異化其本身的主观性、本身的人性，因为神按其本身和对于本身來說乃是異化了的而又由神接受了人性。”(同上书，第72頁)

他自己所創立的假說面前匍匐为奴。

可見，創造活动不是起源于上帝，而是起源于人本身，因为他是所有这些幻想的第一个創造者。

但是馬克思並沒有滿足于这些結論。因为从这些宗教观念中發現世俗的基础，毕竟只是完成了这个重大任务的一部分。而进一步的、更为困难的問題，却不是費尔巴哈以他的心理学和人本主义的原則所能解决的。這個問題是：为什么人要实现这种自我異化？为什么人要制造这种幻想？

馬克思 1844 年在巴黎时，差不多把全部時間都用来研究這個問題，并把它扩展为經濟、政治、法和哲学之間的互相依賴关系的問題。我們从直到本世紀才出版的馬克思的著名手稿（《經濟学一哲学手稿》）中，可以看出他的見解的广度和深度。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們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相互交織着的；因此，如果不全面地理解人們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不可能探討意識形态这一領域。馬克思在当时就已經看到了經濟关系的首要地位，并把它理解为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实体”。他从階級剝削关系所引起的矛盾中，发现了人的異化的基础。

馬克思发现經濟的異化是宗教和思想異化的基础。在階級剝削的制度下，例如在工人生产商品的制度下，工人在这—生产活动本身中使自己的力量異化，从而創造了商品的价值。可是，这一产品本身却归另一个人所有，这样，那个人由于拥有經濟权力，实际上也成了政治权力的“占有者”。因此，工人在这种关系中感到自己是被異化了的。由于生活艰难并且不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和历史，他們必然要从其他方面寻求安慰。因此，群众的貧困是形形色色的宗教幻想得以滋长的具体的肥沃土壤。馬克思在 1844 年初写道，宗教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因为要求实现某种美好的世界的幻想，同时也就是对这个逐渐使人失掉最低限度生存条件的世界的一种抗議。

因此，共產主義作為獲得解放的人的社會，它的目的應當是使人從他的各種各樣的異化中，即從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異化中解放出來。在這裡，新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問題具有現實的基礎。

除了這個有關人的重大問題之外，馬克思當時還解決了哲學上的另外一個重大的問題——本體論和邏輯的問題，他特別是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中對這個問題作了簡要的論述。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再談^①。

雖然馬克思當時已經看到，經濟是人類歷史的基礎，同時也是個體的人的發展的基礎，但是他和恩格斯都還沒有在揭示歷史發展規律方面得出最後的結論。為了使共產主義本身充分地獲得科學的基礎，這一工作是必須完成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聖家族》（1845年）和恩格斯所著

^① 在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觀念作完整的論述時，將要更多地談到這些問題。這裡要強調指出的是，三十年代初，當這些手稿被公布的時候，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參加討論的有盧卡奇、布洛赫、霍爾克海麥、馬爾庫斯、提利克、施泰因畢歇爾等人，而在最近一次大戰以後，繼續進行討論的有梅勞-龐蒂、勒弗夫爾、薩特、博耳諾夫、霍姆斯、波皮茨、阿貝馬、莫爾夫、加羅迪等人。一部分人持有完全錯誤的論點，認為馬克思簡單地因襲了黑格爾的辯證法，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沒有根本的差別（波布茨、梅茨克），年輕的馬克思是海德格爾的先聲（霍姆斯），斯大林主義是年輕的馬克思的必然結果（施瓦茲希爾德）；另一部分人根據這些文章中特別強調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而同樣得出錯誤的結論，認為這是“真正的馬克思”（阿貝馬、博耳諾夫）；還有一些人則認為老年的馬克思是“真正的馬克思”（這主要是蘇聯官方的觀點）。這樣的劃分完全是任意的、不正確的，而這是由於不了解許多事實。當馬克思一旦得出了唯物主義觀念和唯物主義的人道主義關於人的觀念後（這是在1844年之際），他終生都信守這樣的觀念。他為爭取社會主義，為反對不公正、壓迫和資本主義剝削而進行的全部鬥爭，只不過是他的理論觀點的結果。而在他發展的後期，他之所以着重地研究經濟和政治的問題，是由於他正確地認識到：哲學本身還不足以從理論上闡明世界和從實際上改造世界。此外，認為馬克思摒棄了這個十分重要的異化問題，也是完全錯誤的。異化問題作為一個經常的主題，出現在人類生存的各個領域中。例如，在對資產階級關係所作的一個重要的分析中，即在揭示和分析商品拜物教的言論中（見《資本論》），或者在國家及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消亡的問題上，在關於廢除對人的統治而開始對物的管理的論點中（見馬克思論巴黎公社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論點等等），都出現了這個主題。

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表明他们朝这个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回德国的途中路过巴黎,他在马克思那里逗留了几天。他们再一次共同得出结论说,他们的观点和愿望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决定,首先要对自己从前的朋友布·鲍威尔及其伙伴给予答复,因为这一帮人反对他们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恩格斯在巴黎的这几天写了将近二十页手稿,随后便前往德国,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著作。马克思把手稿扩充到二百多页,这部著作在1845年初出版,书名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鲍威尔及其伙伴》。

尽管这本书在批判思辨方法、分析自我意识的思辨哲学等方面有许多引人入胜的重要论述,但是,最有意义的却是这样一些论点,它们表明马克思已经达到了对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解释。

鲍威尔认为,体现在杰出人物身上的自我意识即批判的批判,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马克思在反驳鲍威尔的这一唯心主义观点时得出结论说:“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知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知(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知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①

^①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引文删去了原文中的着重号。——译者注)

馬克思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規律不应当在思想領域中去寻找，而应当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即首先在經濟本身的发展中去寻找，他在同一著作中还研究了劳动和資本、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基本矛盾。他发现这一矛盾是現代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而这一矛盾的必不可免的解决則是未来的基本前途①。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結論。他看出，英国經濟的产业革命是英国現代发展的真实基础，也是階級对立的真实基础，它为今后的革命变革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因素。但是，这一新观点（它本身标志着人类精神发展中的一个革命阶段）在理論上的形成和深化，主要是馬克思的功績。恩格斯在他后来談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的一篇文章中，在回顾 1845 年春当他回到比利时（当时馬克思也正好被迫侨居在这里）的情况时也肯定了这一点②。

① 馬克思写道：“无产階級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們本身构成一个統一的整体。它們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私有制，作为私有制來說，作为富有來說，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階級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滿足的私有制。相反地，无产階級，作为无产階級來說，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約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階級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同上书，第 43—44 頁）

② 尽管从著作本身可以看出，馬克思在深化和形成新的世界观和社会观方面的貢獻要大得多，但是他在偉大科学事业中的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弗·恩格斯的論断也很重要。恩格斯在后来写的一篇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的文章中提出了包含現代历史上的这一新发现的結論，他写道：“当我于 1844 年夏天在巴黎訪問馬克思时，我們在一切理論方面都是显得意見完全一致的，从此就开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当我們在 1845 年春天在布魯塞尔再次会見时，馬克思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已大致完成了发挥其历史唯物論的工作，于是我們就着手来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詳細确定这些新見解了。

但是，这一发现，这一在历史学方面造成了变革，并且——如我們看到的——主要是由馬克思作出而我只是作了很少一点参加的发现，对于当代工人运动是有了直接意义的。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現在不再看作是一种同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一书(1845—1846年)中系統地論述了对社会历史及其規律的这一新观点。这部著作是他同恩格斯合写的,有些部分是同莫·赫斯合写的^③。书中打算首先对德国的意識形态問題,然后再对欧洲各个方面的意識形态問題进行彻底的清算。因为馬克思在这里所要解决的問題,是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痛苦摸索过的問題,是法国唯物主义最优秀的思想家(爱尔維修、霍尔巴赫)、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米涅、基佐)、德国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費希特、謝林、黑格尔)以及以往的許多其他思想家曾經努力要解决的問題。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态》里論述了上述观点的实质,这一論述同十多年后他在《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的著名序言(1859年)中的論述是很相似的。他写道:“由此可見,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該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

样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現象了。这些运动目前已被視為現代被压迫階級即无产階級的运动,被視為他們反对統治階級即资产階級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比較发展的形态,被視為階級斗争的形态,但是这一階級斗争和以往一切階級斗争的不同处,就在于現代被压迫階級即无产階級若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階級分化現象,因而摆脱階級斗争,便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共产主义从此已不再是要凭空想出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要理解无产階級所进行斗争的性质、条件及其由此种条件中产生的一般目的了。”(《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1—342頁)

③ 莫澤斯·赫斯肯定是德国社会主义的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他比馬克思年长些(生于1812年),1841年出版《欧洲的三人政治》一书,1843年出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一书。作为青年黑格尔分子,他受到斯宾諾莎和圣西門的影响,他把圣西門和黑格尔并列,并且力图把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帶到德国。他在这方面积极地影响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长。后来,他同他們在思想上发生了分歧,因为他走上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立場。与施蒂納一样,他在解决人的問題时,在許多地方使用了“異化”的概念。但是,施蒂納陷于极端主观主义,而赫斯則从未超过某种空想主义。

除了茲罗齐斯蒂和卢卡奇以外,近代有奥·科尔努写了评价他的著作:《莫·赫斯和黑格尔左派》(1934年)。

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須在国家生活的範圍內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闡明各种不同的理論产物和意識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們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終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釋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釋观念,由此还可以得出下述結論:意識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謬論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們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識’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結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資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資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見,这种观点表明:人創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創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現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資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們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們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識’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現的哲学家們的反抗,但它对人們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絲毫也不因此有所削弱。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蕩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現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說,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

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①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4页。（“唯一者”，在马克思的原文中加有着重号。——译者注）这一著作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的有关哲学问题，关于社会、阶级、道德和一般意识形态等问题的重要观点，关于这些，将在系统地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念时加以论述。

第二章 几个发展阶段

1846年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和整个世界的新观念已經基本上形成的时期。唯物史观和唯物辯证法是这种思想发展的成熟的、卓越的成果,是在人类思想的发展中无疑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成就^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就已經开始积极宣傳共产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組織;他們着手建立通訊委员会,而在布魯塞尔并建立了第一个小組,参加的有他們的好友威·沃尔弗、約·魏德迈、埃·威斯特华倫、伊·海尔堡、日果,魏特林也曾加入,但由于他对历史、革命和社会主义問題抱空想的、非科学的态度,結果很快就决裂了。

馬克思在当时就决定把自己研究理論的精力分一部分来批判政治經济学,因为他認識到,經济是历史結構及其发展的现实基础。作为这种研究的成果的第一部著作,就是馬克思对蒲魯东的《貧困的哲学》的回答。《哲学的貧困》(1847年)这部有名的著作表明,馬克思继承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資产階級政治經济学的古典成就,并接受了他們的劳动价值理論。

^① 某些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勒弗夫尔,认为在这个时期里仅仅創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哲学观念的創立則是五十年代的事。这种看法沒有看到,馬克思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正是自己的根本的哲学观念,关于人、实践、人道主义、真理等的观念。认为在这个时期,馬克思曾宣布取消任何哲学,这种想法同样也是片面的和錯誤的。尽管有某些容易引起爭論的提法,馬克思实际上所指的不是取消,而是实现(Verwirklichung)哲学。

然而，馬克思与过去一切政治經濟学理論家的本质区别正在于，他的新的历史观。斯密和李嘉图认为，他們的价值理論表述了一个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的自然的、永恒的規律，因此他們把資本主义理解为一种非历史的現象，而馬克思則对这整个理論提出了新的、具有本质差别的基本論点。“經濟学家們在論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資产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經濟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異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教則是神的启示。經濟学家所以說現存的关系(資产階級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財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時間影响的自然規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規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現在再也沒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經濟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資产階級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①

蒲魯东在 1844 年在巴黎进行的長時間的爭論中，自己也“傳染上了”黑格尔主义。馬克思通过蒲魯东的这个例子，再次說明了这种辩证思辨的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的以至故弄玄虛的性质。从哲学范畴推断出世界和从經濟学范畴推断出历史一样，都是徒劳无益的。“經濟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魯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顛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魯东先生告訴我們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經濟学家蒲魯东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圍內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

^① 《哲学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53—154 頁。

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①

从这种理论观点不仅必然得出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结论，而且也必然得出不同的历史结论。马克思认为，被压迫的革命阶级与一切生产工具不同，它具有最大的创造力，在这个阶级与现存生产关系的冲突中，马克思看到了现代历史的基本矛盾，以及被压迫阶级解放的必然性这个解决上述矛盾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前提。

1847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正义者同盟”，它很快就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11月底和12月初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并委托他和恩格斯拟定新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宣言。

《宣言》的前身是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因此，可以有根据地认为《宣言》是他们两个人的著作，尽管它整个是由马克思定稿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2月底，它很快就成为十九世纪最优秀的、最深刻的和流传最广的科学和文学作品之一。

马克思在宣言中以出众的文学笔调和思想风格概括了自己和恩格斯的观点。从阶级斗争问题开始，通过分析现代社会中上述各种对立和矛盾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任务和斗争的前景，直到批判以前的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宣言》是世界文

^①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144页。

献中唯一完整无缺的思想著作^①。

《宣言》是真正的海燕。首先是法国革命，以后又是德国革命，都向“共产主义者同盟”提出了新的、具体的历史任务。“同盟”的全体盟员陆续都来到德国帮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已经孕育着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马克思担任了科伦《新莱茵报》的总编辑，而恩格斯则参加维利希军团当副官。马克思在革命中拥护德国民主派的极左翼。但是，当动摇的德国资产阶级开始接二连三地失掉阵地，当1849年春法兰克福议会停止工作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了联系，而沃尔弗关于西里西亚的义务的文章，以及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文章，都明确地表明，这个报纸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的。

当俄国终于侵入匈牙利镇压革命时，德国反动派便于1849年5月18日封闭了该报。退却是英勇而又豪迈的，报纸的最后一期用红色油墨刊印，上面载有弗莱里格拉特的告别诗和告工人阶级书：“《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时，感谢你们对他们所表示的关怀。他们最后的一句话随时随地都将是：**工人阶级的解**

^① 关于《宣言》的理论观点，将在本书的专门部分加以系统的论述。这里，我只想援引列宁在他分析国家问题时提到的《宣言》中的重要思想。马克思表明，共产主义革命是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因此也是与传统的思想作最彻底的决裂。他又向无产阶级指出，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成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于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超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9—490页）

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因此也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消灭作为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统治的国家。在确定无产阶级对其他各种进步的、反对的政党和运动的态度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又向无产阶级指出这个斗争的最终目标，指出无产阶级必需的国际主义团结是它的历史性行动获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放！”^①

由于革命失败，德国共产党人不久又作为流亡者在伦敦出现。为了尽快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使它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写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这个文件也分发到其他国家里。这篇文章的篇幅虽小，但却是非常著名的。在《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作者向无产阶级解释了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采取的措施。由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派具有相对的进步性，无产阶级可以同它结成反对反动势力的暂时同盟。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目的是要赶快结束革命以推行资产阶级措施，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资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应该提出什么要求，坚持关于工人同农村无产阶级建立联系和结成联盟的论点，并指出德国工人阶级可能要经过较长的革命发展的道路，而法国工人阶级则有可能迅速取得胜利，最后他们两人宣称，工人自己“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

① 《马克思与〈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4页。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前的政治发展情况，可参阅黑尔维希·费德尔的一部详细的专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的前夜》，1960年柏林德文版。

②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2页。

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①。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综合的范例，文中预见到整整一个阶级关系、阶级变动、阶级对抗和决定性搏斗的历史时期。不断革命（对这个问题人们后来作了极为不同的解释）在这里被第一次明确而突出地提出了。不管他们当时是否相信革命会迅速地重新来临，但他们完全正确地把不断革命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无产阶级必须并准备继续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致力于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筹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面发表了著名的文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发表了《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非常熟悉法国的历史，当雾月十八日一周年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机会，运用他的新观点来分析这个时间还没有隔得太远的具体历史事件。

马克思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分析表明了法国革命的经济背景和阶级背景，撕掉了六月血腥屠杀工人的罪魁祸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假面具。而且他还同样明确地揭露了，路·勃朗、蒲鲁东等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说教是反动的和荒谬可笑的。马克思坚持自己过去的关于组织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立场，同时又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在理论上明确地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最根本之点就是工人阶级必须掌握生产资料。“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

^①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9页。

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資本，而控制資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資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階級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資本及其相互間的关系。”^①

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明确規定了与其他一切关于組織新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截然不同的革命共产主义的要求。除此以外，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在对当时整个的經濟和政治运动作了詳尽的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結論：还没有面临着新的革命，如果不发生新的危机，新的革命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在《历史評論》杂志 1850 年第 5—6 期的最后一分册的評論中提出了上述观点，正是由于这个观点，他們与維利希、沙佩尔、弗兰克尔和列曼彻底决裂了。这些人狂热地非批判地幻想“制造”革命，筹集供最必要的准备之用的款項，并等待美国的貸款，而馬克思却严肃地对待革命問題，要求对一切情况和可能进行科学的分析。在 1850 年 11 月 15 日（应为 9 月 15 日。——譯者注）“同盟”中央委員会上，六个盟員（馬克思、恩格斯、鮑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和康拉德·施拉姆）表示反对維利希集团的革命浪漫主义。为了挽救“同盟”，大多数人主張把总部迁到科倫，而 1852 年底在有名的、伪造的科倫审判案以后，并解散了同盟^②。

在这个时期，由于物质上的困难，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欧門—恩格斯公司当办事員，馬克思則留在倫敦，繼續他业已开始的經濟研究，并为各种不同的报纸撰稿，以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他以通訊員的資格为《紐約每日論壇报》撰稿的年限特別长）。

路易·波拿巴政变以后，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书中以非常明确的分析，对这个由許多人作过不同解釋的事件作了合乎实际的說明。

^①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7 頁。

^② 参閱馬克思《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3 年）一书有关該問題的部分。

从理論角度来看，这本书对我们來說是很重要的，因为书中第一次得出进一步的結論：在革命中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国家：“現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鍛炼出来的軍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廢墟上建立起来。”^①

后来有人批評馬克思主义說，在馬克思主义中經濟因素直接决定一切，既决定思想又决定行动，而思想体系和个人則沒有任何积极作用。只要提出馬克思的这部著作，就足以駁倒所有这些批評。这部著作如此綜合地、全面地概括了历史事件的进程，并对它們作出了馬克思主义的解釋。馬克思沒有忽略經濟因素和人类的、个人的因素的意义。因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梦魘一样糾纏着活人的头脑”^②。

馬克思在这几年中生活很困苦。尽管他处境这样困难（恩格斯总是誠摯地給以帮助），五十年代末他还是完成了他后来的《資本論》这部主要著作的序。《政治經濟学批判》这一著作也具有独特的理論价值，而且它的序言也很著名。馬克思在序言中以他固有的非常簡练的笔調，只用一頁的篇幅便概括了自己关于历史及其发展的基本观点。我們在这部历史中不能不提到最經常被引用的一段天才的綜合，因此我們把它全文抄录下来：“人們在自己生

①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3頁。在第一版中，这里的說法略有出入，但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在該版中，有一句話更是預見性地要求无产階級注意它的真正同盟軍：“打碎国家机器絲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贅时的低級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侖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拋棄；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階級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鴻哀鳴的。”（同上书，第665頁）

② 同上书，第121頁。

活的社会生产中参与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树立起来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经济生产条件方面所发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学精确眼光指明出来的物质变革，去与人们所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术的或哲学的形式，——简言之，思想形式，——分别清楚。正如我们评判一个人时不能以他对于自己的揣度为根据一样，我们评判这样一个变革时代时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恰巧相反，这个意识正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现存的冲突中求得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它所给以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所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胚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会抱定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我们仔细去看时总可看出，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說

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那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一种对抗；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母胎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就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而，人类社会的前史与这种社会形态一起结束。”^①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唯物史观的实质。在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在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关系的讨论中，不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同起来，就是把它变为某种更为一般的关于社会的哲学理论。

但是，唯物史观既不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不是关于社会的哲学理论。唯物史观，就如其名称本身所标志的，是对社会过程进行的社会学研究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基础部分。正如任何资产阶级社会学都有自己的某种一般的理论基础即一个关于社会和人的观点一样，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所提出的，也正是一个一般的、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它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加以解释的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这个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

在发表了这一著作以后不久，1860年同卡尔·福格特发生了争论。为此，马克思写了著名的论战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1年）^②。

这几年来，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II—III页。

② 梅林和梁赞诺夫对这部著作的评价是不一致的。梁赞诺夫这样叙述了这一分歧：“梅林完全忽视了流亡者中间发生的主要争执。他没有看到，在这个似乎纯粹是个人的事件的后面，隐藏着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深刻的战略性分歧，而且正如拉萨尔事件所表明的，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危险的动摇。梅林也看不到，在这本反对福格特的书中，拉萨尔及其伙伴们的一切论据也都受到了批判。”（德·梁赞诺夫：《马克思和恩格斯》，1952年贝尔格莱德塞文版，第141页）

件。斐·拉萨尔^①在工人中间进行了众所周知的鼓动工作，并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鼓动工作是以若干基本要求和论点为根据，首先是以普选权的要求和关于“铁的工資規律”的论点为根据的。他断言，这个規律不允許工人的工資超过一定的最低限額。

由于他的“现实的政策”、依靠普魯士国家的态度和理論上的錯誤立場与空虛，他同曾經友好过的馬克思发生了冲突^②。

在当时，拉萨尔的这种活动毕竟还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从理論上看，必須注意到，拉萨尔从未克服过黑格尔的思辨，而从政治上，他幻想普魯士王国能推行有利于工人階級的民主改革，这就必然导致改良主义，甚至敗坏工人階級革命政策的名声。正是这种观点以后成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內占統治地位的观点，因此可以有根据地說，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更接近拉萨尔，而不是馬克思。

正是在那几年里，发生了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1864年9月20日，在倫敦建立了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

①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和有非凡天才的人物。他是法学家和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巨著(《爱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剧本《弗兰茨·馮·济金根》(1859年)以及法学和經济学著作《取得了的权利的制度》(1861年)和《巴斯提阿特—舒尔兹·馮·德里奇先生，或資本和劳动》(1864年)的作者，革命后第一个工人联合会的創始人，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个空虛的、爱虛荣的和在政治上无原則的人。逝世以前，他曾着手同普魯士国家和俾斯麦商談訂約，认为这样就会战胜資本主义。由于拉萨尔决斗而夭折，他的这些观点才沒有发展到完全敗坏他个人和他的有功績的事業的名声。

② 馬克思在致庫格曼的信中这样說明了他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从事鼓动期間，我們的关系中断了，这是：(一)由于他喋喋不休地从事自我吹嘘，同时他又极无耻地剽窃我以及其他某些人的著作；(二)因为我毅然指斥了他的政治策略；(三)因为我在倫敦这里，早在他从事鼓动以前，就向他詳細地解釋和‘证明’过：由‘普魯士的国家’进行直接社会主义的干涉，是一种謬論。……”(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1865年2月23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5頁)

第一国际完全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而它能够顺利地克服空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则应该首先归功于马克思。马克思从国际一成立起就热诚地投身于这一事业，他认为这不仅是实现自己的理论思想，而且也是实现现代历史的基本任务的唯一可能的实际杠杆。

早在制定国际的章程和纲领时，由于参加这一工作的人（沃尔弗、韦斯顿、勒·鲁比兹等）本身持有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就产生了最初的困难。当时，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和社会主义者中间还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工人阶级还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在工人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观点^①。

马克思通过他的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解决了这些困难。他以《成立宣言》为基础，在不违背自己的基本立场的条件下，团结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派别。马克思告诉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说：“我们的意见要在一种能为工人运动中现有的观点所接受的形态中表现出来，要把事情安排得这样是很困难的。在几个星期之内，这些人为了投票权，将和布莱特及科布顿举行会议。

^① 指奥·布朗基（1805—1881）、约·蒲鲁东（1809—1865）和米·巴枯宁（1814—1876）的观点和学说。奥·布朗基属于法国革命运动中最光辉的形象之列，尽管他的策略是错误的。他主张并在实践中贯彻这样一种思想：必须依靠一批为数不多的杰出的革命者，用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他的主要著作是《社会批判》（1885年）。约·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他主张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实行改良，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他的主要著作有：《什么是财产？》（1840年），《经济矛盾的制度》（1846年），《社会问题的解决》（1848年），《交换银行》（1848年），《人民银行》（1848年），《进步哲学》（1853年）。米·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的典型代表者，他只进行暴动的组织工作，以图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和一切国家。他害怕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力图破坏国际的活动并使国际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他的主要著作是《国家与革命》（1873年）。

重新兴起的运动允许使用旧时勇敢的言词，还需要一些时候。行动强硬，态度柔和，这是必要的。”^①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内的政策，直到今天仍应成为国际工人合作在许多方面的典范，因为今天工人运动还未统一，在许多观点和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且尽管这样，社会主义却面临着自己的最后斗争和最后进程的的决定性时刻。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当现在许多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殖民地解放、落后国家提高到现代水平的任务以及人类的生存本身还成为问题的时候，今天能像过去一样，使理智战胜许多策略性的和纲领性的分歧。

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都阻碍不了马克思，国际的许多次代表大会每次他都自始至终地参加了，以便让工人阶级完全意识到它本身的地位和求得解放的方式。他从不吝惜自己的劳动和时间，通过制定纲领、章程、成立宣言和许多报告，提出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发展和斗争的看法，从而教育无产阶级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和解释它本身的斗争。

因此，马克思在国际的章程（这个章程直到1871年9月在伦敦代表会议上才被通过）中提到：“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止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垄断者支配，是一切奴役制度所赖以支持的基础，是任何社会贫苦、精神低贱和政治屈从状态所赖以支持的基础；

所以，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乃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先前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作的一切努力，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团结不够，由于各国工人彼此间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64年11月4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27页。

缺乏亲密联合，总是沒有收到效果；……”等等^①。

1872年9月补充的第七条附則，重新強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过去向工人階級提出的基本原則之一：“无产階級在它进行反对有产階級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自己已組織成为独立政党以与一切由有产階級建立的旧政党相对立时，才能作为一个階級来行动。

无产階級这样組織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达到这一革命的終极目的——消灭階級。”^②

在談到馬克思在国际内的活动时必須指出的其他理論观点中，特別要提到的，是馬克思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問題，以及关于許多社会主义者（蒲魯东主义者和后来的修正主义者等）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常常特別注意的合作化运动問題的观点。

关于这些問題，馬克思在他为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而給国际总委员会所作的指示中写道：“我們认为，現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偉大的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規律的趨勢，虽然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九岁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应当服从一般的自然規律，这个規律就是：为了吃飯，他必須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③

从馬克思的这一見解中，可以看到他关于人的解放問題的許多理論观点之一。不管这一过程經過的各个阶段将是什么样的，从人类生产和总的生产力的必然的高度成就来看，这一过程只能

①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規章》。《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3頁。

② 同上书，第365頁。

③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第一国际》，1950年貝尔格莱德塞文版，第60頁。（“生产事业”，在馬克思原文中为“社会生产事业”。——譯者注）

随着大分工的消除，即随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的消除而获得最终的解决。特别在现代原子能和电子学的发展前景下，人将怎样实现这点，这是一个实际技术的问题。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来说，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是非常必要的。理论上很清楚，为了生活而仅仅固定在一种劳动形式上，是束缚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全面发展，比起他的许多能力中的一种能力的部分发挥要复杂得多和丰富得多。

马克思承认合作化运动是改造现代社会的力量之一，并指出了自由的、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这个问题，认为这种联合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是有远大的历史前途的。他在指示中写道：“但是，合作制度限于狭小的形式（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只能创造这种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单一的、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①

历史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因为，只要存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总是落后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还仍然控制着国家机器，而一旦资本主义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这个国家机器就会立即行动起来。这清楚地表明，从根本上来看，任何阶级统治实质上都是统治阶级的专政。

马克思在他的指示中，同样还确定了社会主义对民族问题和工会运动的明确立场。法国人在总委员会中坚持的论点是：民族是“陈腐的成见”，应该把它们溶解为小组或公社，它们再构成联合会，但不是国家。与此相反，马克思却认为民族是一种不能消灭和忽视的必要的产物，他维护民族自决的论点，而反对任何标准民族

^①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第一国际》，1950年贝尔格莱德塞文版，第63页。

的說法^①。

馬克思在當時關於工會運動的含意、需要和意義的爭論中，堅決認為在工資和勞動時間的問題上，“只要還存在着現代生產方式，就不能”沒有工會和工會鬥爭。“相反，這種活動還應當通過各國職工會的建立和聯合而獲得普遍的開展。另一方面，職工會本身也未意識到，它們已經變成了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在原文中“中心”兩字下有着重號。——譯者注），正如同中世紀的自治市和公社是資產階級的組織中心一樣。如果說職工會對於進行勞資之間的游擊式的鬥爭是必需的，那末它們作為消滅雇傭勞動制度本身和消滅資本權力的一種有組織的力量就更為重要了。”^②（在原文中在“作為”、“就更為重要了”下面沒有着重號。——譯者注）

在那個時期，國際內部馬克思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之間的爭論非常激烈，因此在布魯塞爾的代表大會（1868年9月6—13日）上，終於同蒲魯東主義者徹底決裂了。蒲魯東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觀點在那個時期再也站不住腳了，他們中間以托倫和弗里布爾為代表的右翼脫離了工人運動，而以瓦爾蘭為代表的左翼則日益接近馬克思的思想。國際在那個時期同統治制度進行着日益尖銳的鬥爭，而它面臨的却是同巴枯寧及其追隨者之間的嚴重的內部不和。工人運動的多數加入了國際。拉薩爾的工人協會（拉薩爾死後由施韋澤領導該協會）卻沒有加入國際，這是少數的一個情

^① 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談到了這些爭論：“我的演說詞的開端是，我們的朋友拉法格等已經鏟除了民族性，用法語對我們演講，就是用聽眾中十分之九不懂的一種語言演講，我這段話引起英國人的大笑不止。我更着重地說，他在否定民族性之下，似乎是完全不知不覺地把他們吸收在法蘭西的標準民族之內。”（《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388—389頁）同樣，不久後馬克思就愛爾蘭問題寫道：“奴役別的民族的民族在為自己鑄造着鎖鑄。”（《總委員會的秘密通知》。《致庫格曼書信集》，第125頁）

^② 《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第一國際》，1950年貝爾格萊德塞文版，第64頁。

况。但是，由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革命活动的结果，1869年在埃森纳赫建立了新的社会民主工人党，它立即加入了第一国际。当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建立时，俾斯麦正力图实现其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大德意志的野心，为此，在战胜奥地利（1866年）以后，他需要再取得一次类似的成功。同样，拿破仑第三也想这样做，以巩固他的王国的薄弱的基础。俾斯麦的阴谋得逞了。于是1870年7月爆发了战争。而此后不久，便发生了色当之役。

马克思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写道，不管战争发展如何，拿破仑第三的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模仿剧。

在王国的这出丑剧以后不久，出现了法国无产者和社会主义者最英勇的行动之一——巴黎公社。当梯也尔以新政府的名义企图解除革命的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和没收蒙马特尔的大炮时，政府军却和人民及国民自卫军和好了，并于1871年3月18日宣布成立公社。

巴黎公社社员的无比英勇的精神和创造性，为马克思证实了他过去的某些理论观点，同时也成为他以后的某些十分重要的结论和预见的基础。

首先，公社向马克思表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国家机器，而应该打碎它，建立自己的新的国家机器。迄今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对待旧国家的态度问题的这一基本思想的正确性。至于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和政治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马克思把公社看作是未来的工人阶级政权的根本结构。马克思在他的有名的第三篇《总委员会的宣言》中写道：“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按普选制选出的城市代表所组成。这些代表应该负责并且随时可以更换。其中大多数自然是工人或已被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应当不是国会式的，而是同时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团体。向来都是中央政府工具的警察，立刻就被革除了一

切政治职能，而变为随时可以撤換的公社負責机关了。其他一切行政部門的官吏，也莫不如此。从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所有一切公務人員，都只应領得相当于**工人工資**的薪水。高級国家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和办公費，都随着这些官职的消灭而消灭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不仅是城市管理权，而且先前屬於国家的全部主动权，都已轉归公社。”^①

上述有些問題，諸如領取相当于“工人工資”的薪水和公社代表“随时可以撤換”的問題，对于現代的历史运动和情况來說，还是非常理想的思想。馬克思在后来的《哥达綱領批判》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权利——这在历史上是唯一公平的，如果不想以某种平均主义来阻碍一般經濟和社会进程的話。但是，管理机构的負責和撤換問題，仍是未来的任务，是新的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更成熟和更发达的阶段上必定为之創造条件和必定要實現的任务。

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馬克思的下述結論：“巴黎公社自然应当做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要把各个省区里的位置也让給生产者們的自治机关。”^②

在同一个論点中，馬克思关于工人階級經濟解放的基本理論思想，得到了組織上的解决：不是代表工人階級和人民領導整个經濟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国家机器，而是“生产者的自治”，而“生产者的自治”即工人委員會（不管它的形式和組織結構是什么样的），乃是这样一种形式，它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成为多余的。而这也就是苏联的現代国家主义和南斯拉夫的逐步實現社会管理，即

^① 《法兰西內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8—499頁。

^② 同上书，第499頁。

反对国家主义的过程（唯有这一过程才能从根本上制止国家壟断的莫大势力变为凌駕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之上的官僚国家主义的力量）之間的主要爭論之点。

巴黎公社失敗后，欧洲局势的特点是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俾斯麦的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制造了反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叛国案，判处了他們的徒刑。英国工联日益轉向經濟斗争和改良主义的道路。法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四分五裂。而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本身内部，也发生了爭执。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們不同意馬克思有关法兰西内战的《宣言》，魯克拉夫特和奥哲尔并退出了国际。同时，巴枯宁也加紧了对总委员会和馬克思本人的攻击，这样一来，在1871年9月举行的倫敦代表會議上，巴枯宁主义的問題就成为主要問題了。

在这次代表會議上，放棄工人阶级的有組織的斗争并宣布革命以后必須消灭任何国家和建立无政府状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又遭到了失敗。因此，双方都为1872年9月将在海牙举行的代表大会积极进行准备。代表大会重申了馬克思的观点，同时肯定巴枯宁沒有解散他在国际内部秘密組織的“同盟”，因此大会把他和吉約姆开除出国际。

馬克思与巴枯宁之間的分歧，对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具有原則的理論性质和深远的实际后果。梅林在他的关于这些問題的一般說是出色的著作中低估了上述爭論的意义，因为这里不是什么野心或权威問題，而是現代“劳动和資本”之間的巨大斗争中的关键問題。在取得初步胜利后，应该怎样进行这一斗争和怎么办呢？这是决定现代社会斗争的成就、速度和性质的中心問題。馬克思把重点放在工人阶级有組織的、群众性的政治和經濟斗争上以及由这个斗争而产生的社会革命上，放在建立一个为保卫革命果实和实现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政治武器的新国家上，而巴枯宁則坚持秘密小集团的立場，坚持暴动，坚持在这类革命后打碎任何国

家的立場。馬克思的立場把劳动群众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使他們积极行动起来，并培养他們以迎接以后的偉大行动。而巴枯宁的立場却使群众消极无为，从而使他們对事业的最困难的部分毫无准备。这部分最困难的事业就是：接管社会职能，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必定是以生产者 and 全体劳动人民的自治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至上的知識界或国家官僚为基础。因此，这里所談的是具有决定性的理論問題和实际政治問題。

除了这些問題以外，在馬克思主义問題的理論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代表大会閉幕之后，馬克思于 1872 年 9 月 8 日立刻在阿姆斯特丹发表了演說，这篇演說于 1872 年 9 月 12 日按照速記稿发表在《法兰西共和国》上。对于人們如此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过武装革命还是通过和平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問題（这已作为二者擇一的选择而被非辯证地提出来）馬克思談到：“但我們从来沒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即实现社会主义。——作者注），必須采取一式一样的手段。

我們知道，必須考虑各个国家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认，像美国、英国——如果我更了解你們的制度的話，也可能还要加上荷兰——这样的国家，工人們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应当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們革命的杠杆；为了最后建立劳动的統治，在特定場合下我們应当采取的正是暴力。”^①

这番話有着多么不平常的意义！在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多少次提出过这样的对立：是武装革命还是进化？从馬克思时代起，經過修正主义到現代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已經有多少次非辯证地确定过这一种或那一种解决办法。今天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理論上还是多么不成熟，仍然經常看不到：这两种解

^① 《新路》第 5 期，1958 年巴黎法文版，第 11 頁，譯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64—265 頁。

决办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面；每个国家，根据其发展程度、内部力量和矛盾、傳統和思想等等，在这两种解决办法中有一种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对这同一个国家来说，在特殊的历史情况的凑合下，另外一种解决办法也可能是决定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应该把这两种解决办法中的一种从变革社会关系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中绝对地排除掉。因此，在某个国家里，仅仅为了武装革命而培养革命力量，如同仅仅为了改良、进化和民主道路而片面地机会主义地培养革命力量一样，也可能给革命运动带来致命的后果。过去的历史，特别是我们这一世纪的历史，已经有好几次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

上述事件同时也是第一国际采取的最后一个人比较重大的行动。由于在欧洲、在工人运动和国际本身中的这一连串错综复杂的事件，总委员会要留在欧洲各国是非常困难的。美国没有这种情况，同时，在美国强大的工人阶级也发展起来了。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到纽约的建议被通过了。国际又勉强维持了几年，到了1876年，总委员会终于宣布，国际不再作为统一的组织存在下去。

国际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它的队伍里，锻炼出了许多革命干部，他们后来在组织工人运动的事业中将承担起新的任务。第一国际有幸在它的队伍里出现过像马克思这样的人物，它应当感谢马克思澄清了许多对现代阶级斗争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问题。由于第一国际的活动，工人阶级意识到了自己的国际性质和国际团结，尽管这一思想直到今天还没有成为工人阶级国际行动的坚定不移的基础。

在所有这一切事件以后，基本上进入了马克思活动的最后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又发生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了特别有价值的表现。恩格斯终于在1870年迁居伦敦，并在国际里日益代替了马克思。

由于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合并，一个重要的理论文件产

生了。拉萨尔派在德国的处境日益困难而要求合并，爱森纳赫派也有同样的愿望。在哥达召开的统一代表大会上（1875年2月），还通过了一个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由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容忍和许多让步而产生的这一纲领。马克思曾经就这件事写信给白拉克说，“一步实际运动胜于一打纲领”^①，并在他对纲领的评语中，提出了一些具有特殊理论意义的思想。

马克思在这里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为突出和确切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所谓共产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的思想。由于空想的思想方式对马克思从来是格格不入的，由于他透彻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社会结构的职能，因此马克思在他批驳拉萨尔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偏见时强调指出：必须了解，革命以后，我们遇到的是从资本主义中脱胎出来的社会，它带有那个时代积累起来的一切消极的东西。“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已经在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每一个别的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中正好领回他所给与社会的一切。……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那个调节商品交换的原则，因为商品交换是同等价值的交换。内容和形式在这里都改变了，因为在变更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谁都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供给，另一方面，也因为除了个人的消费品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但是，说到消费品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着在商品等价物的交换里也通行的那个原则，即一种形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可以与另一种形态的同量劳动交换。

所以，这里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虽

^① 马克思：《致威·白拉克的信》（1875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页。

然原則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但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則只是**平均地**存在着,而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場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有一方面还仍然受资产階級范围的限制。生产者們的权利是与他們供給的劳动成**正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平等的尺度**——劳动——来計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貢獻的劳动量較多,或者能够工作的時間較长;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应当按照時間长度和劳动强度来确定,不然劳动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个**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是个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的階級差別,因为每个人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只不过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种天然特权。所以根据**其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种不平等的权利。……**

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在它經過长久的产育苦痛以后剛剛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經濟制度以及由此經濟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①

这里实质上是概括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任何行政措施都不能消除这些矛盾,而只能使之緩和与不加剧。用行政方式宣布,这个阶段已被超越,某个社会正在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比如在近二十年来,俄国曾經两次这样宣布过)——同时經濟結構还不能取消分工,不仅仍然产生着资产階級法权,而且还經常产生资产階級关系——这只能說明,对馬克思的思想了解得很差。

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級阶段上,当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后;当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已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經不单单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为乐

^① 《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22頁。

生的第一要素时；当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在各方面的发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财富源泉都尽量涌现出来时，——只有那时，才可把资产阶级式的法权的狭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哥达纲领》中所表现出的理论上的不成熟性，受到了马克思的尖锐批评，同样也受到了恩格斯（在他的某些信里）的批评。这种理论上的不成熟性在那个时期是不足为奇的。在整个第二国际时期，它经常以更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问题的这个理论方面，特别是哲学方面，是那个时期的最贫乏的方面之一。

与此同时，在1875年前后，由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最初批评家之一、大学讲师欧·杜林的出现，这些弱点便暴露出来了。当时，杜林对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某些科学部门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评价，尖锐地批评了黑格尔和一般辩证法，因而哄动了大学生和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到1875年，他们中的一些人，首先是李卜克内西看到，杜林的观点不仅是混乱的，而且是错误的，因此请求恩格斯予以回击。恩格斯并不乐于同杜林进行论战^②，因为他在紧张地研究自然科学问题（后来他的手稿被收集起来而在1925年作为《自然辩证法》一书出版）。对于发表恩格斯关于杜林的文章，有些社会党人（特别是莫斯特）在1877年哥达代表大会上所持的意见是，读者对这些文章不会感兴趣，建议不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登载。由于倍倍尔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才改变了这种情况。折衷方案是，由于论文本身的篇幅大，因此不登在《前进报》本身上而登在它的科学附录上。以后在1878年这些论文才以单行本出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曾经是，而且

^①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② 参阅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76年5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02页。

現在仍然是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虽然是論战性的,也就是說不是系統地分析一切哲学的、社会学的和經濟的問題,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馬克思主义关于上述各方面的基本观点的扼要叙述。同样,这一著作在多数国家中起了推广馬克思主义的头等的的作用^①。

我們不能像人們有时希望的那样,把这一著作以及后来写的关于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与关于費尔巴哈的著作,看成是恩格斯力图使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系統化,从而詳尽地分析了这方面的一切主要問題的結果。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通过論战解决了一些甚至是强加于他的(例如由杜林所强加于他的)問題,而且同后来的著作的情况一样,他由于忙于一系列其他的政治任务 and 整理馬克思的遺著(出版《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仅仅提出了他和馬克思的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基本原則。在这里他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某些問題,而对某些問題則分析得不够甚至分析得片面。恩格斯在他給梅林、布洛赫和施米特的最后几封信中突出談到了上述这些問題^②。此外,恩格斯沒有馬克思那样深的天才,而經常是为了通俗化和由于理論上无可非难的具体情况,以簡單的形式提出一些問題。所有这一切說明,必須遵从恩格斯这些著作的遺訓和指示——并且要走得更远些,克服一定的片面性,根据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以至科学发展和哲学发展,来丰富

① 关于这一著作以及恩格斯后来的一些著作的基本思想,在本书的理論部分作了探討,因此这里沒有必要来援引。

② 主要參見恩格斯《致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以及《致海·施塔尔根堡》(1894年1月25日)这几封信。恩格斯在他生前最后时期写的这几封信中,特别是在致敏·考茨基和姆·哈克納斯的信中,也提到了自己对艺术、艺术傾向和现实主义等問題的观点。因此,这些书信同他和馬克思1859年就拉薩尔的《济金根》一剧致拉薩尔的信一起,是研究他对于艺术問題的观点的重要原始材料。除了卢卡奇关于这些問題的著作之外,还可參閱彼·德梅茨著:《馬克思、恩格斯和詩人》,1959年斯图加特德文版。

馬克思主义問題;并使之不断深入。在这方面,恩格斯的著作和馬克思的著作一样,永远是那种最具有独创見解、最富有新鮮气氛的文献,这种文献产生了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新观点。

这个时期,由于俾斯麦頒布了旨在扑灭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187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到严重的危机。党对这种措施沒有准备,因此发生了分化:一个由伯恩施坦、赫希柏格和施拉姆組成的集团企图提出它的机会主义观点,声明反对秘密活动和阶级斗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給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对这个所謂“苏黎世三人集团”的观点作了尖銳的批判,反对“通过热情的鼓动来爭取資产阶级”的观点,反对中間政策,并有預見地作出了这样的結論:“既然甚至党的领导在某种程度上也落到这些人手中,那就是說党簡直受到了閹割,再也沒有无产阶级的毅力了”^①。

必須注意到,苏黎世三人集团之一的伯恩施坦就是二十年后出現的修正主义的主要人物,正是这类人物使第二国际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必須特別說明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因为后来的修正主义者把它作为真正代表恩格斯对革命問題的观点的重要文件和論据。这就是恩格斯为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这篇导言因为是恩格斯在1895年3月即逝世前几个月写的,所以被称为他在理論上的遺囑。

正是这个伯恩施坦断言:恩格斯否认革命是取得政权的手段,并宣布議會道路是比較适宜的道路。尽管恩格斯写这篇导言时考虑了李卜克内西要他“緩和些”的請求,但恩格斯在实质上絲毫也沒有放棄他和馬克思的观点。他只是強調了某些历史經驗,首先是說明了現代街垒战斗是十足幻想的东西(因为它們是防守性的、消

^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通告信),1879年9月中旬。《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5頁。

极的)，并指出了在那些年代里取得重大成就的议会斗争的意义。但是归根到底，他从来没有否定过革命。

当时必须赶快澄清被修正主义者掩盖的基本问题：街垒战斗并不是革命。革命是攻击、掌握政权、改变社会关系，而街垒战实质上却是防守性的。因此恩格斯完全正确地作出结论说：“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在街巷斗争中起义方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罕有的例外。但是，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稀罕的。起义者方面的全部问题，是在于要以精神的影响动摇军队的士气，而这种精神的影响在两个交战国军队间的斗争中是不发生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也只能发生少得多的作用的。如果这一点作成功了，那末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弄得惊惶失措，而起义者就会获得胜利。……”

这样，即使是在街巷战斗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主要是起着精神上的影响，而不是起着物质上的影响。街垒是一种动摇军队坚韧性的手段。当街垒能坚持到保证实现这个目的的地步时，斗争结果就获得胜利；当它不能坚持到这个地步时，斗争结果就是遭受失败。”^①

恩格斯正确地指出，由于军队、军事技术和武器的巨大进步，工人阶级正面临着新的情况。他实际上是重申了他和马克思一直强调的观点：革命不是由少数优秀的人们进行的，我们必须牢记，“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变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进行着斗争，究竟他们是为了什么而努力。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教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事，就必须进行一番长期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进行着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

^① 《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7—109页。

竟使敌人陷于絕望了。”^①

恩格斯对上述这项工作和議會斗争的好处和效果不抱任何幻想。他特別強調，必須經常使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保持这样的增长程度，“我們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統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②。由此可見，恩格斯根本沒有把这个“决战的日子”設想成一个友好联誼的节日，而是把它看作一場决定性的階級搏斗，为此必須发动一切未經发动的力量。“革命权是唯一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現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③，恩格斯在同一篇文章中就以这些话再次論证了对上述問題的基本观点。

恩格斯直到晚年，在他逝世之前，在分析和評價人及其历史性的行动方面，始終保持着革命的明确性。

① 《马克思〈法兰西階級斗争〉一书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頁。（“为了什么而努力”，在恩格斯的原文中为“为了什么而流血牺牲”。——譯者注）

② 同上书，第112—113頁。

③ 同上书，第112頁。

第二篇

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

第一章 哲 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世界观——辯证唯物主义——是和他們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时产生的。但在当时，即上一世紀的四十年代，理論历史的問題显然仍旧被看成为哲学的問題。因此，他們在自己发展的早期还没有把这些問題加以区别并划分为各种專門的科学問題。只有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一书中才可以看出馬克思从历史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对历史所作的解釋的区别。直到以后，恩格斯在研究哲学的对象时，才把哲学同社会学以及其他的问题比較彻底地分开。

同时，由于社会学問題（在四十年代它仍然属于哲学的范围之内）是当时的主要問題，并且是和当时人們的历史意向和历史前景有关的問題，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首先明确地形成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观点，至于唯物辯证法实际上已經不言而喻地包括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之中了。馬克思只是在早期对邏輯認識論和人类学問題作了較多的研究，而且他也是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辯证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問題的。

由于馬克思以后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限于經濟領域，他力图給工人階級提供一种有切实根据的观点，以观察資本主义的經濟結構、規律和矛盾，从而認識到通过斗争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来克

服这些矛盾的必要性，所以恩格斯就更多地从事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因此，除了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以外，恩格斯后来写的关于杜林、路·費尔巴哈和关于自然辯证法問題的著作就成了这一新的世界观——辯证唯物主义——的主要的源泉。

但是，必須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通过超越康德、費希特、謝林而走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发展道路上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的。

康德的二元論已經不能滿足他的直接继承者。先驗意識的創造說在邏輯上已被費希特的哲学导致了它的极限。正是因为这样，費希特的哲学忽視了客观性。从費希特的絕對唯心主义中引伸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結論不能成为解釋整个现实的一元論的基础。謝林关于客观性复归的說法还是缺乏充足的理由，于是黑格尔担負起已經由費希特提出的任务，用一种观念論的原則來說明其他一切过程的必要性，即以范疇的演繹法来展开整个的科学体系。

同时，一切二元論或多元論从一方面来看是折衷主义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們又无力解釋存在即实体或现实的各种不同的絕對形式的关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一元論虽然体系龐大，但却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点：第一，用范疇演繹法来解釋自然界至少是令人很难理解的；第二，他的包括了基本思想要素的体系，必然会由于思想的特性，而归結为最終的絕對观念的自我認識（黑格尔的絕對知識），这个体系甚至于把一个历史时期（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宣布为这一发展的历史頂点；第三，在思想的这种泛邏輯的发展中，人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的行动却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这些原因，在三十年代，对黑格尔的背棄和批判就已經开始尖銳起来，当时的批判有这样几方面：一、施特劳斯和鮑威尔对福音书的批判与鮑威尔的自我意識哲学；二、費尔巴哈的唯物主

义；三、施蒂納的絕對个人主义；四、克尔凱郭尔的存在主义；五、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辯证法和人的观念^①。

由于以上的原因，尽管黑格尔的观念是必然要被战胜的，但是，作为哲学思想和人类实践的以往的结果，他的努力，从以下这些方面的認識来看无容爭辯地有着积极的效果：

第一，基于上述理由，任何二元論或多元論都不可能是彻底的；**第二**，某种坚决的怀疑主义表明，它不仅是貧乏的原理，而且还是与人的認識和实践的具体結果相抵触的；**第三**，黑格尔的最天才和最深刻的唯心主义一元論遇到了一些在它内部所不能解决的困难；**第四**，以前对哲学的唯物主义論证有两大缺点，即对现实的結構和发展缺少辯证的考察和对人类学問題的分析不够；**第五**，馬克思的分析表明，以唯心主义的观点并不能彻底解釋人的历史和实践本身，而这种显然是精神的領域却正是从屬於物质和社会的要素，因此，这一領域不是居于第一位的。

除了我們在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展进行历史考察时所指出过的那些因素以外，单是这些情况就足以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会滿足于这一思想运动的偉大成果——黑格尔的哲学的。

根本立場問題

还在四十年代时，馬克思就已經从对人和历史的分析、从对社会和思想关系的分析、从对各种異化形式的分析中認識到，以唯心主义的观点，甚至以費尔巴哈的观点都是不能解决这些問題的，同时他創立了自己的新的、与众不同的关于世界和人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个观念的中心点就是把实践理解为哲学的范疇和人的本质。

在馬克思以前，即使是最偉大的唯物主义者也是对人及其思

^① 卡·勒維特在他的《从黑格尔到尼采》一书中，从非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欧洲哲学发展中的这些問題的要素进行了广泛的分析。

想过程作了抽象的理解。他們把事物、现实說成是某种自在的、被主体所直观并以这样的方式認識的东西。但他們却不了解，事物、人周圍的自然界，事实上是人的自然界和人所創造的事物。他們也不了解，历史的自然不能离开人而存在，正如人不能离开历史的自然而存在一样。这种观念认为，主体不再是消极反映的主体，而现实也不再是被反映的对象。现实（我們所說的自然是与人有关的现实，而不是那种脱离人并且为人所不能理解的现实）实际上被主体化了（被人格化了），正如人被“自然化了”（这是由于被改变了的自然和社会对他的作用所致）一样。

馬克思在《經濟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动物和它的生活活动直接是一个东西。它和它的生活活动沒有区别。它就是它的生活活动。人則使自己的生活活动成为自己的欲望和意識的对象。他有着有意識的生活活动。这并不是他直接与之溶合的某种規定性。有意識的生活活动直接使人和动物的生活活动区别开。恰恰只因其如此，他才是一个族类的存在。换言之，正因为他是一个族类的存在，所以他只是一个有意識的存在，也就是說，他本身的生活对他來說是一种对象，……人正是在对象世界的改造中才作为一个族类的存在表現自己的。这种生产是他的勤劳的族类生活。經過生产，自然界就表現为他的事业和他的现实。所以劳动对象是人的族类生活的对象化：因为，人不仅像在意識中那样理智地，而且勤劳地、现实地把自己二重化，因而在一个由他来創造的世界中直观着自己本身。”^①

人的族类存在，即人用以区别于其他生物存在的特殊存在表現为，人是一种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可能性中表現自己的社会存在，是一种以生产活动——而且是有意識的生产活动——为本质和特点的存在。可見，人显然是实践的生物。

^① 馬克思：《經濟学—哲学手稿》，參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頁。

这种对现实的能动的实践的关系不仅说明了这种现实的变化，而且说明了作为人类真正历史的历史。人的力量的对象化是辩证的过程，正像人在对象中把自己的力量对象化一样，对象、自然界在人本身中被“对象化”了，也就是说，人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

人类的发展(包括它的全部要素和认识的发展)只能从这方面来理解，而不能从其他方面来理解。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写道：“人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既成的对象的存在，是一本已经打开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现存着的人的心理学，这个工业的历史至今没有在和人的本质的联系中被了解，而且始终只不过在一种外在的有用的关系中被了解，……如果那本书，也就是说，恰恰这个历史的感性地就在眼前的最容易接近的部分对一个心理学不打开来，那末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一门现实的内容丰富的实在的科学。”^①

在人的长期的生产和实践活动中，总会出现新的“本质力量”(抽象的思维、音乐兴趣等)。因为，人是按照在实践中得以改变自然的那种程度来改变自己，发展自己对自然的认识的。人的新的生理的和心理的能力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的新的仅仅为人所固有的特性的出现。眼睛之所以成为人的眼睛，就是因为一般的知觉是以自己和思维的这种重要联系来区别于动物的知觉的。由此可见，如果不了解人的生产历史，不了解人使自然界对象化和掌握自然界的历史，不了解人能动地改变自然界和社会的历史，那末，人的生物—心理—社会的变化历史就是不可理解的。

思维和实践

从实践、从人有意識地改变世界的事实中必然会看到，思维本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0页。

身也是一种存在的形式，思維不会与存在处于抽象对立的地位^①。当存在和思維之間出現差別时，这一实践即人的实践就成了虛幻的事情。虽然这些領域中的規律不是絕對一样的，但是，这里的問題是“两个系列的規律，它們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在表現上却是各異的，这只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規律，而在自然界中(到現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也是如此)这些規律是不自觉地、以外界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的表面上的偶然性中間为自己鋪設道路”^②。

可見，思維也有自己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人可以創造新的概念，新的范疇，因此，我們显然不能把思維、概念和范疇說成是某些先驗的形式。在康德以后，哲学思想的进程本身表明了二元論的缺点，它也像一切二元論一样仍然不能解决这两个在原則上有所不同的領域的联系和关系問題。“每一时代的理論的思維(我們这一时代的理論的思維也是如此)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因此，关于思維的科学，正如其他的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維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③

可見，我們不能把思維、意識和现实絕對地分开，而只能承认意識具有它的特性，即自然界一个具有新质的領域的特性，这个領域本身也必然有自己的特殊規律。因此，对思維的辯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必須从哲学观点确定以下各点：

一、思維本身(和它的体现者——人)不过是整个现实(或者換个術語來說，即存在)的一个特殊部分，它和现实並沒有什麼原

① 因此，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充分的理由把意識說成是意識存在(意識是被意識到的存在)。

②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頁。

③ 恩格斯：《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頁。

則上的差別，因此，它也和其他一切存在的東西一樣必然要受運動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制約。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从思維的規定性、从矛盾的發展、从向高級階段即質的更高的階段的過渡中來考察思維^①。

二、同樣，思維就其結構（思維的形式：概念、判斷、推理）來說，是通過一種特定的方式和現實本身的結構取得一致的，因為思維也只是作為一定的關係——人和現實的關係的表現而存在。例如，在我們的一定的思想形式如判斷或推理中，雖然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主觀性，但是，在判斷的主詞和賓詞的關係中，也仍然反映出現實存在着的一般和特殊的客觀關係。因此，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辯證法的觀念中，根據對黑格爾的分析作了以下的結論：“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着差別性，這一事實在每一命題中都表現出來。在這里賓詞是必須和主詞不同的。蓮花是一種植物，玫瑰是紅的；這里不論是在主詞或者在賓詞中，總有點什麼東西是賓詞或主詞所包括不了的。（黑格爾，第二三一頁）。與自身的同一首先必須有與一切別的東西的差別作為補充，這是不證自明的。”^②

三、最後，思維作為現實的特殊領域必然有自己的特征、特性和規律性。思維雖然和現實有一定的關係，但由於它是一個特殊的過程，所以這個過程是與它自己的一些特性和原則相適合的。三

① 恩格斯在他和杜林的論戰中是這樣解決這個問題的：“如果完全自然主義地把‘意識’、‘思維’簡單地當作一種早已有了的，一開頭就和存在、和自然界相對立的東西，那麼其結果總是如此。如果這樣，那麼意識和自然，思維和存在，思維規律和自然規律如此密切的互相適合，就非常奇特了。可是若進一步問：什麼是思維和意識，它們是從哪里得來的，那麼我們明白看到，它們是人的頭腦的產物，而人本身則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中，並且與之一起生長起來的；自然而然地，人的頭腦的產物，歸根到底也是自然界的產物，所以也就不是與自然界的其他聯繫相對立，而是與之相適應的。”（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35頁）

②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參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頁。正如我們將在後面看到的，列寧在他的哲學筆記中特別強調了這個方面的問題。

段論法的形式及其規則是思維的特性以及人所共知的思維原則等等。

這些原理中的某些原理，特別是思維反映現實中的聯繫和關係這一點，在馬克思以前的一些哲學家都是知道的，但是他們却不能說明，思維和認識為什麼和怎樣進一步發展，它們為什麼在每個時代里正好具有一定的性質。

事實上，馬克思已經指出，離開了事物運動和事物本身，人的思維和人的其他思維能力是不能發展的。正因為如此，對象對人來說又不過是人的基本特性之一與其相符合的東西，或者如馬克思所說的，它意味着人的基本特性之一的確證。“如同音樂才喚醒人的音樂感一樣，如同最優美的音樂對於沒有音樂感的耳朵沒有任何意義、不是對象一樣，因為我的對象只能是我的一種本質力量的確證，也就是說，它對於我來說只能是同我的作為自為的主觀能力的本質力量一樣的東西，因為一個對象對我的意義（只有着相應於對象的一個感覺的意義）恰恰像我的感覺所能達到的程度為止，因此，社會人的感覺不同於非社會人的感覺；只有當人的本質在對象面前展開了豐富性的時候，才會形成人類本質的豐富性，才會形成主觀的人的感性的豐富性，才會出現富有音樂感的耳朵，審美的眼睛，一句話，才會出現能夠鑑別人的享受的感覺，即表現為人的本質的力量（這種力量一部分剛剛被形成，一部分剛剛被創造出來）的感覺。因為，不僅是五官感覺，而且那所謂的精神感覺，實踐的感覺（意志、愛情等等），一句話，人類的感覺，感覺的人類性，只有通過它的對象的存在，通過人類化了的自然界才會形成起來。”^①

由於對象只有對人才能成為直接或間接地確證人的特性之一的東西，因此我們同時也就得出了了一個重要的結論：把人的能動

^① 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參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9頁。

性的表現限制在人的全部生活中某些單調的活動上的社會，是會使人成為畸形的，因為它要窒息思想多方面的发展，抑制本性的发展和人的无限創造性。战胜这样的社会，同时也就是建立另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将使人本身掌握人的对象、即人的本质全面地充实成为可能。

人的實踐，人的活動被廣義地理解為生產的、技術的、實踐—科學的和革命的活動等等，這種實踐活動是一本已經打開了的關於人的力量、基礎和對歷史的認識的書。

可見，人的歷史就是人改變世界的歷史。但因為人有了眼睛、耳朵和思維等等，以前不成其為對象的一些東西現在卻成為人的對象。

人不斷通過對自己周圍現實的實際的改變（不管這是生產的變化還是技術—科學試驗內部的變化），來認識現實本身的各种新的特性和規律性，就是說，同時也在改變着自己對現實的認識。所以，在現實中有許多新的領域不斷成為人的對象，這個進步也像人類的生活一樣是有限的（原文如此。——譯者注）。

“例如拜物教表明，理論上的難題的解決怎樣是實踐的課題並且是實踐地被媒介到，真正的實踐怎樣是一個現實的和實證的理論的條件。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識不同於希臘人的感性意識，因為他的感性的存在是不同的。”^①

我們這裡可以預料，後來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一些說法是更加確定、更加全面的。不僅理論上困難問題的解決是實踐的課題，而且拜物教的性質本身也是人的感性存在的一種表現。這就是說，原始的人對現實的關係、他的意識、他對現實的理解是符合他改變現實的水平，即符合他的感性的存在的。

因此，人的認識並不像以前的唯物主義所理解的那樣是某種

^① 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參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2頁。

抽象直观的結果，也不是人的对象，即不是“独立”于人而孤立存在的客体。但是，人的能动性也不像唯心主义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抽象的。因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原文尚有“现实”二字。——譯者注）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費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論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則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①

社会生活和人的活动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但是人的实践、人的活动是有意識的活动，因此忽視这个矛盾中的一个方面，不是陷入庸俗的唯物主义，就是陷入唯心主义。社会的实践也是理論的，正如人的理論也是实践的一样。因为，实践的理論来自实践并且通

^① 《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的第(一)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頁。后来恩格斯在《自然辯证法》一书的手稿中所坚持的正是我們要在这一看指出的一看法，因为人們有时引证恩格斯的話，似乎他对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也总是抱有那种旧的看法。恩格斯写道：“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視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維的影响；它們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維。但是人的思維之最本质的和最密切的基础，却恰恰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非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雷拍和其他的一些自然科学家就或多或少有这种見解）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这种历史观因此是片面的，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現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了，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至于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沒有人的协助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极其微小的。”（《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2頁）

过实践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于实践之所以又是理论的，就是因为它是通过自觉的活动来完成的，因为它是有指导的、有计划的，这样的实践离开人的思考是不可理解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理论和实践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致的，它们仍然是实践在其中占着首位的统一过程中的两个要素。因为，实践在感性上是显而易见的、具体的，在现实和物质上是受制约的。这当然不是说，理论在一定的意义上不能使自己也成为真理的标准^①。

但是，人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这纯粹是个实践问题（这个问题比真理标准的问题要广泛些）。“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②“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

^① 因此，我们可以在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践不仅仅因为它受思想和理论的指导才成为人的实践。对人的本质同样极为重要的这个要素，始终是外在的。实践和理论是彼此作为外在要素而对立的。它们中间的一方并不包含另一方，它们是互为条件的。

与这种外在的关系相反（这种关系现在存在，将来也永远是存在的），实践本身（特别是科学的实践）也就是理论，就是说，这种实践是理论的实践，它本身包含着世代相承的全部理论经验或者至少包括着某些方面的理论经验，任何的实践都是如此。同样，理论不仅仅是理论，对实践来说，它也不是处于外在的关系中。相反，任何理论本身不仅包含着理论的实验，而且还包含着无数的实践的经验和一代一代的检验。

总之：我们前面看到，人的实践是理论的，同样，理论也是实践的，即实践不仅仅是实践，也正像理论不仅仅是理论一样，这两个对立面的任何一面的本身中都包含着自己的另一面，自己的对立面。”（普·弗兰尼茨基：《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一种看法》。《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学杂志》，1957年第2—3期）

可见，真理的标准既可以是实践，也可以是理论，尽管实践是比较基本的，因为实践是比较具体的、多方面的和内容丰富的。所以，人在实践中证实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的正确性时，也就越来越认识现实，日益深刻地认识它的规律并且发现新的真理。由于现实本身是无限的，因此，人的认识能力也是无限的。

^②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页。（引文删去了原文中的着重号。——译者注）

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①

主體和客體的關係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原理徹底克服了機械唯物主義和自然科學唯物主義以及任何形式的唯心主義在對主體和客體的關係的看法上存在着的片面性，唯心主義或者把這兩個要素看成是同一的，或者把它們看成是原則上對立的，或者把客體僅僅看成是主體的產物。主體和客體的關係被理解為本體論關係的一種特殊的要素、特殊的情況。因此，雖然主體和客體並不是原則上對立的，但是，它們依然不是同一的。

馬克思主義者本身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一些解釋，就是要表明主體和客體的關係是怎樣在這些原理中被完全掌握的。他們力圖在這裡真正克服對反映論的庸俗化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而把一種與複雜的認識過程密切聯系着的要素也排除掉。問題僅僅在於他們把這種要素擺在什麼地位和強調哪些點。

“反映”的問題和原理，由於種種的原因，已被現代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斯大林主義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者弄得聲譽完全掃地。首先，他們基本上把這個問題局限在“主觀反映客觀現實”這個最一般的原理上。而這個最一般的原理人們已經很少談到，並且它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特有的觀點。其次，這個最一般的原理至多也只是堅持了批判實在論的立場。而這種立場依然不是馬克思主義所特有的。最後，我們只是談談下列一些最重要之點，即他們並不了解，“反映”只是認識過程的一種要素，因而也是認識論的一種要素，人們也不了解，舊的反映論是消極的，而馬克思主義是要排除這種消極的和直觀的態度。由此可見，認識必須有自己特殊的歷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頁。

史的組成要素，而“反映”这个范畴本身在認識的这一特性中只是一种主要的要素，因此必須对認識过程的个别形式和个别要素作詳細的区分。

在談到人类学問題时，他們不是用馬克思的方法把实践理解为基本的要素和哲学的基本范畴，而是从实践—反映的要素出发。这样，在分析这些問題时，就必然要忽視这些重要的馬克思主义的看法。因此，他們把实践理解为某种事后应该用来证实我們所熟悉的認識原理的要素，是不足为奇的。其所以不能把实践归結为真理的标准，就是因为，如果我們仅仅如此表面地来运用实践，那末只要向前走一步，就必然会走到用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理解这个要素的地步。

可見，在实质上不应该把人理解为反映的生物（因为这也是其他低級生物的特性），而应该把他理解为实践的生物。人只是实践的生物。对实践本身的分析必然会向我們表明，实践只是意味着和某种东西的对立。主体和客体是不会在实践中消失的，它們只是消失了自己分离的性质、原則性的区别。在这个过程中反映必然也会成为一个要素，因为它无非說明，整个本身具有物质性的对象不是由意識創造的，而是一个存在、特性和自在的东西，尽管它是由人創造的^①。

可見，如果以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以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来理

^① 馬克思始終一貫地坚持这个观点。比如他在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的第一条中強調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同样，他在最后的一条中也說明了，不仅是要說明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而根本不是自在的东西是不能在实践中加以改变的。

馬克思的这些原理和他后来的一些說法并不矛盾。他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說：“我的辯证法，在基础上就不只与黑格尔的辯证法不同，并且是它的正相反对。在黑格尔，思維过程——他在‘观念’的名称下，把它轉化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现实界的創造主；现实只是它的外部現象。反过来，在我，观念不外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位了变形了的物质。”（《資本論》第二版跋。《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頁）

解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其次,如果把主体和客体理解为现实和存在的根本不同的形式,如果把主体理解为任何康德式的先驗論的主体,那末馬克思的原理就意味着对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的否定。

如果这种关系被理解为創造性的实践要素,理解为现实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和现实的普遍关系的一个要素,那末馬克思的原理就不是意味着对这种关系的否定。

哲学上的結論

馬克思的这些基本的哲学原理具有深远的理論后果。它們首先是从哲学的观点解决人的問題的最重要的貢獻。

人之成其为人,就在于他从事实践活动和理論实践的活动。人的历史就是这种活动的历史;人的“精神”随着人自己的实践改造活动的发展而成长和发展起来。

人的活动的各个发展阶段都会向人、向人和自然界的關係以及和其他人的關係提出需要解决的任务,因此,人的整个发展也会在这中間得到反映。这样,唯心主义抽象的根子就被切断了。因为“对于社会主义的人,这**全部所謂世界历史**不外是經過劳动創造了人,不外是自然界为了人而存在,所以他关于他經過自己本身的誕生、关于自己的发生过程有着显然的、无可反駁的证明。”^①

人的認識从原始的思維方式到現代科学的思維方式,經過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正如原始的思維方式是以原始的对自然界的關係为现实基础一样,我們的思維方式也是以对自然界和历史的更为全面的關係、以自然界和历史的更加全面的改变和变化为基础,从而也是以对这种全面性的意識以及对现实的特点和規律的意識为基础的。在这个認識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关于人的观念的本质,看出他的經濟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发展的本质。甚至在他后

^① 馬克思:《經濟学—哲学手稿》,參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頁。

期的著作中，我們也可以找到許多和他在早期提出的問題有直接联系的原理。后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写道：“古代社会的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生产有机体，是更简单得多，更容易理解得多的。但那种有机体，是以个人的未成熟性（那时，人与人間自然发生的血族关系的脐带，尚未断去），或以直接的支配服从关系作为基础。那种有机体，是由劳动生产力的低的发展阶段，和物质生活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及人与自然間的相应的狭隘关系，規定的。这种现实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与民众宗教上。现实世界之宗教的反映，必須到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面前，表现为极明白极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那时候，才会消灭。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姿态，必須到它当作自由結合的人的产物，放在他們的意識的計劃的管理下面那时候，才会把它的神秘的幕揭下。但要做到这样，社会的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的物质的生存条件，会是必要的。这种基础或条件自身，又是由一部长久而痛苦的发展史自然发生出来的产物。”^①

可見，不可知論对现实的关系本质上是不可思議的，不合邏輯的。人所拥有的全部經驗和成就最清楚地說明，提出人能不能認識世界这样的問題，是毫无根据的。人类发展所取得的巨大的成果，技术、科学和思想上所获得的輝煌成就都說明了，問題是不應該这样提出的。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形而上学的問題：在各种現象的“后面”是否还存在着某种东西？事物的本质既然是寓于現象之中，因而也就可以通过現象来認識它。如果說存在某种本质，現象后面的“东西”根本上不会发生作用，从而也不会有所表現，那末这个东西就类似于伊壁鳩魯的神而同样成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頁。

了①。

問題在于：我們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認識，我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認識及其結果。人們也就是这样地来研究絕對真理和相对真理問題的。只要人們理解到認識的发展性质和旧的“真理”是不断地被修正和克服的，那末就会明白，我們的一切認識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但是，我們如果在这个相对的因素中看不到絕對的因素，那末就会陷入一般的相对論，而它也就会被实践和認識所推翻。因此，人的認識的各个阶段都是絕對和相对的统一，即对相对性的現象、本质和要素的絕對認識的统一。但不論是相对的認識，或者絕對的認識，都是取决于整个社会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发展水平的。可見，認識的发展是沒有絕對界限的②。

我們只有从人和人的实践出发，才展示了解决其他基本哲学問題，首先是解决范疇問題的前景。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几点重要的結論：第一，如果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理解为前面所說的那樣，那末，任何先驗的

① “自在之物”（它是不会有形态表現的，而且范疇也不能适用于它）這個問題，已由黑格尔在他論本质和現象的學說中的观点完全解决了。停留在这問題上的态度正是表明，不仅用非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甚至用黑格尔以前的观点来理解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問題。

② “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样的包括世界所有联系——諸如物体的，精神的以及历史的——的最后体系完成了，那么，人类的認識的領域便就此終結了。而且从社会按照这一体系而組織起来的时候起，任何进一步的历史便从此中断了——这是荒唐的和毫无意义的。这样人們可以看到自己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毫无遺漏地在其所有联系中去認識世界体系；他方面，人們以及世界体系的本性永不允許人們完全解决这一任务。可是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两种因素——世界和人——的本性之內，这种矛盾还是所有知識进步的主要杠杆而每地、不断地被解决于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之中，这正好似，举例說，某些数学的課題只有在无限的系列或連分数中得到解答。事实上，世界体系在思想上的每一反映，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条件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其作者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状态所限制。”（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6 頁）

先天論都是一个倒退，即至少是回到把现实分成两个绝对不同的领域。由此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各种难题。而这些难题在新康德主义的体系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其次，黑格尔对这个二元论的批判虽然是非常深刻的，但它又必然要停留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局限性里，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黑格尔并不是把人理解为有感性的、有意识活动的人，而是把人理解为自我意识，并且把自然界理解为上述这种思想本质的异在。

有意识的实践和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我们的思想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的客体符合的可能性，是以自然界和人在本质上的统一、人在物质性上的统一为前提的^①。

另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范畴问题——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当现代多元论者，特别是尼·哈特曼指责一元论，说它只用一种原则来解释世界，而世界事实上却是有差别的、多重性的，是由一些不同的领域构成的，这些领域就其范畴和规律来说却不能归结为低级的领域的时候，只有一点是对的：现实的任何领域的特殊性都是不能用一些统一的规律和范畴来解释的。可是，他自己也知道，有着某些统一的规律和范畴、基本的范畴和规律贯穿在现实的一切领域中，但这些规律和范畴在多元论的体系里仅仅是口头上被肯定的东西。

一元论不是臆造出一种新的存在来作为这些范畴的体现者，而是比较合乎逻辑地确定现实的“实体的”统一性是这些基本范畴的规范性的体现者。这样一来，各种绝对不同形式的关系中的不

^① “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其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在成为统一之前，首先当然就应该存在——可是世界的统一性却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在我们观察所达的范围以外，存在真的常常成为一个未决的问题。可是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不是两三个变戏法似的词句所能证明的，而是要由长期的和艰苦的哲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证明的。”（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44页）

可解决的难题就被排除了，从而说明：为什么有一些范畴和规律贯穿在现实的各个领域，为什么现实的各个领域存在着依赖关系。另一方面，这种一元论的观点又能辩证地、发展地看待现实的各个领域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辩证地看待这些领域各自的特殊性。

以一元论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的意义上说）对世界所作的解释，并不意味着把现实的各个领域的规律和范畴归结为低级领域的规律和范畴，并且最后归结为最低级的、无机物质的规律和范畴，而是认为，现实是发展的，这样的现实必须从属于一些共同的范畴的规定性。现实的统一又必然决定某些范畴的规定性的统一。但是，恰恰因为现实是处在过程之中，于是随着各个领域的产生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特殊的规律和范畴，从而基本的规律和范畴也就不断具有特殊的形式和作用。

从这个本体论问题的角度来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有着长期的哲学发展和努力，而以黑格尔对范畴的分析为顶点。对于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了。若干基本的辩证法的范畴和规律得到进一步说明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的哲学中间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这样就详尽无遗了。我们甚至认为，在这些方面，不仅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至今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被提出来。

物质和运动

任何彻底的唯物主义（因而也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的、基本的原则，就是世界统一于它的物质性。

可见，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物质，作为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并作用于我们的感觉的东西，是整个自然—历史的存在和事件的普遍的、根本的基础^①。以前一切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特别是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即现实的基础和本质的问题，从天才的伊

奥尼亚思想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的素朴唯物主义的尝试起,经过巴门尼德的关于在物质上统一的和静止的存在的静态观念、经过原子论和柏拉图的思想、直到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的主张为止,都对它有着极端不同的解决。而唯物辩证法对于一切存在物的基础和本质这个问题,是用物质的概念加以解决的。物质这一概念本身,在哲学史上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形态变化,今天它有着一系列为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所不知道的属性。

物质并不是通过抽象的、一般的形式,而是通过无数个别的物质形式、物质样态而被人所意识到,首先是被人所知觉到。因此,若不研究物质在一系列个别形式中的表现,我们就无从研究物质的基本性质和运动规律。例如,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近来想要从人本身的存在分析中、从人的存在中来解释存在这种最新企图,必然会陷入主观的意识领域,并归结为心理学人本主义的忧虑和关心等范畴。这些范畴可以向我们反映出现代资产阶级分子的历史的精神的状况,但不能反映出客观现实的本质。所有这些想用以上观点来解决本体论问题的打算,一开始就注定是要落空的^②。

同样,另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本体论者哈特曼妄图战胜一元论并捍卫唯心主义的某些要素,他否定世界统一性的论点而论证关于原则上各种不同的存在和关于现实存在的多重性的多元论

①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并在作用于主体时引起感觉的东西,他们关于物质的这种定义是不够的,因为某个唯灵论者也可以肯定把整个世界包含在内的唯灵论的本质之间的这种关系和连贯性。为了避免这样的指责,就必须进一步地肯定空间和时间的原理。近年来,加·巴赫拉德对物质的概念提出了一种有趣的看法,他说:“物质所特有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反抗”(《理性的唯物主义》,1953年巴黎法文版,第10页)。在巴赫拉德看来,物质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和实体的混合、和物质的变形的试验相符合(同上书,第15页)。

② 这就是海德格尔写《存在和时间》一书时期的结果,由于上述原因,他是继续不下去的。

点,他使无机物、有机物、灵魂和精神具有独立的性质,这就必然和辯证的客观现实发生冲突,即和一个領域来自另一个領域这一事实发生冲突^①。

如果确定物质是在空間和時間中普遍存在的東西,那末这无疑就确定了物质和运动的統一。以前关于广延性是物质的唯一屬性的机械論观点,只不过是当时那些学者的理性抽象。因为把运动从物质中抽象出来,就必然会引导我們去非科学地設想某种最初的推动力和某种沒有任何客观科学根据的原則^②。

所以,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之一,而且是它的**基本形式**。由此可見,运动不可能是辯证法的某种特征(像斯大林所說的那樣),也不可能是物质的規律,因为物质的規律都和它的运动直接有关。如果說运动是物质的規律,那末运动的規律因而就成为規律的規律了。

在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运动多半被了解为現成物体的位置移动(机械論者),人們紛紛企图在这里开始分析不同性质的运动形式(亚里士多德、培根、謝林、黑格尔),而至多也只不过把运动分成外在的运动和內在的运动(罗蒙諾索夫、霍尔巴赫)。

唯物辯证法的最新成果克服了在对运动的解釋上的机械論的局限性,这就使問題的提法深刻得多了。唯物辯证法区别于其他观点的地方,就在于它把**运动理解为一般的变化**。

从这一原理中可以引伸出許多其他极其重要的原理。首先,

① 尼·哈特曼企图在几本篇幅很大的本体論的著作中来論证自己的多元論,他的著作有:《論本体論原理》(1934年);《可能性和现实》(1937年);《现实世界的建設》(1939年)。然而,这种論述存在的不同領域和不同方式的本体論,对一般的存在問題和存在的辯证法是軟弱无力的。关于尼·哈特曼,可参看作者著的《哲学研究和批判》(1957年貝尔格萊德塞文版)和达·佩約維奇所著《现实世界——尼古拉·哈特曼的本体論的基础》(1960年貝尔格萊德塞文版)。

② 完成这种理性抽象的首先是十七世紀的哲学家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諾莎,克服这种理性抽象的是托兰德和十八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者。

它告訴我們，运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不能够归结为一种最简单的形式——机械运动，因为一般的变化概括了由无机物起到社会和心理为止的所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和变化。这就是說，这一原理确定了在质上不同的运动形式，而每一种变化，就其本身的性质來說，都包含着最简单的运动形式——位置的变化^①。

进一步說，若是把运动理解为一般的变化，那末运动的不灭性（亦即运动的永恒性）不仅應該从量的意义上理解，而且應該从质的意义上理解。这就是說，不仅物质的运动是不灭的，而且物质从一种形式轉变为另一种形式的的能力，它創造不同性质的存在形式的的能力也是不灭的。

把运动理解为一般的变化，同时理解到这种变化的絕對性和靜止的相对性，这也就克服了所有以前的唯物主义关于世界上存在某种最終的、不变的因素或原子的观念，并且肯定了一切存在物的絕對的辯证性、即变異性。

因此，絕對不能把物质和它的任何具体形式混为一談，因为它的任何一种存在形式都只不过是它的实现的一种暫時形式，一个阶段和一个时期。

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和辯证法的物质概念，排除了一切过去常見的关于物质和世界的某种原始状态的概念。原始状态的概念是和现实矛盾的，这是人所难以避免的拟人观的結果。因为，既然物质和运动是統一的，那末物质的創造过程也就是无始无終的，那

^① 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对唯物主义把整个现实归结到最低級的規律上去的一切批評都不过是針對机械論者而言的，从而說明他們不懂得用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釋这个問題。例如，哈特曼关于多重性規律的基本概念以及不能把低級規律归结为高級規律或把高級規律归结为低級規律的說法，仅仅是我們上面所提到的这个問題的辯证观点的靜止的說法，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特別着重指出过这个問題。恩格斯写道：“应用到物质上的运动，就是一般的变化。从同一个誤解出发，就产生了想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这样就抹煞了其他运动形态的特殊性。”（《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07 頁）

末某种靜止的或平衡的原始状态是与基本概念相矛盾的荒謬絕倫的假設。这一原理的必然結論就是关于物质和运动的无限性的观点^①。

空間和時間

物质和运动的客观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的空間和時間的客观性。这样，辯证唯物主义就继承了多数偉大的哲学体系(德謨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培根、霍尔巴赫的体系)和全部科学的傳統，而与那种在主观唯心主义中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唯心主义观念相对立，与那种把空間和時間仅仅看作我們知觉的普通形式的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观念相对立。

可見，空間和時間不是也不可能是別的，而是运动着的物质的职能。从这个辯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中必然得出如下的結論：沒有物质的空間和沒有运动的時間仅仅是人的理性的不符合现实的抽象。因此，运动着的物质决定空間和時間；这样，根据对于物质的辯证的分析可以看出，关于某种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的观念，必然是人們生造出来的东西，是由于对物质的客观存在还没有充分認識所造成的概念。

由于空間和時間是由运动着的物质决定的，所以唯物辯证法彻底肯定了物质存在的这些基本形式的相对性。必須強調指出，这也是物理学最新研究的成果。現代物理学，特别是光学，在解决牛頓力学关于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这一困难而复杂的問題时（牛頓是为了解决慣性原則的一系列問題而确立这些概念的），曾遇到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困难基本上可以归結如下：一方面，按照古典力学，任何运动的速度对于两个彼此相对运动的观察者來說是不等的(古典力学的相对性原理)，而另一方面，实验表明，光的速度不以

^① 必須強調指出，絕對不能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論中得出宇宙局限性的說法。爱丁頓关于原始状态、最終性等等的观点，从哲学观点來說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观察者的运动状态为轉移总是守恒的 C (米赫尔逊交叉实验)。

在推翻古典力学的相对性原理还是推翻 C 是普遍常数的規律这种两难推論的情况下，爱因斯坦采取了罗伦兹的特别的收縮假說，認識到問題在于修正物理学关于空間和時間的基本概念。他在狭义的相对論中，对于这个深奥的两难推論既不排斥这一方也不排斥另一方，而是对基本概念作了本质的批判，論证了時間和空間的相对性的观念，这就給現代物理学奠定了基础。

所有这一切对于同类的和直綫的运动是适用的。后来爱因斯坦在自己的广义相对論中指出，这些原理对于各种参考 (referencija) 体系都是适用的。此外，爱因斯坦用自己的关于重力場是由全宇宙的质量分布情况所决定的、并且是变化的这一論点来确定空間本身取决于物理的要素。

在对物质和运动作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的基础上，哲学的成果实质上是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論的最新的的基本成果一致的，这一相对論否定了关于時間和空間絕對性的旧观念。这就证明了现实存在的这两种形式是由物质本身和它的运动所决定的^①。

量 和 质

可見，物质在其一切存在方式中都是为時間和空間所規定的。任何进一步更精确地規定存在物的这种時間性和空間性，只有在規定了它的量，即在量的方面加以規定之后才有可能。存在物的量的規定是它的規定之一。既然这是物质的一种必不可缺的規定，同时也是一切物质样态的必不可缺的規定，那末，例如，实验心理学在給心理現象以量的規定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完全合理的和正确

^① 这是这个問題的一般本体論的解釋。对人來說，時間特性的問題，例如一般物理的和历史的時間之間的差別的問題是特別有趣的。恩·布洛赫在自己的《对于进步的理解的分歧》这本小册子(1957年柏林德文版)中，曾就繁荣和发展的問題特別研究了这个问题。

的。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量上，因为量不能概括客观存在物的所有各种規定^①。

进一步規定存在物的范疇，就是质的范疇。客观现实（处在各种存在形式中的物质），不仅具有量的規定，而且始終具有质的規定，即任何事物都以自己的特殊方式而存在，以自己的各种規定而与其他事物相区别，并对其他事物发生特殊的关系，产生特殊的反应等等。

可見，量和质是事物的客观的規定，而不是主观的規定。（存在物、现实——所有这些术语都应该从本体論的意义上理解为同义語，我也是这样来使用这些术语的。）

至于质的范疇，那末在哲学史上經常就这一范疇的性质发生爭論。一方面，从古希腊起就已經繼續不断地进行着关于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爭論（德謨克利特），它在洛克的学說中得到了最强烈的表現；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就有着把事物的全部质的規定性理解为客观赋予的規定性的趋势（伊奥尼亚唯物主义者、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薩哥拉、亚里士多德、伊壁鳩魯），而在唯心主义的哲学中則过去和現在都有着把这一規定性全盘主观化的很有势力的派別。

这一过程的最終形式就是經驗批判主义者和內在論者（馬赫、阿芬那留斯、舒佩、舒貝特—索尔登等）以及新实证論者（施利克、卡尔納普、弗兰克、艾耶尔等）的主观唯心主义。

只有那种把质理解为事物的客观規定性的趋势才是唯一正确的。从对某一事物的存在和它同其他事物的关系的一般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这种关系和作用的全部特殊性，不能仅仅归結为它的量的規定性。因为，量对于我們來說只是表明事物的量的規定

^① 很多人，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一些代表人物都企图把整个现实、事物和現象的全部质的多面性归結为量的比例，这是非常片面的。黑格尔在他的邏輯学中談到了毕达哥拉斯派，他正确地指出，他們的論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性。然而，同一数量的不同事物可以对同一种作用或现象发生完全不同的关系，可以对于某种其他客体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或后果等等，这就是说，一个物体的量不能完全说明各种事物的存在、运动、发展和作用的无限的差别性和特殊性。

这里始终还存在着下列的问题：有没有根据把质分为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而且那些第二性的质（色、声、热等等）都是纯粹主观性的，即都是第一性的质（广延性、密度、重量）作用于我们的感觉的结果。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无论如何应当既注意到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物体，又注意到我们自己的感官的特殊结构。但是，如果所有的事物（物体）都具有同样的第一性的质，那末它们对我们造成的千差万别的感觉反应就将是不可理解的了。如果不同事物的相同的量在我们中间引起不同的感觉，那末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肯定，这种差别性的原因也必然存在于这些物体的本性之中，即存在于它们的不同的质的特殊性中。

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要同时注意到事物的质的差别性和我们的感官的质的特殊性（因为感官会使外部影响发生特殊的变异）。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把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割裂开来，又不能像素朴实在论那样把它们看成几乎绝对符合。

托·巴甫洛夫正是陷入了上述第二种错误：他在《反映论》一书中反驳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人肯定，第二性的质只是在事物对感官发生作用之后才产生的，并且事物具有作用于眼睛和在其中引起颜色感觉的客观属性（“性能”）。和这种观点相反，巴甫洛夫硬说：存在着红色的客观现实属性，它为事物所固有而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这样，他就把心理生理学的质和本体论的质即在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质混为一谈了①。

① 托·巴甫洛夫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时候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他在《反映论》中写道：“我们对红色的感觉不是和感觉本身相符合，而是和不依赖我们的意识而独立存

不同的物体其量相同而作用不同,这就向我们表明,物体除了量的規定性之外还有另一种規定性,即质的規定性;我們感官的特殊的结构和感受力向我们表明,必須将物理的作用轉化为心理生理作用的特殊的质。因此,各种物体发出的不同的电磁波,向我们表明了它們的不同结构,也就是說,它們在接受一种电磁波而发出另一种电磁波方面具有不同的能力和屬性。只有这种观点,才能使我们理解我們的感覺器官的发生,这些感覺器官只是在事物給予千万年来不断发展中的有机体以各种不同性质的作用的基础上,才单独地、分門別类地区分出来的。

顏色之被感受为顏色,紅色之被感受为紅色等等,这都是心理的感受,它作为心理的感受仅仅是具有心理生理结构的有机体所固有的。但是,与这种感受必然相适应的还有物体的发出一定长度和强度电磁波的特殊屬性(例如我們通常称之为紅色的那种屬性),不过这种屬性不能仅仅归结为物体的量,而且應該归结为它的特殊的结构。

感知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屬性的主观反映,这个一般的解說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仅仅作为一般原理來說才是如此。應該在“主观反映”的公式中区分这一“反映”的不同阶段,而这种区分正是对任何“反映”作辯证唯物主义分析的实质。因为不同的反映形式之間的区别是很大的,例如:首先是和事物的性质联系很小的

在于事物本身的紅色的客观现实的特性相符合,只有这个时候,也只有这个时候我們才能够談到意識的表現……我們始終只能从我們主观的复合指出客观的紅色(色盲者对这一点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事实,从这个事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点,我們对客体紅色的意識,也像对事物的任何其他的质量或特性的認識一样,是思想符合于客体的复杂的、长期的过程。这样,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得出这样的看法:沒有感覺器官的存在,沒有它和事物的相互影响,客观的紅色是根本不会存在的。”(《反映論》,1947年貝尔格萊德塞文版,第194—195頁)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許多这样的素朴实在論的看法(例如第191頁)。

对颜色的感觉，其次是对形式的感知，再次是对颜色或声音的感知，最后是逻辑概念形式的反映，直到有关艺术作品或整个意识形态表现的反映，这种意识形态的表现也“反映”了自己的时期、时代和一定阶层的心理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反映”，但是对每一种反映都需要作特殊的分析和说明，而这种分析和说明却是一般公式无法作出的。苏联的思想家们、巴甫洛夫以及与他们相似的人所犯的错误正在于此^①。

量到质的转化规律

新质产生的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人类思想从它最初进行科学和哲学尝试的时候起，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隐约地包括在古代伊奥尼亚哲学家的观念中，因为关于万物所由产生的最初始原问题（这在泰勒斯看来是水，在阿那克西米尼看来是光，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是火，等等），本身必然包含着从统一的最初始原中如何产生出世界的质的多样性的问题。

如果说发生学的问题曾被尖锐地提出过，那末它现在又重新被列入首位，因为不解决这一问题，就不会了解新种、新的有机体的产生，总之，就无法了解世界的进化过程。

^① 有关这一范畴的另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某一事物的一般的质的问题。在苏联哲学界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事物是由一种质规定的，这种质是事物的许多属性的基础。我在《量到质的转化的辩证规律问题概论》和《勃·姆·凯德罗夫论渐进性是旧质转化为新质的形式》两文中，指出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对于研究量到质的转化规律是有意义的。

苏联的哲学家硬说质是一切属性的唯一基础，这是不合逻辑的。如果说植物是玫瑰、苹果树等等的质，那末试问：作为唯一的质的“植物”怎么能够成为品种极为繁多的各种植物的基础呢？

对任何事物所作的各种分析都向我们表明，事物是许多质的统一体，即它是多质的。其中必定有一些质较多地从根本上规定着事物，而另一些质则较少地从根本上规定着它，等等。物体的质正是取决于物体本身的特殊构造和结构，因此，物体随着结构的改变，也必然会改变自己的质。

辯证地解决量和质的关系、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就为解决被归入全人类最重要的問題之列的上述問題提供了基础。

通过对量变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它与质变是密切联系着的，也就是說，每一个量变都有其变化的界限。某一特定的质，当其量变到一定程度时，便要引起急剧的质变。这就促使謝林，特别是黑格尔去表述客观事物的这一普遍規律。黑格尔在他写的《大邏輯》中是这样来解决这一問題的。他說：“据說自然界中是沒有飞跃的；普通的观念如果想要理解产生和消灭，就会像前面讲过的那样，以为只要把它們設想为逐渐的发生或消失，那就是理解它們了。但是上面已經說过：存在的变化从来都不仅是从一个量轉化到另一个量，而是从质轉化为量和从量轉化为质的，是他物的生成，即漸进过程的中断以及与先前的存在有质的不同的他物。水經過冷却并不是逐漸变成坚硬的，并不是先成为胶状，然后再逐漸地坚硬到冰的硬度，而是一下子就变成坚硬的。在水已經达到了冰点以后，如果仍旧在靜止中，它还能保持液体状态，但是，只要稍微震动一下，就会使它变成固体状态。”^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这一不平凡的解答中，剔除了唯心主义的范疇的演繹，因此他們对于这一規律性的認識就成为他們科学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論的基础。

当我们考察自然現象（例如化学現象、元素周期系）以及社会革命等等的时候，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們都完全是按照量轉化为质的辯证規律而发展的^②。

^① 黑格尔：《邏輯学》，1932年萊比錫德文版，第383頁。（中譯文參看《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8頁。——譯者注）

^② 在我对凱德羅夫的观点的批判中，我曾給这一普通的原理作了如下的說明：“如果考察现实中的現象，我們就能够断定质的变化有几种主要的方式。第一，可以通过物体通常的量的增减而由一种质变为另一种质（如将物体分成分子和原子）。第二，质的变化可以仅仅基于一定物体結構上的某种改变，尽管該物体所包含的元素的數量、該物体的內容仍然不变（如同分異性的現象）。第三种情况，也是现实中最常見的

因此每一个发展都是由自己进化的和革命的方面组成的，而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每一个质的变化都可以了解为革命的时机，它可以导致一定物体的一种或多种质的根本变化。

整体 和 部分

上面我們已經看到，物质（也就是說一切个别事物）范畴的規定性，是空間、時間、量和质。然而，任何个别事物，不論对于其他

情况，即通过該物体中新的要素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通过它們的产生或消灭，一句话，通过新内容的产生或消灭，来实现质的变化。”（《哲学研究和批判》，塞文版，第60頁）根据前面引用的苏联哲学家关于事物只具有一种质的观点，他們必然将这一規律解釋成这样：产生新质的革命的轉变同时也就意味着事物本身的全盘的革命变化。这对于观察复杂的社会机体尤其重要，因为这样一来，除了承认急剧的革命轉变以外，就排除了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发展的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切事物，特别是复杂的社会机体，都是由多种的质規定的，即是多质的。其中任何一种质的变化，都和量的变化不同，必然是飞跃式的，即相当急剧的。但是，在某一个事物的发展中，不会是它的一切质都經歷着根本的变化，而仅仅是其中某些质經歷着这种变化。这也就决定了各种不同的轉化的性质。如果事物的质大多数或大部分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末这就是在較短时期內的比較迅速、比較急剧和比較根本的变化。如果是个别的质逐渐地发生变化（其中每一种质本身都經歷着飞跃式的、急剧的变化），那末这就是緩慢的、具有进化形式的变化，虽然它們实质上是革命变化的积累（只是在時間上較长而已）。

“正因为每一种事物都是多质的，所以在自然的和历史的过程中，我們可以对这一量变和质变的过程区分出无限变異的可能性。

可能产生这样一些情况：一定的量变（由于这些变化本身的性质，也可能由于一定的外部条件），引起了該事物大量比較根本性的质的急剧变化，也就是引起了該事物本身的較为根本的变化，这对于簡單的自然物尤其是常常发生的情况（如一种元素轉化为另一种元素）。

而更多的情况是：量变引起了小部分质的急剧变化，因此，我們可以把这一个过程看成为逐渐的、非連續的过程，它达到一定的程度也会引起事物的根本变化。不过这一飞跃的性质，按其剧烈的程度和强度等等來說，和我們前面提到的第一种情况不同。这第二种情况会造成一定的过渡阶段，而这些过渡阶段只能用这种方式才能加以解釋。”（普·弗兰尼茨基：《量轉化为质的問題概論》。《哲学研究和批判》，塞文版，第53—54頁）

个别事物或是在本身内部即对于本身的各个部分，都处于一系列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說，它自己对其所固有的各个部分是一个整体，但同时对于另外某个整体則又是部分。

因为部分和整体总是根据某种东西来决定的，这里包含着对比关系的因素，所以这两种因素都是相对的。

考虑到部分对整体的关系（这在哲学发展的过程中曾引起了整体和部分到底誰是第一性的尖銳爭論），我們可以断定，这一关系基本上有着两种极不相同的情况。

整体可能是各个部分的一般的机械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部分的总和即整体，与其各个部分并没有质的区别。（一块金属可以分成若干部分，这些部分无论分开还是合成一个整体，在一定的限度内都是一样的，而整体本身也是如此。）

整体可能是各个部分的辩证的总和，在这里，整体与其部分有着质的区别。然而必须特别强调指出，各个部分对整体的关系并不是在所有这样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說，应当考虑到现实的不同领域，并且总是要分别地对待它们。例如在一种化学的整体中，部分先于整体而存在（例如先有氧和氢原子，它们化合起来才成为水），但对于某种有机物的整体和部分却不能这样说。在后一种情况下，整体和部分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

许多唯心主义者总是力图使这种关系具有某种神秘的形式（例如斯穆茨的整体論），其目的归根到底是要把整体、绝对和神确定为神秘的整体。其实这种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本身，就是具有各种不同特殊性的最普通的自然关系，这种特殊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正确地加以规定。同时必须强调指出，这个整体和部分的問題同一般和个别的問題不能混为一谈，后者属于辩证法問題的完全不同的领域^①。

^① 这种錯誤常常发生，并且需要特别着重指出的是：这两种問題属于本体論的完全不同的方面。同样地，特别是邏輯方面的形式主义者企图把概念关系的問題（特

正因为整体即总体决定着部分，而反过来，部分构成为整体，因为每一个部分是“总体化了的”，所以只有在总体的结构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了解每一个部分。这一范畴对于黑格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真实的东西就是全体的东西），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如此。可以说，在分析任何现象时，整体的方法论乃是辩证的思维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

决定论问题

前面主要是从存在物本身，即从物质存在的各种不同形式本身来谈客观现实的一般规定。但是，经验本身从一方面告诉我们，个别事物不仅处于直接的存在关系中，而且同其他事物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这是由物质和运动的统一性这个基本原理合乎逻辑地引伸出来的。因为物质的某些部分在自己的运动中必然会对另一些部分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它们处于相互关系之中，因此它们也相互依赖。

物质宇宙中的每一个部分，只不过是无限的联系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至少在理论上把每一部分理解为这种无限联系和制约的合力，是完全正确的。非常明显，一定的普遍联系，是在分析宇宙间一个小小的领域内的某种具体情况和个别具体事件时所不应忽视的常数。

在这种普遍联系中，一个运动必然制约着另一个运动，一个物体必然制约着另一个物体，以至无穷。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起这种作用，一个运动决定着另一个运动，这就是现象之间的决定

别是在判断的问题上），确定并解释为一定的整体、组合等等的关系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不能对于在判断中所反映的那个认识过程的性质作出正确的解决。这就是说，在现实本身（这种现实在我们的思想活动中会通过特殊的方式改变样子），并不存在它的关系会反映在某种判断之中的那种分离了的整体。这种判断（合乎常情的判断）在特殊与一般或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本体论的事实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性。对决定論問題作一番比較詳細的分析，我們就可以肯定以下几点：

首先，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任何作用（在这里是一个物体引起另一个物体的运动），都是因果联系的形式之一。这同时也是决定性的最简单的形式，即因果性，这里，在因果的关系中存在着事件的一般順序性。但是，就在这种因果性的形式中，也显示出了这一現象的辯证性，因为原因和結果不是矛盾着的形而上学的两个方面，而是辯证的两个方面。正如业已产生的結果必然会作为另一种現象的原因而繼續发生作用一样，作为某一現象的原因的东西，也必将是另一現象的結果。这一矛盾的任何一方面都既是原因又是結果，即对立的規定的統一^①。

因果联系（因果性）的另一种形式是：原因和結果在其中有着先后的序列，但原因也像結果本身一样繼續保持着，可以說，这种发展过程是同时的。这种形式康德已經进行过分析（但他受到叔本华的攻击），它对于考察社会現象特別重要，因为在社会現象中不存在通常的机械的因果序列，而是原因和結果在同一个時間內都繼續存在。这并不是說，在这种情况下原因在時間上不是先于結果，而只是想要肯定和強調这样一个事实，即原因不停止发生作用，而結果本身也繼續存在。（某种特定的思想体系，是某一特定階級产生和存在的結果；但是这一階級繼續存在并决定着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虽然是結果，也同时随着特定階級的存在而存在。）决定論的这种情况对于研究社会現象十分重要，因为在这里，結果

^① 在仔細考察這一問題時，我們找到恩格斯講的這樣一段話：“原因和結果，作為概念，只有在应用于一定的個別場合才有因果意義；可是當我們一把這種個別場合放在它和世界整體的總聯系中來考察時，這些概念就匯合在一起而交織成為普遍交互作用的概念，原因和結果在其中經常地交替位置；在此時或此地是原因的，在彼時或彼地就成了結果，反之亦然。”（《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頁）

对自己的原因发生作用的情况是特别明显的。这里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同一因果序列的辩证关系，这对于了解历史的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①。

最后，我們也可以肯定一种内在的决定性，即决定性与本身的规律性等同的情况。因果性原则实际上往往被人了解为它的这种形式，即一些原因和结果的不变的常规性。

决定性这一概念的根源首先在于人类的经验，即人们对于两种现象之间的固定联系观察，其次也在于人的能动性本身。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很有根据地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来反驳不可知论。他说：“我们不仅看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看到：只要我们造成某一特定的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时所必需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一特定的运动；甚至我们还能产生在自然界中完全不会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运动；我们能预先规定这些运动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性观念的基础，而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②

由于这是人建立因果性观念和观点的基础，所以一切人从逻辑上说都具有因果性的概念，并且都根据对于各种事件的多少已经认识到的原因和结果来活动和行事。因此，莱维-布律尔关于两类不同精神（超逻辑的和逻辑的精神）的观点是根本不正确的，这一点后来就连他自己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觉察到了。共同的和神秘的观念的存在，并不否定因果性观念的存在，而是说明对于各

^① 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决定论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是十分复杂的，因此这也是导致如此庸俗化，导致搬用社会学观点的原因，特别是在需要确定比较高级的精神过程的因果性时（如思想体系、艺术、哲学等等）。第一，在这里所谈的不是物理学的决定论类型的因果性；第二，这里的因果关系要通过人类心理和意识的微妙处折射出来；第三，所有这些因素相互影响要比自然界其他领域中的情况复杂得多。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个現象的原因有着不同的解釋。而这是生产共同体发展的低級阶段的結果,是認識和掌握自然力和自然規律的低級阶段的結果,所有这一切就产生了一系列带有神秘性的观点。这些生产共同体在生活的不同时刻所进行的日常活动,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按因果性原則行事的,只是对于这些因果联系的認識还处于低級阶段,这在后来要以另一种方式来补偿^①。

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

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問題的一个方面,是包括在个别事物和現象的运动和发展的內在决定性問題的总体之中。这一問題本身曾使那些明确提出这个問題的古代思想家,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感到极大的困惑。他們首先遇到的是一般这个概念的邏輯認識論問題。我們的概念(它主要用来表示某种普遍性)和现实世界(它乍一看来完全是由个别事物构成的)的关系,以及科学的問題(它只有在一系列个别現象中确定了普遍性——規律性——才成其为科学),这就是千百年来貫穿在哲学史中的主要問題。这个問題从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內容起,經過經院哲学圍繞唯名論和实在論的爭論,主要是通过近代进步哲学中的唯名論傾向,而由黑格尔作出了深刻的研究,不过他仍然是从唯心主义的立場出发的。这一点无疑地是黑格尔本人也不能彻底解决这个問題的原因。但是他的关于本质和現象、共同和一般、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学說,無論如何还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有关这一問題的最深刻的研究。

在唯物辯证法中,这个問題包括有几个方面;其中,我們仅仅

^① 布律尔在下列几本十分有趣的著作中以丰富的科学論据提出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低級社会的智力职能》(1910年),《簡單智力》(1922年),《原始精神》(1932年)等等。这一观点很快就受到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如杜尔克姆、耳·維貝尔、普尔济路斯基等人的正确批判。

从发展的問題着眼，来談談这一問題的根本方面。因此我們將不考虑一般的東西也作为某种共同的東西表現出来（但不是在发展規律的意义上，而是在一定关系的規律性的意义上表現出来）的那种問題；同样，我們只想将这样一种共同的東西的形式，即从人类活动来看它是一般東西的那种形式，加以抽象地概括。在这种意义上說，人类的活動是这种共同的東西的来源^①。

唯物辯证法首先是从事物的个别性着手来考察事物。可見，个别是任何事件、任何过程的“基础”。但是我們到現在为止已經看到，某一个別并不是与其他的个别絕對隔絕的，而是同其他个别的物体或現象处于复杂的联系之中。

不过，除了这种“外部的”联系以外，在个别事物之間还存在着“內在的”联系。如果我們分析一种植物、动物或一种社会制度，我們就会看到，它們中間的每一种都具有一系列与其他的植物、动物或社会共同的特点。人和其他某些有机体具有共同的特性，这就是說，一切个别事物在其某些质上是和某些其他事物相同的，正如它在个别特性上与它們有所区别一样。

这种同一，这种共同的東西，实际上正是我們所研究的一般和特殊，它不是某种抽象的東西，而是个别事物的內在本質。从这些事物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共同的東西也表現为它們的規律性。

可見，一般和特殊（特殊也是一般，只是在与包括更大量現象的其他一般的关系中它才是特殊）并不是什么主观的抽象，不是“純粹的”一般，而是具体的一般，它既表明各种个别事物的联系

^① 这些問題在馬克思主义的領域中还很少研究。在我自己所著的《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一般、特殊和个别問題》一书中（1952年薩格勒布塞文版），对这一問題的某些方面作了研究。这里強調了結構的概念，如果不分析結構的概念，就不能理解規律的概念。不过，应当更进一步来指出結構本身的差異性。这样就可以区分出靜止的結構及其有关的規律（特别是在数学上），和在对其他某种結構的关系中表現出規律性的那种結構，以及活动的結構和它的活动的規律。如果进行詳細的分析，肯定还会发现一些其他的現象，这不过是证明这一問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說明。

性,甚至也常常表明它們的同一来源。

某些事物的这种一般特性,首先取决于这种个别的結構。个别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活动得多和变化迅速得多,因为它在各种不同的影响和情况下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作为規律的一般,就是个别在运动中的較为固定的东西,但它也是取决于这一运动的。这就是說,随着个别的結構比較急剧的变化,它的一般,即它的发展規律也在变化和发展着。(在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发展过程中,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就是下面这种情况:个别社会的結構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它的特殊发展規律发生变化,虽然普遍的規律性作为对一切社会都适用的一般,仍在繼續发生作用。)因此,和一切个别一样,一般也具有历史性。

个别过程中的这种內在規律性,在有机界以特殊的結構遺傳的具体的一般所起的作用,种或类的实现——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某一个过程的现实的、具体的結局。这样一来,有关这个問題的一切神秘性就都消失了,这个問題表現为一种基本的自然現象;这就是說,一个有机的或社会的結構,只能按照作为事物本身結構的表現和作用的那些規律来发展,而这种規律又随着这一結構本身的变化而变化。

必然性和偶然性

我們看到,在这里所研究的一般(即規律),并不是抽象的一般,而是具体的一般,即同自己特殊的和个别的因素相結合并体現在个别事物中的一般。它同时也决定着个别的运动和发展的进程,从而它本身就表現为一种必然性。必然性是一般(即自然界各个不同方面的規律)的表現和作用的方式。因为凡是在某一物种发展的一切条件已經具备的地方,这一物种就会按照它作为物种的內在規定性的必然性而发展起来,并且反复再現于一定数量的

个体中。可是，对事物的辩证的分析向我们表明：在自然界中并不是绝对的必然性实行着统治，而是也有偶然性的客观存在。

在哲学思想史上，对于解决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问题，曾经作过各种不同的尝试。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大体上是：从把偶然性看成两个因果序列的符合（亚里士多德、穆勒）起，经过把偶然性解释成原因不明的机械论的观点（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以及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起来的辩证观点（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直到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排除必然性的非决定论观点（布特鲁、现代实证论和某些自然科学家）。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具体的一般的观点才不同于其他的解决办法，而能够更深刻地考察和理解这一问题。

由于一般总是通过单个的、个别的事物和现象而存在并发生作用，所以在这些事物和现象中，它总是带着一系列外表的、个别的因素而存在。这些因素不是这个一般的无条件的表现（也就是说不是必然的），它绝不是某一种事物或现象存在的本质的东西，而是由一系列的情况、首先是外部情况所决定的。

这些个别的特性不构成物种的差异，而只能是个体与个体间的差异，它们并不是物种的发展所必需的，同时它们是无限千差万别的。

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这样写道：“因此我们认为偶然性系指一物能存在或不能存在，能这样存在或能那样存在，以及一物之存在或不存在，这样存在或那样存在均不系于自己，而依赖他物。”^①

按照这种理解，偶然的東西和不一定始終存在的非本質的東西是相同的。這也就是關於偶然性的基本觀點，我認為它並不排斥我們前面所談到的那種觀點，即也可以將偶然性解釋為兩種獨立的並且沒有任何相互聯繫的現象的符合。

^① 黑格尔：《辩证法》，1939年贝尔格莱德塞文版，第470页。（中譯文見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308页。——譯者注）

無論是在前一種情況或者後一種情況中，對於特定的個別（個人、社會等等）的發展本身來說，偶然性可以是非本質的（不重要的），但也可能是本質的。

在上述的後一種情況下，兩個現象的巧合對於某一現象的繼續發展可能是決定性的，但是也不一定是決定性的。

在第一種情況下，偶然現象對於個別的發展多半是非本質的，但是，一定的偶然現象在某一物種的發展中，也可能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現象，因而也是必然的和本質的現象。整個達爾文主義實質上就是奠基在這種由偶然向必然的轉變之上的。恩格斯在撰寫《自然辯證法》一書時就已經指出了這一點，他說：“達爾文在其劃時代的著作中是從建立在偶然性上的最廣泛的事實基礎出發的。正是單個的種屬內部的各個個體間的無數的偶然的差異，正是可能增大到突破本屬的特性的並且其最近原因只有在極其稀少的場合下才可能得到實證的那些差異，使達爾文不得不懷疑生物學中一切規律性的原有基礎，不得不懷疑形而上學地固定不變的原有物種概念。”^①

從以上所有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不能像人們有時所做的那樣，把偶然性的概念與非本質的概念絕對地等同起來。

在這裡無論如何還必須強調指出，這些個別的特性和偶然性，一般說來也同樣是一定的原因、首先是外部原因的結果，因此它們也是符合決定論的。至於我們對於一系列偶然性的各種既定的決定論的因素認識到什麼程度，以及我們能夠對它們確定到什麼程度，則是另外一個問題。由此可見，決定性的概念與必然性的概念不是等同的。必然性也同樣是決定性的一種形式，猶如普遍的因果性歸根到底也是偶然性一樣。

不把这些概念正確地區分開，不了解這一問題的全部複雜性，

^①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2—183頁。

再加上其他某些现象，特别是微观世界中的现象，就使得某些思想家（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一反过去那种把规律当作绝对必然性的机械论观点，由于存在一系列偶然性（实际上它们都伴随着某种必然性），而把一定的事件宣布为非决定论的。

直到现代，在自然科学中还一直满足于由宏观事件的分析产生的拉普拉斯式的严格的决定论。可是现代物理学、特别是与光的问题有关的现代物理学的飞速进步，使得旧的观念发生了相当的变化。

古典力学所不能解决的灼热物体的辐射问题，决定了新的物理观点的出现，其中普兰克关于非连续性的观念，亦即光能的非连续性放射的观念，无疑是划时代的。它如此强烈地动摇了关于光的波动性的古典观点，以致后来爱因斯坦依据微粒理论而埋葬了这一观点。这样就奠定了量子力学的基础。量子力学通过波尔、海森堡、施略丁格尔、德·布洛利、迪腊克、波尔恩等人的学术著作，终于假设光具有二象性，即把光看作微粒和波的存在。

所有这些学术著作，使许多物理学家陷入了迷途。这是不奇怪的。古典力学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概念被摧毁了，波和粒子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变为统一了，这一切都使得各种实证论者有借口来重新坚持自己唯心主义的结论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形而上学”的见解。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人类的智慧和知识所达到的每一根本性的进步，竟使某些人对人的认识的客观性和可能性发生怀疑，其实这一进步正向人们最清楚地证明了人类智慧的力量及其认识过程的无限性。

从决定论的问题来看，海森堡关于测不准关系的确立，是量子力学发展中的特别重要的因素。

在试图测定电子运动的实验中，得出了和古典力学不同的结果。在古典力学中，在任何个别场合下，只要我们知道某一质点的位置和速度，那末这一质点的运动就是完全确定的。但是，由于光

的波和微粒的結構，我們却不能同时測定电子的速度和位置。此外，我們在使电子发光以确定其位置的同时，对它所起的作用也足以使它改变速度。

海森堡的測不准关系表明，同时正确地測定电子的速度和位置，这在原則上是不可能的。采用微粒照片不可能比測不准关系所作的更为准确。

由于位置和速度这两种成分在古典力学中是构成因果性原則的主要成分，所以当时有許多人就得出結論說，在微观物理学中根本談不到什么因果性，即決定論，而只能談非決定論。

普兰克、施略丁格尔、海森堡等人都得出了这种論点，并认为这些規律性的統計性质否定了決定論的原則。这里实际上說的是什么呢？

科学习惯于采用宏观物理学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某一因果关系的組成部分是能够确定的。通过对一系列其他的如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中的因果联系的研究（这些因果联系取决于大量个别的因果关系，而且每一个别的情况都影响基本的結果并改变它的形态），我們可以看出：規律性不是以絕對相同的形式出現的，而是表現为一种趋势，并且主要表現为一种具有无数不同形态的“基本路綫”。

在这种情况下，規律本身是由內外因素所制約的一系列相互作用集合成的結果。因此，存在着大量的偶然性（每一种偶然性本身又都是符合決定論的），它們必然要破坏事件的划一性（即旧的意义上的規律性）。因此，大量事件的規律性，除了統計的方法以外，不可能用別的方法来表現，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始終只能确定事件的那种“基本路綫”，也就是事件的最常見的情况。

在海森堡的測不准关系的問題上，实际上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同时由于我們今天在主观上还不能确定每一个别情况的所有成分，这种情况就显得具有权威了。

但是，統計的規律性的存在，正是向我們证实了这些过程的决定性，甚至是比较一致的决定性。因为，如果个别的条件、原子内部的力量和其他情况不实现合乎规律的确定性，如果每一个电子都是不受决定論的限制而行动，那末就不可能存在事件的这种“一般的路綫”，也就是統計的規律性，因为自由的变異是无限的。正因为有統計的規律性和盖然性的存在，这就表明上述过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即这些过程中的大多数必定通过一系列的偶然性而发展起来，这些偶然性在这种錯綜复杂的結構中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必然的^①。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說明：無論对于必然性問題或偶然性問題，都应当作辯证的理解。

对立面渗透規律

唯物辯证法所揭示的整个自然界的另一个普遍規律，就是对立面渗透規律^②。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矛盾着的。我們可以用这一原理来概括一切可能有的矛盾，从最簡單和最表面的矛盾，到作

① 正因为如此，就一定会得出与施略丁格尔相反的結論。施略丁格尔从分子間的运动着眼，作出結論說：“只要一認識到那些規律性具有几乎是全部的——而可能真正是全部的——統計性质，那末这些規律性就不再提供任何合理的論据來說明它仍然是基于决定論的。”（《論物理学上的非决定論》，1932年萊比錫德文版，第15頁）根据这些事实，新实证論者得出結論說：因为事件不能被准确地預見，因為它們具有統計性质，所以就談不到什么决定論，因此他們是把作为客观范疇的决定論与作为主观范疇的預見混为一談。

② 我认为应当拋棄“对立面統一和斗爭”这种表述方法，因为：第一，“斗爭”是一种仅仅适合于有机界的概念，只有在动物之間或者人們之間才有斗爭，但是对于无机的元素、或者引力和斥力以及阳电和阴电來說，則它們之間絕对沒有斗爭；第二，任何存在总是內在和外部的各种对立面的渗透（这也就是統一和相互作用）。因此，“渗透”这个术语（恩格斯从前采用过它）比較适当地包括了自然界中一切对立面的情况。同时这个术语并不排除在存在着对立面斗爭的地方，如在有机界而特别是在社会的运动中，也产生对立面斗爭的可能性。

为发展的源泉的矛盾。

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区别的，即使是事物之間的最普通的差別，也向我們表明：不存在什么絕對同一的东西。这样我們就可以理解萊布尼茨的原理，即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事物。

但这种看法认为，事物基本上是彼此无关的。我們將两个事物加以比較就会发现，它們在一定的特性上是“对立的”，也就是有差別的。但我們同样也会发现，它們在一定的特性上是同一的。而矛盾的第一种关系——統一和不統一（同一性和差別性），在本质上是辯证的，因为一方是同另一方統一的。某些事物之間的統一性，不言而喻地也包含着它們之間的不統一性，正如它們之間的區別必然也包含着某些統一性一样。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只有通过某种与它共同的东西、相同的东西才能进行比較，也就是通过交换价值来进行比較。即使是极不相同的事物，至少也具有作为一般物质发展的表現和因素的那种統一性^①。

矛盾的再一个阶段就是肯定和否定。我們为了区别起見，曾設想这两个对立的观念是彼此无关的，現在为了給它們下定义，我們就应看到它們是相互制約的。或者，如黑格尔所写的，这两极中的任何一极，都要通过另一极表現出来，而且另一极怎样，它也怎样。在他对《邏輯学》的注釋中，有一段精彩的論述向我們說明了这一极性的关系。他說：“人們总以为肯定与否定具有絕對的區別。但其实两者是相同的。我們甚至可以称肯定为否定，反之，亦同样可以称否定为肯定。同理譬如說，资产与債務并不是特殊的本身不同的两种財產，在負債者为否定的財產，在債权者即为肯定的財產。同样的关系，一条往东的路与往西的路即是同样的一条

^① 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在其《邏輯学》一书中特別进行了研究，一般說来，在該书中最深刻地研究了对立面和矛盾的問題。他說：“相似只是彼此不相同的，不同一的事物間之同一。”（黑格尔：《辯证法》，塞文版第 419 頁。中譯文見《小邏輯》，三联书店 1954 年版，第 262 頁）同样地，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也出色地采用了这一范畴和原理。

路。这样，肯定和否定就互为条件，并且只存在于相互联系之中。北极的磁石没有南极便不存在，反之亦然。如果我们把磁石切成两块，我们并不是在一块里有北极，在另一块里有南极。同样的情形，在电里，阴电阳电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流体。在对立里，相异者并不是与任何别物相对立，而乃是与它正相反对的别物相对立。”^①

最后，在每一种发展中都有着各种不同的趋势和力量的对立，这是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列宁特别重视这一因素，在他的笔记中有许多地方谈到这一问题，并强调指出：只有借助于这种因素我们才能了解自我运动。在他所写的《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列举了对立面的各种不同形式，从正和负，作用和反作用，一直到阶级斗争^②。

正如我们迄今所看到的，一切矛盾没有相同的性质。如果说一些矛盾只具有差别的性质，而另一些矛盾则具有肯定和否定的性质（这种矛盾告诉我们，没有本质的对立就不可能存在，例如原子、行星系等等之中的对立的力量），那末客观现实的各个领域中的力量的矛盾和它们的斗争，则向我们表明了发展所由产生的基本力量。

当我们分析任何一种发展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体（作为一个统一体）并不是由于新形式而有机地增长，它的这种增长始终是由

^① 黑格尔：《辩证法》，塞文版，第424页。（中译文参阅《小逻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65—266页。——译者注）

^② 列宁特别着重指出，矛盾和对立面的问题对于了解发展的本身，对于了解辩证法的中心概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说：“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8页）

內在的力量的极化所决定的，是由处于統一之中的內在矛盾所决定的。統一不仅仅意味着暫时的、相对的平衡和靜止，而且也意味着矛盾各方的必然性和它們之間不同程度的极化。此外，还应当強調指出，这些矛盾不仅存在一种表現形式，而是每一事物在自己的发展中都表現出矛盾的更多的形式。例如在生物界中，恩格斯提到了继承和适应的矛盾；又如在历史上，階級斗争也不是唯一的形式（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在各个集团之間等等都存在着矛盾）。簡言之，沒有不同力量內部的极化，沒有作为发展的实际源泉和动力的內在矛盾，就沒有事物的发展。

否定之否定規律

对立統一和斗争的規律向我們說明了一切发展的动力，說明了发展賴以實現的內在的对立趨勢。

正如我們在前面各节中所看到的，任何发展都必須以事物的质变为前提。沒有这种质变，就沒有产生新的自然形式（生物形式、社会形式）这种意义上的发展，因此量到质的轉化規律向我們說明了一切发展的結果和要点。

对立面統一和斗争的規律向我們說明了一切发展的內在动力，但这一規律本身並沒有向我們說明这些对立面斗争的結局。

否定之否定規律就是这两个規律之間的某种中間环节，而在现实本身則是客观的桥梁，它幫助我們理解任何过程的两个阶段之間的联系，即对立关系发展的阶段和过渡到新质的阶段之間的联系。

如果我們分析了各种事物的本质矛盾，即由該事物的质的界限所規定的矛盾，那末就能十分透彻地了解这一規律性（以及前一規律）。

任何个别事物由于它是由一定的质所規定（决定）的，所以它就不可能同时又是說明另一事物的其他的东西。某一事物的这种

质的規定性(当然也包括量的規定性)和界限,正是使得它的运动、发展和变化成为可能的那种基础。而且正因为它只是某种規定的东西,所以我們說,它不能同时又是一切其他的东西,正如斯宾諾莎以及后来的黑格尔和馬克思所已經讲过的,决定就是否定^①。任何决定、任何規定实质上也就是否定,是对其他所有东西的否定。它只是表明,任何个别,其本身都不是无限的,而且是包含着矛盾的。

在任何发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在个别事物(有机体、社会等等)中有新的內容、新的力量在产生,而个别事物就日益和自己固有的否定相矛盾,也就是和它在其中发展的范围、质的界限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对立面的斗争(它們意味着本质的对立)表现为事物的新的力量、新的內容同旧的形式、旧的结构斗争。在一切成功的发展中,这些新的力量在自己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否定了(揚棄了)自己的对立面、自己质的界限、自己的否定。这一行动就是否定之否定、革命的时机,它把两个进化阶段联结起来。这种革命行动的內容就是新质的产生。

^① 这种深刻的辩证的思想,还在柏拉图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柏拉图在《诡辩学派篇》中指出:“因此我們看到,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即使是存在的东西,在其他的東西那里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一不存在,它就一定只是一种东西,但是对于无数的其他东西來說,它是处于不存在的关系中。”黑格尔則直接继承了斯宾諾莎的原理(决定就是否定),并且在《邏輯学》中对这一問題作了最明确的說明。他說:“在生活中,否定是直接存在同一的,并且这种否定是我們称之为界限的东西。某物之所以为某物,只是由于存在于自己的界限內,由于有自己的界限。因此不应当把界限看作某种好像純粹是外部存在的東西,因为它渗透一切的存在。将界限理解为存在的純粹外部的規定,是基于对量的界限与质的界限这二者的混淆。而这里的問題首先是质的界限。……如果我們試进一步細究界限的意义,則我們就会发现界限本身包含着矛盾,因此它表现为某种辩证的东西。换言之,界限一方面构成存在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又是对这一存在的事实的否定。……”(黑格尔:《辩证法》,塞文版,第369頁。中譯文參閱《小邏輯》,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14—215頁)只有根据这些原理,辩证的否定規律才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只要考察一下任何一种发展的情况，就能基本上揭示所有这些因素。例如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这个社会的一种内在的界限，是它的第一个否定。由于生产力的增长，由于这一新的社会内容的增长，这种发展就引起了矛盾，而最后还造成了对抗（因为对抗是矛盾极端尖锐化的表现），导致对自己的界限的否定，对自己的否定的否定，即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否定，而这种情况就是否定之否定，同时也就是向新的社会的质——社会主义——的过渡^①。

非常明显，这些社会矛盾是通过人的实体而表现和发展的，我們这样说，是因为人是历史的主人。在阶级社会中，旧的质的界限（旧的生产关系，一句话，旧的社会）和新的力量之间的这种内在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里一些阶级代表旧的形式和内容，而另一些阶级则代表新的形式和内容。政治和社会的革命是这些内在矛盾和对抗的必然结果，没有它就不能过渡到具有新质的社会状态。可见，一切向新的社会形式的过渡都是革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必然如此。不过后一种过渡将不再具有政治变革的性质。

人和自由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本身包含着自由的人的个性、創造者的个性的原則同自然事件及自然历史事件的普遍决定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乃是大多数哲学家所力图解决的主要难题和首要課

^① 这一規律也可以用連續发生的过程来解释，在这里事物会发生同样的结果，因为作为某种肯定的东西的原有阶段，实际上也是前一阶段的否定。例如，馬克思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出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个人的以本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以一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出它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4頁）在这段話里应当看到：被否定的个人的私有制，已經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即对封建的依附关系和所有制的否定。

題，它实际上反映了事物进程本身和人类生活中所提出的矛盾。

决定論者和非决定論者关于人的自由問題的长期爭論，乃是要解决这一問題的不断努力的证明。馬克思对这一問題的解决，超出斯宾諾莎和黑格尔关于自由是認識了的必然性的观念，为闡明这个人类之謎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意見。

正因为人是整个自然运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他必然为一系列規律所决定，因为这些規律对于整个自然以至那些包括人在內的自然的特殊領域都是同样起作用的。因此人也为这些規定和規律所限制。人作为物理的生物和有机的生物，也和其他一切生物一样，受到一系列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决定素的限制，根据这些决定素，人的自由表現的可能性、他的自由行动、他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而作为社会生物，人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历史的和精神的活動是由一系列原因——从經濟的和社会的原因起直至思想的和个性的原因为止——所决定的。

关于人为一系列自然历史因素所决定、規定和制約的事实，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样，由于以上許多因素，人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彻底解放。

然而，人也是創造者，而如果沒有自由，創造是不存在的。无論如何，人的这种自由的本质，絕不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仅仅在于从上述不同的原因中进行选择的“自由”。把自由归结为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意味着貶低人的作用，因为这样的选择甚至会受到最普通的、本能的、功利的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約。

問題要深刻得多，在这里人的意識表現了自己的重要性和威力。

誠然，非决定論看不到前面已經提到的人所受到的一切限制，这些限制对人的活動起如此巨大的决定作用，以致根本談不到什么絕對的自由。反之，决定論則看不到人的意識和意識活動的作用和力量，即看不到为严格的决定論增添新成分的因素。

人不单纯是自发发展的产物，他在自己的各种活动中不单纯是必然性的盲目的工具，因为他也能够認識这种必然性，并根据这一認識来安排自己的行动，利用他通常所遇到的各种力量和自发势力等等。人的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对必然性的認識的程度，或者，如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和斯宾諾莎、黑格尔所規定的那样：自由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性^①。

可見，人的自由的实质在于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必然性即規律性的認識——这是人摆脱一系列的偏見、克服物质上和思想上的限制等等的結果。

总之，自由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且像所有历史現象一样是发展的。人对于制約着他的規律認識得越多，他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就越自由。由于发现自己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系列决定素，人日益摆脱了过去束縛他的一系列其他限制。因为，人之不自由不仅在于社会經濟領域，而且也在于思想領域，在这里，由于各种形式的異化，人实际上沒有意識到自己自由的可能性，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生活的直接的决定素。

人的历史也就是人的異化以及排除各种異化形式的历史。从

^① 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一书中非常扼要地闡明了这个問題的本质：“自由不是在于想像中的对于自然規律的独立，而是在于認識这些規律，并且在这种認識所給与的可能性之上，有計劃地使得自然規律为着一定目的发生作用。关于外部自然的規律，以及关于人們本身的支配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規律，都可以这样說——这两类規律，我們只能在思想上，而絕不能在现实中予以分开。所以意志的自由，不是别的，只是由于認識事物而能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所以人对于一定問題的判断越自由，則所确定的这一判断的內容，将带着同样大的必然性；而犹豫不决則是以无知为基础的，看来好像是在許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可是这种犹豫不决，正是证明自己的不自由，证明他被自己所应当支配的对象所支配。所以自由是以对于自然必然性的認識为根据的、对于我們自己以及对于外部自然界的支配；所以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最初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向着自由的进步。”（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7頁）

历史上看，異化具体地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最广义的意识形态的领域。

馬克思在他的早期就看出費尔巴哈对異化問題的見解的片面性。在他的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第四条中扼要地指出：“費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異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像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哩。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身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論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①

“費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費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②

“所以，費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③

在更加综合地研究人的问题时，馬克思立刻了解到，人的意識

^① 《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第（四）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頁。

^② 《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第（六）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頁。

^③ 《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第（七）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頁。

形态的矛盾既不是人的思想的独立自主的和孤立的产物，也不是什么抽象的人的独立自主的和孤立的产物，而是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他了解到問題的解决正是在于揭露人的整个生活中的矛盾。

因此，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更确切地說，对于人的解放問題的研究超出了思想領域狹隘的範圍，并且貫穿着对人作为有意識的實踐的生物这一基本規定的分析。人的存在的现实性不仅仅在于理性。人的关系不仅仅在于思想的关系。人的實踐、感性活动、行动、劳动都是人的本质的規定，正是根据这些規定人才和其他生物区分开来，也正是根据这些規定人才成其为人。

但是，劳动本身并不是作为一般的劳动而存在的，它只是存在于自己的特殊形式之中。劳动关系乃是社会关系，而在私有制社会中，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現代的私有制社会中，它以歪曲的形式，即以自我異化的形式表現出来。“劳动者对待自己劳动的产品好像对待一个疏远的对象一样——就在这一論断中存在着全部結論。因为，依照这一个前提，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劳动者生产得愈多，那末，他所創造的和自己对立的疏远的对象世界就愈强大，他本身就愈貧困，他的內在世界作为他本身的世界就愈少屬於他。在宗教中也有这种情形。人們向神灵供献得愈多，則他在本身中保存得愈少。劳动者把他的生命投到对象中去；但現在他的生命已再也不屬於他而屬於对象了。从而，这种活动愈大，則劳动者愈成为沒有对象的。凡是他的劳动产品都不屬於他。这种产品愈大，則他本身愈小。劳动者在他的产品中的異化意味着：不仅他的劳动成了一个对象，成了一种外在的存在；而且劳动是在他外面、不依存于他、疏远地存在着，并且成为与他相对立的一种独立的力量；凡是他投到对象中去的生命，都敌对地、疏远地对着他。”^①

^① 馬克思：《經濟学—哲学手稿》，參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頁。

但是劳动者不会疏远地对待他本身的产品，劳动的产品不会成为劳动者的**異化**——如果这种異化不是在生产产品本身的本质方面的話。也就是說，劳动者在生产本身的活动中自我異化，生产是真正的異化，而这个现实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即生产者和他的劳动产品分离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使得其他某个不从事产品的生产的社会集团有可能占有劳动者的产品。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对劳动者来说是**外在的**，即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他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反而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反而感到不幸，并不发挥任何自由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精力，反而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使自己的精神陷于荒廢。”^①

馬克思把其他一切異化的形式的根源归结于**經濟異化**的事实。这种經濟異化的后果不仅落在劳动者身上，而且落在资本家和整个社会身上。劳动者在其中对象化和異化为自己劳动力的一部分的产品，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成为一种为劳动者以及这些生产产品的占有者所不知道的东西。因而，无论对劳动者或资本家来说都是異化的劳动对象、商品，具有表现为它所固有而不以其他任何事物为转移的**規定性的某些特性**。这种商品的价值，它的性质和作用好像是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好像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当人类生活本身也为市場的波动所左右，为这些商品的缺少或过剩所影响的时候，当这些商品存在的神秘性给人类生活带来那样的不安和动荡，以致要求有某种固定的立足点，那怕是抽象的空想的立足点的願望已經成为日常心理的需要的时候，这一信念就更加加强了。

在这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分析直接补充了他早期的著作和观点。他在指出商品的神秘性不是产生于它的使用价值之后，

① 馬克思：《經濟学—哲学手稿》，參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5頁。

作出如下的結論：“商品形态的神秘性，不过是这样构成：人們把他們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作劳动生产物自己的对象性质，当作这种物的社会自然屬性来反映；从而，生产者对总劳动的社会关系，是当作存在于生产者外界的諸对象物的社会关系来反映。就因有这种轉換，所以劳动生产物成了商品，成了感觉的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就像光綫一样。一物的光綫射入我們的視神經时，我們不认它是視神經的主观的刺激，却认为它是眼睛外界某物的对象形态。但在視觉活动中，确实也有光綫由一物，一外界对象物，射到別一物，眼睛里。它是物理的諸物間一种物理的关系。但商品形态，及商品形态依以表現的劳动生产物間的价值关系，是和劳动生产物的物理性及由此发生的物的关系，絕對沒有关系。那只是人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人看来，这种关系，采取了物間一种关系的幻想的形态。所以，要找一個譬喻，我們必須进入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生产物，好像是賦有生命，互相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存在物。在商品界，人手的生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个叫做拜物教。只要劳动生产物是当作商品来生产，这种性质就必然会附着在劳动生产物上。所以这是商品生产的不可分离的性质。由以上的分析已經知道，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起因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的性质。”^①

可見，只要人看不到商品世界的性质和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后果是受社会关系的性质制約的，并且看不到商品拜物教是現代社会所固有的異化过程的一个方面，那末，人生活在这种历史范圍和条件下，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

在現代的人的这种錯綜复杂的关系中，經濟異化是其他一切異化形式的基础。那种使生产中的自我異化成为可能的制度，必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54頁。

然是隶属的、剥削的、不自由的制度。

人，社会财富的真正的创造者，使本身固有的社会力量异化于政治力量的形式即国家形式之中，而国家却成为凌驾于那些真正是人生存的可能性的前提条件的东西之上的力量。人，财富和社会关系的创造者，在他本身的创造物面前是从属的和无权的人。没有前途、没有权利、备受压迫、生活贫困的现实，它的另一方面的后果必然是制造出对某种现实的幻想，作为对于一切世俗的否定现象的补偿。也就是说，应该从人的社会经济异化中去寻求宗教异化的基础；应该从现实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不自由里面去寻求宗教的不自由。

“私有制的积极的扬弃，作为人的生活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返回到他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宗教的异化作为这样的东西只不过出现在人的内部的意识的领域中，但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所以这种异化的扬弃包含着两个方面。”^①

可见，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异化的扬弃，因为它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这一领域的异化的扬弃必然也涉及所有其他领域。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而且是人的问题，它意味着人的全面的生活。因为人是全面地对待现实的生物。“他和世界的任何一个人性的关系，看，听，嗅（引文删去了“味，感觉，思维，直观，感受，意欲”。——译者注），动作，爱慕，一句话，他的个性的一切器官，如同那些直接在形式上作为共同器官的器官一样，在其对象的关系中或在它和对象的关系中是对象的占有。人的现实性的占有，这种现实性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证明”^②。

这里问题不在于一般占有形式的占有制，如人占有私有财产。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3—84页。（引文中增加了某些着重号。——译者注）

^②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参阅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6—87页。

人對於現實的全面的關係，是全面地能動地掌握現實的可能性，但只有全面地能動地對待現實才能達到這點。

在階級社會中，這種全面的關係的缺陷就是人失去人性，人的個性局部化，人們變為受限制的自動機械和機器。人對現實的全面關係的可能性的復歸，這是新的人道主義的基礎。如果不揚棄人在某種單調活動和政治經濟上的從屬的情況下的異化現實以及人的生活困境，那末，要想建設一個奠基於人道主義原則之上的社會是不可能的。

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也是現實的人道主義，因為它傾向於實現具體的感性的人的關係；但是它同時也是抽象的人道主義，因為它把一切都歸結於克服宗教的異化，而不是去揭露一切異化的現實基礎。因此費爾巴哈必然要停留在歷史發展的次要的道路上，而這條道路跟現實的、主要的道路只有一個共同的起點。

馬克思的人道主義是人的“人性”、人的族類的本性的體現，也是人對現實的全面的豐富的可能性的體現——它奠基在對這種全面性、人性之否定的關係本身的全面的改變之上。只有這種階級關係、私有制關係、從屬和統治關係的揚棄，總之，異化的揚棄，才能成為“把人看作人以及把人和世界的關係看作人的關係”的基礎，才能成為“把愛情只和愛情交換，把信任只和信任交換”^① 等等的基础。

在我們的時代，馬克思主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忽視了這一個問題，而這一個問題卻很快地成為資產階級哲學的中心課題之一。馬克思主義者迄今首先以自己的革命者的力量從事革命的行動和注意經濟問題，認為經濟問題是基本的問題，而忽視了許多理論問題。在恩格斯關於哲學是辯證法和邏輯學的这个定義本身中，也表現出了十九世紀後半葉科學和哲學方法論偏見的影响。

^① 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參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9頁。

的确，現代的革命行动是一种倫理改造的可能性的最深刻和最现实的基础，是人类現代的进步事业的最合乎道义的行动。但如果是孤立的行动，那末革命行动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归根到底也是沒有成效的。人的解放的过程不是由革命行动一下子解决的，因为这是长期的过程。对于人的关系、偏差和異化現象的批判，仍然是人的經常的任务。也就是說，創造性的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对人科学地說明世界，而且还要成为人的克服一切形式的思想異化現象的理論手段，成为人在爭取摆脱一切障碍、阻撓、蜕化、神秘化現象，一句話，在爭取摆脱一切丧失人性的現象的历史性斗争中的指路明灯。

馬克思主义哲学以如此完整的、富有思想內容的原理，在理論上永远消除了在解釋人及其思維方面的宗教的和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就是說，人本身依存于自身和自然界。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也沒有什么不能发现的不可知之物。人是自我的产物。生活的涵义就是人赋予它的涵义。而整个人的进步还是取决于人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什么虚妄的幻想和他本身的思維的产物。人能够在实践中掌握和認識自然規律和社会規律到什么程度，人也将会繼續进步到什么程度。这种发展不是取决于什么別的东西。

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本身不流于宿命論，但又承认偶然性和在偏差的意义上能够对必然性的进程发生作用的个别因素，所以它在本质上是能动的哲学。不仅如此。它胜过唯心主义体系的全部能动性观念，因为它不仅認識到思想的能动性，而且也認識到具体的、实践的、感觉的、现实的能动性。

人是真正的創造者，而且也只能是这样的人，是改造世界、自然、历史，同时也改造自身的生物。他发展着自己的認識。一句話，他有历史。人是唯一的历史的生物，因为他不仅仅重复着自己族类的規律，而且以自己的历史活动創造着一系列新的規律，因为对于他來說，发展在实质上就是朝着更大的自由的运动。

虽然这种运动在过去和現在都必然有其严重的局限性，虽然整个人的本质都曾經为各种形式的異化所束縛，但是人毕竟是唯一意識到并能克服这一局限性的。人类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是爭取人性的斗争的一个阶段。人的解放的現代阶段，乃是人从人的異化的基本形式中解放出来的时刻。

第二章 社会学

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性

唯心主义在解释历史发展方面的一个主要难题，就是它始终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一定的历史时刻会出现同样的或相似的社会制度，会出现同样的或相似的政治、法律、哲学等等观念？究竟是哪一种人类精神的规律性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十八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的德国等等国家中创立了同样的或多少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

这种建立在人类精神即意识的自由和第一性之上的规律性，是任何一种唯心主义都无法找到的^①。

马克思摒弃了所有各种把人看作“观念”、“自我意识”、“绝对”等的“发展因素”的幻想，而把人理解为具体的、现实的、劳动的生物，他同现实和社会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本能的自卫关系、实践劳动关系起，到愿望、兴趣、要求、理想等为止。这些关系是他个性的组成部分，是他的人与人的关系和意愿的生物社会学的基础。

^① 所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从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学起，到近代的各种社会学，例如心理学社会学、形式社会学和现象学社会学为止，都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在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中，甚至提出这种观点，认为不存在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因为社会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只是精神的创造。因此，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学不可能解决这一个并不是特别混乱的领域中的问题，这样就走到了一个极端。而近来大部分研究经验社会学（这还是非常必需的）的社会学家却陷入另一个极端：他们把上述问题不仅说成是不重要的，而且说成并不是社会学的问题。他们淹没于大量的经验的事实中，但却忘掉了：科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寻求一定领域的规律；只要事实能被推广和综合，就有它存在的理由。

总之，社会的人的这种心理，在一个一个时代里甚至短促得多的时期內，都各不相同并发生变化的。这种心理对于同一社会制度內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势必是各不相同的，而对于不同国家內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阶层來說，在某些基本点上却是相同的。

由此可見，一定的思想体系必然反映着一定的社会阶层的观点、願望、利益和生活方式等等，而一定社会阶层的这种社会意識状况，又是由該社会共同体的整个社会历史情况和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

那末，这种社会情况和社会政治制度实质上又是什么东西决定的呢？农奴和封建主之間的封建关系的根本基础是什么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农民和资本主义社会內必然存在的其他阶层之間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根本基础是什么呢？所有这种关系的实质，正在于經濟关系，即各个阶级或社会阶层在一定的經濟关系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誰的手中掌握經濟資料，某些其他的人对这个占有經濟資料的人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之中，他在这种关系中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对任何社会的“解剖学”，是构成上述一切的基础的具体物质結構。

因此，不了解一定时代或一定社会的經濟和經濟关系，就无从研究社会的人的心理，从而也无从研究他的意識形态的表現。

但是，經濟本身，即經濟关系，也不是某种固定的、僵化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它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生产力（生产工具和具有劳动經驗和劳动知識的人）則是历史发展的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東西，它的发展导致一些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理論、理想、观点，总之旧的思想体系的解体，并导致新的社会关系、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新的理論、理想、观点，总之新的思想体系的建立^①。

只要分析一下以往的历史发展，就可以看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变革的基础都在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同生产中現存

的经济关系发生了矛盾。为了使人们能顺利地继续向前发展，必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这就是从原始公社过渡到奴隶占有制社会，从奴隶占有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从资产阶级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质所在。这些社会，也就是自古以来的各种基本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应当把研究这些社会形态的结构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上述这些思想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

唯心主义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所提出的一种主要非难，就是认为经济关系绝不是物质关系，而是精神关系，对此，如果我们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这就是认为社会发展的基础竟是精神关系，而不是物质关系^②。

① 大多数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种关系解释成机械的关系。其中，一些人是由于无知；而另一些人则避而不谈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许多驳斥了以上解释并对这个关系作了正确说明的人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分析。我们只要从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举出一段，就足以说明了：“……根据唯物史观，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我或马克思从来都只不过是如此断定而已。倘若有人把这个原理加以歪曲，说仿佛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末他就把这个断语变成毫无意思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场合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也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如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至所有这一切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进一步发展成教义体系。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透过无穷无尽的偶然情况向前进展……”（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8—489页）

② 特别在鲁·施塔姆列尔、麦·谢勒以及一切用新康德主义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人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这种观点。例如，麦·阿德勒与那些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相反，竭力说明，经济关系不是物质的关系，而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正确的），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首先是精神的关系：“换言之，如果经济关系不外乎就是人们的关系，那末，它在实质上也就是精神的关系，即是说，它始终包含着人们一定的、自觉有目的的活动。”（麦·阿德勒：《唯物主义历史观教科书》第1卷，1930年柏林德文版，第157页）并参看该书的第194—195页，在这两页，他力图证明，社会存在是精神性的。

的确，人們的关系不能仅仅是片面的物质关系，正如同人本身絕不能仅仅是实践的劳动的生物而不同时是思想的生物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看到经济关系中的精神交往的方面，那末自然永远也不能理解这一关系的物质性。因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人本身（如奴隶或农奴）的占有，购买他人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不是仅仅为占有者創造某种精神交往和精神价值，而是創造物质上可感触到的商品，即生活用品和奢侈品），——这一切都是最普通的物质占有形式，是物质关系。在今天，弄不清观念上的一百他連尔（銀币名。——譯者注）即精神上的占有和錢包中的一百他連尔即物质上的占有之間的区别，这就意味着处在比唯心主义者康德本人还落后的哲学思辨阶段。

任何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基本上也是有意識的关系。人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历史中的革命因素，他自身变化着，同时又有有意識地改变着生产工具本身（从而也改变着自己本身），生产工具的发展又引起了廢除一定的旧的經濟关系的必然性。正是根据这一論断，于是又出現了一种非难。这种非难认为，改变历史的因素，仍然是意識，仍然是人，因此在这里不可能存在什么决定性，因而也不可能存在什么規律性（李凱尔特、馮特）。但是这种观点沒有考虑到，人（任何人）始終是处在早已形成的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經濟关系）中，他像接受以往时代的全部知識那样地接受了它們。因此，他的活动显然要受到現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現有的經濟关系和一般社会关系、現有的科学和整个意識形态的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約束。所以，他不能越出自己所处的社会的范围，这就是說，他只能为在他所处的社会中可能已具备其物质和精神前提的那个新社会而奋斗，而不能为另外某一个新社会而奋斗。由此可見，虽然人是历史和他本身的唯一創造者，但他始終是在現有的物质力量和物质关系的基础上来創造的，他的思想只有在正确地反映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性、也就是規律性的情况下，才是革命的；而在

一切其他情况下，他的思想和行动或者是反动的，或者是空想的。

社会经济形态范畴

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最重要范畴之列。甚至可以說，它是个别和一般之間，即被考察的个别国家和具有普遍特点与规律的一般社会之間的中間环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只是相同的一些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加强的情况是没有的。社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迄今已經形成几个在质上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其中每个类型本身又成为特殊的社会机体。由于社会发展和社会組織有特殊的、在质上不同的各个阶段，因此我們涉及到的，是一些有其特殊的成长、发展、活动和向另一种社会組織形式过渡的规律的制度。

馬克思就是把按其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关系和一般社会关系不同于其他结构的社会整体和制度叫做社会经济形态^①。

实际上，我們可以說，在第一章已經提到的一般规律性，正是在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形式中（当然，也始終在某些个别国家

^① 列宁特別清楚地看到了这个范畴的意义，因而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不同，极力坚持这个范畴。而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則不同意这个范畴，他們或者談論一般的社会，或者把社会分解为无数的、或多或少是重要的形式、集团等等。例如，列宁在和民粹派論战中写道：“这个理論（即馬克思主义理論。——作者注）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資料的謀得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資料謀得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間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些关系（即馬克思的用語‘生产关系’）的体系是为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所包裹着的社会基础。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每一种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轉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重要和不重要之間的区别已为社会经济结构这一内容和政治、思想形式之間的区别所代替了；由于推翻了以往那些在仅仅有特殊的历史上一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规律的地方看出自然界规律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已被推翻，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本身也就得到了确切的解釋。”（《民粹主义的經濟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88—389頁）（引文刪去了原文中的着重号。——譯者注）

的个别情况和个别特点中)反映出来和得到实现的。

这样，我们能够把迄今的社会经济形态区分为：原始公社、奴隶占有制社会经济形态、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人仍然对这种区分有疑問：能否把原始公社仅仅理解成一种形态，同样共产主义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目前只不过看到了它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些仍然是社会学所要解决的问题①。

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是一个突出的社会学的范畴，是社会学的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尽管在社会学著作中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普遍性和它的上述特殊形式研究得极少。如果不能正确地了解各个形态的结构和它的全部特征，那末就不能够认清每个个别的国家发展所处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界限。因为，不管我们研究哪一个国家，不管它的发展是在哪一个时期，它不是属于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便是属于资本主义的或其他的社会经济形态。这就是说，它的基本的社会结构和它的职能，同其他所有同一形态的国家是共同的。因此，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的发展中有相似之处和共同的因素。

如果想对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有认识，就要考察该形态的每个个别国家的基本结构及其活动方式。其次，就是要考察该形态

① 阿·德腊吉切维奇在他的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期是在时期和形态之间作了区别的，并且提出了另外的划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期是在时期和形态之间作了非常重要的区别的。这种历史分期首先把整个社会的发展(其中也包括未来的无阶级的人类社会)归纳为四个大的社会时期，然后又把这些时期中的每个时期按其社会经济的成熟程度分为低级的、中级的和高级的阶段——或者也可以说是形态。为了把上述一切再扼要重述一遍，特提出社会历史发展各阶段的如下的轮廓：1、(野蛮时期)低级的、中级的和高级的阶段；2、(蒙昧时期)低级的、中级的、高级的阶段；3、(文明时期)低级的——奴隶占有制，中级的——封建主义，高级的——资本主义；4、(共产主义)低级的……”(阿·德腊吉切维奇：《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各发展阶段中的历史地位》。《我们的实况》杂志，1957年第5期，第481—482页)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社会主义是形态或者仅仅是过渡时期的问题中谈到。

的运动规律,因为它对于具体的历史分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应当注意到,纯粹的形态是罕有的;在大多数场合下,旧的社会经济关系与新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交织在一起,并出现将同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冲突的更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例如,封建社会在某一时期就同旧的奴隶制度及其心理状态的许多特征交织在一起,并且在这同一个封建社会内部又开始形成商业资本、手工工场和工业等等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可见,认识了这些社会结构,才能使我们看清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看清它的一般的以及许多特殊的特征和规律性。尽管新旧因素交织在一起,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形态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结构,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殊的存在方式,各阶级同其他社会阶层和集团的特殊关系,特殊的统治、剥削的性质,结构本身的基本因素内部的特殊关系,特殊的社会心理状态即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心理状态,自己固有的物质和精神具体表现的条件等等。这些就是具有本身的特点的每个个别国家在其中发展和运动的“界限”。而这些国家本身的个别性特点只不过使某一形态的复杂性变得更加复杂罢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可见社会经济形态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因而应当十分注意它,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

阶级斗争规律

在存在阶级区分的社会里,这种经济上的对立和矛盾也反映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阶级就是具有明显历史性的、人们的大集团,它们是在劳动差别和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各个阶级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维持本身生活的方式不同,在分配和支配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在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而且各个阶级所固有的特殊的阶级心理不同。阶级和阶级斗

爭的學說，是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另一个重要部分^①。

人本身創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社会上有組織的人来創造自己的历史的。在階級社会中，他表现为隶属于一定階級的人，他受到他所屬的具体階級的利益、生活和思想的約束。由此可見，階級結構是一定社会的基本社会結構，它一方面决定了上述人們的心理状态，从而也决定了他們的人生观、願望和兴趣，另一方面又决定了这一历史发展时期的基本社会政治冲突。

由此可見，要对階級社会中的社会运动和思想的发展进行任何科学的分析和綜合，都必須正确地考察階級关系的总的形势、各階級集团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各階級在經濟关系中以及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②。

因此，階級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在階級对立和階級冲突中，而这种对立和冲突的結局，在形式上将是一次政治革命，在內容上将是一次社会革命。

由此可見，階級斗争的規律是历史运动的規律之一，但它不是

① 列宁在《偉大的創举》一文中給階級下了最完整的定义。馬克思主义給階級概念所下的定义特別不同于資产階級社会学在这方面的种种嘗試的地方，就在于它看到了本质的因素——經濟状况和人們的集团間的关系。而古尔維奇、索罗金等則列举一系列的标志，如成員間的开誠布公和团結、个别的特点和对其他集团的反对立場等，作为階級的因素。这种陈旧的、混乱的和認識片面的定义，尽管正确地看到了階級的某些特征，但却不能确定階級的本质的东西。

② 圍繞着階級的問題，在我国的学术界展开了有关階級、种姓和等級关系的爭論。和爭論中的上述看法相反，我认为，既不能像某些人所作的那样，把种姓和等級等同看待，也不能把任何一种分工的結果都看成是种姓，更不能把剝削的必然性和階級概念牽扯在一起。階級概念是这样一种基本概念，它向我們表明，存在着人們的較大的集团，它們在整个生产生活、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階級本身，在历史上也曾以种姓和等級的特殊形式出現和存在过，而种姓和等級則是按宗教和法律的特征組成的，并具有不同程度的排他性等等。我认为，只要存在大分工，只要各个人們大集团在一定的經濟过程中发生特殊的联系，就会有階級存在，而不管是否存在剝削，不管生产資料掌握在誰的手里。因此，我們可以說，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階級。

普遍的规律，而是特殊的规律，也就是只适用于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相对地说是极短时期的一种规律。因此阶级社会是典型历史的、即暂时的社会形态。它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即当生产资料的发展使得对人的剥削第一次成为可能的时候产生的；而在我们的时代，即当生产资料的发展水平使得一切人剥削人和阶级剥削阶级的现象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累赘和障碍时，当人类已隐约地看到新的无阶级的社会关系的曙光时，阶级社会正在消灭。有阶级的时期是人类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必经的时期，是人类新的极其光明的时期的真正火的洗礼。

革命概念

在革命的问题上，在社会学家当中，不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至今还流行着形形色色的观点。有人往往把这个概念了解为经常伴随着某一革命变革的一定的外在形式（例如武装的性质），而不是在这里首先去考虑这一概念的内容。我们是从实质上把革命了解为任何事物的任何质变，如果这里所指的是社会的话，那末就是以一种社会关系代替另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变化，同其他任何一种质变一样，总是比通常的进化的变化具有更为急剧的、激烈的、短促的性质。

同时，由于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多多少少成功地解决了在社会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发生的尖锐冲突，即表现为尖锐阶级对立的、在社会经济基础上发生的矛盾，所以，大多数这样的革命就具有了暴力的武装性质，以致于导致推翻旧的政权。

由此可见，在这里重要的是分清革命的内容同它的外在形式、形态以及革命所导致的政治变化。这样，我们才能基本上分清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总是意味着消除旧的社会、旧的社会关系，并建立新的社会、新的社会关系；政治革命则是意味着推翻旧的政权，但还不一定导致消除旧的社会关系。任何社会革命总

是政治革命，可是，任何政治革命則往往未必是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正如馬克思所称呼它的那样，是“历史的火車头”。它屬於人类生存和历史运动的最重要、最有生命力的因素之列。社会就是借助社会革命来消除已經过时的关系，克服那些阻碍生产力，从而也阻碍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冲突。由此可見，社会革命就意味着使生产关系适合新出現了的生产力，同时使政权从一个階級的手里轉到另一个階級的手里。

有人也把政变称之为政治革命。但是政变所改变的仅仅是政权的性质及其体现者。在这里，往往有人把这种历史事件神秘化，时常力图把这种政治革命說成是社会发展中重大的、根本的轉折。这种情况特別表現在法西斯主义分子的身上，他們力图把政权在政治上的改变解釋成偉大的社会革命变革，而其实这种变化仅仅是資本主义内部的政变，也就是有利于資产階級社会中最反动的社会力量的变化。

革命形式的問題，在历史发展的現代，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成为特別迫切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迄今流行着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俄国人的观点，认为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都必須采取同1917年俄国革命一样的原則、方式和形式来进行；另一种是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和工党分子的观点，他們否定社会主义变革的武装、暴力的性质，而认为社会主义必須通过和平的、进化的、議会的途徑来达到^①。

^① 著名的工党主义理論家之一道·赫·科尔，也和其他的現代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在他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文中說明“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間的差別时断言：“共产主义者坚持階級结构的革命是第一个必要的步驟，而西欧社会党人則坚持以再分配性的征收所得稅的办法实现小范围社会化的渐进綱領”（参看1951年6月2日《战斗报》）。俄国斯大林主义者之所以硬把我們說成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因为我們在我们时代的这个中心問題上坚决地采取和实现了辯证的观点。关于这个問題，例如列宁曾經这样写道：“右傾教条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視新內容，結果遭到了完全的破产。左傾教条主义則固执地絕對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过各

上述两种观点都是非辩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是把一种社会革命的形式绝对化，而后者则把另一种形式绝对化。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考虑到任何革命的时机都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各种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当时的国内外的历史环境，一定国家的其他矛盾，本民族的传统和心理，反动力量和革命力量的性质及其强弱程度，最后还有各个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权利。关于这点我们将在别的章节中详细阐述。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和道路在各个国家中将始终是特殊的、不同的。而这些形式和道路的内容、实质将总是相同的：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国家的产生、实质和消亡

随着阶级的出现，也出现了一种原始社会中未曾有过的新的社会机构，这就是国家。当社会划分为阶级，即划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统治阶级就必须有一种组织来维护本身的利益并保持自己在社会上的特权地位^②。

这种在阶级剥削的社会中负有维护剥削者政权的重任，并拥有军队、警察、法院等等众所周知的机关的设施、机构，就是国家。这种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任何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并不是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努力引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页）斯大林主义由于其众所周知的教条主义立场，曾经企图仅仅把一条道路、即把武装的道路强加于所有的人，结果在这里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今天，俄国的理论家们开始意识到不能再坚持这种片面的和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做法了。

② 马克思主义已经十分明确地证明了，某些新的关于国家产生的理论，如暴力论（普洛维奇、杜林、奥本海、考茨基等人）以及最终都发展成反动的种族论的各种心理论（如戈宾诺、张伯伦），都是站不住脚的。其他某些心理学家（如弗拉塞、莱维—布律耳）发现了许多有关原始公社活动的有用的材料，但是对他们也总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司祭和巫师的权力的加强在某些公社中导致了国家的产生，而在其他公社中则没有呢？这是心理学的原则所无法解释的。

家^①。

可見，國家的概念在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有着十分肯定而明确的内容。由于在历史上常把国家（它始終是一定階級或階层的国家）同一般的社会共同体混为一談（統治階級总是想这么做的），因此对国家、国家的历史和将来的命运的解釋，往往极为混乱。

国家机构在各个方面的活动，特别是在現代，并不仅限于維護統治階級的政权，因为在社会发展日益錯綜复杂的情况下，国家机构必不可免地会担負起某些一般的社会职能。無論国家机构扩大这种活动范围的原因是什么，国家在实质上归根到底总是統治階級的机关，它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归根到底是保卫和維護这个階級的政权的。

此外，由于任何階級的政权是由整个国家机构来維護的，因此，無論这一政权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形式和民主性质，它实质上始終是該階級的专政^②。

同时，馬克思主义根据階級斗争和国家发展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原理，这些原理使得它同其他一些資產階級社会学观点有根本的区别。

① 恩格斯在其对希腊人的氏族制度及其解体所作的精辟分析中，曾經指出，随着物质的丰富和增加，在氏族的內部就出現它的成員之間的差別。“所缺少的只有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会保证各个人新获财富不受氏族制度共产主义傳統的侵犯，不仅会使以前被輕視的私有财产成为神圣，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目的，而且会将相继发展起来的新的获取财产形式，亦即不断加速的财富积累，盖上社会普通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会使正在开始的社会階級分化永久化，而且会使有产階級剝削貧穷群众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統治永久化。而这种机关也就出現了。國家被发明出来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1頁）

② 这是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論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把专政理解为某种与民主相反的东西，因为民主同样也是专政。专政所指的，不是那种也可能是殘酷专制的外在統治形式，而是任何国家的实质，而任何国家都是統治階級的机关，是該階級所掌握的、并且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階級冲突的程度而随心所欲地运用的机关。列宁在他的关于国家与革命的一书中对这些方面曾經作了特別突出的闡述。

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标志着生产力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发展水平，以致对社会活动的成果的私人占有变成了阻擋社会向前发展的明显障碍。于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統治和剝削也就完全成了沒有根据的东西，它产生尖锐的内部冲突，从而也产生尖锐的国际冲突，正是这些冲突把人类一次又一次地抛入危机。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解决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

由于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无剝削的社会关系，消灭人对人的統治，因此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消灭阶级統治的机关——国家。

但是，社会主义与这个最终目的不同，它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还是一个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是政权属于工人阶级的社会。由于被推翻的阶级在国内外还有力量、联系和共同利益，还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因此社会主义必然还是一个阶级統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在工人阶级国家这个问题上，就是在社会主义者之间，也经常存在着种种誤解。一般可以肯定的是：根据不同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力量的对比、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发展程度等等，无产阶级国家无论在专政形式或国家结构方面，都必然会具有极为不同的形式，如同资产阶级国家中迄今所发生的情形那样^①。

^① 无论在理論上或在实践中，无产阶级专政常常被人们作非社会主义的解釋，并且被用来作为使用任何一种暴力形式，甚至对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本身使用暴力的借口。因此，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們所指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国家的这种或那种的外表形式，也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說是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政治制度的某种方法或組織，而是国家的社会内容、即阶级的政治内容。政治制度的形式、方法和組織是从一定的社会内容产生的，因此它們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可能是而且必然是不相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起着无可辯駁的領導作用的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社会实质。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无可辯駁的領導作用简单地理解为某个工人政党参加政府，而应该理解为一个国家内的

集中制国家机构的集中程度以及保存的时间的长短，同样也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国际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意識的发展程度。这种集中制的国家机构，在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和进步的。

根据所有这些理由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者主張在革命后必須馬上廢除国家本身并建立无政府状态的論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空想的。这等于使进步力量自杀。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还存在着階級統治的时期，要想朝着消灭一切階級的目标前进，就必须廢除基本生产資料的私有制，从而消灭剝削制。

社会主义社会为了不致蜕变成一种剝削制度，也就是說，为了不致自己否定自己，就必须馬上着手不断地扩大人的經濟自由（这也就是扩大他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必須着手把生产資料、然后也把其他的公共設施从国家的手中交到社会的手中。这就是說，国家消亡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規律性，因为国家消亡不过是社会关系社会化的統一規律性的另一个方面。实现国家消亡的形式，就是工人管理生产，其他劳动者通过有組織的权力单位和社会管理单位——公社——来管理他們自己的工作机构^②。

我国的发展在實踐中实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这一社会发

这种階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这种力量对比下，工人階級及其社会主义領導力量同其他劳动人民結成联盟，能够根据他們的社会經濟利益来改变社会关系，并在实际上改变着这种关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南斯拉夫資料續編》，參閱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78—479 頁）这个問題的实质就在于此。

② 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曾明确地看到和論述这个問題。例如恩格斯就是这样論述这个問題的：“国家以全社会真正代表資格所作的第一个行动——将生产資料轉化为社会所有，——同时也将是它以国家資格所作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关系的干涉，将逐渐成为多余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于人的管理便会由对于物的管理和对于生产过程的指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廢除’的，而是消亡下去的。”（《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50 頁）并参看列宁特別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闡述的观点。

展阶段的深刻思想，证明了这些思想的正确性。反之，加强集中制的国家机器，进一步集中管理整个生产和剩余劳动的分配，就必然会导致暂时否定社会主义的某些本质的因素，导致否定社会主义民主，使社会主义发生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变形。

不实现与不扩大经济自由，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就根本不会有人的真正的自由。很明显，这一发展过程也包含着一系列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国家机构和公社的职权和活动还必然交织在一起。但是，在社会管理的这个阶段上，由于还存在着从旧社会和旧观念产生的各种倾向，由于发展中还存在着种种困难和不平衡状态，因此，为了使社会主义的关系得到正确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国家必须实行种种干涉措施来制止和限制上述倾向。国家的这种干涉是必要的和进步的。随着社会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觉悟的进一步提高，国家的作用也必然日益缩小。这样，集中的管理将日益转变为集中的调节，这种调节将不再具有国家的性质。

因此，工人阶级的国家，也像一切阶级一样，必将消亡下去。消灭阶级是工人阶级和人类其他进步力量的伟大的斗争目标。因此，国家政权形式将归于消灭，并为社会管理和社会调节的制度所代替^①。

下面还要谈一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另外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和异化理论

直到今天，社会主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更不用说别人

^①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根本性的修正，他宣布了在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加强国家的论点，并以此在理论上为他本身所发展起来的官僚主义的国家主义作辩护。必须强调指出，俄国的理论家就是在今天也还没有抛弃这个观点。而这个观点不仅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而且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分析斯大林主义时加以阐述。

了)仍然是一个有爭論的、人們企图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問題。尽管这种情况看来是多么奇怪,但却是事实。分歧是很大的,有时还是原則性的和截然对立的。

在任何其他問題上,實踐主义和实用主义都沒有达到如此明显的表現。各种社会力量正是把他們努力从事的东西宣布为最高的准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說这种态度在資产階級思想家的身上是可以容許和理解的話,那末对于馬克思主义者來說則是不能容許的,因為他們有足够明确的方法来分析一定的情况、行为和成就。

就理論上闡明这个历史范疇来看,我們认为,虽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作了十分明确的原則規定,但是馬克思主义者却把社会主义理解为:(1)它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2)它是特定的社会經濟形态;(3)它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4)某些人把无产階級专政和社会主义分开,认为它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真正的过渡时期。

十分明显,工人階級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是通过无产階級革命进入和开始一个把階級社会轉变为无階級社会的时期的。可是,把这一整个的时期称为过渡时期,这样我們还是絲毫沒有对它提出內容上的說明,特别是因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多多少少都是过渡性的。在“过渡的”这一术语中,甚至也可能隱藏着一种为某些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手段辯护的企图,借口“过渡性”以及和旧事物的冲突等等,而把这些手段說成是正当的。

从几乎被普遍采用的术语来看,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即向无階級社会轉变的时期,这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共产主义,即消灭階級、消灭現代大分工等等,即使在現代最发达的国家中也是不可能馬上實現的,而在不发达的国家中就更不用說了。

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一书中对这一点曾經作了这样十分

明确的論断：“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則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因此，可以說，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革命地轉变”为共产主义的整整一个时期；因而这也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馬克思語），它还不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社会，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它仍然是有阶级的社会，因为阶级不可能馬上被消灭；它仍然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某一个阶级有必要組織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

尽管上述一切是正确的，但甚至在上述一切前提下，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仍然会有差别。問題在于：这个革命轉变的涵义、方針和目的是什么？革命力量在这整个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是什么？

既然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革命地改造为共产主义的时期，而且这一点对它是根本的，那末，它必定既包含着资本主义的残余，也包含着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萌芽和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必定通过本身的不断加强和发展日益占优势，从而战胜旧的因素。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

于是，我們就碰到了这些問題：为了使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也在社会經济方面成其为社会主义，必定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现哪些共产主义的因素？

要是革命者以为社会通过夺取政权的行动本身就已具有社会主义的特点，那就是极大的幻想和錯誤。即使最革命的政党和力量夺取了政权，这也并不意味着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关系，即那种除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外首先还必须包含着共产主义的重要因素的关系。

^① 《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頁。

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使我們了解這個問題上眼界真正開闊起來。既然我們認識到，正如我們在本書理論部分所提到的，人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全面地被異化，而且人的這種異化、不自由、受束縛、受壓迫表現在他的生活的一切領域，而首先表現在經濟領域內，那末，我們就會合乎邏輯地得出結論：革命力量的首要任務就在於使人擺脫所有這些使他處於如此無權狀況的束縛和異化。

這種異化在經濟領域表現為工人脫離他的勞動產品，脫離分配；在政治領域表現為勞動人民脫離政權；在思想領域表現為屈從於各種思想成果，儘管這些成果是人的創造物，但卻具有凌駕於人之上的巨大力量和優勢。

革命的涵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即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的涵義，正在於克服、消除所有這些人的異化的形式。因此，這種變革的唯一的基本的涵義，不是消滅私有制，消滅資產階級的剝削，而是消滅私有制度所特有的社會經濟關係，更確切地說，是消滅使生產者脫離他的產品、脫離分配的制度所特有的社會經濟關係。

這就是說，當生產資料所有制不是社會所有時，就不可能消滅一切形式的異化。而無論是私人資本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或是以社會主義力量為首的國家主義都不是社會所有制。在上述一切情況下，起分離作用的力量（資本、國家）既支配着生產，也支配着分配，從而支配着整個勞動者。在上述一切情況下，異化繼續存在着，因此自由的問題仍然和先前一樣是迫切的問題。

只有從這些方面來看，我們才能充分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後來列寧在國家消亡、直接生產者的聯合、公社等等問題上所堅持的主張，即堅持日益擴大勞動人民對社會和經濟的干涉，而日益縮小政治機關的干涉的過程的主張。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但這是還不夠發展的共產

主义，是处在尖锐和急剧的转变过程的阶段上的共产主义。虽然社会主义是还不够发展的共产主义，但总是共产主义的一定的阶段。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所特有的一切重要因素基本上必须存在并得到发展，而这意味着：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和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管理生产资料，社会管理分配，也就是说，国家消亡下去；总之，不仅在经济这一基本的社会生活领域中，而且也在其他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全面地发展社会自治。简而言之，社会主义必定是一个消灭人的异化的过程。

思想体系

可见，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而我们又可以把社会上层建筑基本上分为政治法律机构(国家、政党等等)和广泛交织在一起的思想上层建筑：从科学起到其他各种不同的形式(哲学、宗教、艺术、道德)为止。

这种思想上层建筑的全部总和也被称为思想体系，于是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即思想体系对其他社会结构因素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某一特定的思想体系对特定时代的其他结构因素，首先是对社会经济基础本身的关系问题。这些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一的和机械的，而是极为复杂的。

换言之，任何社会结构都是由几种重要的因素组成。而这些因素又是相互交错、彼此发生作用的，尽管它们基本上取决于经济基础本身。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正如普列汉诺夫有一次在研究“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所提到的，首先向我们揭示：(1)生产力的状况；(2)被生产力状况制约的经济关系；(3)在这个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它在阶级社会里以存在阶级、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时期)，以存在统治阶级的政治机构等等为特征；(4)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也就根据他所属的一定社会阶层而形成；任何个人都反映着一定的社会

心理状态，而一定的社会心理状态又是在与生产力和政权具有特殊关系的各个集团中形成起来的；（5）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形式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反映着各个社会阶层或阶级的一定的心理状态、兴趣、願望等^①。

任何个人都是以他自己时代的关系为基础的。他不能摆脱这种关系。他的意識就是根据他所处的地位和受到的影响而逐漸形成起来的。由于任何阶级社会在自己内部都是分裂的、矛盾的，并存在着维护旧的阶级陣地的或在某些比較进步的关系中克服旧的关系的各种不同傾向，所以每个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等等）都必然完全地或局部地、激烈地或溫和地（这又取决于各种不同阶级力量的对比性质和本人的个性）反映出进步的或者退步的傾向，总是要肯定地表示支持社会发展的一定的力量，不管公开的程度如何。

从以上的全部論述中可以清楚地了解，若不弄清每一个时代的基础即經濟关系，从而弄清其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去研究这一时代的思想体系，那是不会有結果的。人們是他們自己的思想、哲学、法、道德、艺术、宗教等等的創造者，总之，是他們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創造者，但他們并不是某种具有一般抽象意識的抽象的人，而是由生产关系和他們在社会生活的这一領域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的具体的人。正如前面已經談过的，社会关系的性质、阶层和阶级的划分，也就决定了某个阶层的特殊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必然反映在他們的思想、世界观和社会观中。

馬克思早在他发展的初期就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一书中断言：“統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說，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資料的阶级，同时也支

^①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这个公式是普列汉諾夫在《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一书中提出的。

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①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没有自己本身的绝对独立的历史，因为它始终是受社会历史制约的。或者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提出过的，“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②

马克思的基本意图是要证明，意识和意识形态没有某种不取决于具体的人及其社会经济关系的独立的历史。这正是因为，过去人们不了解，思想的过程具有某种特殊性。

事实上，对于这一思想过程，思想家往往对意识作“相反的”了解，他们臆想，似乎思想过程是基本的、根本的过程，它决定了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每一个思想家都设想，他本人只是继承以往时代的思想，而他的思想又具有非凡的创造性，以致能决定时代本身，甚至设想他的思想是历史和人的绝对真理。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大分工，使人们有可能把自己的意识设想为不是对现存的关系和实践的认识，而是某种其他的东西；体力活动开始被看作是人所不屑于做的事情，而思想家也开始臆想创造在人类历史上占首要地位的“纯”理论和“纯”思想体系。

他没有看到，他自己也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他没有意识到，他在解决某种理论上的冲突时，实际上也正是在解决着人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类历史實踐中存在的冲突；他沒有看到，他在爭取新的社会关系的斗争中所信奉的那种“思想”，只是对社会生产方式中的现实矛盾和要求克服这一矛盾的新的现实关系的一定程度的認識。

在某一階級的思想家看来，一切事物都仅仅发生于思想領域中，因此，他們各人为自己規定的任务，就是在各自的領域中（如哲学、法学、道德、政治等等）寻求和确定絕對真理^①。

这并不等于說，思想体系既沒有相对的独立性，也沒有自己的历史。每一个思想家继承了以往时代的全部思想材料，并在当代一切既得成就的基础上来解决以往理論中的难题、矛盾和缺陷。这势必是一个錯綜复杂的过程，它实质上是以人們掌握和改造自然以及历史的程度为基础的。

因此，每一种思想体系在纵的与橫的两个方面都受制約。一方面，在纵的方面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經济发展程度、人类控制自然的程度、階級差別和階級心理状态以及社会的斗争、願望和意向；另一方面，在橫的方面决定于：整个思想遗产、人类一般思想和特定領域的思想的发展水平。因此这就要看所指的是哪一种思想

^① 恩格斯在他致梅林的信中曾經特別明确地談到这个问题：“思想体系乃是由所謂思想家所作成的过程，虽然是有意識地作成的，但其意識是虛假的。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对他始終是莫名其妙的，否則这就不成其为思想体系的过程了。可見，思想家給自己造成关于假的或表面的动力的观念。既然这是思維过程，所以不論其內容或是形式，都是从純粹思維中——不是从自己的思維中，就是从先輩的思維中——得出的。他只与思維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維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比較疏远的，不从屬於思維的根源。这种对事物的看法，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既然任何人的行动都是通过（“通过”，在原文中加有着重号。——譯者注）思維进行的，那末这种行动似乎最終都是以思維为基础了。……正是国家机构形式、法权体系、任何領域的思想观念的独立历史的这种外表，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如果說路德和加尔文‘制胜’了官方的天主教，而黑格尔‘制胜’了康德和費希特，如果說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民約論》間接地‘制胜’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鳩，那末这乃是仍然保持在神学、哲学、国家理論之中，作为这些思維領域的发展阶段，并且完全不越出思維范围的一个过程。”（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8—499頁）

体系而定。

如果忽视了思想体系的第一种决定性，那末就会片面地以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思想体系的发展。如果忽视了思想体系的第二种决定性，那末就会陷于机械论和唯社会学的观点，这同样也是一种特殊的片面性。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想全面而科学地分析某一思想领域，例如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领域的話，那末，我们的分析至少必须包括下列成分：**第一**，资产阶级社会分化为两个基本的阶级极端，即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事实，它们的相互矛盾以及这两个基本阶级本身内部的分化和不团结；**第二**，资产阶级社会所遭受的危机，特别是上一世纪末所遭受的危机。在这方面应当进一步注意到资产阶级社会也并不是统一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到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因素也并不是处于同一过程的；**第三**，各个思想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它们和思想体系以往整个的发展过程的联系；**第四**，我们所分析的该思想领域的特殊相对性，它相对独立地继续研究在它之前发生的问题的情况；**第五**，还应该分析每个人的特殊的个人心理结构，它在这种复杂的思想发展中始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着必然性和普遍性。每一个人，特别是天才的和杰出的人物，对于一定的历史情况或思想情况都有自己的反应方式，因此，尽管受基本社会经济制约，这种反应的性质也可能是极为分明的和因人而异的。

由此可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某一思想领域，必须包括对意识的形成（在上述情况下是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的意识的形成）发生作用的种种成分。

其次，还必须着重指出，某一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意识，就这个时代来说，无疑是有绝对意义的，而就人类的整个发展来说，则只有相对的意义。某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和实践所达到的水平，实质上也就是它的理论达到的水平。人类一般实践的每一进步，都

向理論、向人們的意識提供了新的条件、新的任务，从而也促使它进一步发展。

人們的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各个生活方面之間的辯证关系，其中經濟方面具有首要的意义。但是，在这种錯綜复杂的影响中，不能忽視思想的影响，因而也不能忽視一个时代的思想体系对社会过程本身的影响。人們在創造历史的时候，是抱有自己的願望、利益、理想和观点的，因此，所有这些思想体系的成分，也是历史的必要的組成部分。如果没有对新事物的向往，如果不相信或不了解这种新的事物将带来新的社会关系、新的自由和新的可能，那末無論在过去或将来都不可能創造出历史来。但是，所有这些向往、信念或知識，都得通过人們的头脑，并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些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会成为真正的物质力量。有人批評馬克思主义对历史运动的解釋，說它忽視思想因素的重大作用，其实这些批評只是表明了批評者对于唯物辯证法一无所知^①。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馬克思主义不会不看到各种历史运动中的这一现实的因素。在階級社会中，領導着各个政党、組織、軍隊以至整个階級的杰出人物，多半起着显著的作用。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情况、外部影响等等交織在一起，因此，每个这样的时期，

^① 讓我們引证經典作家的两段話來說明这个问题。青年时代的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已写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頁）而恩格斯在致梅林的同一封信中也曾經写到：“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們的一个荒謬观念：既然我們不願承认那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領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那末我們也就是否认它們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对因果关系的刻板的非辯证的看法，把两者看作永恒对立的两极，而完全忽略其交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現象一旦为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所造成的时候，它也就影响周圍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諸原因发生反作用。”（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9頁）

由于存在着实现一般发展规律性的各种不同的途径，而具有种种可能性。虽然每一个历史时期必须实现该时代的一般规律性（它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各种不同的途径、各种不同的偏差来实现），但是个别杰出的历史人物对当时历史形势的精辟观点、对实现最好的可能性的深刻见解以及他们的果断决策和崇高威望，都给历史发展留下了特殊的痕迹。任何个人的活动都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但是在探索不同的途径方面，在实现一定的可能性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的创造作用。

道 德

道德问题历来就是各个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思想家注意的中心，因为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通过道德问题来解决的。所以许多哲学家都把自己的伦理学体系当作哲学研究的目的，力图在哲学研究中解决人们的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提出关于善、人道和一般德行的观念和定义。伦理学理论具有思想体系的性质，这是极其明显的。这些理论最充分地反映了哲学家本人的社会地位和意图。

这就是说，道德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并且和一切社会关系一样，首先是由社会经济情况和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的。因此，在存在阶级划分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统一的伦理观，因为某一种阶级关系和阶级制度，主要只是对于那些认为唯有这个社会是好的阶层即统治阶层来说，才是好的。至于在这个社会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的被剥削阶层，他们对于人道、剥削、友谊，简言之，对于善和恶，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的一段话里在研究道德的问题时得出结论说：“所有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而因为直到现在社会是在阶级对立之中发展，所以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是为支配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是

当被压迫階級足够强大之时，它表現对于这个統治的抗爭，而代表被压迫階級的将来的利益。自然誰也不会怀疑，在道德上也和人类知識的所有其他領域上一样，一般地說有着进步。可是我們就是現在也还没有越出階級道德的范围之外。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階級对立，而且甚至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对立已被遺忘了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階級对立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之上的、真正人类道德方才成为可能。”^①

由此可見，道德观是深深地扎根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以至社会政治关系之中。統治階級的道德在理論上为該階級的地位、該階級关于人的观点和願望进行辯护。由于統治階級的思想基本上也就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由于統治階級为此而掌握了从国家到教会的全套政治机构和社会机构，因此一方面出現了倫理观外表上一致的假象，另一方面統治階层的道德观也滲入被剝削階級的意識(不过这主要是靠暴力的高压手段)。

以往的各种倫理学，实质上都是以两种方式來解釋倫理問題：它們或者是在人的意識之外，在上帝、国家等等那里(所謂道德的他律)，或者是在人本身之中，在人的意識、感觉之中(所謂道德自律)探索道德的起源和标准。以往关于道德的他律的观点的基本缺陷在于，它們沒有認識到道德的階級性，另一方面，它們忽視了有意識的个人在各种道德行为中的作用。人不是按照某种規則和規範机械地行动，而是能有意識地对形势和自己的社会实践作出估計并采取一定的态度。至于那些主張道德自律的倫理学說(多半是唯心主义的体系)，則完全忽略了道德的社会性的意义，而仅仅沉溺于从主观方面对道德行为的分析，以及关于某种絕對倫理的冥想。

因此，在对現代世界的道德作某种分析时，首先决不能迴避資產階級社会分裂为两个基本的階級极端和它們相互斗爭的事实。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6頁。

资产阶级的道德从理论上概括现存的社会关系；而社会主义的道德则是摧毁这种社会关系。对于整个民族、阶级、集团和种族的剥削、压迫，为了私人的利益而进行的大规模的杀害行为——其中没有一件是和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的道德观相矛盾的。现今社会中的社会主义的进步力量，正通过自己争取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伦理观的斗争而形成起来。既然只有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并将生产资料交归联合的生产者管理，才能够解决现代世界的矛盾，社会才能够随着阶级关系的完全消灭而得到发展，那末社会主义者的道德观也必然会具有这种客观的历史内容。一个社会，如果它像社会主义社会那样，把消灭剥削、消灭一些集团对于另一些集团的压迫、使人在他的生活的一切领域内得到解放，宣布为自己的最高原则，那末，它必然就会把这种历史的动向作为自己的道德原则的基本内容。因而，社会主义的道德必须在这一个实践的历史范围内把这种新的、人道主义的原则作为自己的根本内容。

由此可见，我们在分析和评价道德行为和一般伦理现象时，既不能忽略问题的这个方面，也不能忽略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人并不是由外在的规范和义务所盲目决定的，同时，他的行为和态度也不是以对伦理原则的主观的自律的观点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人们各种关系的错综复杂的作用下是很常见的）：有一些行为在客观上具有道德的性质，而在主观上却不是如此；相反，有一些行为确实是从无私的道德观点出发的，但它却违反客观的历史道德。由于在阶级社会中进步力量的道德是历史上进步的道德，因而它是衡量道德行为的客观标准。而有一些历史人物的悲剧就在于，他对某一行为合乎道德性的极深刻的信念同现实情况、历史的道德在客观上发生了冲突。

宗 教

宗教是最古老的思想体系现象之一。自从人们开始批判地思

考，即科学地考察和解釋自己周圍的現象以及本身的思想以来，宗教的問題就成了研究的对象。古代的許多哲学家，特别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色諾芬、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欧格米尔、斯特拉敦、卢克萊茨等人，就已經开始研究這個問題，并认为宗教完全是自然界的事情，是人們无知和对于自己所不認識的力量恐惧的結果^①。在后来的許多哲学見解中也包含有这种正确的观点，即认为宗教并不是某种超自然的东西，而是在历史上合乎邏輯的一种現象。十八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尖銳批判宗教的观念以至于它的社会职能时，更是把这种观点發揮得淋漓尽致。爱尔維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的尖銳批判，剝掉了宗教的神圣外衣，揭露了宗教的全部社会作用，指出宗教是一切統治阶层用来尽量加强影响被压迫群众意識的一种設施^②。

所有这些人(其中也包括黑格尔，特别是把宗教看作是人們異化的一种基本形式的費尔巴哈)的努力，虽然对于确切地、科学地解釋这个現象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因素，但却沒有发现这一过程的基本根源。費尔巴哈正确地看出，宗教的观念可以归結为世俗基础；人們在所有这些关于上帝等等的观念中，不过是把本身的力量、能力和特点異化为一种假想的形式而已，但是还仍然存在着一个問題，即人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就是馬克思在分析這個問題时所补充的一点。而這個問題，

① 卢克萊茨在他的論宗教的起源一书的結尾一段中正是強調指出各种自然力，即雷、暴風雨、地震的作用。这些自然力引起人們的恐惧，致使人們感到自己的渺小，并把它們称之为神等等。

② 不应当忘記，霍尔巴赫早已明确地看出宗教的这一社会职能：“这就是基督教給予政治社会的好处：它在各国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它使人民变成了奴隶；当君主崇拜它时，它就贊助君主的暴政；当君主不崇拜它时，它就使他的臣民成为叛乱者和宗教的狂热者；当它和政治一致时，就压迫、愚弄貧困的百姓并使他們失去科学和工业；而当它和政治分离时，就使公民成为非社会的、不安的、无耐性的和反叛的。”（霍尔巴赫：《揭穿了的基督教》，1956年貝尔格萊德塞文版，第120頁）

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在《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第四条中已經十分明确地談到和解决了①。

可見，我們必須在社会的本身中、在人类克服社会内部的矛盾以及社会和自然界之間的对立的程度中去寻找宗教現象的根源。宗教作为人类異化的一种形式，是人类思維在历史上的一定时期的合乎邏輯的必然产物。

在原始公社时期，宗教作为唯一的思想体系的形式，是由于人們在自然界的面前无能而产生的（直到今天，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社会中还在产生着宗教），当时自然界是作为一种超自然的、未知的力量而与他們对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度低下，与此相适应的，人們控制自然界的能力也极低，他們对自然界的事实和規律的認識也极差。

由于控制自然界的能力低下，由于人們还受到不可預測的、沒有認識的自然事件、力量和意外事件的束縛，由于他們在这些沒有認識的事物面前經常感到恐惧，于是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在他們中間便产生了各种意識形态的东西，在这里也就是宗教和巫术，以弥补他們在經濟、技术和科学上的实际弱点和短处。各种祭神舞蹈、巫术魔法、图腾崇拜和禁忌迷信，以及稍后的对自然力的迷信，直到最后的各种拟人观，都能在这些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根源；这些宗教現象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原始公社、氏族和部落同自然界或其他部落作斗争时最有效地保护它們。

由此可見，这些原始宗教的性质是与人类的下一个发展阶段

① 后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又更为明确地說明了这个問題：“工艺发达的研究，会把人类对于自然的能动关系，把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由此也把人类社会生活关系及从此流出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揭露出来。把这个物质基础抽去，甚至宗教史也会成为非批判的。事实上，由分析来发现宗教的雾一样的幻想之世俗的核心，比之反过来，由当前现实的生活关系来展开它的天国化的形态，是件更容易得多的工作。后者是唯一的唯物論的科学的方法。”（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8頁）

即階級社会中的宗教根本不同的。占統治地位的宗教，基本上是取得胜利的氏族、以后是取得胜利的階級的宗教，这些氏族和階級把自己的宗教观念强加于其他氏族和階級，并以此作为巩固本身的政治地位的方式之一；而在被剝削阶层中間，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宗教观念，以減輕被剝削群众的痛苦，并給他們带来对某种美好生活(虽然是在虛幻的世界中)的信仰和希望。被剝削社会阶层的宗教观念是与他們的现实状况和願望相适应的。这些宗教观念一掌握群众，就会对統治阶层造成直接的威胁；因此統治階級多半把这些宗教观点拿来，然后把它們改变得适合于階級不平等的整个社会制度(如佛教、儒教、基督教等等)。

由此可見，这个“分裂的和矛盾的社会基础”、階級社会的矛盾、对群众的剝削、社会的对抗和无知，是經常产生宗教現象的社会基础，而且只要上述情况未被克服，还将是产生宗教現象的社会基础。在这种关系中，宗教及其空洞的告誡和虛幻的允諾，势必是人类觉醒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无怪乎剝削統治階級总是要竭力握有尽可能巩固和广为分布的教会組織，这些組織的基本政治目的就是使群众迷醉于进天堂的允諾和修前程。

正在消灭着階級剝削、从而消灭着一切階級的社会，不需要用这种落后的旧意識形式、不科学的手段和自我欺騙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自由的人是人全面解放的过程，經濟解放是这一过程的基础，而克服所有这些偏見无疑是实现人的精神解放的最基本的行动。

第三章 政治經濟学批判

馬克思对政治經濟学領域进行了自己的主要分析并提供了主要著作，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已經看出經濟領域是基本的，同时使自己的理論研究主要朝着这一方向前进。因此，在他一生中就写出了若干本篇幅較小的著作（《雇佣劳动和資本》、《哲学的貧困》、《工資、价格和利潤》）和两部巨著：《政治經濟学批判》（1859年）与《資本論》（1867年）。在这些著作中，他继承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即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經濟学的最优秀的傳統^①。

馬克思在四十年代就已得出結論：人的異化的本质、他的基本依賴关系都在于經濟領域。因此，如果人不能在經濟領域得到解放，人的解放就不可能順利地实现。因此，为了能够得出实际的結論，必須对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詳尽的分析：工人階級能不能解放，怎样才能解放？在这种制度中是否具备一切可用来建設人們如此向往的无階級社会的条件？資產階級社会的种种矛盾在这个社会的內部能否得到解决？是哪些因素构成这些矛盾，而这些因素的基础又是什么？

其他社会主义者远不能找出这些問題的答案。而只有解决了这些問題，才能为进步力量的斗争提供科学的基础，才能使这一斗争不是立足在某种抽象的善良願望上，而是立足在实际的历史材

^① 不应当忘記，我們在前面就已經強調指出过，斯密和李嘉图已經为政治經濟学奠定了一个基石——劳动价值理論。但是，他們作为資產階級的經濟学家，不能历史地理解自己本身所处的社会的問題，因而也就不能理解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

料上和对資本主义社会过程的結構和規律性的科学認識上。

因此，作为战士和科学家的馬克思自己毕生的科学活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基本的科学任务，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不仅是政治經濟科学方面的革命，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和其他进步力量在本身的历史斗争中所获得的最宝贵的理論武器。

剩余价值問題

馬克思《資本論》的整个結構是以他的价值理論为基础的。这一理論在他的 1859 年的著作中就已經被提出来了。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作了如下的分析：

“如果一盎司金、一吨铁、一夸特小麦、二十碼綢緞是等量的交換价值。当作这样的等价物，消失了它們的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別，它們就代表着同一劳动的相等分量。均等地物化在它們之中的劳动，本身應該是同形式的、无差別的、簡單的劳动；就这种劳动來說，不論出現在金、铁、小麦或綢緞之中并无差別，好比就氧气來說，不論存在于铁锈、大气、葡萄汁或人类血液之中并无差別一样。但是，挖金、采铁、种麦、織綢，是质的方面互不相同的劳动种类。事实上，在物体上表现为使用价值之差別者，在生产过程中就表现为生产这些使用价值的活动之差別。生产交換价值的劳动，如同它无差別地对待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一样，它也无差別地对待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并且，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活动的产物，也就是有个性差別的劳动的結果。但是，它們在当作交換价值时所代表的，却是一致的、沒有了差別的劳动，也就是消失了劳动者个性的劳动。所以，生产交換价值的劳动乃是抽象一般劳动。”^①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參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頁。

由此可見，表現在交換價值中的勞動是一般人類的勞動，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它是一定的肌肉、神經、腦髓等等的消耗。這就是這樣一種簡單勞動，它的性質在不同的國家和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是不同的，它是其他任何複雜勞動的基本要素，因為複雜勞動實際上是簡單勞動的總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下列這個事實在馬克思看來是顯而易見和無可辯駁的：世界上所創造的一切價值，都來自人類勞動。

但是，現在在這裡却開始碰到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無論如何不能解決的一個難題。既然一切價值都來自人類勞動，那末資本家擁有比他投入生產的更多的價值，總而言之，資本的積累，是從何而來呢？

資本積累在交換的過程中是不可能產生的，因為如果一方高於價值出賣商品，那末另一方就要因此受到損失，可是價值的總和却仍然是一樣的。如果我們停留在以往的政治經濟學的观点上，認為資本家償付了勞動，那末又會產生一個問題：如果資本家償付了工人的全部勞動，那末積累在資本家手中的剩餘價值是從何而來呢？如此等等。

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同時也就是政治經濟學的關鍵性問題，是由馬克思首先解決的。他論證了，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的不是勞動，而是能夠生產價值的商品，即勞動力。這樣一來，貨幣所有者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價值，從而也就有權按照既定的勞動日去使用勞動力。但是，勞動力的價值和使用勞動力的所得，是不同的兩回事。正如在生產過程中所表明的，勞動者只要用勞動日的一部分時間進行勞動，就足以生產出他的勞動力的日價值，就是說，勞動者在二十四小時內維持生命所需要的僅僅是一部分的勞動日。

“所以，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使用所創造的價值，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放在自己心目中

的，就是這個價值差額。……貨幣所有者已支付勞動力的日價值；所以，**勞動力一日的使用（即一日勞動）**，也屬於他所有。”^①可見，勞動者在市場上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換得勞動力的日價值。但是，對勞動者來說，只要用一部分的勞動時間（比如說半天）就足以生產出維持他的生活即維持他的勞動力所需要的價值。在勞動日的其餘時間中，他實際上是在無償地為資本家勞動。在這一部分無償的勞動日中工人所創造的這一部分價值，就被資本家當作剩餘價值而占為己有。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明了，剩餘勞動並不是資本發明的，因為在有一部分人壟斷生產資料的各個社會中，都存在剩餘勞動。但是，在這一些古代的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不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而是它的使用價值，因而從生產本身的性質中還沒有產生出對於剩餘勞動的無限制的欲望。“所以在古代，過度勞動，要交換價值是在它的獨立的貨幣形態上獲取時，在金與銀的生產上，方才成為可怕的。在這場合，強迫致死的勞動，是過度勞動的公然的形態。這可以參看代阿多爾·西庫魯士(Diodorus Siculus)的記載。但這在古代畢竟還是例外的。不過在生產上仍未脫棄低級奴隸勞動形態，徭役勞動形態等等的民族，一經卷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支配的世界市場，而以生產物的國外銷售為主要利害關係時，那就會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等等的野蠻的虐待之上，加上過度勞動的文明的虐待。所以，美國南部諸州的黑奴勞動，在生產主要是為滿足直接的自我需要時，尚能維持溫和的家長制的性質。但棉花輸出越成為諸州的主要利害關係，黑奴過度勞動——有時只要七年勞動，已經把他的生命消費掉——就依比例，越是在每一件事都計算，每一件事都被計算的制度內，成為因素了。問題不再是从黑奴那里取得一定量的有用的生產物。現在是**生產剩餘價值**的問題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參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3頁。

了。多瑙河沿岸諸公國的徭役勞動，也是這樣。”^①

資本積累

這樣就揭開了剩餘價值及其所有的不同形態形成的秘密。同時也為闡明資本積累的實質，解釋究竟是哪些生產要素形成這一積累，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在他的進一步的分析中指出，資本主義和其他的經濟制度不同的地方正是在於，一部分剩餘價值不是用於資本家個人的需要，而是用於新的生產。一部分剩餘價值被用來建立新的生產資料和可變資本（即勞動力）。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被購買，並不是為了要由它的服務或它的生產物，來滿足購買者的個人需要。他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資本，是生產商品，使它們里面包含着的勞動量，比他所付的勞動量大，那就是有一個不費他什麼，但能由商品售賣而實現的價值部分。剩餘價值的生產或增殖，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法則。”^②

馬克思既科學地闡明了資本的產生；又科學地闡明了工人即社會上實際創造物質財富的那一部分人所受的剝削。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積累時所得出的那些結論，成為工人階級鬥爭和觀察未來的基本指南^③。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6—267頁。同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也扼要地提到這個問題：“例如，如果從價值方面說，他平均每日的生計資料，是=6小時平均勞動，他每日的勞動平均就須有6小時為他自己而做。他的勞動力的現實價值，和這個物理的最低限度是不一致的；氣候和社會發展狀態不同，那就會跟隨不同；那不僅依存於物理的需要，並且依存於已經成為第二天性的歷史發展的社會需要。”（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5—1126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8頁。

③ 特別要強調指出，馬克思曾經說明，資本並不是一定的財富，而是一定的社會關係，也就是說，它是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作為前提的：“再考察貨幣。貨幣是以商品交換的一定水準作為前提。各種特殊的貨幣形態，單純等價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或貯藏貨幣，或世界貨幣，將因它這種或那種機能的範圍不同，或相對重要性不等，指示出社會生產過程相異的各個發展階段。但經驗告訴我們，要形成這種

馬克思說明，資本構成是以這樣的方式增長的，即它的不變部分比可變部分（即工人）要提高得快，這樣經常就有一部分工人過剩，成為無產階級的後備軍。這種情況首先是由於資本家的競爭所造成的，因為每一個資本家在競爭中都力圖以更少的價值生產出尽可能多的商品，但要達到這一點首先就必須改進和增添各種機器，以便使他有可能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商品。可是，如此一來，用少得多的工人管理的、更為完善的機器卻代替了許多工人，從而使一部分工人階級成為“過剩的”人口。“資本可變部分這種加速的——隨總資本增加而加速，且較其增加更迅速地加速——相對的減少，會在另一方面，相反地表現為，勞動人口的絕對增加，不斷比可變資本或勞動者的雇用手段的增加更為迅速。資本主義的積累會不斷產生出，並且正好是比例於它的力量和它的範圍，不斷產生出一個相對的，超過資本平均價值增殖需要的，從而過剩的或過多的勞動人口。”^④

這一相對過剩人口的產生，比生產過程中的技術革命，進行得迅速得多。因此，還留在生產中的一部分工人階級就不斷地受到那一部分失業的工人階級的威脅，而資本家卻利用這種情況盡量進行剝削。馬克思以下列論斷結束了自己根據1866年以前的事實所作的上述分析：“社會的財富，機能中的資本，它的增加的範圍與能力，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和他們的勞動的生產力越大，產業後備軍也就越大。可以利用的勞動力會和資本的膨脹力，由相同的原因來發展。所以，產業後備軍的相對量，會和財富的潛力一同增加。但和現役的勞動軍比較起來，產業後備軍越大，常

種形態，商品流通的比較低級的發展，已經很夠。資本却不是這樣。它的歷史的存在條件，單有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還是不夠的。資本只能在那種地方成立，在那裡，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在市場上，與當作勞動力售賣者的自由勞動者相遇。這一個歷史條件，包含一個世界史。所以，資本，從它初出現的時候起，就在社會的生產過程上，劃了一個時期。”（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0頁）

^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93頁。

備過剩人口也就越是大。他們的貧困與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是成反比例的。最後，勞動者階級中的求乞階層和產業後備軍越是大，官方正式認為待救恤的貧民，也就越是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普遍的法則**。如同其他一切法則一樣，這種法則，會由多種多样的情形，在現實運用上有所修正，但此等情形的分析，不屬於這裡的範圍。”^①

這個資本主義積累的普遍規律問題，在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中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和分歧。倍倍爾、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斷言，馬克思並不是把這個規律了解為工人階級的絕對貧困化，而是相對的貧困化；布哈林則認為靠犧牲殖民地的利益可以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以及諸如此類的觀點。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必須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詳細加以研究的問題，而對現代帝國主義時期來說，也是這樣。馬克思是從分析六十年代以前的工人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得出結論的，當時上述的論斷在生活實踐中都已完全可以得到證實。但是，不能否認，工人階級的狀況從那時以來在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得到改善。

今天的俄國經濟學家莫羅佐夫、格列則爾曼、列昂節夫等都證明美國和法國的工人的生活標準不斷惡化，這是他們根據對工資的分析所用的一種最常見的詭辯辦法（根據工資來確定生活標準，就會進行這樣的詭辯，因為，为了不致得出片面的結論，必須考察許多因素）。

於是，又發生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否駁倒了馬克思的結論呢？

馬克思關於不變資本的提高和“過剩的工人人口”、產業後備軍經常存在的論斷，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現實的意義。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在今天的條件下仍然起作用。但是，正如馬克思在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1—812頁。

上述結論中所說的，当时他本人并没有去分析使这个規律（如同其他任何規律一样）发生变化的各种情况。

无可怀疑，有着各种的情况在大大削弱这个規律的作用，尽管这是通过往往損害某些其他生产者的利益的方式而发生的。

我們只拿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規模的工业发展來說，这种发展在許多年間不仅吸收了本国的劳动力，而且也吸收了別国的劳动力，从而在某一时期使这个国家的大量过剩人口达到空前的規模。

其次，不能忽視工人通过自己的各种政党和工会所进行的有組織的和大规模的战斗。这些政党和工会通过爭取工人工資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对失业工人的社会救济等等的斗争，也同样使这个始終力求以最純粹的和最强烈的形式来实现的規律本身有所改变。

同样，在分析这个問題时也不能忽視另外一个条件，这就是首先通过对殖民地的奴役来擴張資本和实现超額利潤。如果說通过这种方式 and 上述方式可能使某些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那末就不能否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生活条件是降到了最低限度之下。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商品以較少的价值生产出来，无疑使处于特权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者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标准。此外，各个資本的競争和斗争，引起資本的积聚和集中、生产的扩大、生产过剩以至大量的“过剩人口”，这样就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矛盾。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过一种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正常的、对社会有利的方式，即通过战争和战争恐怖来解决这些矛盾，这点是不应该忘記的。可見，某种完全非人道的手段必然是为維持资本主义关系的“稳定”和“正常”服务的。

仅仅对上述几个条件（經濟学家要全面地又正确地解决这个問題，就必须从各个方面更为全面地研究上述条件）的簡要的分

析便表明，存在着許多“使这个規律发生变化”的情况，而对于每一个国家必須具体对待，因为，在这一个国家中的資本主义的发展条件和另一个国家的資本主义发展条件的差別可能是相当大的。

也不应忘記(在今天我們可能看到的範圍內)和上述問題也有联系的一个事实。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已經天才地說明了的、資本主义积累的历史傾向。

馬克思曾經指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資本的原始积累”作为它的史前史，当时，对依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得的私有財產(农民的土地、小手工业者的資產等)进行了大規模的、最无耻的和最野蛮的剝夺。当这样形成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时，在这种生产方式內部，相互竞争的規律、資本积聚和集中的規律就开始发生作用。这时資本家本身也成了剝夺的对象。馬克思得出結論說：“这种剝夺，是由資本主义生产自身的內在法則的作用，由資本的集中，来完成的。一个資本家打死許多資本家。和这种集中或多数資本家为少数資本家剝夺的現象在一起，規模愈益加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态，科学之意識的技术的应用，土地的計劃性的开发，劳动手段变为只能共同利用的劳动手段的轉化，一切生产資料因为当作結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資料使用而起的經濟，一切人民在世界市場网中形成的錯綜，从而，資本主义統治的国际性质，将会跟着发展。把这个轉变过程的利益横加掠夺，并实行独占的大資本家老爷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同时，穷乏，压迫，奴役，退化，榨取之量，却在增加。但同时，人数不絕膨大的，为資本主义生产过程自身的机构所訓練，所統一，所組織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在增长。資本独占，成了和这种独占在一起，并在这种独占下开花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資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与它們的資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之点。这种外壳会被破裂。資本主义私有制的喪钟响起来了。剝夺者被剝夺。

由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出的資本主义占有方式，資本主义私

有制，是个人的以本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以一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出它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并不是重建私有制，却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已有的造就——**协作，土地与由劳动自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个人的所有制。”^①

馬克思的《資本論》中那段著名的和具有預見性的話，就是这样写的。帝国主义的最新历史表明了馬克思所不能完全預見到的某些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但是，依我看来，这些特点同馬克思的总的观点并不矛盾。馬克思正确地证明了，竞争的規律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不断导致对較小的和較弱的资本家的剥夺。显然，这个过程一直到今天还在进行。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最近的发展，那末就可以看出，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资本的壟断已經成为生产方式的桎梏”，也就是說，资本主义在（席卷这些国家的）大危机中无法解决暫时的、普遍的貧困状态，正如它不能摆脱世界战争的灾难（这在实际上也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桎梏的表现）一样。

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后的各种矛盾和过程

旧型的资本主义在本世紀已經表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恰好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力夺取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在历史上已經发生的情形那样），国家机器本身就把越来越多的作用承担过来，并且越来越摆脱直接的阶级影响和力图通过越来越多地参与生产过程本身来解决这些矛盾。旧的资本主义形式再也不能适应于今天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了。凡是工人阶级不能夺取政权的地方（这就是說在大多数国家里），国家就日益地把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4—965頁。

暂时解决劳资矛盾的责任担负起来。而这种对生产过程本身的参与，不能以其他方式，而只能通过限制私人资本直到剥夺私人资本，即把所有的生产部门国有化而发展起来。这样一来，旧的资本主义形式被否定了，我们在这一发展中看到了一个新质的阶段，即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就其结构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最直接的入口^①。

毫无疑问，旧的资本主义形式必然要反抗这种过程。同样，毫无疑问，旧的资本主义是不能在本身的基础上解决社会问题的。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英国、挪威、美国等国的发展，那末，就可以看出，这一过程是日常的现实。国家（如果我们以资本主义的范围为限的话）只有通过自己强烈的干涉才能削弱这种消极后果，才能找到暂时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

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在凡是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力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的国家中，则是当前历史时期合乎规律的过程。而国家资本主义本身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跳板。

这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上，看来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可能性：或者国家机器将朝着官僚主义的方向加强起来，从而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又会成为社会顺利向前发展的障碍，这样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势必要以革命的方式来克服这个最后的桎梏；或者无产阶级善于利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来加强工人阶级参与管理整个的生产和社会过程，这样将以更少的痛苦来达到同一目的。因此，今天工人阶级对这一发展的正确立场，是它的政策的基石之一。

^①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布哈林）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对于这种现象给予了不同的评价，但是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根据这些现象当时所达到的发展程度来考察和分析它的。在列宁和布哈林之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一直到今天都完全忽视了这些过程，因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第三方面，当然不可能預見到所有这样的国际历史情况，它們在个别国家內可能通过引起无产階級反对現存資本主义的直接武装行动而縮短这一过程。

总之，資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正是作为一种趋势，表明当前发展阶段上的某种变化只不过证实了馬克思关于这个趋势的思想。所謂某种发展的趋势，实际上指的是以理論上无法預見的所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阶段和时期为前提的最終目标的必然性，因为在复杂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当前的历史发展中，对所有的因素、情况、活动和偶然事件是无法預測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通过对利潤和利潤率的分析，进一步补充、解釋和闡明了自己的这些学說。在这里，他从另一个方面更为具体地說明了上述过程的不可避免性。

如上所述，馬克思曾經指出，資本有机构成是通过提高不变資本而变化的，也就是說，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不变資本（生产資料——机器、原料等等）比可变資本（劳动力）增长得快。但是，正因为有机构成是这样发生变化的，所以，对于資本家來說极为重要的东西即利潤率，也就由于資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个必然性而下降。

既然利潤率是剩余价值对总資本之比，而剩余价值是由劳动力所生产的，劳动力在其对不变資本的比例中又不断减少，所以資本主义的一般現象和規律就是利潤率的下降。

但是，馬克思也說明了許多与这个規律起着相反作用的影响，它們削弱这个規律，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个規律发生变化等等——因此，馬克思也就說明了利潤率下降趋势的規律。

为了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它是作为利潤、利息和地租来实现的），資本家必須增加投到生产中的資本量。但是，由于資本的这种不断的增加是靠减少劳动力来实现的（这就是說，不变資本相对而言要增加得快得多），所以，就出現了利潤率不断下降的

趨勢。資本家首先就通過增加總資本量來彌補這點，這樣，儘管利潤率較低，資本家仍然能夠獲得較大的利潤總量。

馬克思指出：“所以，勞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步中，一方面，表現在利潤率愈益下降的趨勢中，另一方面，是表現在所占剩餘價值或利潤的絕對量的不斷增加中；所以，大體說來，可變資本和利潤的相對減少，是與二者的絕對增加相適應的。像我們講過的那樣，這種二重的作用，只能表現在總資本的比利潤率下降更為迅速的增加上。為了要在較高的構成上，或在不變資本增加得相對更多的情形下，使用一個絕對增加的可變資本，總資本不僅須比例於較高的構成而增加起來，並且要比它增加得更迅速。由此，就得到結論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越是發展，為了要使用同量勞動力，一個愈益更大的資本量是必要的；如要使用更多的勞動力，那就更加如此。因此，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必然會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生出一個永久的顯而易見的勞動人口過剩。如果可變資本以前占總資本二分之一，現在僅占六分之一，為了要使用同量勞動力，總資本就必須三倍；如要使用加倍勞動力，總資本就必須六倍。”^①

所以，資本家都不得不盡量增加總資本，以便通過增加利潤量來補償利潤率的下降。但是，這種資本的增加和生產的提高實際上卻具有我們在研究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和歷史趨勢時所看到的那些後果。它引起生產過剩、小資本的滅亡、危機等等，從而表明，資本主義由於自己內部發展的必然性不能使社會順利地向前發展了。

於是，刺激資本主義生產的利潤率就由於自身的下降而延緩新的獨立資本的形成；並引起生產過剩、危機和資本主義的其他災禍。馬克思指出，那些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絕對的生產方式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263頁。

的政治經濟學家（例如李嘉圖），在這裡也覺得這種生產方式為自己設置了一種限制。“但在他們對於利潤率下降所懷的恐懼中，重要的是這種感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生產力的發展中，碰到了一個限制。這個限制，和財富的生產本身，是毫無關係的。並且這個特殊的限制，證實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限性，證實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僅僅歷史的過渡的性質，證實了它不是財富生產的絕對的生產方式，却寧可說會在一定階段，和它的進一步發展發生衝突。”^①

因此，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歸結為下列幾個方面：“**第一**。它把它的生產物當作商品來生產。生產商品，不是它和別種生產方式所借以互相區別的事情；但成為商品是它的生產物的支配和決定的性質這件事，却使它和其他生產方式區別開來。……可以特別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標記的**第二點**，是剩餘價值的生產當作生產的直接的目的和決定的動機。在本質上，資本是生產資本的；但只有生產剩餘價值，它方才生產資本。”^②

我們不打算說明馬克思在他這部不朽的著作中所完成的經濟思想方面的一切成就。我們只想強調指出，除了上述各點以外，馬克思曾經全面地闡明了資本的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問題以及關於地租（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學說。而這一切不僅對於了解資本主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也是研究社會主義的必要理論基礎。

馬克思從上一世紀的四十年代起到他逝世為止，都致力於自己的這部不朽的著作。儘管時間間隔有這樣長，但他卻不能在生前出版它。《資本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則由恩格斯加以整理後，直到1894年才出版。原來預定作為《資本論》第四卷的大批手稿，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7頁。

② 同上書，第1152—1154頁。

最初是由考茨基用《剩余价值理論》的标题出版的。

馬克思来不及完成这部著作是由于下列三个基本原因所致：首先，是由于經濟困难而常常中断自己的工作，他为了养活自己和全家，不得不从事許多比較次要的事务。其次，他作为一个把毕生精力献給人类及其幸福的人，是不能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件和革命活动袖手旁观的，当时他特別紧张地参与了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最后，由于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科学工作者，不肯放过任何与其研究的对象有关的书籍、文章或事实。而这方面的經濟事实和材料都是在十九世紀逐日积累起来的。因此，当俄国也进入資本主义过程时，馬克思甚至不辞劳苦地学习俄文，以便能够閱讀俄国的著作。

然而，这里所指的还不仅仅限于政治經濟学的著作。馬克思为了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对象，还研究了其他科学領域的許多問題。且讓我們只举几个例子來說：在农业和农艺化学方面，他研究了約翰斯頓、李比希、哈姆、拉維涅、馬朗、恩格哈尔特等人的許多著作；在机器和設計方面，他研究了波佩、尤尔、貝希曼、波多林斯基、卡斯巴里等人的著作；在地质学和生物学方面，研究了尤克、格兰特、普賴尔、施萊登、兰克、菲克、弗雷斯等人的著作。如果有人翻閱一下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所引证的著作的目录，那末，便可以在这部著作的包罗万象、論据充分和規模宏偉有一个概貌的了解。这部著作，过去是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領域內一部最杰出的著作。

还不应当忽視一个事实。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馬克思来不及完成政治經濟学的研究，也来不及研究其他理論問題，特別是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問題。他在这些專門的領域中所来不及研究的东西，却在自己的《資本論》中以間接的方式实现了。这部著作迄今仍然是唯物辯证法的最富有內容的概括性的著作，当然，这种唯物辯证法是被应用到政治經濟学的專門領域的。迄今为止，唯物辯证法还没有建立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当然这不是指一成不变的体

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明了一條必經的道路，闡明了用辯證法解釋和分析具體事實的方法。馬克思不是以某些抽象的定義，而是以最具體的現象，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作為出發點的。他首先分析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細胞的商品本身（他在其中揭示了商品的質的方面和量的方面），然後在對特殊的商品即貨幣所作的分析中指明了它今天的這種表現的歷史性質。他在每進一步分析任何一個較重要的政治經濟學的範疇（積累、利潤、地租等等）中，同時也貫徹了歷史的和邏輯的方法，並且在每個範疇中，揭示了它們形成的歷史過程的最終表現。

在《資本論》中邏輯和歷史就是這樣統一起來。在其中，對生產方式的一個階段即資本主義階段進行了邏輯分析，但這個階段始終只是依據先前的發展並作為先前發展的結果加以闡述，即辯證地加以闡述的。

這時馬克思的辯證的分析就轉到資本主義生產的這些因素（商品、貨幣）的最直接的聯繫和關係方面，說明了資本的實現，以便由資本循環方面的問題轉到再生產的問題，即分析這一種生產方式的全面聯繫。

研究的方法，是從個別的具体到抽象，從具体的和大量的個別（即商品）到認識資本主義規律及其發展的趨勢。

此外，由於社會經濟過程同樣也只是一般物質現實過程的一個特殊狀態，所以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思的這部著作中也就充分發揮了它的作用。因此，任何較嚴肅的有關辯證法規律或範疇的論著，都一定注意研究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材料的基礎上對於這些辯證法因素的論述。不管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否談到對立的統一和鬥爭的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量到質的轉化規律，一般、特殊和個別的關係，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問題以及可能性和現實的問題等等，但它卻作出了十九世紀最傑出的思想家的最有權威的分析。

馬克思花在這部著作中的巨大努力並不是白費的。他的著

作, 不論在过去和現在, 都意味着新的社会力量的科学思想在理論上极偉大的胜利, 同时也意味着, 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命力和能力在于从一种社会制度的現狀中揭示出它的未来及这种发展的基本規律。



第三篇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 的馬克思主义

第一章

一 德国的初期馬克思主义

約瑟夫·狄慈根(1828—1888)

第一国际年代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知識界傳播的时期。应当看到，直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人們还无法更多地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因为有些早期的手稿已經湮沒无聞，另一些則放在抽屉里留給“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只有在批判杜林的以及后来論述費尔巴哈的几篇著作中，才闡述了他們的一些基本哲学观点。他們的社会学观点和批判經济学观点主要是靠《共产党宣言》和馬克思的經济学著作傳播开来，但这个过程还是相当緩慢的。此外，如果还考虑到当时最优秀的革命力量是在从事实际的政治斗争，那末就沒有任何理由奇怪：为什么当时沒有产生大批卓越的理論家，他們能够应用馬克思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他的全部学說或其中的某些組成部分。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却出現了一个值得注目的自学成名的哲

学家約瑟夫·狄慈根^①。他并未受过正規的教育，初期受了費尔巴哈的影响，后来又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終于独立得出了唯物辯证法的某些基本結論。这样，他就屬于当时为数不多的用辯证法和唯物主义观点探討哲学問題的思想家之列。他的著作中显示了罕有的哲学才能；当然，由于他所受教育不多，这种才能受了很大的局限。

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中特別強調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一切現象的統一的問題^②。狄慈根在一些問題上有着彻底辯证的观点，如认为現象不是孤立的，不能把宇宙理解为現成事物的体系，而应当理解为发展过程；可是尽管这样，他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这样一些根本性問題上却表現了不确切的观点，这就使他从彻底的唯物主义轉向了斯宾諾莎主义。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中有好些地方持有这样的观点：“思維是腦的活动，正如走路是腿的活动一样”^③，可是在另外許多地方解决这个关系时他却写

① 狄慈根于1828年誕生在科倫附近的布兰肯堡。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制革工人。狄慈根两度侨居美国之后，于1864年前去彼得堡，担任一家制革厂的技术指导。1869年他回到德国，并发表了第一篇著作《人腦活动的本质》（1869年）。1884年他第三次去美国，在紐約負責編輯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1886年他迁居芝加哥和他的儿子在一起，同年在該地写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認識論領域中的漫游》一书，1887年又写成《哲学的成就》一书。他写給儿子的一些关于邏輯学的书信，后来由他的儿子欧根出版了。狄慈根于1888年在芝加哥逝世。他是馬克思的朋友。在我国出版物中論述狄慈根和狄慈根主义的有波·舍施奇的一本巨著《約瑟夫·狄慈根的辯证唯物主义》（1957年貝尔格萊德版）。

② 狄慈根时常強調自己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万物都是大的，万物也都是小的；万物都占有空間，万物也都有時間性；万物都是原因，又都是結果；万物是整体，又都是部分，因为万物本来就是万物的內容，因为万物就寓于宇宙之中；万物都是彼此亲和、相互联系、相互依賴的。作为絕對者的万物的概念，它的內涵由无数相对性构成；作为普遍真理的万物的概念，它遍布于一切現象之中，它是概念科学的基础。”（《哲学的成就》，1895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第76頁）

③ 《人腦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选集》，1958年薩格勒布塞文版，第59頁；中譯本參閱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頁。

道：“唯心主义者沉醉于观念，旧唯物主义者沉醉于物质，前者和后者都是狂热之徒，就这一点来说他们都是形而上学者；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过份强调精神与物质的区别。不论前者或后者，都未能达到认识宇宙的统一性和单一性、认识宇宙的广博性的程度，宇宙并不是非物质即精神的，而是既物质又精神的。”^①狄慈根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也孜孜探究这一问题，并且违背了自己对待许多哲学问题所采取的基本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解决办法，认为“狭隘的唯心主义者硬说一切事物都是思想，而我们则想说明：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只是一个类概念下的两个种概念；基于它们的共同本性，并且从正常的逻辑着想，我们应当在它们各自独有的名称之外还赋予它们一个全族系的名称或共同的名称。只要意识到这一点，那末唯心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只不过是字眼上的争论而已。”^②

除了这个重大缺陷之外，狄慈根的哲学著作中还时常表现出累赘重复、不够严谨和辞不达意的毛病，因此他的哲学思考的水平是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狄慈根看来，“一般本性和绝对真理是等同的”^③，关于绝对真理的知识“是我们生而具有的；是与意识同时获得的”^④，等等。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确切和不严谨的毛病，狄慈根还是看到了现实生活中某些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并表述了一些十分精辟的见解。他十分明确地领会到这样一些基本的辩证法原理，如“一切原因都是结果，而一切结果又都是原因”^⑤，又如除了无意义的矛盾外，还存在有意义的、现实的矛盾：“静止的运动和运动的

①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选集》，第203页。

② 狄慈根：《哲学的成就》，德文版，第76页。

③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选集》，第193页。

④ 同上书，第195页。

⑤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选集》，第91页；参阅中译本，第55页。

静止——这就是需要解决的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就可以解决一切矛盾。”^①狄慈根相当清楚地看到了一般和特殊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他在对思维这个一般问题作了片面的、抽象的解释。他也同样地强调了我们的认识的辩证性质，并提出了一些著名的论点，这些论点无疑也曾对列宁产生了影响：“无论哪个事物、无论哪个原子都是不能被彻底认识的。一切事物的秘密都是无穷尽的，就好像是不可逾越、不能透过一样。然而我们终究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事物有越来越正确的认识，并且懂得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的精神所不能达到的。人的精神在发现秘密这一点上是沒有极限的，它在发现新事物方面是沒有止境的，因而它有着无限宽广的余地来对个别事物或对整个宇宙进行无止境的、无法估量的认识。”^②

在狄慈根那里我们还可以找到这样的见解：他正确地把唯心主义看作是在一定问题上的片面性和夸大等等，而不看作是绝对的荒谬。同样，我们可以找到有关我们认识中的一般性和必然性的性质的明确主张。他写道：“唯物主义者否认精神的任何自主性，认为应该借助经验来找到原因，对于他们，我们应当回答说：以因果关系为前提的必然性和一般性，绝不能在经验中获致。另一方面，也应当告诉唯心主义者，虽然理性可以探求原因，但是不可能同时进行认识，因为这种探求毕竟不是先天的，而只是后天的，它只能在经验提供的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固然只有精神能揭示出非感性的、抽象的一般，——但这只限于在感性现象的现有范围之内。”^③可见，狄慈根已经十分敏锐地觉察到，通常的经验论对于说明人类认识是不够的，正像唯心主义的错误恰恰在于否定经验一样。

由此可见，狄慈根的著作并不是前后一贯和沒有矛盾的。他

① 狄慈根：《哲学的成就》，第100页。

②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狄慈根哲学选集》，第225—226页。

③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选集》，第96页；参阅中译本，第61—62页。

在主要方面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但是他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許多問題并没有掌握；他在許多領域內都有独到的見解，然而他的唯物主义却常常是不确切、不彻底的。所有这一切特点，使得狄慈根成为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光輝形象；然而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辩证法是没有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那样全面的。

狄慈根死后十年，在修正主义流行的年代里，有些人试图拿狄慈根的哲学来同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相抗衡，认为他的哲学是更深刻、更完备、更全面和更精确的哲学。在这些“狄慈根主义”的最虔誠的信徒中，居于前列的是他的儿子欧根·狄慈根，荷兰馬克思主义者安·潘涅庫克，恩·翁特尔曼，奥·伊·海尔方德，狄慈根著作的俄文譯者巴·格·达烏盖，以及亨·罗兰—霍尔斯特^①。

所有这些人的主要論点就是：狄慈根比过去任何人都更为深刻、更为清楚地闡明了辩证法，馬克思主义者应当根据狄慈根的哲学在認識論和自然辩证法方面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狄慈根哲学在認識論和自然辩证法方面要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詳尽得多、深刻得多，因此它应当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所有这些人特別推崇狄慈根的地方，正是他背离彻底唯物主义的地方，是他錯誤地解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地方——把它們視为一个高級的統一体的不同存在形态。这样就势必会得出結論說：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一对相反的命題是不切題的，是沒有任何意义的。

在二十世紀初的时候，梅林、普列汉諾夫和列宁就起而反对这

^① 关于这方面的問題，欧根·狄慈根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并专门出过两本书：《狄慈根傳略》（1915年）和《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参照約·狄慈根的認識論解决这一問題的尝试》（1921年）。潘涅庫克也在《新时代》（1903—1904年）上发表了論历史唯物主义和宗教的文章；翁特尔曼写了一本詳尽的著作《狭义馬克思主义的邏輯缺陷》（1910年），罗兰—霍尔斯特則发表了一本名为《約瑟夫·狄慈根的哲学对无产阶级的意义淺釋》的著作（1910年）。

种夸大狄慈根哲学的意义和創立新学派——狄慈根主义——的企图，他們一方面承认約瑟夫·狄慈根的声望和才能，并且在根本方面也承认他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然而他們同时也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結論：狄慈根的哲学，就其水平、鮮明性、深度和广度來說，都不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某些思想上，可以认为是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一定充实，但也不能当作是对他們的哲学的补充或代替。至于“狄慈根主义”一說，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一书中把它視为是混乱思想和向反动哲学迈进的一步，是想不根据狄慈根的偉大之处而利用他的弱点来創立一种新路線的企图^①。

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紀最后二十年里有了巨大的发展。馬克思本人也经历了欧洲大陆上这一蓬勃发展时期的开始；他曾經誠懇地提出建議来帮助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同样他还同拉法格和盖得一起，在1880年直接参加了制訂法国党的党綱的工作。三年以后（1883年3月14日），这位社会主义的第一名战士和現代科学的最杰出的天才人物的心臟停止了跳动。

^① “如果給約·狄慈根一个总的評价，他是不应该受到这样严厉的譴責的。他九成是唯物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妄自标新立異，企图建立不同于唯物主义的特殊哲学。約·狄慈根多次讲到馬克思，总是說他是一派之首……約·狄慈根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因此，欧·狄慈根和——十分遺憾！——达烏盖同志杜撰‘自然一元論’、‘狄慈根主义’等等，是給他帮了倒忙。‘狄慈根主义’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它是一种混乱思想，是向反动哲学迈进一步，是想不根据約·狄慈根的偉大之处（这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是有許多偉大之处的！）而利用他的弱点来創立一种路線的企图！”（《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0—261頁）

二 馬克思主义在法国

在上述时期的西欧和中欧，資本主义有了急速的发展。十九世紀中叶，产业革命以疾速奔騰之势向前推进，这样，无产阶级也就大量形成和組織起来。

法国经历了它的六月事件^①和公社失敗后的五月流血周，在它的革命高潮中涌现出一批非凡的革命家，他們将永远成为人們心目中自我献身、英雄气概和人道主义的榜样。菲·邦納罗蒂、奥·布朗基、路·瓦尔兰、古·弗路朗斯、沙·德勒克呂茲、泰·費雷、尔·里若、路易莎·米歇尔以及許許多多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知名的和无名的战士，将作为新世界和新人的誕生的标志留傳后世。

保尔·拉法格(1842—1911)

在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里，法国还产生了一个极其强有力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保尔·拉法格。拉法格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时曾受到蒲魯东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在1865年当他还是一个医科大学生的时候，就因为从事革命工作而被法国的所有大学拒于門外。1865年拉法格在倫敦認識了馬克思。同馬克思的几次談話，給这个思想活跃、气质猛烈的人开扩了眼界，使他对历史发展有了新的認識，并使他的思想发展出現深刻的轉变。1866年拉法格担任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員，两年后他同馬克思的女儿劳拉結婚，在公社时期他参加了波尔多的革命活动，公社失敗后流亡国外。

然而就在巴黎公社失敗后不久，由于資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

^① 指1848年6月法国工人阶级为反对二月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举行的起义的失敗。——譯者注

蓬勃发展，在七十年代中期，加入工会的工人就在巴黎举行了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76年)。三年以后，布朗基被大赦，公社社員陸續从流亡生活中返回本国。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领导者是茹尔·盖得(1845—1922)——法国工人党的最坚强的組織者和創始人。作为《平等报》的主編和大量馬克思主义論著的作者，盖得在这一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普及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和工人階級階級斗争观点的工作^①。

盖得和拉法格在1880年一同到倫敦去拜訪馬克思，商討工人党的綱領；馬克思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就这个綱領向他們作了指示，这个綱領同年在哈佛尔通过。然而两年之后，在圣埃田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就已經出現了分裂。早在1879年馬賽代表大会上就初显端倪的集体主义派与机会主义派的內部斗争（在这次大会上集体主义派取得了胜利），导致了1882年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集团的分裂活动，这个集团的领导人**有保·布魯斯、让·阿勒曼**（所謂的可能派分子）和完全的社会主义者**边·馬隆**。

这样，拉法格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論活动就集中于闡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工人运动的一些基本的理論、綱領和策略問題。加以在1893年一些独立社会主义者（**米勒兰、維維安尼、白里安、饒勒斯**）建立了单独的政党，而且米勒兰在1898年参加了資产階級政府，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复杂形势就格外明显了；同时也出現了一系列的爭論，这些爭論实际上一直延續到今天。

德雷福斯案件以后，在饒勒斯的有力影响下，成立了統一的社会党(1905年)，这个党由于有了饒勒斯这个显要人物而获得了很高的威信^②。

不論就哪一方面來說，**拉法格**都称得上是这一时期馬克思主

^① 盖得的主要著作有：《論社会主义基本原理》(1878年)，《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1879年)，《階級的道德状况和政治状况》(1901年)。战争时期盖得出任資产階級政府的部长，从而也就背棄了自己早期的观点。

义运动的十分重要和有独到見解的理論家。他的主要力量用于写作一些精辟的短論和論战性文章。虽然他沒有提出什么新的基本原理来丰富馬克思主义理論，可是他一貫独創地、富有才能地、机智灵活地把馬克思主义理論应用于各个不同領域。形势的复杂性看来就像是正投合他的敏感的气质和多方面的才能一样。他的作品有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也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内部爭論的各种批判性文章，还有对于唯物史观、所有制、宗教、語言、达尔文主义、托拉斯、交易所等等各种各样理論問題的探討；在所有这些方面，拉法格都表现出他是整个馬克思主义运动中最卓越的理論家和論辯家之一。

他的大量論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懶惰权》（1883年），《卡尔·馬克思的經濟唯物主义》（1885年），《革命次日》（1887年），《共产主义和經濟演变》（1892年），《革命前后的法国語言》（1894年），《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1895年），《财产的起源和发展》（1895年），《卡尔·馬克思的經濟决定論》（1909年）。

拉法格并不是一个善于对某些錯綜复杂的問題加以詳尽分析和系統概括的人。他的独到的辯证法思想以其特有的优雅姿态掠过各个領域和各种事实，到处都留下一点它的主人的鮮明的痕迹。拉法格尽管在某些問題上有他的片面性、幼稚見解甚至浪漫色彩，但不失为一个彻底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很少有誰能像他那样高

② 让·饒勒斯（1859—1914）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者。他曾經是一位哲学教授，写过許多历史和政治著作，是《人道报》的创办人。他在理論上沒有采取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而主張唯心主义和进化論。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正义观念的實現；在階級斗争理論上他表现为合法主义者。他是一位爭取和平和爭取德法友好的偉大战士，偉大的人道主义者，当时法国社会主义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反对战争，在大战前夕被一名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所暗杀。可以参看沙·拉波波特为饒勒斯写的詳細傳記。他的主要著作有：《感性世界的现实性》（1891年），《德雷福斯案件》（1898年），《社会主义行动》（1899年），《社会主义研究》（1902年），《1789—1900年法兰西共和国社会主义运动史》（1901—1908年）等等。

明地把馬克思的丰富的方法应用于生活和科学的各个不同領域。

这里我們只能举出个别的例子，它們在当时或是代表着一种独到的見解，或者至少是一些新的启示。

比如說，拉法格十分确切地規定了自然环境和人相互之間的辯证影响，看到了一个在馬克思主义对人的看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人的积极的、改造的活动。他在自己的一部最有名的著作中写道：“人以自己的活动不仅改变他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在各方面創造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后者虽然不能使他的机体脱离自然环境的影响，但至少可以大大緩和这种影响。不过这个人人为的环境本身对于它从自然环境中接收过来的人也要施加影响。就像馴化的植物和动物一样，人也受到来自两种环境的影响。”^①

同时，拉法格在这里还揭示了一个理解各种人为环境和現象的相似性的重要方面，这个問題只有根据馬克思主义对社会結構的正确分析才能得到解答。他写道：“人們逐步建立起来的各种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彼此之間在发展和成熟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不过处于同样的发展和成熟阶段的各个环境，彼此間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不論它們是哪些人种創造的，也不論它們的地理位置如何。人們一方面受到各种不同的自然力量的改造作用，同时也受到各种相似的人为环境的影响；这些人为环境縮小了人們的各种差別，发展了人們的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害关系、共同的爱好以及共同的精神活动。無論如何，相似的自然环境，比方說位于相同緯度和同等海拔的自然环境，对于生活在那里的植物和动物是产生类似的亲化作用的。这些动物和植物具有类似的群系。相似的人为环境也可以使那些被不同自然环境分为各个大小种族的人类趋于联合。”^②

拉法格根据自己的这种見解，在論述馬克思的經濟决定論的

① 《卡尔·馬克思的經濟决定論》。《拉法格著作选集》，1957年薩格勒布塞文版，第132頁。

② 同上书，第132頁。

文章里对灵魂的起源、对包括基督教的产生在内的宗教信仰的发展等问题作了独到的分析。虽然他在这个题目上把问题简单化了，将灵魂这个观念的产生原因只归结为反思活动的因素（梦的解释等等），但是他对于灵魂、地狱、天堂、神这样一些概念的演变所作的考察却有許多独到之处。拉法格指出关于死后的共同住所的观念是怎样随着氏族的解体而衰微的，关于死后惩罚的思想是怎样随着古代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而重新出现的。他说：“但是，如果说对死者的惩罚重又出现的话，那末它已失去了个人复仇的性质而获得了集体复仇的性质，即被称之为公众惩罚的阶级复仇的性质。个别的人不再实行复仇，而是由有共同利益的个人集合体来实行复仇。这种从个人复仇到集体惩罚的转变，是当个人主义已在社会关系中得到确认之后实现的，因为在古代城市中燃起的阶级斗争，已经把单个的人集合为两个敌对的阵营。”^①

拉法格在分析作为古代宗教、神秘传说和哲学在当时的发展结果和混成物的基督教时，清楚地揭示了它的两重性。“基督教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甚至也没有杜撰任何荒诞思想和幼稚的迷信，不过它却有一种无法比拟的高明手段，这是神秘传说和奥菲士教^②所不曾具有的；它可以满足广大平民的各种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需求、愿望和欲念。它善于煽起穷人对富人的仇恨，但同样也会安慰富人：把改变不平的命运，奖励行善，使机遇和幸福平等化等等都推迟到天国里去实现。基督教已经抛开它初期所装扮的迷惑人的姿态，成了有产阶级的太平门。”^③

尽管在这个分析里存在着片面性，特别是当他试图单纯根据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来断定资产阶级必然信教

①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拉法格著作选集》，第 191 页。

② 奥菲士教是古希腊的一种神秘主义教派，主张肉体为罪恶而灵魂不灭的论点。——译者注

③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拉法格著作选集》，第 207 页。

和无产階級必然不信教时表现了机械論的思想，但是在拉法格的这段分析中却显示了他的思想的广闊和独创性。

拉法格在探討資產階級社会中的个别因素时，极其敏銳地論断了这个社会的一些現象和典型标志。他确切地論断了資產階級对待科学的两面态度。技术科学的发展适应資產階級的需要，因而資產階級也就容忍了技术科学所必需的各种决定論的观念；可是資產階級在社会科学領域內却限制这种自由，因为社会科学在意識形态問題中还涉及了社会关系的性质本身^①。

正如馬克思在早期以及后来的作品中对商品拜物教所作的一些分析一样，拉法格也深入探討了資產階級社会思想結構中的一些基本因素。拉法格指出，資產階級对社会制度的愚昧无知，正像野蛮人对自然界的愚昧无知一样。人們对于整个錯綜复杂的自然現象和社会事件既不知其原因，也不知其規律，这就助长了人們的迷信和神秘感，誤以为一切都决定于偶然性。“另一些日常的經濟現象，在資產者的头脑中注入了一种信念，认为存在着某种脱离一切物质的、沒有物质基础的神秘力量。只举一个例子来看。貨幣所体现的社会力量同它的物质很少联系，这样就在資產者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关于不依赖于物质而存在的力量的想法。这一小块紙片，如果人們不是在它面前頂礼膜拜而提高它的身价的話，就沒有任何魔力；可是它能給占有它的人带来最现实的、在文明世界中人們最向往的东西：面包、肉食、美酒、房屋、土地、駿馬、女人、权威和荣誉等等，給人以肉体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慰借；任何神灵也未必

^① 关于这个问题拉法格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哲学决定論之所以能在自然科学中占統治地位，只是因为資產階級容許自己的科学家自由地探討自然力的作用；資產階級当然想要認識这种作用，因为他们要利用自然力来为自己生产财富。可是由于資產階級所处的社会地位，他們不可能把同样的自由給予經濟学家、哲学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因而这些人也就不可能把哲学决定論应用到社会科学方面来。基于同样的理由，天主教会过去曾經禁止人們自由地探討自然界；所以为了建立自然科学，当时就有必要推翻天主教会的社会統治。”（同上书，第214頁）

有更大的法力。资产阶级的生活就是这样交織着神秘主义”。^①

拉法格虽然只是对經典作家的已知論点进行闡述，但做得却是才气洋溢、机智精辟^②。

拉法格是一位学識淵博、才智过人的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掌握各种知識領域的巨大能力。在他的多方面的理論著述中，他也留下了第一部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学著作。他在論語言与革命的著作中一方面闡明了从具体概念中产生抽象概念的过程^③，另一方面也精辟地分析了語言、風格和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发生的演进和变化。拉法格在这方面的研究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納为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表达的下述看法，他确认“語言反映着人的生活及其周圍环境中的一切变化。人們生活方式的变化（例如从农村生活轉入城市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的事件，都在語言中留下了痕迹。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現象有了迅速的改变，它的語言也就发生迅速的变化；而沒有历史的民族，它的語言也就沒有变化。拉伯雷的法語，在他逝世一百年后就只有專門学者才能懂；可是，产生挪威語、瑞典語和丹麦語的冰島語言，在冰島本土

① 《卡尔·馬克思的經濟决定論》。《拉法格著作选集》，第 220 頁。

② 举例来看，拉法格在闡述《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的著名論点时这样写道：“这种对劳动成果的掠夺，把社会变成了一个集市，这里一切都有人买卖；不单是人的劳动产品，而且包括人本身。体力劳动者之为人购买，是由于他的肌肉的能力；腦力劳动者之为人购买，是由于他的大脑的能力，是因为他們是工程师、化学师、农艺师，是因为他們有組織才能或指揮才能。生产的共产主义和占有的个人主义之間的对抗，貶低了人，使人退化，把人变成为商品，把社会——再重复一次——变为一个大杂货鋪”（《共产主义和經濟演变》。《拉法格著作选集》，第 272 頁）。

③ 例如在他所写的关于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一篇論文中就注意到：“当談到語言的时候，我想請你們注意同我們的問題有关的一个現象：一切在今天帶有抽象涵义的詞，一开始在創造它們的野蛮人的头脑里都有着具体的涵义。举例說，希腊語中的 *nomos* 一詞，在它具有規律这个抽象意义之前，曾經代表过牧场、居留地的意思。法語中的 *droit* 一詞表示与正义相当的涵义，可是在最初它则是用来表征某种不能折断、不能弯曲的东西。从这些語詞現象中难道还不应当得出結論說是具体的东西引起人們头脑中的抽象的东西嗎？”（《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拉法格著作选集》，第 244 頁）

至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①

拉法格在他关于雨果、都德、左拉等人的文学評論中，也不失其革命学者的本色，他力图闡明資產階級文化的涵义和結構。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釋艺术（指的是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解釋），并从这一立場出发，像他的老师一样，揭示了“社会环境”的階級分化的因素，这一点对于这个解釋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除去一些刻薄而俏皮的論点外，还可以見到就各种不同問題所表述的一些精采思想。拉法格在一处談到代表作問題时断言，作家也必然受到自己的社会环境約束而无法摆脱，由此他得出結論說，“天才艺术家的脑筋，并不是如像雨果所說，是‘上帝的宝鼎’，而是一个奇妙的試管，其中凌乱地装进了当前的各种各样事实、感觉和思想以及过去的各种各样回忆：在这里，这些混杂的成份互相遇合、掺和、溶化、搭配，結果就調制成了各种口头的、书面的、繪画的、雕塑的或歌唱的作品；而且从这个脑力发酵作用所产生的作品，就其特点來說比参加配制它的各种材料要丰富得多，就像合金的特性不同于合成它的各种金屬一样”^②。

在拉法格的著作里还可以看到有些地方貫串了机械論、抽象性、浪漫主义等等的观点，然而这些东西并非主流。拉法格对各种事件都反应敏銳，同时在理論上也躋于当时发展阶段上的最强有力的馬克思主义者之列。他的功績在于：他是最早指明托拉斯、壟断組織和財政資本的出現及其作用的人中間的一个；他在《革命次日》这篇文章里着重指出了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个思想在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时期完全被忽視了），即国家的消亡和社会自治的思想。尽管在那些分析里他有时沉湎于革命的幻想，过早地預言了各种具体措施，但是他所強調的在革命以后的时期

① 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語言》。《文学評論》，1949年塞文版，第4頁。

② 拉法格：《浪漫主义的根源》。《文学評論》，第82頁；中譯本參閱拉法格《文学論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36頁。

中最根本的东西，是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見解一致的。国家是阶级統治的机关，因而新的革命政权应当粉碎资产阶级的制度，依靠按社会主义原則組織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奠定新秩序的初步基础：“不要繼續让国家来充任邮电事业的主人，鑄造錢币，管理它几乎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經管理着的铁路；不要由国家来担任紡紗厂和織布厂的主人、担任各种工厂的經理等等，像拉薩尔所希望的那样，——革命政权应当做到让工人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自己的企业主，自己的經理。

革命政权无需为邮务人員，电报、铁路和矿山的工作人員以及鑄造車間的工人指派领导人，訂出規章制度，規定劳动关系和各項价格；相反，应当由这些工人自己商量怎样挑选自己的工程师、自己工厂的主管人，怎样在自己内部分配收入。这里我談到收入問題，只是因为革命的次日还必須保持资本主义的支付劳动报酬的办法；可是在未来，在我們将要看到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工人們将不再領取工資，也不取得任何个人收入，而是平等地享用全部社会財富。然而在革命的次日，国家只能通过革命政权把生产資料交由生产者支配；将要委任專門的委员会来規定每一个企业必須上繳的数額即企业应拿出偿还向企业提供的服务的款額，以及折旧費、修理費和改进技术装备費用的提成額，該委员会同时还应規定企业必需拿出多少数額的产值来納入社会基金，供保证全体社会成員的衣食住之用。”^①

前面已經着重指出，拉法格也有一些不够深刻的地方，或者說还有一些机械論的解釋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观点，甚至有过一些錯誤的結論，如认为在現代不可能发生战争。然而这些缺点絲毫也遮盖不了这位理論家和革命家的偉大，他不仅毕生始終如一地、永远站在战斗崗位上，站在爭取新人的斗争的第一綫，而且也是为数不多能够創造性地应用和丰富馬克思主义的人物之一。

^① 《革命次日》。《拉法格著作选集》，第400—401頁。

若尔日·索列尔(1847—1922)

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法国，与德国的修正主义的发展同时，出现了一种背离馬克思主义的派别——所谓的革命工团主义。佩路提埃，特别是若·索列尔，就是这一派的主要理論家。索列尔研究了已往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巴黎公社和米勒兰內閣主义的教訓，继承了佩路提埃的思想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体系，这个体系与无政府主义有着某些共同特征。

索列尔在九十年代初期接近了馬克思主义，同拉法格、日·德維勒、阿·邦奈等人一道参加編輯《新世紀》和《社会进步》杂志。索列尔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和馬克思主义者有着頻繁的接触，通过他的介紹，在《社会进步》杂志上发表了安·拉布里奧拉、貝·克罗齐、阿·拉布里奧拉等人的許多論著和文章。可是很快在法国的馬克思主义者內部以及在意大利的馬克思主义者中間都出現了理論上的分歧。索列尔根据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議會斗争的經驗，以及某些社会主义者参加資產阶级政府的情况，得出了以下的結論：在理論上为这种政策进行的种种辯护，模糊了馬克思主义的实质。

于是索列尔就开始对所有当时的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展开了批判性的攻击，他认为应当从所有自称为馬克思主义的学說当中把馬克思主义的核心拯救出来。索列尔并不是一个对历史发展的結構和規律作过深刻研究的人，而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但他的論著归根到底并没有多少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是在反对正統派思想的斗争中标新立異，独树一帜。然而他对某些至今仍不失其重要性的問題所作的探究和考察，毕竟是值得注意的。

索列尔对于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設想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錯誤在于迷信議會主义和人道主义。由于注意到知識分子出身的許多领导人过分热衷于这种政治策略，索列

尔不仅反对議會主义，而且反对知識分子在革命工人运动中的任何领导和指导作用^①。索列尔认为馬克思的主要功績在于他克服了資產階級对政党的看法并指明了階級問題和階級的重要作用。由此索列尔得出結論說：“社会主义的整个前途在于工人团体的自主发展”^②，在于工人階級意識到自己的未来取决于对階級斗争的了解和掌握。因此，馬克思主义的關鍵問題不在于組織新的政党、从而必然接收下来資產階級的各种特点，而在于引导工人階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掌握各种手段，組織起来进行斗争，使自己能够摆脱統治者；在于說服工人階級决不能效法資產階級。另一方面，馬克思主义如果始終坚持絕對革命的观点的話，就絕不能同政党糾纏在一起，不論是怎样革命的政党；因为这些政党不得不像資產階級政党一样从事活动，适应选举情况的要求而变换自己的态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同其他一些拥有同样选民的团体妥协”^③。

由于这样的原因，索列尔的“新派別”，即革命工团运动，并不指望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而是希望掌握运动的本性。这个派別摒棄来自空想主义或来自布朗基主义的一切公式，并且认为，应当从傳統的馬克思主义中清除掉非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任何东西，以捍卫它的精华^④。

索列尔对任何类型的政党一律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政党会导致作为基础的階級同抱有建立国家組織的目的的领导者互相分离；因此索列尔就呼吁无产階級成为一个組織在自己的革命

① 正因为如此，他激烈地反对饒勒斯；他在1910年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后者写道：“这位左右群众的老手所作的各种努力的結果，只是表明了那种道德复兴的幻想的幼稚性”（《工团主义我見》。《一种无产階級理論的材料》，1919年巴黎法文版，第284—285頁）。

② 索列尔：《工团的社会主义前途》。《一种无产階級理論的材料》，法文版，第133頁。

③ 索列尔：《馬克思主义剖析》，1908年巴黎法文版，第56—57頁。

④ 参看同上书，第59頁。

工团之内的阶级，呼吁这个阶级采取革命暴力——因为这不仅是革命变革的主要杠杆，而且也是一种旨在实现道德复兴的道德要求。“无产阶级的暴力不仅保证未来的革命，而且也是使沉溺在人道主义中的欧洲各民族重新获得当年的旺盛精力的唯一手段。这种暴力将使资本主义只发挥其物质的作用，并要求资本主义恢复它曾经一度具备的不可一世的气概。日益成长并坚定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可以迫使资产阶级继续保留它在工业生产斗争中的热情；资产阶级一心向往的就是掠夺和财富，与它相反，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要站了起来，资本主义社会将会达到它历史上的完善地步。可见，无产阶级的暴力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素。再补充一点：只要运用得当，这种暴力可以导致取消议会社会主义，使它不再成为劳动阶级的统治者和旧制度的捍卫者。”①

在索列尔看来，无产阶级的暴力是维护文明根本利益的阶级斗争的单纯的表现。尽管阶级斗争可能不是获取直接的物质权势的最适当的方法，但“它确能从野蛮中拯救世界”②。因此，索列尔也把暴力问题看作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伦理学问题③。

索列尔认为这种革命暴力的基本关键就是总罢工。在他看来，革命工团主义者应当从总罢工当中看到全部社会主义。正像他的工团主义观点受到蒲鲁东的强烈影响一样，他想要在柏格森关于创造性进化是不可分整体的思想中，寻找关于总罢工这一最后变革仅仅是局部罢工的后果和最终目的这种观点的论据。总罢工同时也就是“孕育着全部社会主义的神迹，是一套能够本能地唤起各种情感的构图，这些情感符合于社会主义为了反对现代社会而进行

① 索列尔：《论暴力》，1908年巴黎法文版，第49页。

② 同上书，第57页。

③ 索列尔在上述这部著作的最后是这样总结自己的论点的：“老实说，社会主义有责任赋予暴力以高度的道德价值，并借助这些道德价值来拯救现代世界。”（第253页）

的战争的各种表现。罢工在无产阶级当中激发了最高尚的情感，激发了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最深挚、最富有主动性的情感。”^①

总罢工作为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唯一行动，与议会斗争和党派斗争不同，它不是以一个国家代替另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一批领导者代替另一批领导者而告终，而是以消灭一切国家、一切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宣告完成。因此索列尔把强力(force)和暴力(violence)这两个词也作了区别，认为“强力的任务在于强迫组织某种社会秩序，其中某些少数人居于统治地位，而暴力所要求的则是摧毁这种秩序”^②。

索列尔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之一，在于他们主张工人应当牺牲一切，以便在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之后组织一个新的国家，也就是把那些向他们庄严保证为人民而斗争、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的人送上台去执政。“新派别的看法与此完全不同；它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即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效法资产阶级；新派别并不认为有必要为了一种起码的、可疑的结果，即为了更换一批统治者，满足思想家、政客、投机分子以及一切崇拜和觊觎国家权力的人的私欲而去进行一场革命，那怕是一场能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凡的革命。”^③

因此，跟马克思主义对过渡时期政党和国家的作用的看法相反，索列尔表现了一种直接消灭国家的典型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把向没有领导者的企业自由生产者地位过渡的问题当作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④。

作为一个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索列尔的所有这些论点使他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思想 and 理论领袖；这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在法国、而更多是在意大利有着大量的信徒。尽管索列尔对待

① 索列尔：《论暴力》，第95—96页。

② 同上书，第152页。

③ 同上书，第158—159页。

④ 同上书，第237页。

正統派思想采取了极其尖銳的批判态度，但他始終未能深刻地掌握历史发展的問題；而在他的批判观察上表现出他在相当程度上不懂馬克思的历史观。因此，他批評馬克思过分相信黑格尔所主張的历史发展“受神秘的宇宙精神力量的影响”^①的思想，但是这种批評根本沒有打中問題的本质。索列尔站在典型的經驗論的立場上，认为馬克思“把社会机构主要不看作是經驗提供的东西，而看作是神秘的历史力量的作用；在对过去所作的科学研究揭明了宇宙精神的現代作用方式——但并未确定这种作用方式是否持久——之后，並沒有出現什么受到历史驗證的实例”^②。

在索列尔的全部著作中都表现出他对唯物主义和辯证法关于现实的观点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他的著作也就是形形色色的影响的汇合物，实质上是折衷主义的东西。有蒲魯东的互助論和工团主义思想，有馬克思的階級斗争和自由生产者联合組織的观点，也有柏格森的作为有机整体的进化观，以至尼采的对民主主义和凡人主义的批判——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索列尔的作品中找到，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也就产生了不同的作用。索列尔本人在晚年曾以激动的心情論述列宁和布尔什維克的革命^③（虽然这次革命是与索列尔完全相反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产物），可是索列尔的許多追随者不久以后都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狂热信徒。

在他的影响下，本世紀初就已經开始形成了工团主义运动，这种运动是与組織成任何一种类型政党的无产阶级的階級运动相对立的。1907年4月3日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国际工团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当时工团主义运动的一些最知名的人物：于伯特·拉加尔德勒、維克多·格里福斯、阿尔图諾·拉布里奧拉、罗

① 索列尔：《进步的幻想》，1921年巴黎法文（第三）版，第373頁。

② 同上书，第375頁。

③ 参看《进步的幻想》一书第三版（1921年巴黎版）第382—384頁，以及《論暴力》一书第四版，在这一版里补充了一些对列宁的辯护。

伯特·米歇尔、鮑里斯·克里切夫斯基。会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登載了这些人的报告摘要；在那里可以看到他們同索列尔的論点的一致性。阿尔图諾·拉布里奧拉对工团主义作了如下的概括：“1. 政党，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机器，它是一种不同于阶级的东西；2. 社会主义的发展沿着另一条道路，而不是議會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道路。如果好好考虑一下，整个工团主义就是这样。”^① 拉加尔德勒、米歇尔以及其他一些人正是由于批判民主主义和議會主义而背棄了索列尔的某些基本思想，很快就倒向了法西斯主义。

三 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

意大利革命工人运动的开始可以从第一国际时期算起。在巴枯宁主义的强烈影响下，在当局残酷流放的条件下，这一运动日漸集聚了力量，到了上一世紀末期，不仅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强了，而且也建立了統一的社会主义政党（1892年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这个党在1893年命名为意大利社会党。在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中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下，意大利社会党很快就分裂为：极右派（列·比索拉蒂、伊·波諾米、卡勒帕），无政府工团主义派（阿尔图諾·拉布里奧拉、恩·費利）和中派（菲·屠拉梯、特雷維斯）。墨索里尼和他的党羽成立了一个左派，这一派在大战开始时由于代表了干涉主义的立場并同意大利帝国主义进行合作而被开除出党^②。

^① 《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1908年巴黎法文版，第13—14頁。在同一本小册子里于·拉加尔德勒是用这样的方式表示同一种看法的：“假如說阶级斗争就代表全部社会主义，那末可以說全部社会主义就寓于工团主义之中，因为在工团主义之外就沒有阶级斗争。”（同上书，第3頁）

^② 关于迄至本世紀初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历史发展概况，参看罗·米歇尔著《意大利馬克思主义史》（1907年德文版，附詳細书刊索引）一书。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1904)

正像法国的工人运动和馬克思主义产生了拉法格一样，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和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队伍里造就了**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作为羅馬的一位大学教授，他的思想演变过程如下：开始是信奉康德的先驗哲学，歷經海尔巴特和黑格尔的观点，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已經傾向于社会主义，并在对馬克思主义作了研究之后，他果敢地同自己过去的唯心主义思想作了决裂，成为一名极其淵博的、具有高度修养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作为馬克思主义者的拉布里奥拉，写出了以下一些著作：《共产党宣言回忆》(1895年)，論文《論历史唯物主义》(1896年)，《社会主义和哲学概論》(1898年)，《从一个世紀到另一个世紀》(1925年)。

正像恩格斯在一封信里所說，談到拉布里奥拉就意味着談到“一位十分彻底的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些論著的特色，就是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各种历史問題作了全面而独到的研究。拉布里奥拉通过这一工作向意大利的广大社会主义者大量介紹和普及了馬克思主义。

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也包括对待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拉布里奥拉跟第二国际的多数馬克思主义者一样，采取了唯一可能的馬克思主义的立場。恩格斯在給考茨基的一封信(1891年2月23日)里談到有人主張《新时代》杂志应当受到檢查的时候，曾經用諷刺的口吻指出：这种光輝的思想，是要把从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者法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德国社会主义科学，置于党的領導自身制訂的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控制之下。与此相像，拉布里奥拉在他的那篇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論著中写道：“我承认別人有权——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切有关党的政治立場問題上采取严厉的、哪怕是专制的态度。但是，如果仅仅由于他們是同志就承认

他們在科學問題上有法官的權威，那是不行的！——科學永遠都不能建立在多數贊成的基礎上，即使在未來的國家里也是如此。”^①

可以說，拉布里奧拉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所有重大問題都有深刻的理解，他不僅對於歷史發展的總的概念的運用是準確的，而且還看到了對複雜的歷史現象作出有效的唯物主義分析所不可缺少的某些重要環節；他的見解有時多少有些出入，但並不總是這樣。

當時出現過一個爭論問題——究竟是要倫理社會主義還是要科學社會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當時的新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採取了把康德同馬克思聯結在一起的斷然形式；拉布里奧拉在這個問題上毫不动摇地指出，基本的倫理學問題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政治問題：“從此以後，倫理學和理想主義就在於：使科學思維為無產階級服務。如果這種倫理學對於那些敏感而常常又是神經質的和愚蠢的人來說顯得不够道德的話，那就讓他們到偉大的傳教士斯賓塞那里去告貸利他主義去吧。他會給他們一個含糊其辭而又枯燥無味的定義的，這樣就該滿意了吧！”^②

拉布里奧拉卓有成效地批判了因素論，強調指出，這是經驗論者的觀點，他們注意到複雜的歷史現象中的個別因素，並認為其中的個別因素是了解歷史發展的關鍵。相反，“社會是一個複雜的整體”^③，它的形成和變化是極其繁復的。那些認為從一個方面把握經濟的形式和樣態，而從另一個方面把握諸如法權、政治、習俗等等就感到滿足的人，是在抽象地看待事物。對待歷史，需要把它當作一個社會有機體來了解。“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社會生活的統一整體。經濟本身融合在這個過程的巨流中，它出現在多種多樣

① 引自卡·沃倫德爾：《康德和馬克思》，1926年杜賓根德文版，第219頁。

② 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唯物史觀論文集》，1928年巴黎法文版，第78頁。在這個論文集中編入了以下各篇著作：《共產黨宣言回憶》，《論歷史唯物主義》，《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

③ 安·拉布里奧拉：《唯物史觀論文集》，第79頁。

形态的阶段上,表现为其他一切的基础。所以,問題并不是像我們的論敌所設想的那樣,从抽象地孤立的所謂經濟因素引伸到其他各种因素上去,而首先是应当对經濟作历史的了解,并通过經濟的变化來說明其他各种变化。”^①

在上述分析中,拉布里奧拉以独到的方式強調指出一个对于馬克思主义分析任何社会現象都有重大意义的方面。首先,拉布里奧拉所強調的是:在社会历史决定論的領域內,因果关系、决定者和受决定者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楚的;而更不是个人心理学的主观决定論領域內的問題。其次,問題决不在于把各种杂乱无章的历史現象納入經濟范疇,这方面問題仅仅在于一切历史事实归根到底(恩格斯語)要借助經濟結構來說明。第三,“为了从一定历史的基本結構轉到其整个外部表現,就需要借助于現象和認識的某种**复合体**,即我們可以称之为——在缺少其他适当名詞的情况下——**社会心理学**的东西。我不希望以此暗示有某种幻想的社会心理的存在,也并非暗示把这了解为某种虛假的集体的精神,它似乎可以根据自己的不以个別人的意識、也不以他們的一定的物质关系为轉移的規律而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和显示出来。这是純粹的神秘主义……这种就其本性而言始終是受条件决定的社会心理学,并非所謂人的精神的抽象和一般过程的表現。它永远是各种特殊条件的独特的結構体系。”^②

拉布里奧拉的所有这些努力,使他成为意大利馬克思主义的一位难得的思想家,他十分深刻地掌握了唯物史观,从而使它成了自己的科学的思想方法^③。

① 安·拉布里奧拉:《唯物史观論文集》,第91頁。

② 同上书,第120、122頁。另外可以參看該书論述這一問題的第247頁。

③ 同拉布里奧拉一起,作为馬克思主义者开始活动的还有比較年輕的阿·波基,可是他同巴拉托諾、弗·維斯、克勒斯比在《社会批判》上对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了唯心主义的修正。貝·克罗齐在他从事理論活动的初期也曾受过拉布里奧拉的影响。

第二章 德国的馬克思主义 和修正主义

俾斯麦实施了反社会主义者法令以后，并没有能阻止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处于非法地位的党，获得了愈来愈多的拥护者。德国的民族資本也蓬勃发展，使德国迅速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德国必然渴望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勾当中分得一定的地盘。

在这同一个时期，在巴黎成立了第二国际。正值世界博覽会举行之际，有两个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开幕：一个是可能派召开的，另一个是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前者垮台了，在后者的会议上成立了第二国际（1889年），第二国际在一切問題上基本上坚持了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国际直到1900年还没有建立常設的中心。国际的每一个支部都是独立自主的，但是有义务按照它們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貫徹执行代表大会的決議。只是到了1900年，才在布魯塞尔設立社会主义国际局，但是，就連这个机构也不是第二国际的执行机关（当时的主席是艾·王德威尔得，書記是凱·胡斯曼）。

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出，恩格斯清楚地知道，在如此波瀾壯闊、分支繁多的革命运动和革命过程中，不可能由一个中心来实行权威的領導；另一方面，無論是他或是馬克思，都从来不曾打算充当无上的权威来一貫提出現成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決議，他們总是想在社会主义者爭取实现历史发展內在趨勢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成为他們真誠的同志和顧問。

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取得合法地位，就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

通过了新的綱領(1891年)。恩格斯对考茨基起草的这个綱領草案在階級斗争、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等問題上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观点,提出了尖銳的意見。十年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的分裂,这时已略現端倪。在那些虽然犯有种种錯誤、但仍然坚持革命斗争的立場并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異常器重的革命运动老战士中,包括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

威廉·李卜克內西(1826—1900)不是一个以理論著述著称的人物,但是他多年的积极工作,对德国和欧洲工人运动作出了許多貢獻。李卜克內西是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以后在倫敦流亡期間是馬克思的好朋友,后来,同倍倍尔一起,創立了爱森納赫工人党,并且都是該党在德国議會中的第一批議員。李卜克內西是《前进报》的主編之一;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如:《知識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識》(1872年),《論土地問題》(1876年),《法国革命史》(1890年),《罗伯特·欧文》(1892年)和《回忆卡尔·馬克思》(1896年)。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

奥古斯特·倍倍尔作为一个政治家,具有更大的影响,他在各个方面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著名的政治領導者、杰出的演說家和彻底的革命者。除了《德国帝国議會和地方議会的議會活动和社会民主党》(1876—1893年),《基督教和社会主义》(1892年),《沙利·傅立叶》(1888年),《社会民主党和普选权》(1895年)和《自傳》(1910—1914年)等著作以外,倍倍尔还写了一本在工人运动中流傳极广的书《妇女和社会主义》(1883年)。倍倍尔根据大量文献資料,指出了社会主义者对待妇女解放問題的基本态度,以及妇女在社会上受压迫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原因)。

当修正主义一露头,倍倍尔就尖銳地反对伯恩施坦的論点,并根据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因素指出这种論点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倍

倍尔不是一个理論家，也沒有向前推进馬克思主义的理論，但是这里有必要至少談一談他对某些問題的一些看法，因为這些問題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不仅被弄得混乱不清，而且被弄得与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意图截然相反。

首先，倍倍尔十分清楚地向伯恩斯坦指出，他在无产階級貧困化理論和所謂个体資本縮减理論等方面对馬克思的批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倍倍尔援引了馬克思的完全相反的論断得出結論說：“可見，这里又十分清楚地表明，資本主义企图长期压迫工人階級的趋势遭到了回击，工人正在組織起来，并在共同斗争中迫使資产階級作出让步。”^① 由此可見，倍倍尔坚持的这种明确的观点，不仅不与馬克思的分析发生矛盾，而且符合現代社会的整个发展状况，即工人階級的处境正在改善。倍倍尔得出結論說：“的确，大部分工人的状况有了改善，絕對地說，同过去相比有了提高；这种改善同統治階級过去和現在的状况相比，是不是也有相对的改进？对这个問題，若不作进一步的探討，不能到处都作肯定的答复。”^②

因此，現代斯大林主义思想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不顾大批国家在經濟上已經有了更大的进步，仍然教条主义地坚持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的观点。

倍倍尔在这场爭論中作了出色論述的另一个問題，就是社会主义者之間思想自由的問題。当时某些修正主义者大叫大嚷地指責宗教裁判和教条主义，倍倍尔对此发表了一种無論在夺取政权阶段或是在革命胜利后的阶段都能促进社会主义运动順利发展的唯一可行的主張。他写道：“宗教裁判必須先要有教条。然而，如果說有一个党不存在教条，那末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如果說有人坚决反对并从我們的头脑中坚决清除教条主义，那末这就是馬克思

① 倍倍尔：《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立場的攻击》。《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文集，1958年薩格勒布塞文版，第364頁。

② 同上书，第367頁。

和恩格斯。他們也就是今天在某些方面被人們津津乐道地称作教条主义代表者的人。可見，在我們这里沒有教条，因而也不存在宗教裁判。如果一个党按照綱領，把要求現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取消限制思想发表的一切障碍当作自己的首要要求之一，可是它向現存社会提出的这种要求竟不适用于本党同志，这岂不是陷入了惊人的自相矛盾的境地。批評的权利是一項不容置疑的公认原則。批評對我們來說可能是不愉快的。受批評永远是不愉快的，因为无論是人或是政党都不会一下子就改变自己的观点。这里，在糾正个人的意見、甚至广大群众的意見之前，必須先出現一系列的情况。批評自由是我們生活的准則，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空气。”^①

請看，馬克思主义、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这些基本前提，在第三国际和斯大林主义时期竟被篡改和拋棄到了什么地步！那种认为政治中心的观点在一切政治、学术甚至艺术問題上都成了不可动搖的決定的主張，竟根深蒂固地成了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的“证据”，同时成了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那些以自己的活动隆重宣布了未来的自由个性的人們——党性原則的最高表現！

当人們宣布武装革命是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原理时，他們也是在坚持一种与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以及包括列宁在內的一切偉大的革命家的想法截然相反的观点。与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相反，倍倍尔表述了辯证的革命思想。他在上述同一著作中写道：“設想在我們党内有人企图制造革命，以便能更好地、更輕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是荒唐的。并不是革命者在制造革命，无論何时何地都是反动派在制造革命。偉大的歌德就曾向他的埃克尔曼說过，如果爆发革命，那只能怪政府。我可以从作家那里給你們举出数十处例证，直到引用老莫姆森的話，他

^① 倍倍尔：《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立場的攻击》。《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文集，第338頁。

在羅馬史中曾非常精彩地說明：当某一政府表明它已經无力解决有关大部分公民利益的任务时，**爆发革命便是理所当然的事**，那时，过錯不在于起义者，而在于暴力挑衅者。党內的同志們！在我們德国，資产階級本身也是始終根据这一原則出发的。”^①

* * *

倍倍尔的这一場論战，就已經把我們带入了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十九世紀末是修正主义滋生的时期，修正主义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后果。

这一現象的产生，也和一般現象一样，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十九世紀后半期和二十世紀初，資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的上升时期。工人階級在許多国家里，特別在德国，取得了議會斗争的显著成績，同时本身也不断壮大。无产階級斗争的規模日益扩大，处于合法地位的党日益适应于議會方式的政治斗争。上述种种情况必然会在某些无产階級思想家（特别是小資产階級出身的思想家，但也有无产階級出身的思想家）的心理和观念上产生影响（因为客观环境如果比較长期地使人过着相对和平的、經濟上小康的生活并在議會中取得成績，它大体上就可以使人們或者成为革命者，或者成为小資产者）。在这些人中，有的就开始宣傳改良主义，宣傳只进行和平的議會斗争的要求，宣傳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渐进性；他們把这些都当作基本的理論口号，而不是仅仅看作現有的可能性之一。

現代社会的結構，它的錯綜复杂的組成部分和发展趋势，实现某些局部性目的的多种可能性（局部性的目的可能掩盖当时运动的真正的基本目的）——这一切过去和現在都是在客观上可能使人們对斗争的目的和方法产生不同理解的因素。至于某一个人

^① 倍倍尔：《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立場的攻击》。《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文集，第377頁。

主要傾向于修正主义观点还是傾向于革命观点，这当然不仅取决于客观影响，而且取决于他在該社会的主观状况，即个人的經歷、品质，在一定时机明确地区分主次、区分历史发展的主要关键和权宜之計的能力。这一切也就是偉大的革命家不同于其他政治家的那些主观品质。

没有一个发达的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避免这一場論战和內部的原則分裂。法国的可能派和饒勒斯分子（他們同时支持內閣主义），意大利的比索拉蒂右派和墨索里尼左派，英国的費边社和工党分子^①，德国的伯恩施坦分子，俄国的別尔嘉也夫、司徒卢威、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等——所有这些人都是資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結構和內部矛盾的同样条件的反映。不言而喻，坚持上述的社会主义論点和上述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張，就必然会同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一般概念发生冲突。因此，几乎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提出了“回到康德那里去”和把馬克思的哲学同康德的哲学結合起来的要求，以代替馬克思主义中以独特方式包含的、經過提炼的黑格尔的因素。

“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个口号，实际上也是当时資产階級哲学中占統治地位的偏見之一。

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康德是可以用来表达十九世紀后半叶資产階級意識的十分理想的哲学家。在当时資产階級社会蓬勃上升的乐观的时期，資产階級分子还没有經受到他們在数十年后、即在

^① 費边社是以維伯夫妇为首的一群知識分子在1883年創立的社会主义团体，其参加者还有蕭伯納和哈·威尔斯。他們的观点实质上是改良主义性质的，同时企图把英国資产階級自由主义同社会主义結合起来；他們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英国的边沁主义、达尔文主义、斯宾塞的进化論和現代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他們作为工党运动中的一派，始終是一个人数較少的排他性的集团，但对工党分子的改良主义政策和观点起着重大影响。英国社会主义者亨·海德門、貝尔福特-巴克斯、威·莫里斯后来都采取了类似的、主要是修正主义的立場。当时由凱尔-哈第、拉·麦克唐納等人領導的工党运动，后来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社会大震动后所飽受的，深感本身存在的孤立和自己的社会沒有出路的那种内部危机。与十九世紀后半叶资产阶级制度的种种胜利(哪怕是妥协的胜利)和相对稳定相适应，资产阶级分子在多数情况下习惯于产生自滿的感觉。他們的“自我”，他們的自我意識早已从1848年不光彩的日子中全部恢复过来，同时也沒有明显的客观理由，可以使这种自我意識发生重大的疑虑，或使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初期的信念发生动摇。

虽然当时他們就已經激烈反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但对于自己的先驅者所夸耀的人道主义偉大理想，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但是，他們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理想的发展方向，絕不是使黑格尔的哲学进一步发展，因为黑格尔直接引出了馬克思。另一方面，自从黑格尔建立起完整的体系之后，要想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繼續彻底发展辯证法，在理論上也是不可能的。可是給它奠定唯物主义的基础，則又意味着不再处于资产阶级哲学陣营之内和否定本身的社会基础。

这种思想(我們可以有条件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的本质的特征，正在于它無論在理論上或实践上，实质上都不意味着要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社会界限和思想界限，而至多只是提出一种十分理想的要求：通过加强国家的作用，使国家作为某种“中立”的因素而負有解放的使命，以緩和阶级矛盾。当时，这种傾向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表現，就是所謂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納、古·施穆勒、罗·布倫坦諾等)，他們实质上是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代表。

鉴于以上种种理由，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六十年代李普曼的号召不能是“回到黑格尔那里去”，而只能是“回到康德那里去”。康德(他在发展哲学知識中的历史功績是偉大的、无可爭辯的)是一个在主观方面、思想方面甚至社会方面仍然符合要求的理想人物。

当时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把康德的哲学看作是万宝全书，是唯一的科学的基础，是“哲学所经历的最重要的变革”^①，继康德之后，哲学家“原則上沒有創造出任何新的东西”^②，——这就是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的創始人以激动的心情所写的話。

特别是新康德主义的馬堡学派，对于修正主义的发展有过相当大的影响。这一学派的創始人柯亨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倫理学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原則不能以唯物主义为基础，而应当以倫理学唯心主义为基础，因此，康德由于創立了倫理学和絕對命令而成了德国社会主义的鼻祖。如果考虑到他們的先驗唯心主义观点，那末出現上述結論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因为先驗唯心主义观点认为，世界的規律是先驗意識的規律，因此，社会規律不能来自社会现实，而是来自意識本身（那托尔卜）。这一学派的信徒魯·施塔姆列尔、弗·施陶丁格尔、卡·沃倫德尔等人直接以康德主义的先驗原則为基础，力图給馬克思塗上唯心主义的色彩，从而把康德和馬克思結合在一起^③。

① 威廉·文德尔班：《什么是哲学》（序論一），1911年杜宾根德文版，第22頁。

② 威廉·文德尔班：《批判的或进化的方法》（序論二），1911年杜宾根德文版，第100頁。

③ 特別詳盡地論述这一思想的著作有：柯亨对朗格的《唯物主义史》一书所作的《帶有批評性补充意見的前言》（1896年），以及《純意志倫理学》（1904年）；保·那托尔卜的《社会教育学，在共同的基础上意志形成的理論》（1899年），《社会唯心主义》（1920年）；施塔姆列尔的主要著作《从唯物史观看經濟和法》（1896年），《社会主义和基督教》（1920年），在后面这本书中他认为基督教具有更大的意义；施陶丁格尔的《倫理和政治》（1899年），《道德的經濟基础》（1907年），《政治的文化基础》（1914年）。施陶丁格尔尤其主張一种改良主义的論点，认为消費合作社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途徑。在沃倫德尔的著作《康德和馬克思》（1911年）中，可以看到对新康德主义和馬克思主义問題的十分精彩的观点和分析。沃倫德尔这个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馬堡学派的信徒，力图从这种立場出发，把康德和馬克思的观点，特别是在倫理学和社会政治学問題上的观点，融合在一起。除了上述著作外，他还发表了《康德和社会主义》（1900年），《哲学家的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尔》（1920年），《从馬基雅弗利到列宁》（1926年），以及康德的傳記（1911年）和馬克思的傳記（1929年），在後一傳記中，他对馬克思的为人，一般說来，是深表敬仰的。

不能否认,其中某些人曾进行重大的尝试,企图本着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树立新的人性,并且企图把康德和馬克思結合在一起。但是,他們在这一工作中所持的哲学立場和思想立場,直接否认社会主义是历史必然性(必須以人們的約定为前提),否认它是現代历史矛盾和人的积极活动的必然結果,这样,他們也就必然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

这实际上也就是修正主义本身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在德国,格·福尔馬尔1891年在慕尼黑发表的《关于黄金国的演說》,康拉德·施米特評論普列汉諾夫的《論唯物主义的历史》一书的著作和評介姆·克朗能堡的論康德一书(1897年)的文章,以及当时的其他文章,实际上已經开始提出了修正主义。这些著作和文章以不同的方式強調指出,康德是科学的和批判的哲学的最偉大的代表,因而确实有必要用康德的思想来丰富馬克思主义,同时拋棄黑格尔。

路德維希·沃尔特曼(1871—1907)

提出类似論点的,还有路德維希·沃尔特曼,他在《道德意識体系》(1898年)、《达尔文理論和社会主义》(1899年),尤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1900年)一书中,竭力想把康德、馬克思和达尔文結合在一起。他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声称,他的这本书标志着回到康德那里去;他說,馬克思关于科学的思維过程的观点符合于康德的观点,而不符合黑格尔的观点。在他看来,康德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相互之間的关系比想像的还要接近。沃尔特曼在这本书中写道:“对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历史的深入研究,除了使我确信在科学方法問題上馬克思和康德之間要比馬克思和黑格尔之間更加接近得多以外,……还使我深信,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基本上也就意味着回到康德学說那里去,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意識到这种原則联系。”①

这样,在他看来,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实际上等于回到康德那里去。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留給馬克思主义的,只是外部的表現方式,至于內部的思想潮流,实际上是康德的。“但从这些研究中同时可以看出,康德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比以前所想像的要接近得多;如果从另一方面来探索黑格尔哲学遺留給馬克思思想領域的东西,那末这种殘余几乎只涉及外部的表現方式,而內部的思想潮流却完全貫穿着批判的和自然科学的方法。”^②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

修正主义者为了鼓吹自己的观点,創辦了新的《社会主义月刊》,来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新时代》相对抗。当时聚集在《社会主义月刊》周圍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人以外,还有爱·大卫、沃·海涅、保·康普夫迈尔、庫·爱斯內以及大部分奧地利馬克思主义者。但是整个运动却以**爱德华·伯恩施坦**而得名。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恩格斯的朋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他于1896—1898年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問題》的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紧接着在其信徒的慫恿下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1899年);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社会学、經济学和政治学上詳尽无遺地表述了对于整个运动的主張。

伯恩施坦的野心无疑超过了他的理論能力,特别是在有关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基础即哲学問題上,更是如此。伯恩施坦同新康德主义者一样,为了想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倫理公設,而不是某种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結果,他对唯物主义和辯证法下了不正确的定义,认为辯证法是馬克思的錯誤的根源。

他說,“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就是要肯定一切事件的必然

① 沃尔特曼:《历史唯物主义》,1900年杜塞尔多夫德文版,第296—297頁。

② 同上书,第321頁。

性”，“既然物质运动决定着思想的形态和意志的方向，那末思想的形态、意志的方向以及人间的一切事件都是必然的”^①。伯恩斯坦从这个错误的前提出发，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后期改变了这种观点，使思想、意识、意志具有了更重要的地位。伯恩斯坦由此得出一个武断的结论，认为不能重新回到他们的早期阶段，并对全部观念作一元论的解释。他没有分清“决定性”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竟断然认为：“哲学的或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符合决定论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却不是如此，它并不认为各国人民生活的经济基础对于生活方式具有任何无条件的决定性的影响”^②。

伯恩斯坦的这种解释，没有看到决定性并不等于绝对的必然性和宿命论。他利用这种解释，除了批判辩证法之外，还企图抛弃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根本因素，以及有关当代历史发展的结论。

伯恩斯坦认为，阻碍彻底科学地分析历史过程的另一个因素，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隐患，是妨碍对事物作任何彻底观察的圈套”^③。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伯恩斯坦对于黑格尔在资产阶级哲学和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的看法，完全是随着时代风尚人云亦云。某些哲学家推崇黑格尔，主要是因为他的体系宏伟完备、他的分析精辟细致等等，但是黑格尔哲学的灵魂，即他的辩证法，却被他们抛弃了。他们都用康德的批判的方法来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相抗衡。因此，伯恩斯坦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中的歧义和矛盾，“根源在于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辩证法。因为，辩证法的‘肯定——否定，否定——肯定’代替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文集，1958年萨格勒布塞文版，第35页；中译本参阅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页。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文集，第45页。

③ 同上书，第59页；参阅中译本，第26页。

了‘肯定——肯定，否定——否定’，它的对立面的相互轉化和由量到质的轉化，以及其他辯证的妙法，始終妨碍对所認識的变动的意义作充分的估計”^①。

毫無疑問，在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几乎在每一个阶段上，都会由于对辯证法作刻板地了解而使得問題庸俗化和公式化。但是，無論过去和現在，这种过錯的原因都不在于辯证法，而在于那些人沒有充分領会黑格尔和馬克思的精神，把辯证法用来当作解决一切問題的普遍公式和泛泛空談。無論是这些人，或是辯证法的反对者，以及伯恩施坦，都不了解，直到今天，辯证法仍然是对事物（包括思維）的現實过程的最深刻的領会和認識，是任何先天的先驗的方法或任何分析的方法所不能取代或替補的（所謂分析法只不过是任何方法的一种必要因素）。因此，毫不奇怪地、而是理所当然地可以得出下列形式邏輯的推断：伯恩施坦在面对着改良还是不改良（即革命）的选择时，只是确定了一种可能性，而且是前一种可能性。同样，他还认为，由于这两个概念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都使用，因此他們在这方面不是貫徹始終的，而是前后矛盾的。他沒有看到，馬克思主义理論中的这种表面的“妥协”和“二元論”，并不是运用某种人为的辯证公式的結果，它实际上是历史实践本身的“二元論”在思想上的真实反映^②。这也使伯恩施坦片面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文集，第57—58頁；參閱中譯本第25頁。

^② 伯恩施坦特別是在馬克思对資本积累趋势的分析中，看到了这种表面上的二元論。他写道：“在我看来，这一章（指关于資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一章。——作者注）表現了二元論，这种二元論貫穿于馬克思的全部宏偉巨著中，在其他地方也有不那么突出的表現。这个二元論就是：著作一方面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希望证明早在起稿之前就已存在的命題；著作所依据的公式，早已确定了結論，而这个結論本来是应该在发展中求得的。在这里，回到《共产党宣言》去就表明，馬克思的体系中确实存在空想主义的殘余。”（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文集，第222—223頁；參閱中譯本，第125頁）罗·卢森堡对此作了正确的答复，她說：“但是，馬克思的这种‘二元論’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資本主义的現

地宣傳改良主义。既然他认为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完成偉大事业，不是由于依靠了“黑格尔辯证法的帮助，而是由于違背了这一辯证法”^③，那末我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說，伯恩施坦本人之所以犯种种片面性的錯誤，正是因为他不了解现实的辯证法的深刻意义。

不能否认，伯恩施坦曾敏銳地觉察到了某些因素，特别是有关当时經濟問題的某些因素，并反对了如工人阶级絕對貧困化、中小行业和中小私有者絕對减少等論点。他的这些观点对于防止某种片面夸大是有意义的。但是，倍倍尔、考茨基等人曾明确地向他证明，这并不是馬克思的观点，因此伯恩施坦是在无的放矢。

伯恩施坦沒有从这些事实中作出相应的、馬克思主义的、有关革命斗争策略的結論，却利用这些分析来证明：由于財富的增加和組織的严密，资本主义已經能够避免其主要的禍害——經濟危机。他的这一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該章結尾部分的观点上：“如果意想不到的**外部**事件(着重号是伯恩施坦自己加的。——作者注)不引起普遍的危机(如上所述，这是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的)，那末，便沒有确凿的理由根据純粹經濟的原因来断定普遍危机很快即将来临。地方性的和局部性的蕭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普遍的停滯，以今天世界市場的組織和扩展来看，特别是从**食品生产大发展**来看，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后一現象对于我們的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可能再也沒有別的因素比地租的下降和食品价格的下落对于緩和商业危机和防止商业危机增长更有貢獻的了。”^④

在的二元論，是資本和劳动、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論，它是資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二元論——資本主义的阶级对立——的宏偉的科学反映。”(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参閱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2 頁)

③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文集，第 69 頁；中譯本第 37 頁。

④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文集，第 120 頁；参閱中譯本，第 71—72 頁。

伯恩施坦的主要批判者，特别是罗·卢森堡，已经充分地指明，而且历史实践本身也最终表明，伯恩施坦的这一结论所依据的对现状的分析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伯恩施坦在理论上究竟超过了馬克思的“唯心主义”和“妥协性”多少！

鉴于上述这些理由，伯恩施坦附和当时的工会活动者^① 和合作社会主义者的主张，特别强调工团和消费合作社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意义。这种观点整个说来当然是在号召改良，而革命则只是一种不成文法，它只有在我們自己放棄呼吸的自然权利时，才不再存在。伯恩施坦认为，觉察到这一点的人正在日益增多。“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拋棄确实已经过时的空話，并按照它今天的本来面貌，即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的姿态出現，那末这些人的影响将比今天要大得多。”^②

根据以上种种論点，可以完全合乎邏輯地得出結論：伯恩施坦并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而仅仅把它看作是从人类存在的人性冲动中产生的倫理要求。他在答复罗·卢森堡对他的批評时，断然地說，“虽然她的論证作出了某种惊人的邏輯飞跃，結果把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武断地完全等同起来，但是她多多少少触及了事情的本质，这就是：我确实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它的內在經濟的必然性，相反的，倒是认为沒有可能也沒

^① 工会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卡·列金、罗·施米特、保·翁布萊特等也是修正主义者，他們后来同伯恩施坦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

^②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文集，第209—210頁；参閱中譯本第112頁。紧接着这一論点之后，伯恩施坦又补充說到有关革命的論点，他认为革命是思辨的权利，結合着他對改良的基本观点来看，这种权利只不过是空洞的宣言。“并不是說我們賭咒否认所謂的革命权利，这純粹是思辨的权利，它不能在任何宪法上明文規定，也不能为世上任何法律所禁止；在我們放棄了呼吸的权利、从而自然規律迫使我們死去以前，这种权利將始終存在。这种不成文法是不能制定的，它不因我們轉到改良的立場而受到任何影响，正如正当防卫的权利不因我們制定了調解人身和財產爭議的法律而遭到廢止一样。”（同上书，第210頁；参閱中譯本，第112—113頁。）

有必要給社会主义奠定純粹唯物主义的基础。”^①

不仅如此，伯恩施坦在当时，即在德国已經成为发达的工业国，而社会民主党已經拥有二十万党员的时候，还认为工人阶级尚未成熟到可以取得政权。当然，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工人并没有像工人运动发展的初期那样地赤貧化，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偏見和弱点^②。实际的缺点和困难，始終是應該估計到的。但是，由此得出結論說，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夺取政权尚且为时过早，这只能使革命力量解除武装。

尽管伯恩施坦提出了个别正确的見解，但在一切根本問題上他是錯的。他沒有足够的理論修养，不能从一个較短时期所特有的某些个别过程中，看出它們的总的綫索。他在理論上沒有弄清哲学、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經濟学的許多基本問題，只看到种种困难和复杂現象，以致被这些困难和复杂現象弄得理論上束手无策，混淆是非，并倒向改良主义。

当时起来尖銳地反对伯恩施坦这些观点的馬克思主义者，是正确的。其中站在最前列的有：罗·卢森堡、普列汉諾夫、梅林、倍倍尔、考茨基等。伯恩施坦对黑格尔辯证法的批判，当然意味着回到其他的哲学体系上去，首先是回到康德的体系上去，并想用这些哲学体系来修正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在这本书中还没有从这一立場出发来論述哲学观点，但这一工作已經由他的信徒根据当时資产阶级哲学中占統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学派的理論彻底完成了。

这个过程从沃尔特曼、施米特起，經過鮑威尔和阿德勒，正如我們以后还要談到的，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在革命实践方面，伯恩施坦拋棄了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則：否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文集，第224頁；参閱中譯本，第127頁。

② 同上书，第230頁；参閱中譯本，第132—133頁。

定革命，否定无产階級专政，否定有关国家消亡的全部問題；从而在資本主义第一次总危机酝酿时期起了瓦解革命力量和破坏革命过程的作用。伯恩施坦主張一般的民主主义并反对“布朗基主义”，可是他同其他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起投票贊成軍事撥款并敌視布尔什維克革命，从而使一个社会主义組織和一种社会主义政策遭到空前的破产，他的行为也帮助了德国反革命的胜利^①。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占有主导地位，所以德国修正主义，特别是伯恩施坦，也就具有国际影响。无怪乎德国修正主义的出現也遭到其他国家馬克思主义者的反击，拉法格、普列汉諾夫、卢森堡、潘涅庫克都对它进行过批判。在德国馬克思主义者中，除了倍倍尔以外，当时特別突出的两个著名人物是梅林和考茨基。

弗兰茨·梅林(1846—1919)

像梅林这样具有高度的文化、淵博的知識、广闊的眼界、正直的人格、坚定的革命性和非凡的風格的人，不仅在馬克思主义者中，而且在整个学术界中，都是少見的。梅林誕生在波美拉尼亚一个为普魯士王朝服务的官吏的家庭里，他在耶拿学习哲学和文学史，毕业后从事新聞工作。

梅林与同时代同境遇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样，早期埋头研究普魯士王国和容克地主的历史和文化古籍，从而接近資产階級民主

^① 現代企图为伯恩施坦路綫和观点进行論证和辯护的人之中，有一个叫彼得·盖伊；他写了一本书，名叫《民主社会主义的抉擇》(1952年紐約英文版，德譯本1954年紐倫堡版)。他在书中认为社会主义面临的基本抉擇是：民主道路还是暴力？这是典型的非辯证的提問題方法，因为無論選擇哪一方面，都会陷入一般的空論。正是这种提法曾使伯恩施坦、考茨基及其同道对德国革命和布尔什維克的俄国作出了完全非馬克思主义的反历史的評價。盖伊最后认为有必要訂正修正主义的某些不够明确的原理，如它的哲学基础(因为战争和大危机动搖了它的乐观主义)和策略(这种策略虽然基本上是民主議會制的，但并不是始終都很明确)；其实，他在这里提出了早已解决的要求。

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坚定战士——伊·雅科比、格·魏斯、保·辛格尔及其刊物《天平》。

德国特殊的发展道路造成了“来自上层的”革命，即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妥协，同时也使自由主义分子遭到破产。只有一个党代表着历史前途，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俾斯麦曾企图用反社会主义者法令来阻止它发展，但最后不得不认输。

事态的整个发展过程使爱好自由的、正直诚实的、学识丰富的梅林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梅林在八十年代末就已经参加了《新时代》的工作，1891年起成为编辑之一。这样就开始了梅林工作的新阶段。他很快成了德国的以及世界的文学史、哲学史和历史学领域中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工作者之一。

梅林的主要精力没有花在理论方面，而花在历史方面。他的精辟的历史见解、渊博的文化知识和熟练掌握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产生了非凡的成果。他的雄劲有力的笔触和优美流畅的文体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他研究了普鲁士历史、普鲁士反动的容克地主阶级、霍亨索伦王室的传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文学史和哲学史。他论述这些问题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科学地研究和解释上述这些历史现象的最有价值的依据。

《关于莱辛的传说》(1893年)当然是梅林的最成功的科学分析之一。书中对莱辛本人以及他在当时德国和欧洲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作了相当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书中清晰地说明了当时德国同其他西欧国家相比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落后，以及由此而在文学运动、特别是在当时莱辛的著作中所反映出的各种矛盾和特点。必须着重指出，梅林在这本书中以及在其他的专著中(如关于席勒、海涅等人的专著)，都首先着重解释这些文学现象，而不是分析作品的风格，因为后者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毕竟是第二位的任务。但是，对风格的分析，如果它不是纯粹形式上的和形式主义的分析，就必然需要以梅林顺利完成的

准备工作作为先决条件^①。

梅林的另一一些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篇幅巨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共四卷（1897—1898年）；《中世紀末以来的德国史》（1910—1911年）。这些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在科学上研究和評述这些时期的基本資料。

梅林特別精通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历史，因而能够出版《卡·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薩尔的著作遗产》（共四卷，1902年），并写了序言，作了精辟的研究分析；他还写了《馬克思傳》（1918年）。在这些著作中，梅林善于根据丰富的內容，以肯定的笔調，非常卓越地概括了当时各种錯綜复杂的历史事件。

除了大部头的著作以外，还应该提到他写的篇幅較小的关于軍国主义和战争問題的文集，以及哲学史的論著。

尽管梅林存在一些缺点和錯誤（但同当时其他的馬克思主义思想領袖比起来要少得多，关于这一点我們以后还会談到），但是他所写的大量文学評論著作，将永远是最杰出的馬克思主义思想成果之一。要知道，当时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各种必要的条件来从事和平的学术工作，他們还处在为爭取社会主义而进行尖銳的政治斗争的时期，这一斗争不仅每时每刻会提出一些必須直接完成的任务，而且往往使馬克思主义的最优秀的思想家遭到牺牲^②。

正如馬克思主义者过去已經指出过的，梅林在历史分析中，对

① 梅林的文学評論著作后来汇集出版，名叫《文学史論文集》，第一卷从卡德龙到海涅，第二卷从赫伯尔到高尔基。

② 因此 1916 年卢森堡在梅林七十寿辰时給他的賀信中对梅林生平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她写道：“您从資产階級陣营中挽救了过去資产階級文化財富的遺產，并把它交給被剝夺社会继承权的人的陣营。您的著作和文章使德国无产階級不但密切接触到古典哲学，而且接触到古典文学，不但接触到康德和黑格尔，而且接触到萊辛、席勒和歌德。您的神奇的笔所写的每一行字，都教导我国工人：社会主义不仅是生活問題，而且是文化运动，是偉大而自豪的世界观。”（轉引自魯·林道：《紀念弗兰茨·梅林誕生一百周年（1946年2月27日）》，1946年柏林德文版，第11頁）

拉薩尔和巴枯宁的生平和活动作了不正确的評价。他觉得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們俩人似乎过于苛刻，因而认为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他們的名誉。后来发现的拉薩尔同俾斯麦的通信以及有关巴枯宁活动的文件都证明，正确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梅林。

梅林在研究哲学問題和分析哲学本身时，陷入了某种馬克思主义的唯社会学观点。他反对那种把哲学仅仅看作是哲学家和天才人物的主观創造的唯心主义观念，并对哲学同社会結構之間的某些关系作了非常精彩的分析（如对古代、康德、斯宾諾莎、費希特、黑格尔、十九世紀后半叶的資產階級哲学、新康德主义等），但他对哲学的理解过于片面，仅仅把它看作是意識形态的表現（这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中占統治地位的观点）。梅林主要只是坚持：“每一种哲学都是根据某一民族或某一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需要的深刻根源在于当时的經濟生产过程之中”，哲学一旦产生，“它的思想不是由于本身的吸引力，而是作为历史发展的工具而繼續发生作用，历史发展本身又是由經濟生产过程所决定的”^①，由此，梅林很自然地得出了关于一切哲学終結的結論。也就是說，既然哲学仅仅是“階級斗爭在意識形态上的附帶表現，是人們意識到階級斗爭的思想形式之一”，那末，在梅林看来，正如在沒有出現階級斗爭以前不存在哲学一样，“階級斗爭一旦消灭，历史上的那种哲学也将不再存在”^②。

梅林主要是埋头研究历史問題。他认为馬克思的历史观是最重大的理論貢獻；这样，他虽然片面地，但是着重地指出了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其他的唯物主义、首先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区别。他在那本保卫馬克思的观点、反对巴尔特的攻击和歪曲

^① 梅林：《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哲学史論文集》，1931年柏林德文版，第42頁。

^② 梅林：《哲学的本质和时代性》。《哲学史論文集》，第25頁。

的著名小册子《論历史唯物主义》中写道：“那种虽然也是极端錯誤的，但是略为高明的做法，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混为一談。这种唯物主义认为，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也生活在社会中[，因而不仅存在着自然科学，而且存在着社会科学]。其实，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則不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把人看作是有意識地进行活动的自然产物，但没有去研究人的意識在人类社会内部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这样，它一涉及历史領域，就轉变为自己的截然相反的对立面，即极端的唯心主义。它迷信創造历史的偉人的惊人的思想魔力；我們可以提到毕希納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狂热崇拜，以及海克尔在令人可笑地痛恨社会主义者的同时把俾斯麦奉为神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只承认人类社会内部的思想动力。”①

但是，另一方面，在有关一般哲学观念的問題上，梅林錯誤地认为：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基本上也就是馬克思的观念，辯证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毫无区别。因此，他在一篇文章中得出結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停留在費尔巴哈的哲学观点上，如果他們沒有把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領域而使它扩展和深入的話；簡單明了地說，他們在自然科学方面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就像他們在社会科学方面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样。”②

一般地說，梅林不是高明的理論家，但他是好些思想領域的杰出的历史学家。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成就完全超过了理論成就，而

① 梅林：《論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史論文集》，第284頁；中譯本參閱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2頁。（方括号內为原文所有而塞文漏譯之字，下同。——譯者注）梅林的这一著作是作为《关于萊辛的傳說》的附录而出版的。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給梅林的一封著名的信中提到了这一著作，信中对于解釋思想領域中的某些缺点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意見。

② 梅林：《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史論文集》，第337頁。

梅林的主要声望正在这个方面。

尽管梅林的著作中存在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在他对各种人物、理論和时代的具体分析中很少表现),但梅林为正确地评价这些现象发表了卓越的馬克思主义的見解,他一貫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反对理論上和实践上的各种非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不良企图。

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梅林站在战斗的最前列,同样的,他也正确地认清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实际政治活动中的“狄慈根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梅林虽已老迈年高,但毅然决然地站到罗·卢森堡和卡·李卜克内西的一边,譴責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为此,他在七十高龄,仍被捕入獄。他英勇地站在当时德国社会主义的唯一真正革命的派别“斯巴达克联盟”的前列。

梅林的最偉大的贡献,正如已经說过的,是在历史、文学史、哲学史方面。卢卡奇在他論述梅林的一篇卓越的专著中,虽然过于尖锐和过于苛刻地强调了梅林理論观点的某些局限性和錯誤,但在全面评价梅林本人时作出了正确的結論:“梅林也和一般现象一样,带着自己的錯誤和缺点处于第二国际活动領域之内。虽然他对美学原理、文学史的方法論、文艺批評原則及其运用等的解釋,包含着不少严重脱离馬克思主义路綫的錯誤,但是梅林的时期代表着一个只能批判地超过、但不能逾越或抹煞的发展阶段。梅林的高度的文学修养,他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同德国革命傳統的联系,使得他的著作成为每一个想以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认真研究德国文学問題的人的必讀参考书。此外,我們在論述过程中曾一再指出,梅林在反对当时工人运动中的錯誤的机会主义派别时,如何从正当的感情和客观上正确的立場中产生出許多不正确的結論和論点,这些結論和論点尽管有錯誤,但包含着一种比同时代的德国任何其他馬克思主义者都要高明得多的观点的因素和趋势。梅林的革命积极主义,他对艺术中革命的主观积极因素的強調,都标

志着我們的文学理論的重要发展阶段；只有批判地吸收梅林著作中大量有价值的遗产，才能真正克服这个发展阶段的缺点。因此，具体而細致地研究和分析梅林的全部观点，既包括他的方法論，也包括他的个别結論，——这是現代馬克思主义文学理論的一項非常重要的迫切任务，对于德国說来更是如此，因为具体地研究本国的过去，是馬克思主义思想家过去相当忽視的一項重要的刻不容緩的任务。只有批判地克服梅林的缺点，才能創立馬克思主义的德国文学理論和德国文学史。梅林作为第二国际德国支部激进派的重要人物，作为向国际工人輿論解釋德国文学发展史的人物（不管这种解釋包含多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过去和現在都是一个永远具有国际意义的历史人物。”^①

卡尔·考茨基(1850—1938)

卡尔·考茨基的名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作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象征。第二国际的繁荣兴盛使得考茨基声誉大振，同样，第二国际的衰微沒落也意味着考茨基这个德国社会主义和整个第二国际公认的理論領袖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理論成就和重大弱点，最充分地反映在考茨基的身上。

考茨基在漫长的一生中写了許多大小著作。在这方面，我們所感到兴趣的，和通常一样，是那些促进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或損害馬克思主义思想声誉的理論观点，因为它们始終具有广泛的理論或政治意义。

考茨基在七十年代初就已参加社会民主党。1881年在倫敦担任恩格斯的私人秘书；1883年創辦《新时代》（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論刊物），并主持这一刊物直到1917年。考茨基具有旺盛的創作精力和淵博的文化知識，他为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作了許多工作，把

^① 卢卡奇：《弗兰茨·梅林》。《美学史論文集》，1959年文化出版社塞文版，第363—364頁。

它运用到許多科学活动領域，首先是历史和經濟領域。在他的早期活动中所写的著作有：《托馬斯·莫尔及其烏托邦》(1887年)，《卡尔·馬克思的經濟学說》(1887年)，《1789年以来的階級矛盾》(1889年，此书以后再版时改名为《法国革命时期的階級矛盾》)，《爱尔福特綱領》(1892年)和《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驅者》(1894年)，最后这一套著作主要对十六世紀以前早期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上这些著作表明，考茨基善于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运用到各个历史时期和他所研究的各种現象上。

在理論方面，属于这个时期的，还有考茨基的一本最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土地問題》(1899年)。他也是馬克思主义者当中最先全面地研究这个对于社会主义理論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問題的人。当时在这个問題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截然相反的意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兰克福(1894年)和布勒斯劳(1895年)的代表大会上研究了這個問題，但沒有能得出一致的看法。修正主义者福尔馬尔和大卫认为，馬克思忽略了工业和农业发展之間的本質区别，因此他沒有看到，工业发展的規律与农业发展的規律完全不同。工业发展的規律导致集中，而在农业中，小生产同集中的大生产相比，占着优势。

考茨基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为基础来开展研究工作，他认为工业发展的規律已經为馬克思所解决，而农业发展規律毕竟不同于工业发展規律。

考茨基根据大量資料，經過細致分析，得出了一些具有原則意义的重要原理，这也是他对這個問題的理論貢獻。首先，他得出結論說：农业在現代經濟发展中落后的原因，不在于这个經濟部門的經濟因素，而首先在于它的社会因素；农民小地产之得以保存，并不证明它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或显得更加經濟合理，这是資本主义制度下經濟发展和地产的利益的特点所造成的。“根据以上种种，可以得出結論：不应設想在当今社会中可以消灭小地产，或由大地

产来完全排挤小地产。我們已經看到，凡是地产过于集中的地方，都会出現分散的趋势，如果这种趋势碰到太大的障碍，国家本身和大土地占有者都会出来帮助。

但是，大地产的这种努力正好证明，最錯誤不过的一种意見，就是认为小經濟的保存是它能够同大經濟竞争的結果。恰巧相反，小經濟之所以保存，是因为它已經**不再是大經濟的競爭者**，是因为它已經不再作为大經濟也生产的那些农产品的出卖者。凡是資本主义大經濟已經伴随着小經濟而发展起来的地方，小經濟就**不再起这种出卖农产品的作用**。在这里，小經濟就从产品的**出卖者变为大經濟‘生产得过多的’产品的购买者**；而小經濟自己生产得过多的商品，就是大經濟特别需要的一种生产資料——即**劳动力**。

凡是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的地方，大經濟和小經濟就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为条件，正如資本家和无产者互为条件一样，因而小农也就日益具有无产者的性质。”^①

在談到大农业經濟还是小农业經濟具有优越性的問題时，考茨基在分析中明确地认为，“可以心平气和地說，大經濟較之小經濟具有肯定无疑的优越性”^②。他同时也得出結論，认为大經濟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大經濟优越性的发挥抵不上它由于面积辽阔和距离遥远而受到的損失；因此，任何超过这个界限繼續扩大土地面积的行动，都会减少它的赢利^③。

① 考茨基：《土地問題》，參閱三联书店 1955 年版，第 199 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 144 頁。

③ 他在这本书中写道：“一般說来，不能規定发生上述情况的精确界限。对于不同的技术条件、土壤条件和作物經營品种，这种界限是各不相同的。某些发展趋势力图扩大这种界限，在这方面发生作用的例如有：以蒸汽或电力作为动力，在田地上敷設铁路；而另一些趋势則相反地要求使这种界限日益縮小。同面积相比較，投入的人力和畜力愈多，需要运输的物品、肥料、收获物、机器和笨重的工具愈多，就会愈加突出地感觉到远距离的后果。可以說，某一地产在經營上愈是精耕細作，投入同一土地面积的資本

考茨基肯定,农业正日益依附于工业,而且現代科学和現代工业所生产的技术設備正在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革命;他由此得出正确的結論說,这个过程将消除工业和农业的脫节,农业必然会随着更强大的資本主义經濟因素发展。“但是,如果說在原始的农民經濟中,农业是一个在經濟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因素,那末現在这种关系顛倒了。資本主义大工业占着統治地位,而农业必須服从它的需要。工业发展的方向对于农业发展也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工业朝着社会主义前进,那末农业也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④

考茨基从以上的种种分析中,也得出了社会民主党在革命胜利以前和以后对待农民的态度的結論。社会主义者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的破产是无法阻擋的,长期保持分散的个体土地所有制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工业中的社会主义趋势和社会主义的实现,指出了农业发展的道路。不过根据恩格斯对这个問題提出的公式,考茨基也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不能剝夺农民,而只能承认他們是现实的有益的劳动力,他們應該在发展过程中認識到合作制是他們最好的前途。

除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分析以外,考茨基还以恩格斯的《法德农民問題》(1894年)作为依据。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就农民問題断然肯定:“第一,法国綱領上的一种提法是絕對正确的:我們預見到小农不可避免的破产,但我們决不應該自己插手去加速这

愈多,那末它扩張的最大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它的赢利就会降低)一般說来也就愈小,但是技术的发展不时在冲破这个規律。”(考茨基:《土地問題》,參閱中譯本第178—179頁)

④ 參閱同上书,第349頁。考茨基在后面接着明确地指出,农业不能从本身中发展出必要的力量来消除那种控制和长期束縛农业无产阶级的資本主义关系。但是,由于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其中的某一部分不能朝着与其他部分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大工业是現代社会的統治力量,因此“它也会要求那些不能从本身中創造出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前提的領域,朝着社会主义发展并适应工业的需要。工业从本身的利益着想,从社会的統一和协调着想,是非这么做不可的”(參閱同上书,第351頁)。

种破产。

第二，同样显而易見的是，当我们掌握国家政权时，我們絕不能設想用暴力去剝夺小农（不論有无报偿全都一样），像对待大土地占有者所必須采取的办法那样。对于小农，我們的任务首先是把他們的私有經濟和私有地产組成合作社的經濟和地产，但不是使用暴力手段，而是依靠示范和为此而提供的社会帮助。当然，到那个时候，我們將有充分的資料向小农证明他們現在本来就應該明了的那些好处。”^①

考茨基在著作中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完成了自己的分析。考茨基的这本书完全有权列入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論著作。

在这个时期，考茨基始終不渝地掌握住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虽然沒有像卢森堡那样尖銳地、毫不妥协地批判伯恩施坦，但毕竟是参加反修正主义斗争的人之一。紧接着这个时期之后，考茨基出版了两本也很著名的书，一本談的是倫理学問題，一本談的是基督教的起源。

《倫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是馬克思主义文献中少見的著作，它在較为广泛的範圍內提出了这个問題。考茨基在历史学、社会学和經濟学方面虽然是突出的能手，然而哲学理論問題却是他的最薄弱的方面，这几乎也是这个时期馬克思主义的一切主要人物的通病。

一般地說，值得注意的突出的現象是，几乎第二国际一切理論家和領導人的哲学水平，对哲学問題、特别是馬克思主义哲学問題的認識水平，都是非常之低。因此，在哲学方面反修正主义的那一部分工作，迫于形势，不得不落到斯·龔特尔的身上，实际上是落

^① 恩格斯：《法德农民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参閱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4頁。如果根据这些原理来考察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实行的集体化原則，即对农民的剝夺（他們坚决把它宣布为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原則），那末，尽管历史經驗不无值得慰借之处，然而結論是十分清楚的。

到新康德主义者施陶丁格尔的身上。于是，凡是试图对某些问题作哲学分析的地方，都应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研究，在这个方面，奥地利馬克思主义者有主要的发言权^①。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的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他是当时馬克思主义者中唯一能够在理論上胜任愉快地同施米特、伯恩斯坦、司徒卢威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进行哲学論战的人。

考茨基对倫理現象的分析，实质上抱有一定的企图，他打算一方面超过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又把达尔文主义同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但是無論在前一方面或是后一方面，他都沒有成功。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在如此艰巨的任务中能够用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去克服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論的許多局限性，这确实是有意义的；但是，尽管如此，考茨基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却受到了生物学派和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此，他的这一著作，也同达尔文、斯宾塞、克魯泡特金对道德現象的分析和研究一样，非辯证地把动物的某些本能特点和人的道德观念等同起来。考茨基曾断然肯定，“道德規律无非是动物的本能”^②，“道德規律具有与遺傳本能相同的性质”^③。

① 下面这个圍繞馬克思主义进行論战的例子(約发生在 1907年)，清楚地說明了考茨基对馬克思主义哲学認識得很差。当时有一个俄国工人写信来問馬克思主义和馬赫主义的問題，考茨基对此回答說(这封回信被弗·阿德勒刊登在 1909年的《斗争》杂志上)：“您問道：馬赫是不是馬克思主义者？这要看人們对馬克思主义怎么理解。我并不把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这种观点同任何唯心主义哲学当然毫无联系，但是同馬赫的認識論不是沒有联系的。……我个人在馬克思和狄慈根的观点之間并没有发现任何重大差别。而馬赫是非常接近狄慈根的。”(引自德波林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书的德文版所写的序言，1927年，第18頁)在同一封信中，考茨基在回答普列汉诺夫是否正确解釋馬克思的哲学这个問題时說：“如果您問我，普列汉诺夫是否正确地援引馬克思的哲学？我應該回答說，馬克思沒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終結。至于普列汉诺夫是一个精通馬克思学說的人，那是毫無問題的。”(同上书，第19頁)

② 考茨基：《倫理学和唯物史观》，1920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第63頁。

③ 同上书，第67頁。

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是达尔文主义的。

但是，考茨基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毕竟要比达尔文主义者前进一步，他指出了社会的阶级差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对整个社会的社会本能的减弱和阶级内部社会本能的加强。但在这些問題上，考茨基沒有能明确地把倫理的社会現象同动物的本能現象截然分开。例如，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就同动物的本能現象完全不同，因为根据一定社会的发展程度、分化情况和性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由于領会的不同，可以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它們不是作为生物学的范疇，而是作为明确的社会范疇在人們的正常关系中发生作用。

考茨基卓越地論述了恩格斯关于道德规范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以及意識形态具有独立性的特殊現象（这里也包括道德，因为道德也对它所由产生的社会基础本身发生反作用）。

考茨基认为，只有道德理想不能来自社会本能。“道德理想无非是由于不滿現狀而产生的希望和願望的总和。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动力，作为团结进步阶级的力量和激励他們反对現狀的手段，是战胜現狀的有力杠杆。但是，代替旧社会而出現的新社会的状况，不取决于道德理想的表現形式，而取决于現有的物质条件、技术水平、自然环境、邻国性质和現有阶级的活动等等。”^①

考茨基认为，道德理想是对現狀的抗議，因而它不是目的，而是社会生存斗争的力量和武器。“道德理想是特殊的阶级斗争关系的特殊武器。”^②

考茨基对倫理問題作馬克思主义解釋的这一尝试，既受到达尔文主义生物学派和进化論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学派的影响。这一尝试虽然沒有涉及倫理学領域內許多十分重要的問題，但是作为最初的、尽管是沒有打中要害的一种馬克思主义的尝试，毕竟是值得

① 考茨基：《倫理学和唯物史观》，第139頁。

② 同上书，第141頁。

得重視的。考茨基沒有能比較明確地領會理論和哲學的微妙之處，因而不能有力地克服對這些問題的生物學派和社會學派的解釋。

考茨基關於基督教起源一書的意義和價值則要大得多。他根據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收集的大量資料和原始文獻，對帝國時期的羅馬和以色列的歷史情況、階級差別和各階層的狀況，第一次作了詳盡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考茨基也詳細地分析了早期基督教公社，論述了基督教公社組織的發展和其內部教階制度的形成，並且一直敘述到基督教被確認為國教。他研究這一重要現象後的結論如下：“基督教只有在轉化為其原始本質的對立面時，才能取得勝利；在基督教中取得勝利的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剝削和統治他們的僧侶階級；基督教取得勝利時，已經不是一種變革的力量，而是一種保守的力量，是壓迫和剝削制度的新的支柱；它不僅不消滅皇帝的權力、奴隸制度、群眾的貧困和財富在少數人手中的集中，相反的，到是維護這些現象。基督教組織即教會之所以勝利，是因為它拋棄了最初的目的，反而擁護相反的目的。”^①

對於當時最重要的問題即革命問題，考茨基在《取得政權的道路》（1909年）一書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這本書的基本思想如下：“我們既不是不惜任何代價擁護法制的人，同樣也不是不惜任何代價進行革命的人。我們知道，我們不能按照意志創造歷史形勢，我們的策略必須以歷史形勢為依據。”^②他同樣認為，歐洲無產階級已經進入了奪取政權的決定性戰鬥和決定性過程的時期，政權有利於無產階級的決定性變化可能不久以後就會到來。考茨基也堅決主張社會民主黨不要採取同日益腐化墮落的資產階級政黨結成聯盟的政策。社會民主黨在取得實際的政權以前，要想參加國家政權，就只有“向資產階級政府出賣自己的政治力量。無產階級作

① 考茨基：《基督教的起源》，1954年貝爾格萊德塞文版，第398頁；中譯本參閱《基督教之基礎》，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468頁。

② 考茨基：《取得政權的道路》，參閱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71頁。

为一个阶级，任何时候也不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至多只能爭取到几个締結卖身契的議員罢了。”^①

但是，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經指出过的，考茨基在这里也閉口不談革命后的国家問題，而这个問題恰好是革命行动的中心問題之一。潘涅庫克在这个問題上同考茨基进行了論战，他的意見是正确的。关于摧毁旧国家机器的思想，是考茨基所一貫不能接受的。正是这一退却，成了他后来变节投降和把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思想基础。

但是，正当考茨基写这一著作的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第二国际内部的分裂，开始日益扩大和加深。修正主义派成了公开的改良主义派，他們同工会領袖一起，日益奉行资产阶级的政策。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在策略上日益倒向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罗·卢森堡、弗·梅林、卡·李卜克内西、克·蔡特金等人組成的左派，最后终于分离出去，并在大战期間組成了单独的革命的“斯巴达克联盟”。

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百一十一名議員都投票贊成軍事撥款^②。

战前的形势和战争本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战争时期的态度問題，取得政权的道路問題，革命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問題。

在第一个問題上，第二国际遭到了彻底的破产^③。对于另外

①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參閱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25頁。

② 十五名議員(包括卡·李卜克内西、累德布尔、哈澤、倫施)反对軍事撥款，但受到党紀的約束。12月，德国政府再度要求增加撥款时，只有卡·李卜克内西一个人起来反对。

③ 1915年9月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得举行的會議和1916年4月在昆塔尔举行的會議，都譴責了第二国际的这一立場，并郑重宣布了革命的方針。当时，布尔什維克在列宁、季諾維也夫和拉狄克的领导下，要求會議反对国内和平的口号和采取国内战

两个问题，以考茨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断然不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照旧主张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种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特征）。当1918年欧洲无产阶级确实面临革命时，考茨基写了几本小册子，这些书只能使无产阶级解除武装，并且实质上是赞成艾伯特—谢德曼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叛卖行径。当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这个联盟杀害了德国最革命的人物时，考茨基认为有必要把模糊不清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主问题，当作时代的中心问题，同时攻击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性行动。他写道：“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所理解的现代社会主义，不仅是社会化的生产组织，而且是民主化的社会组织。这样，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和民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④

但是，考茨基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概念，特别是民主的概念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也就是说，没有揭示它的阶级内容，而是仍然停留在一般的形式主义的观点上，即从形式上和法律上对这个概念下定义；这当然使他得出了毫无革命气息的结论。在考茨基看来，民主意味着“多数的政权。但同样地也意味着保护少数”⑤。如果说民主的含义在这里还表达得不够清楚，那末考茨基在一年后出版的这本书的删改本中对此作了十分明确的阐述。他反对专政，认为专政在德国是用不着的，并且得出结论说，因此，“我们将要而且应当要坚持民主，坚持我们已经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权”⑥。

争的方针。这同时也是左派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当权派的机会主义的最初步骤。

④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维也纳德文版，第5页；中译本参阅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页。

⑤ 同上书，第15页；参阅中译本第17页。

⑥ 考茨基：《民主还是专政》，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46页，在内容提要上竟称这本书为社会民主党的党义概要！

这是考茨基陷入中派歧途的結局，这条歧途，正如卢森堡在战前就已經正确地預見到的，背棄了正道而倒向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而在这个时期它又具有自由主义的民主色彩。考茨基用自由主义的、形式上的、法律上的民主概念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民主定义。其实，任何民主实质上都是一定階級的政权和专政，可是考茨基却把它解釋为普选权。很自然的，他的最后結論必然是否定革命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宣布議會斗争是唯一可行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因为，既然沒有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議的，而民主又意味着“多数的政权”，那末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占到多数，就不能夺取并保持政权。如果工人階級已經占了多数，它就可以通过选票取得政权。无产阶级以这种方式取得政权后，不仅将继续保持民主，而且要扩大这种民主，因为这样做沒有有什么危險，无产阶级本身占着多数。所以，武装革命应当束之高閣^①。

全部問題都被归結为政治和法律問題。民主的实质完全被掩盖了起来。专政被視作为一种“状态”，如果它成为一种“政体”，就会意味着剝夺反对派的权利，取消选举权，取消集会自由；因此，在这种政体下，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个人专政或一党专政。所以必須把它拋棄^②。不仅如此，而且在这种专政之下，反对派只有一条出路——国内战争。因此，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应当把发生国内战争的罪过归之于本身的专政！

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暴力革命、严厉的专政、取締反对派等等，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可行的必不可免的道路和

① 此后，考茨基于1920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的第三版序言中，还作了一种估計。他說：“在这方面，我們仍然坚持：英国和德国将是最先达到現代社会主义的国家，这种社会主义将使无产阶级得到滿足和解放。这两个国家今天已經具备了这方面所必要的因素。”（該书1920年柏林德文版，第13頁）考茨基連同他的議會选票究竟取得了些什么成果，历史本身、首先是他的祖国德国的历史本身是最好的证明。

②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參閱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25—26頁。

手段。这一革命可以开展得更“民主些”，甚至通过议会的道路。但是，在本国和别国革命事态蓬勃开展的时候，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在一国取得政权的惊天动地的日子里，宣布那样理解的民主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并谴责布尔什维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实际上就等于抛弃马克思主义有关这些问题的基本原理，并成为叛徒^①。

在这个时期，考茨基又出版了一本攻击布尔什维克的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书中对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作了分析，但基本上仍然坚持以往著作中的那些论点。考茨基污蔑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只是在日益抛弃社会主义原则和变为机会主义者的情况下，才得以保持政权^②；他发现在城市中形成了三个阶级：从前的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只要他们还持反对的立场）；雇佣工人；以及第三个阶级——官僚。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过错在于建立专政，而这在考茨基看来只是意味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具备，而且这种状态的必然结果就是国内战争。“既然我们面临的抉择只是：民主或者国内战争，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凡是社会主义还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的地方，凡是多数居民还不接受社会主义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刻一般地说就还没有到来。可是布尔什维主义却认为社会主义应当由少数人强加给多

① 对于考茨基的这本书，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中给予了十分尖锐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证据确凿的答复。书中通过尖锐的批判指出，考茨基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也发生思想蜕化，例如：民主和专政的定义，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评介等等。正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考茨基坐在艾伯特—谢德曼政府顾问的安乐椅上（这个政府杀害了最优秀的革命者、以前党内的同志），指手划脚地就民主和普选权问题指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这当然是轻松愉快的！而这种态度，正如我们在其他例子中还将看到的，乃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共同立场。

② 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柏林德文版。“他们以要人自居，却牺牲了自己的原则，从而成了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布尔什维主义目前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可是社会主义现在在那里已经遭到了失败。”（第133页）

数人，結果就只能发生专政和国内战争。”^①

对于这一本书，列·托洛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駁考茨基》(1920年)一书中给予了严正的回答，他尖锐地駁斥了考茨基的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对于这一批判，考茨基在《从民主到国家奴役》(1921年)一书中又作了答复。他彻底坚持自己过去的观点，认为“国家奴役是布尔什維克式的共产主义的終点”^②，布尔什維主义“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具有明显的反动性”，它将是“社会主义历史中的污点”^③。

略为詳細地談一談考茨基对当时的这些重大問題、以及馬克思主义實踐的重大問題的基本观点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考茨基的这一套东西实际上表达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整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时期的理論綱領。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强迫工人阶级“实现民主”，却把行使暴力和专政的特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这样，资产阶级即使处于少数，也可以等待时机通过选票重新取得胜利。

必須注意，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新“理論”，正是在当时最紧要的关头，即在布尔什維克同国内外资产阶级武装干涉进行英勇斗争的时候提出的。考茨基认为时机已到，他不仅在理論上反对这些唯一能履行自己的国际和国内任务的共产党人，并且亲自出馬到格魯吉亚去支持孟什維克和自由派反对苏維埃政权^④。

① 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第145頁。他在这里仍然坚持原先的民主观点，认为沒有“根据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产生的人民議會”就不可能存在民主。(第150頁)

② 考茨基：《从民主到国家奴役》，1921年柏林德文版，第122頁。

③ 同上书，第127、128頁。

④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鉴于考茨基的这些功績，在他的七十岁生日时出版了一本祝寿文集《活的馬克思主义》(1924年耶拿德文版)，并称这个阶段为馬克思主义的第四阶段。执笔撰文的有：麦·阿德勒、奥·鲍威尔、阿·布劳恩塔尔、阿·克兰諾德、奥·晏森、考茨基的儿子等。同样，希法亭的《社会》杂志也为考茨基的生日出版庆祝专号《馬克思学說的保卫者和发展者》，执笔撰文的有：麦·阿德勒、卡·沃倫德尔、路·布丁、維·切尔諾夫、爱·伯恩施坦、特·唐恩、鲍·尼古拉也夫斯基等。

考茨基在这个时期除了写一些篇幅較小的著作以外，还企图在《唯物史观》^①一书中概括自己的社会观并总结自己的全部理論活动。

对于这部书，概括地可以说，它无论在总的題材上或是在分別的专题上，都是迄今論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般概念的規模最大的尝试之一。从問題的理論方面来看，这部书的缺点是論述得不够深刻，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問題闡述得不够深刻；这个缺点必然也会反映在一系列其他問題的論述上，就像考茨基过去的某些理論著作那样。考茨基的理論生活的道路是从达尔文主义开始的，而且以后一直没有摆脱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此在这里，也像我們在談到他的倫理学一书时所強調过的那样，他在理解以后的某些其他观点时（如龔普洛維奇关于国家起源的暴力論），也一貫把达尔文主义进化論的有限辯证法同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混为一談。同时，不言而喻，他对現代的国家和革命問題的解釋，是彻底根据他在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維克的观点时所提出的那些原理出发的。

另一方面，这部书所涉及的范围极广，它提出了大量的問題和一系列很好的見解。但是在理論方面，它沒有彻底貫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在許多地方具有折衷主义和机械論的观点。

尽管这部书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資料以及很好的見解，但是我們有必要至少用若干篇幅談一談考茨基貫徹于全书的模糊的理論观念。考茨基直到当时仍然沒有弄清馬克

^① 第一版印于1927年，第二版印于1929年。两卷合計超过一千七百頁，因而这里无法詳細地談論书中涉及的一切問題。书的内容无疑包括甚广，除了某些典型的社会学問題如階級問題、国家問題等以外，他还试图論述社会共同体的起源、人的本性問題（遺傳，人是一种利己的、社会的、有性欲的生物，对自然界的适应，种族，技术，經濟，历史的意义，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意志和科学在历史中的作用等）。在这里，我只是试图对这部书作最概括的評價。

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联系 因而认为唯物史观实质上并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观念。“所以可以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依赖于某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它同每一种可以充当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世界观,都发生联系,或者至少不同它处于无法联系的矛盾之中。”^① 设想能存在某种可以充当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但本身却不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世界观,这只是说明了作者不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此,他在同一页上竟然能得出结论说,在他看来,唯物史观“不仅同马赫、阿芬那留斯有联系,而且还同许多其他哲学有联系”^②。

在辩证法的基本观念上,考茨基也仍然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者、机械论者,而不是辩证论者。他从来不了解辩证的运动即“自我运动”的实质,不了解每一种过程内在的辩证矛盾和对立的实质,而是把一切都归结为个体同环境的关系,其实这只是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中的一个因素。“任何适应过程的出发点是有机体,‘我’。在这里我们所指的是肯定、‘正面’、‘正’、‘正题’。

与它相对立的是它所处的周围世界,即‘非我’、有机体的否定、它的‘反面’、‘反题’。最后的出路是克服矛盾,否定之否定,通过适应而使有机体重新得到肯定,即‘合题’。”^③ 考茨基在这里甚至设想恩格斯犯了错误,因为恩格斯认为运动和发展不是由两个因素(个体和周围世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仅仅是“一个因素的运动,即个体本身内部的运动;从而在同一个个体身上既寻找反题,又寻找正题”^④。因此,考茨基竟想纠正恩格斯在分析辩证法时所存在的黑格尔的残余,却没有发现他自己存在的、而在恩格斯的观点中已经克服了的机械论。

①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1卷,1929年柏林德文版,第28页。

② 同上书,第28页。

③ 同上书,第130页。

④ 同上书,第132—133页。

在解释国家的起源时，考茨基也认为需要纠正恩格斯关于国家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和社会内部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而应当接受龔普洛維奇的更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征服論。实质上，考茨基在这里也不理解使国家組織（不是部落組織等等）得以产生、并使征服之类历史现象能造成建立国家的結局的这一过程的內在辯证法。这里也表明，考茨基不理解辯证法是正确地解释某些重大的人类历史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考茨基也不了解現代資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本质，他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希法亭的最后分析上。甚至到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放棄他在战争开始时提出的机会主义的超帝国主义論，他实际上是用这种理論来掩飾帝国主义的实际命运，掩盖无产阶级进行尖銳的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考茨基以前曾提出一种主張，认为对財政資本更有利的是，消除相互斗争和竞争，为了剝削全世界而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这样就能消除战争和破坏，并能民主地夺取政权。考茨基現在在这部著作中又得出結論說，“也可能財政資本接受世界大战的教訓，認識到用这种方法来扩大剝削地盘未免过于冒險。存在这种扩大利潤的願望，使整个資本的处境过于危險，因此，更有利的办法就是实行超帝国主义，即各国財政資本在国际范围内結成卡特尔。”^①

在这部书中，考茨基对于現代資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全部观点，和我們在上面已經談到过的、他

①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2卷，第146頁。列宁早在1915年就已經在《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但刊印于1924年）*以及論帝国主义的著作中，揭露了中派的这种机会主义論点。他在給布哈林的小册子《帝国主义和世界經濟》写的序言中指出，財政資本联合的种种趋势是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即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資本主义早已轉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了。在这里，也是列宁正确。这个问题，我們在叙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时，还将提到。

*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12頁上說，《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載于1916年1月《先驅》杂志第1期。——譯者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争剛結束时期所写的那些著作仍然是同样的。不仅对民主問題，而且对革命力量的一般斗争，他都仍然持抽象的观点。他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眼光来观察当时的形势。他认为，凡是存在发达的无产阶级的地方（英国、德国），多数必然会取得民主的优势；这种机械的观点，加之议会斗争的胜利，使得考茨基十分着迷，以致他根本不能设想，可能出现一系列其他的国内和国际因素使这一发展过程轉入完全不同的軌道。他似乎已經完全不能理解阶级斗争的进程和阶级斗争的策略。所以他才会以如此自信的口吻，以忽视政治的态度，就法西斯主义的危險发表預言說：“法西斯分子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須具有很大的数量，譬如在拥有三千九百万人口的意大利，他們占了将近五十万。在德国，要想达到这样的比例，他們必須糾集大約一百万人。在一个工业国中，为了实现資本主义的目的而想凑够如此大量的信徒，即使在最好的年头也是不可能的。在意大利，环境对于法西斯主义特別有利。”①

这段话就是在德国法西斯主义上台之前四年說的！

同样，考茨基在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民主观点和阶级斗争观点时，提出了一大套糊涂观念。他說，设想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来緩和阶级矛盾，这必然会导致放棄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他就不得不承认，他毕生的工作全是白費的。“但是，毕竟不无令人寬慰之处。因为社会主义对我们來說，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达到无产阶级完全解放这一最終目的的手段。我們今天只看到一种可能性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反之，如果在目前的生产方式的範圍內已經可以同样地办到这件事，那末这就意味着，可以比我們社会主义者原先的设想更容易地、更简单地、并付出更小的代价来达到我们的目的。”②

①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2卷，第477頁。

② 同上书，第563頁。

在这里也毋需再作任何評注了，因为这种观点是同他对资产阶級形式民主制度的崇拜完全一致的。

这部书是年迈的考茨基的最后一番努力，他不仅总结了自己对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观点，而且在理論上闡述和論证了自己的論点，特别是有关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現代問題的論点，并反駁馬克思主义的解釋，首先是反駁列宁所代表的馬克思主义解釋。尽管这部书中包含大量的丰富的材料和資料，尽管书中有許多精彩的历史分析，尽管这部书是在1926年完成的，但它在思想上仍属于战前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的范疇，因为它在某些根本問題上修正了馬克思主义，并且同我們前面提到过的其他几本书一起，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党义概要。

罗莎·卢森堡(1870—1919)

考茨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論上的盛衰，而罗莎·卢森堡则不仅是这个社会民主主义时期的最杰出的光輝形象，而且是这个时期的否定。她博学多才，充滿革命热情，站在德国和波兰社会主义队伍的最前列。不仅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高漲并取得議會胜利的时期是如此，而且在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向軍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屈膝投降的日子里也是如此。那帮人由于屈膝投降而保全了生命和地位，而卢森堡却在第一批牺牲者中遇难。但是她的名字将永远载入最偉大最光輝的革命家之列，他們的思想也和他們的事业一样是永垂不朽的。

卢森堡是波兰人，她在大学求学时期就已經参加了当时被分割的波兰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久被迫出走，侨居于瑞士，在那里結識了著名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团体(普列汉諾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她主要攻讀政治經濟学，并以《波兰工业的发展》(1898年)这篇論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卢森堡同利·約吉赫斯、瓦爾斯基(米哈尔科夫斯基)一起，在

九十年代創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造就了相当数量的杰出革命家，并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活动。

1897年，她迁居到德国。此后，直到她牺牲，主要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内活动。她的文采、天赋和决心，使她很快就崭露头角，居于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前列，不应忘记，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在馬克思主义理論和实践方面都处于权威地位。

但是，与此同时，修正主义也正好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德国社会主义者所写的反对修正主义的各种理論著作中，卢森堡的著作是最輝煌和最有理論价值的。

卢森堡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年)为标题，一下子就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她在书的第一頁就指出，这样提问题是不能辯证的。“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它看来，爭取社会改良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①

卢森堡精辟地分析了与这一論题有关的各种社会問題和政治問題，指出，对资产階級国家的迷信，以为通过它就能按某种方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最常见的改良主义幻想。生产过程正在日益社会化，而国家监督也正在日益扩大。私有财产日益变为赤裸裸地剝削他人劳动的形式，而国家监督則日益渗透階級利益。国家以及所有制关系日益具有資本主义的性质，而不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合法改良和革命不仅是具有或多或少好处的行动，而且是根据更深刻的历史原因活动的因素。“因此，合法改良和革命，并不是像餐厅里的热炒和冷盘那样可以供人任意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法，而是階級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因素，它們就像南极和北极、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一样，相互制約、相互补充，同时也相互排斥。

^①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參閱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頁。

問題正在于：一定的法律制度每每只是革命的产物。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創造行动，而立法則是社会生活在政治上的延續。合法改良的工作，本身并没有任何自己的、不依赖于革命的动力，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只是在最近一次变革所給予它的刺激还在发生作用的时候，并且只是循着这一方向运动；或者，具体地说，它只是在最近一次变革所产生的社会形式的範圍内运动。这正是这个问题的核心。”^①

卢森堡对资产阶级国家不抱任何幻想。当伯恩斯坦因国家通过了許多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和命令而满怀希望时，卢森堡指出，这种希望建立在对现实过程的不正确的观察之上。因为“另一方面，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国家本质发生了另一种变化。首先，今天的国家是居于統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組織。如果这一国家为了社会发展的利益而执行了各种有关公共利益的职能，那只是因为这些利益和社会的发展，一般地是符合統治阶级的利益的，而且只能在这一限度之内。”^②

在社会主义到底是倫理理想还是历史必然性的問題上，卢森堡也保卫了馬克思的唯一科学的观点。而且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經濟关系中发现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地，这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偉大的成就。因此，她駁斥了伯恩斯坦企图否认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經濟前提的种种假設。同样，她正确地解釋了恩格斯在 1894 年对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著名序言中所表述的原理；这篇序言，很多人认为是恩格斯在理論方面的遺囑。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指出过的，修正主义者根据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的某些原理，企图证明，恩格斯放棄了革命，建議以議會斗争作为取得政权的道路。

卢森堡坚决駁斥了这种解釋，她指出，恩格斯所指的不是夺取

①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参閱中譯本，第 53 頁。

② 参閱同上书，第 22—23 頁。

国家政权时期无产阶级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态度。“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本身，无论马克思或是恩格斯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怀疑过。到伯恩斯坦，才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窝，当作负有完成世界历史上最惊天动地的变革——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这一使命的机关。”^①

修正主义者特别害怕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不仅他们，而且许多当时并不主张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一直耽心发生“过早的”革命。这帮人在发生革命搏斗之后总是抱怨说，本来是用不着拿起武器的。卢森堡对这个問題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任何请求和发誓，都无助于防止过早的革命。理由是：“第一，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巨大的变革，绝不能设想可以一下子完成，即通过无产阶级的一次胜利的打击就完成。设想这种可能性，就等于重复纯粹布朗基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变革需要经过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根据各种情况看来，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会不止一次地受到挫折，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终结果来说，无产阶级在第一次必然会是‘过早的’夺取政权。

第二，‘过早地’夺取国家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的这种‘过早的’进攻，是为最后胜利创造政治条件的一个因素，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夺取政权时伴随发生的政治危机的紧要关头，只有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在政治上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对政治权力和国家权力的这种‘过早的’进攻，本身也就是促进最后胜利的时机到来和决定这一时机的重要历史因素。从这一观点来看，那种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的出发点是认为社会机械地发展，因而设想可以离开

^①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参阅中译本，第58页。

階級斗争并且**不依赖于**階級斗争而确定階級斗争胜利的时机。”^①

在这个时期，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在1903年以后，对党的綱領发生尖銳的意見分歧的时候，卢森堡批評了列宁在无产階級斗争的这一重大問題上的观点，指責了列宁的被她說成是“极端集中”的主張^②。这里无疑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問題和意見分歧，它在以后的适用过程中实际上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列宁的原理坚决強調需要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来建立一个巩固的、有紀律的党，这个党同时将是具有明确目标和坚定决心的基本核心。可是列宁的这个原理在后来斯大林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粗暴的集中主义。与此相反，“卢森堡主义者”則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強調自发性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低估了組織因素的首要意义。

但是，列宁和卢森堡之間的分歧，特别是在工人运动的以后发展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大战期間），其实并不像人們所強調的那么大。列宁坚决主張建立一个巩固的、有紀律的組織，使中央委员会具有很大的权力，同时使代表大会成为最高机关，——这确是事实。卢森堡认为群众运动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基础（这一点列宁也是明确的），一个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錯誤在历史上要比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不犯錯誤都更有价值得多，更有效果得多，——这同样也是事实。

在这个問題上，特别是結合当时工人階級斗争的条件来看，列宁是正确的。卢森堡所警告的那种領導官僚主义化的危險，不仅可能存在，而且在列宁逝世后甚至变成了事实。但是，这并不是列

①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參閱中譯本，第60—61頁。

② 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組織問題》（載《新時代》1904年7月）一文中批評了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的主張。对此，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写于1904年9月）中作了答复（參閱《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6—477頁。——譯者注）。

宁原則的过錯，而是那些片面地貫徹这些原則的人的过錯。

另一方面，卢森堡的原理所包含的危險，就是过高估計自發性和群众的創造作用，其实，群众若沒有明确而坚强的領導，很容易錯过關鍵性的时机。这一时刻若不存在一个坚强的党，很容易使革命失敗，这样的事情已經屢見不鮮了。

但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卢森堡在著文談到群众罢工和党的問題时，已經能克服上述观点的片面性，并接近列宁的正确观点。“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最有文化的、最有阶级觉悟的先驅。它不能也不应像宿命論者那样束手坐待‘革命形势’的到来，等待自发的人民运动从天而降。相反的，它时时刻刻应该努力促进和迎接事态的发展。”^①

在这一著作中，卢森堡对群众罢工作了精辟的馬克思主义的解釋。她既不幻想可以简单地通过一紙命令掀起群众罢工，又不机会主义式地抱怨流血牺牲，她把群众罢工解釋为富有成果的长期革命斗争时期的总结。她把群众罢工同群众示威游行等区分开来，并得出結論說，群众罢工只有在革命高漲时期才能发生，它主要是革命形势本身的表现，而不是革命形势的原因。她在結束自己的分析时說，“其实，不是群众罢工产生革命，而是革命产生群众罢工”^②。

除了上述同列宁的意見分歧以外，卢森堡在民族問題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的坚定观点相反，她把這個問題归结为經濟上的独立自主，并且否认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

^①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卢森堡演說論文选集》第1卷，1951年柏林德文版，第224—225頁。同样，她在著名的尤尼烏斯的小册子中写过相似的話：“如果說我們不能超越历史的发展，就像人不能超越他的影子一样，那末我們无论如何可以加速或延緩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世界史上第一次人民的运动，它的目的和历史使命就是在社会活动中加入人的自觉意思、計劃思想，从而也就是加入自由的意志。”（《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卢森堡演說論文选集》第1卷，第269頁）

^② 《卢森堡演說論文选集》第1卷，第204頁。

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①。

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后，卢森堡回到波兰，领导波兰起义。后来被捕入狱。获释后，到德国。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办了党校。卢森堡同梅林、希法亭（她接替了他）、敦克尔、斯塔德哈根、乌尔木、埃克施坦、海涅曼一起担任教员，她教政治经济学。同时，她搜集资料，写她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主要理论著作《资本积累论》（1913年）。

在这本书中，卢森堡抓住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几乎是最根本的问题：能否实现扩大再生产。这方面的抉择对于革命工人运动也有决定性的意义。到底资本主义能否无限地进行扩大再生产呢？如果能够，那末资本主义就会是一种具有无限前途的制度。卢森堡并没有满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认为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一章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总资本积累的问题只是提了出来，但并没有给予答复。她在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进行论战时，解释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理由是：资本主义把自己的剩余价值投入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那里可以容纳它的产品。因此，“资本主义积累的继续进行，需要以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作为它的环境，资本主义积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同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交换物资，它只有在找到新的环境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内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是作为自己产品的购买者和供应生产要素的源泉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对于资本来说，外部市场是容纳它的产品以便为它提供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②

^① 在《民族问题和自治》（1908—1909年）一文中特别强调这些论点。对此，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书中作了答复。这件事，我们在相应的地方还将谈到。

^②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参阅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89—290页。

按照卢森堡的論点，一部分用来投資的剩余价值，不能在內部市場实现，而只能在外部市場即在非資本主义形态中实现。因此，資本主义不仅是第一个具有囊括全球、“排挤一切其他經濟形式、不容任何其他經濟形式并存的”傾向的經濟形式。“但它同时也是第一个若沒有其他經濟形式作为环境和生活資料便不能单独存在的經濟形式，它虽然具有成为世界形式的傾向，但同时由于內部不能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形式而日益崩潰。”^①

卢森堡的理論所依据的假設是：只有存在非資本主义国家，資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即資本的积累才是可能的。一旦这些国家也都成了資本主义国家，如果国际无产阶级到那时还没有举行起义来摧毁資本主义，那末資本主义也将直接开始崩潰。

卢森堡的論点引起了一场激烈的爭論，对此，她在《反批評》中作了答复，并再一次对自己的理論作了明确的概括。她在序言中写道：“从十九世紀初开始，积累起来的資本也随同这些方法从欧洲輸出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非資本主义国家；它在那里，在新的地区，在旧的家庭生产形式的廢墟上，为自己的商品找到了一群新的购买者，从而也找到了进一步积累的可能性。

这样，資本主义由于同非資本主义社会集团和国家相互作用而日益扩展，并且依靠它們而不断积累，同时又一步一步地排挤它們，以便取而代之。参加割据积累地区的資本主义国家愈多，还可以让資本实现世界性擴張的非資本主义地区愈少，資本爭夺这些积累地区的竞争也就愈激烈，資本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也就愈陷入經濟和政治灾难的絕境：世界性危机、战争、革命。

資本通过这一过程，却为自己准备了灭亡，其方式有两种。第一，資本依靠侵占非資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而不断扩展，它不顾一切地奔向末日，到那时，全人类实际上只由資本家和雇佣无产阶级組

^① 卢森堡《資本积累論》，参閱中譯本，第376頁。

成，因而不能再继续进行任何扩展，从而也不能进行任何积累了。同时，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资本也加重了阶级对立，加重了国际上的经济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到来之前，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全世界取得不可分割的绝对权力之前，它必然会引起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起义。”^①

卢森堡的论点所引起的争论和她在这种情况下所作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假设，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说明了问题解决得不够明确。有一些人（如奥·鲍威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不是由于它不能实现剩余价值，而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不满，由于组织起来和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不满。另一些人则宣布，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它必然会导致革命（这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成了官方的理论）。其实，这种论点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都是荒诞无稽的。

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在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时曾经指出的那个问题，在那里，马克思分析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扩大再生产的日益发展，这些情况引起了资本主义内部的激变，这种激变已经为迄今的历史所证实。而这个过程必然会从自己内部导致古典资本主义的否定（因为它不能避免和解决这种激变），导致国家干涉的日益加强，而国家干涉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具有明显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因此，就连资本主义也实际上已处于一定的过渡时期。

卢森堡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首先是考茨基）的日益严重的机会主义发生冲突。战争爆发后，社会党人在政策上变节投降；卢森堡是最先起来严厉谴责这种社会沙文主义的人之一^②。早在1915年，她就同梅林一起创办了新

^① 卢森堡：《资本的积累，或后人从马克思的理论中造出了什么？反批评》（《资本积累论附录》），第336页。

^② 应该指出，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1907年）、哥本哈根（1910年）和巴塞尔（1912

的《国际》杂志，这个杂志的撰稿人还有：克拉拉·蔡特金、奥·塔尔海麦、克特·敦克尔、普·兰格和亨·施特勒貝尔。

在战争期间，她大部分时间都被关在监狱中，但在短暂的获释期间里，例如在1916年初，她同激进的左派代表——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爱·迈耶尔、尤·卡爾斯基、列·約吉赫斯等——一起组成了社会主义左派的組織“斯巴达克联盟”。

这个时期也出版了她的著名的《尤尼烏斯的小册子》，这本书在当时，除了列宁的著作以外，是对战前形势和对第二国际破产的最尖锐和最卓越的分析。书中指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内的作用，它在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威望（当时不是他们同意其他社会主义者，而是其他社会主义者同意他们），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严重堕落、破产和变节，揭露了它所鼓吹的关于德国人负有文明使命、社会民主党继续朝气蓬勃等等理论。

卢森堡写道：“在这场战争中，问题不是像社会民主党党团声明所说的那样，关系到德国的生存和自由发展，也不是像社会民主党报刊所登的那样，关系到德国的文化，而是关系到德国银行今天在土耳其属亚洲地区的利润，关系到曼内斯曼和克虏伯将来在摩洛哥的利润，关系到奥地利这个‘以哈布斯堡君主国为名的組織涣散的集团’（如《前进报》1914年7月25日所说的）的生存和反动制度，关系到匈牙利的猪和李子，关系到第14点和弗里德曼—普罗赫的文化，关系到维持‘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法西斯政权和‘巴尔干

年）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反对战争危险的决议。决议的补充部分是根据卢森堡、列宁和馬尔托夫的建议通过的，它说道：“如果遇到了爆发战争的危險，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職員，在社会主义国际局的有力支持下，有责任采取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来尽力防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自然应该根据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紧张程度而有所不同。如果战争终究爆发了，他们有责任设法尽速地制止战争，并且竭尽全力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人民革命，从而加速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轉引自麦·貝尔：《社会主义和社会斗争通史》，1933年薩格勒布塞文版，第491頁；中譯文參看《三个国际的历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9頁）

的反革命’。”^①

因此，卢森堡激烈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下列口号：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只在和平时进行阶级斗争。按照这种论断，从1914年8月4日起，直到媾和为止，阶级斗争就被宣布为不存在了，克虏伯的大炮在比利时一轰击，德国就变成了神奇的阶级团结、社会和睦的国家了。

然而，卢森堡写道，阶级斗争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为了能在一定时期任意废弃而发明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可以自由制造的东西。阶级斗争的存在要比社会民主党早得多，而且在战争中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足以使阶级斗争不再存在。大炮的轰鸣没有使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发生任何变化^②。

卢森堡虽然提出了卓越的批评，阐明了历史形势，但是她却根据这场战争是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冲突这个正确的论断，过于匆忙地得出了不可能存在民族自卫战争的结论。她写道：“由此可见，这始终是目前帝国主义的历史环境，它决定了各国战争的性质，由于这种环境，今天根本不能再存在民族自卫战争了。”^③

卢森堡也在监狱中对列宁的十月革命表示欢迎。虽然她对革

①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卢森堡演说论文集选集》第1卷，第325—326页。

②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卢森堡演说论文集选集》第1卷，第343—344页。

③ 同上书，第367页。列宁同年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中热情地欢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同时也提出了批评意见。首先，书中没有明确地指出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没有彻底贯彻用国内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则，同时得出了一个过于一般的、因而是错误的结论：不可能存在民族自卫的和解放的战争。列宁考虑到这本小册子写得十分精彩，因而特别着重指出，这些疏忽一定是偶然的，是对当时战争的本来正确的估计过分强调的结果。列宁的基本思想是，对事物始终应该作具体的考察，而且作辩证的考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转化为民族战争。”（《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2页）

命过程有不少批評的意見，但是她对布尔什維克的态度同考茨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有着多么大的差別啊！她对俄国革命的評價和批評是在1918年秋写的，当时她沒有获得一切必要的文献，也沒有必要的直接接触。（这本小册子只是到了1922年才第一次出版。）

卢森堡的批評意見沒有否定这个如此光輝的历史行动，相反的，她首先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最清楚不过地駁斥了考茨基之流的下列学究式的分析和論断，諸如：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俄国工人运动的激进派把資产階級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犯了錯誤。卢森堡再一次指出，考茨基的論断是同俄国孟什維克阿克雪里罗得、唐恩等人的論断完全一致的。她也粉碎了关于需要取得某种議會多数然后进行革命的神話；她簡明扼要地写道：“不是取得多数而后实行革命的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的策略取得多数。”^①

卢森堡的責难，首先是在对待农民的策略方面。她认为，把土地分給农民、把有組織的大庄园分散这一些非社会主义的措施是不必要的，它們在日后的发展中会造成一系列的困难。接着，她再一次反对民族自决权的原則，认为它是錯誤的，因为它只能被这些国家的資产階級所利用^②。同样，她也不贊成布尔什維克对立宪会

① 卢森堡：《論俄国革命》。《外交政策文献》，1951年貝尔格萊德塞文版，第4—5頁。在提出批評性意見之前，卢森堡对布尔什維克的功績作了如下的估計：“一个政党在历史性的时刻所能表現的英勇无畏、堅韌不拔的精神，以及革命的远見和彻底性，在列宁、托洛茨基等同志身上都充分体现出来了。西方社会民主党所缺乏的革命气节和行动能力，在布尔什維克身上都可以找到。他們的十月起义不仅[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同上书，第5頁）

② 这段話的全文如下：“但是，——这样我們就触及了問題的癥結，这种民族主义論調的小資产階級空想性正在于此，因为在階級社会的严酷的现实中，在极端尖銳的对立时期，它会直接变成資产階級階級統治的工具。布尔什維克通过它本身和革命所遭受的极大的損失應該得到教訓：在資本主义統治下，沒有民族自决可言；在一个阶

議的态度，认为把它解散以及取消社交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都是錯誤的，因为这些自由是在政治上提高群众的唯一可行的手段。

卢森堡的批評始終是尖銳的。她认为批評是进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基本的因素和保证。但是，有关俄国发展的許多資料，她在囚室中无法取得，因而她对情况的了解也就不够全面。她責备列宁和托洛茨基非辯证地提出专政还是民主的問題，責备布尔什維克对待政治自由和立宪會議的态度，但是这种責难是沒有根据的。仅仅隔了两三个月以后，当德国反革命猖獗时，她就确信列宁他們的行动是正确的^③。所有这一切並沒有妨碍她用下列的話来結束自己的分析：“德国当权的社会主义者可以高喊布尔什維克在俄国的統治只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諷刺。如果說这种統治过去或現在是这样一种諷刺，那末这只是因为它正是德国无产阶级所持态度的結果，因为这种态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的諷刺。我們全都服从于历史的規律，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际上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布尔什維克表明，他們能够做一个真

級社会中，民族内部的每一个阶级都追求按不同方式来‘自行决定’；对于资产阶级說来，民族自由的观点已經完全让位給阶级統治的观点了。芬兰的资产阶级，以及乌克兰的小资产阶级在这样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宁可受德国的暴力統治，而不要民族自由，如果这种民族自由是同‘布尔什維主义’的危險联系在一起的話。”（同上书，第6頁）

③ 例如，1918年11月她在《开始》一文中写道：“革命政府召开了立宪人民會議，从而創立了一个与工农代表机关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机关，把革命納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軌道，用魔法取消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目的。”（《开始》，載于1918年11月18日《紅旗报》，参看《卢森堡演說論文选集》第2卷，1955年柏林德文版，第596頁）她在1918年11月20日《紅旗报》上发表的文章《国民議會》中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今天誰傾向于国民議會，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誰就或者是隱蔽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或者是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同上书，第606頁）她在下列文章中也都表述了这种观点：1918年12月17日《紅旗报》上的《国民議會还是委員制政府？》；1918年12月23日《紅旗报》上的《国民議会的选举》。

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許可的範圍內所能做到的一切。不应当希望他們創造奇迹。因为在受到世界大战的破坏而疲憊不堪的、遭到帝国主义的扼杀并被国际无产阶级所出卖的孤立一国内进行典范的无可非难的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可以算是一件奇迹。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区分布尔什维克政策中的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实质性的东西和偶然性的东西。在这个最近时期，也就是当我们在全世界都面临着最后决战的时期，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即当代最迫切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个或那个局部的策略问题，而是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群众的实干能力和争取整个社会主义威力的意志问题。在这方面，列宁〔、托洛茨基〕及其战友最早以实际榜样走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面。直到今天仍然只有他们可以像胡登那样地说‘我敢于这样！’

这一点就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中的本质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有着不朽的历史功勋，因为他们在夺取政权和实际提出实现社会主义问题等方面，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从而大大加快了〔整个世界范围内〕劳资清算的日子的到来。在俄国，问题可能只是刚提了出来〔，这个问题不可能在俄国解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未来到处都是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①

卢森堡在监狱中几乎一直被监禁到战争结束。1918年11月9日的革命，使她和许多其他左派社会主义者获释。当时工人阶级和军队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可是以艾伯特和谢德曼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并不想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相反的，他们在准备反革命。对当时的形势不能抱任何幻想，因为社会民主党内以艾伯特、谢德曼、列金、大卫为首，以考茨基的中派为顾问的领导集团，一开始就主张事态的“民主”发展，——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反革命。

形势变得复杂化了。军队逐渐集结起来并日益处于政府的支

^① 卢森堡：《論俄国革命》，第10頁。

配之下，而工人階級也武装起来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廢寝忘食地在群众中工作，宣傳斯巴达克派的主張。除了卢森堡以外，他无疑是当时共产党人的最杰出的領袖^①。斯巴达克派終於能在1918年11月18日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紅旗报》，并在年底組成了共产党。但是，反革命势力已經組織起来，悬赏杀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1月15日，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皮克被发现而遭到逮捕，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立即被害，接着爱斯内、約吉赫斯和許多其他同志也相继牺牲。

列宁在晚年曾对卢森堡作了极好的评价，他說：“……鷹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鷹那样高。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問題上犯过錯誤；在1903年对孟什維主义的評價上犯过錯誤；在資本积累的理論上犯过錯誤；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諾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張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联合的錯誤；1918年在監獄里所写的著作中犯过錯誤（1918年底1919年初出獄后，她已經糾正了自己的大部分錯誤）。虽然犯了这些錯誤，但她始終是一只鷹。……卢森堡說：‘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一具僵尸。’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載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②

亨利希·庫諾夫(1862—1936)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及与第二国际大部分理論家走着

^① 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是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法律家和社会民主党的議員。他屬於极左派，是德国左派的最革命和最彻底的領袖之一。1916年由于反对战争而被捕。他是斯巴达克联盟的創始人，是卢森堡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1919年1月与卢森堡一起遇害。这样，社会民主党同資產阶级的联盟就消灭了德国的两位最有才干的革命領袖。卡·李卜克内西的主要著作有：《軍国主义和反軍国主义》(1907年)，《反战的階級斗争》(1919年出版)，《社会发展的运动規律的研究》(1922年)。

^② 《政論家的短評》。《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0—181頁。

大致相同的道路的德国理論家中，庫諾夫是很出名的，至少在世界經濟史方面，他留下了大量著作。在德国修正主义出現的时期，庫諾夫尖銳地批判了修正主义，他是梅林、考茨基和当时其他反修正主义者的战友。在这个时候，他的科学研究兴趣就已貫注于經濟史、社会学和人种学方面。1912年出版了他的《原始时代的技术》一书。但是，这个时期，庫諾夫就已經在这一派社会民主党人中日益变成右翼，后来在战争时期，成了国家資本主义的捍卫者。

他在《党的毁灭》(1915年)一书中宣傳了一个著名的机会主义論点，认为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阶段。按照他的主張，既然資本主义的崩潰并没有到来，而帝国主义又是必要的阶段，那末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資本主义是历史上和經濟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因而企图根除資本主义就好像从前工业发展的初期企图消灭机器一样。不仅如此，而且連帝国主义和掠夺战争也是必要的，从而，通过这种战争来建立大国也是必要的。因此，民族自决是一种常見的天真想法。

他的这些观点，在他的主要理論著作《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論》(第1卷1920年，第2卷1921年)中有着更詳尽的發揮。对于庫諾夫，也像对于第二国际其他許多馬克思主义者一样，不能說他完全拋棄了馬克思主义。他坚持了馬克思的許多基本原理，但是正好在某些有关当前具体历史时期的其他根本問題上，他表面上似乎維護馬克思主义，实质上却完全拋棄和修正了馬克思主义。

差不多可以說，在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問題上，第二国际不論在理論上或是在實踐上都遭到了破产。庫諾夫也和考茨基、王德威尔得、希法亭、倫納、伯恩施坦等人一样，在这两个問題上栽了跟斗。庫諾夫同考茨基一样，一口咬定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有設想过无产階級可以在占据多数以前取得政权；而一旦占据了多数，就无需采用布尔什維克的恐怖方法，而应当采用民主的方

法。“根据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只有在占据了人口大多数的時候，才能取得政权。一旦出現了这种情况，就无需在取得政权后不采用民主的政体。”^①

庫諾夫在批評列宁时所依据的一种論断是：认为列宁“不理解馬克思关于严格合乎規律的发展順序的思想”^②。所以布尔什維克設想可以通过組織、军队和暴力来超越一定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样，他們就把經濟发展的理論变成了心理发展的理論，并陷入了巴枯宁主义。因此，庫諾夫认为必須保卫真正的馬克思，以防止列宁的布朗基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可是他却閉口不談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經濟发展程度和工人阶级的壮大已經达到足以实现革命变革的水平。毫無疑問，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这一变革首先将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中发生（英国、德国和法国），这在当时是最合乎邏輯的推測。但是他們並沒有像庸夫俗子那样以憤懣的心情来对待其他国家实际发生的事变进程，也沒有把历史首創权始終只給发达的本国民族。

庫諾夫反对革命，着重強調了国家的职能。这也是大战期間聚集在帕尔烏斯（海尔方德）主办的《钟声》杂志^③周圍的一群修正主义者的共同观点（这个杂志基本上具有国家主义和国家資本主义的傾向）。例如，倫納（后来的奥地利总理）就曾解釋說，国家代替了工人阶级及其組織，成了社会主义的杠杆。因此，根本用不着任何关于摧毁旧国家和建立新国家的理論，而是需要巩固和整頓国家，以便通过它来实行社会主义。庫諾夫认为，否定国家的理論

① 庫諾夫：《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論》第1卷，1920年柏林德文版，第329頁。

② 同上书，第331頁。

③ 海尔方德博士（帕尔烏斯）曾参加1905年的俄国革命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后来他也由激进的馬克思主义者蜕化为机会主义者和变节分子，并在战争期間靠金融投机而发财。聚集在他所办的《钟声》杂志周圍的，除了庫諾夫以外，还有哈恩尼施、倫施、海尔曼、倫納、普連厄。

是庸俗的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关于国家起着发展要素作用的思想正在日益深入人心，这也就证实了拉薩尔关于国家的联合、組織和进步职能的論断。

庫諾夫根据自己的“严格合乎規律的发展順序”的原理，硬說民族自決的原則是庸俗馬克思主义的論点。他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原理，企图证明，似乎他們两人从来不曾承认过民族自決权。这样，他当然也就不去正确解釋經典作家有关爱尔兰、波兰等問題的各种观点了。庫諾夫写道：“文化落后的小民族的国家独立，相反地，一般不仅違反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且也違反以兼井和同化‘殘存的民族’、‘孱弱的民族’和‘衰落的民族’（恩格斯使用这些名詞，指的是文化落后的各小民族）而告終的社会发展一般方向。即使这些民族一般有可能取得国家独立，但这样产生的小国絕大多数的生命力不强，无法朝着建立大型的国家和經濟共同体的方向发展。”^①

既然这些小国仍然繼續依附于大国，而且归根到底失掉了主权，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沒有大国的經濟和文化发展的各种优越性，那末，所謂民族自決的原則只不过是一种道德上和美学上的虛构。

看来，几乎再也不能提出更妙的論据来为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作辯护了。况且这种論据还是以“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哩！

庫諾夫在这部篇幅巨大的著作中也对某些問題作了一般有益的分析，批判了某些反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巴尔特和馬薩利克，但同时他也反对恩格斯和摩尔根的家庭发展观等。战后，庫諾夫成了柏林大学国家学的教授（1919年）和人种学博物館的館长，从而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傳揚。

庫諾夫的最偉大的貢獻，无疑是四卷本的巨著《經濟通史》，书

^① 庫諾夫：《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論》第2卷，1921年柏林德文版，第37—38頁。

中广泛地考察了从原始农民經濟和原始村社到現代資本主义的經濟发展过程^①。这部书对于以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釋如此重要和如此悠久的世界經濟时期，无疑作出了重大貢獻。他背棄馬克思主义的地方，在书中反映极少；因为这里所涉及到的，不是我們在前面分析过的那几場論战，而是經濟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方面，他仍然可以是一个更加彻底得多的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竭力想证明不存在原始共产主义（虽然他會举例說明每一个部落集体耕种土地！），同时他超越了奴隶占有制社会經濟时期（在他的发展体系中不包括奴隶占有制时期），——这就是我們至少需要提到的他在这些問題上背离馬克思主义观点的地方。

^① 庫諾夫：《經濟通史》第1—4卷，1926—1931年德文版。

第三章 奧地利馬克思主义

奧地利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的一个重要支派。該党内曾經出現一些当时頗为重要的理論家，他們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了和他們的德国同志們类似的观点。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工人运动曾經经历了若干相当困难的阶段，后来，特别是由于維克多·阿德勒(1852—1913)的作用，才在海因費耳特大会(1888年)上得到了統一。在反对政府、爭取改善工人階級生活条件、爭取普选权等等的斗争中，奧地利社会民主党曾經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績。在党的領導成員中曾出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其中特別杰出的有：麦克斯·阿德勒、魯道夫·希法亭、卡尔·倫納、奧托·鮑威尔。其他值得提出来的还有：弗·阿德勒、格·埃克施坦。

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来看，奧地利的馬克思主义和德国的馬克思主义所受到的影响基本上是相同的。弗·阿德勒是接受馬赫影响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从馬赫主义的立場来修正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在他的《馬赫战胜了机械唯物主义》这部著作中）。因此，他所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別，正是在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中間傳播得特別广泛的那个派別；普列汉諾夫，特別是列宁，曾經同这个修正主义派別进行过理論上的論战。

以新康德主义修正馬克思主义的企图，在麦·阿德勒身上表現得最为露骨。同时，所有这些人在对待革命、无产階級专政和布尔什維主义的問題上，基本上都奉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路綫，特別是該党“中派”的路綫。

奧地利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聚集在《馬克思研究》（科学社会

主义的理論和政治期刊)的周圍。这个刊物是1904年由麦·阿德勒和魯·希法亭在維也納創办的，并且曾經刊登奧地利馬克思主义的两篇主要的理論著作：鮑威尔的論民族問題一书和希法亭論財政資本的著作。

麦克斯·阿德勒(1873—1937)

馬克思主义中的新康德主义傾向，在阿德勒的著作中具有最完整的哲学形式。阿德勒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例如：1904年在《馬克思研究》上发表的《为科学而奋斗的因果性和目的論》，1909年和1921年分別发表的两篇論思想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专著，以及他在維也納任哲学教授时所写的《唯物史观讀本》(第1卷1930年，第2卷1932年)，都一貫主張以認識批判論的观点来代替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一方面几乎全部承认和运用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論点，另一方面却始終力图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主要原理归根到底作唯心主义的解釋。这种做法导源于一种特殊的、精心制作的“康德化的馬克思主义”；从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康德化的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馬克思主义的創造性的进一步的发展，而显然是倒退和修正。

阿德勒认为唯物史观的主要問題是“物质和观念的关系問題，是两者之間的关系的序列問題。在这里像在一切情况下一样，只有从認識批判論的观点出发才能解答这个問題”^①。而認識批判論的观点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原理之上：心理的东西不可能从物理的东西中产生，因此，社会关系(阿德勒认为这是心理关系)不可能由物质条件中产生。他說：“心理的东西从来不可能从物理的东西中产生，精神过程在生理机能上对肉体过程的依存更是某种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因而事实上除了心理—物理平行主义以外不能

^① 阿德勒：《馬克思主义問題》，1913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第1頁。

肯定別的东西，所以认为物质条件对历史过程从而也就是对心理过程产生任何影响的观念，也是不可思議的。”^①

因此，阿德勒从物质和观念分离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进一步力图表明：社会过程由于是某种人为的东西，所以事实上是精神的而絕不是物质的过程和关系。二十年后他在总结自己的唯物史观的著作中仍然继续坚持这个论点。

“既然经济关系不是別的东西，而是人的关系，那末经济关系同时在根本上是精神关系，也就是說它永远包括人們的一定的、有目的的活动。”^②阿德勒企图用这种论点来摆脱由唯物主义所造成的全部困难——即解释精神对物质的依存性的困难。既然物质的东西事实上就是精神的东西，也就是說社会关系是精神性质的关系，那末观念对社会关系的关系，事实上就是一种心理范畴对另一种心理范畴的关系。甚至连生产力（这毕竟是某种物质的东西）也显然转化成了社会的東西，也就是說转化成了精神的東西，因为事实上自然力只有加入人的关系中才成为生产力^③。由于阿德勒把涉及到人的一切东西统统归结为精神的東西，他就出人意外地改换了事物的本质，认为物质的自然力和自然事物一旦卷入特殊的社会关系，就变成純粹精神的東西。在阿德勒看来，它們都成了劳动力，因此，正像“经济关系就是精神关系一样，生产力也就是精神的力量”^④。

① 阿德勒：《马克思主义問題》，第3頁。

② 阿德勒：《唯物史观讀本》第1卷，1930年柏林德文版，第157頁。

③ 阿德勒写道：“只有这样，这种自然力才加入人的关系中去，只有这样，自然力才成为社会的力量，而且只有这样，自然力同时才成为人的力量，因为自然力受到人的意志和目的自觉的控制，从而也就成为他們的即人的生产力。”（同上书，第162頁）自然力只有加入人的关系中才是社会生产力，自然力只有在人的关系中才是生产力，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自然力并不因此而丧失其物质性，也不丧失它作为物质客体而具备的全部特性。

④ 同上书，第163頁。

阿德勒认为,这才是对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釋。馬克思主义只有拋棄了唯物主义,才成为科学的、認識批判論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东西。正如我們在上面看到的,对阿德勒來說,唯物主义是荒謬的。从物质运动中产生活生生的东西和产生意識,是不可思議的。这样說是可以的,但是无法理解。为了使所有上述观点符合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明确断定的他們是唯物主义者的說法,阿德勒企图证明,“唯物主义”这个術語仅仅受到历史的制約,是为了反对唯灵論而提出来的,实际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现实主义的实证論者。“但是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它是**实证的唯物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实证的唯物主义**,此外不可能是別的东西。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往往毫不含糊地承认这一点。”^①

非常明显,阿德勒根本沒有理解馬克思主义的各项主要原理,而是对它們作了歪曲的解釋。这表现在阿德勒对馬克思主义的主要問題所作的一切說明和解釋中,尤其表现在最重要的实践問題上。馬克思在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第一条里,曾在根本上同时把費尔巴哈分为唯心主义的費尔巴哈和非辯证的唯物主义的費尔巴哈;阿德勒对于馬克思在这里所表述的中心思想的理解,当然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在談到這個問題时,阿德勒得出結論說:“可見,馬克思在这里认为,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由于它只承认客体,也就是只承认物质的联系,因而沒有給人的活动留下地盘,这样,唯物主义也就可能把一切精神的东西仅仅看作某种从外表上可以被感触的东西,看作物质的产物,而不能从精神的东西的內在主观活动中对它进行了解。”^②

① 阿德勒:《唯物史观讀本》第1卷,第100頁。这种毫不含糊的地方在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每当談到“现实的”或“实际的”(wirklich)东西的时候,都把它理解为物质的东西,或者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明确地把它与物质的东西等同起来;可是阿德勒却反过来企图证明,在这里,物质的东西只能理解为“实际的”、現存的、实证的、既成事实的东西——而这些与唯物主义的特征是沒有联系的。

② 同上书,第92頁。

在这里,問題当然根本不在于“內在的主观活动”,因为这是在馬克思以前很早就存在的十分常見的唯心主义論題,在这个論題上,馬克思与他的哲学的前輩們没有什么不同。这个論題同时也是正确的(因为精神的东西必然是主观的、內在的活动),但是它是片面的。人的本质問題絕不仅限于此,而馬克思主义的問題更不仅限于此。

整个馬克思主义再一次被顛倒了过来。既然意識是第一性的东西,由此就会得出結論:人之所以具有社会性,不是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上,“而是因为人可能生活在社会上,因为人在自己的自我意識中已經直接是社会性的了”^①;因此,把历史过程划分为物质的因素和观念的因素,完全是一种非批判的态度,归根到底不仅需要拋棄唯灵論,并且也需要拋棄唯物主义,而应当坚持認識批判論关于意識的学說。这种关于意識的認識批判論学說(Erkenntniskritische Bewusstseinslehre)“根本不可能提出像恩格斯称之为哲学基本問題那样的問題:精神是第一性的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相反地,关于意識的認識批判論学說无疑是从第一性的东西出发,也就是从我們的經驗出发,并提出問題:它为什么能够如此。由于經驗除了在經驗意識过程中以外,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所以只有經驗意識才是真正的批判思維的发源地。因此,只有在我們的意識中才能区分出‘精神’和‘物质’。我們的經驗当然并不是首先由精神产生的,但同样也不是由自然界产生的,而只有在我們的經驗中我們才能够體驗到精神和物质之間的区别,并且只有通过我們的意識的各种形式才能體驗到这种区别”。^②

不用特別着重指出,阿德勒本着新康德主义的精神,不仅得出了意識第一性的結論,而且事实上把现实的全部內容都納入意識

① 阿德勒:《馬克思主义問題》,第6頁。

② 阿德勒:《唯物史觀讀本》第1卷,第120頁。

的規定性之中^①。

为了使馬克思主义摆脱一切形而上学，阿德勒特別坚持說馬克思主义不是任何世界观。馬克思主义提出的問題就是認識社会現象和社会过程，因此，它是一种关于历史的規律、經濟范疇的实质和社会經濟发展的实质的学說。所以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是一种新的正确的社会学說的开端，是一种真正名副其实的社会学的开端”^②。但是这种科学本身与任何世界观都毫无固定的联系。相反的，正如考茨基所主張的那樣，在阿德勒看来，唯物史观既可以同唯物主义世界观合并，又可以同唯灵論世界观合并，还可以同泛神論或无神論的体系合并。不仅如此，而且馬克思主义是不以任何哲学为基础的。“相反地，必須說，不仅需要拋棄把馬克思主义与某种世界观等同起来的做法，而且也需要拋棄因某种哲学給馬克思主义奠定基础而把馬克思主义与这种哲学联系起来的企图。”^③

虽然阿德勒从实质上把馬克思主义归結为唯物史观，也就是归結为可以以任何哲学为基础的科学，并且对唯物史观作了新康德主义哲学的解釋和論证，但是他在理解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倫理学的根据方面，与具有社会主义傾向的其他新康德主义者，如施陶丁格尔和沃倫德尔，是不同的。施陶丁格尔和沃倫德尔，以及追随他們之后的伯恩施坦及其同道者，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倫理学的公认原則，因而把康德也算作德国社会主义的先驅，阿德勒不同意这种說法。他认为，根据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运动，因而是一种自然現象，当然，它不具有物理的本性，而具有社会的本性。因此，应当把这种現象本身看作事实，而不应当看

^① 在上述著作第 141 頁上写道：“思維作为人的思維，也就是作为一种心理过程，沒有大脑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意識作为精神的特种基本規律，沒有大脑不仅可能存在，而且也不可能用其他方式来理解，因为大脑本身就是意識的內容，是意識的思想規定性。”

^② 阿德勒：《馬克思主义問題》，第 63 頁。

^③ 同上书，第 64 頁。

作价值。可見，馬克思主义“只和这种历史运动的现实的因果根据有联系；任何倫理学的根据都意味着否定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意味着直接根据康德的說法把截然不同的理論經驗和实践經驗的观点不加批判地混淆起来”^①。由于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倫理学不是科学，所以馬克思主义不能由倫理学来补充，也不能以倫理学为基础。

可見，奧地利馬克思主义中的阿德勒流派，在使馬克思主义康德化方面，几乎走得最远，它完全貫徹了認識批判論的結論，把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归結为認識批判論的唯心主义，把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归結为用唯心主义来解釋的馬克思的范疇。

阿德勒在《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1922年)和《政治民主还是社会民主?》(1926年)两书中所表述的政治理論观点，基本上和我們將更多地談到的鮑威尔的观点相同，因为鮑威尔在政治方面是战后奧地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例如，阿德勒比考茨基清楚地看到了“多数原則并不是民主制的原則，而是共同利害的思想”^②，而且看到了政治民主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論，“这种理論的主要錯誤是很明显的，因为它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社会”^③。同时阿德勒还着重指出，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是拾了資產階級批評的余唾，尤其是在德国，正当觉醒起来的資產階級从专政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利益时，社会民主党却成了民主制的热烈捍卫者。虽然阿德勒正确地指出“資產階級国家的法律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有产階級对非有产階級实行专政的性质”^④，但是他在这方面仅仅认为专政和政治民主并不矛盾，但和社会民主却是矛盾的。可見阿德勒对社会主义政权(不管名称如何)的实质仍然是

① 阿德勒：《馬克思主义問題》，第143頁。

② 阿德勒：《政治民主还是社会民主？》，1926年柏林德文版，第17頁。

③ 同上书，第59頁。

④ 同上书，第92頁。

不明确的。

阿德勒同意鮑威爾的意見，認為資本主義可以改善生活狀況，但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目的，並不是僅僅為了謀求物質利益，而且也要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因此，像鮑威爾所主張的一樣，爭取自由的思想成了引導工人階級鬥爭的主要思想，而不問資本主義制度下物質條件是否得到了改善。在這方面，阿德勒尤其歡迎鮑威爾於1919年在奧地利建立合法的工廠委員會的創舉，並且認為這是改造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最重要的步驟，可是工人本身尚未充分了解這一步驟的意義。在這裡，他又一次過高地估計了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推行個別社會主義措施的作用，這是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特點。問題不在於這是不是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定階段和工人階級的組織，而在於他們不理解，只要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些都只是暫時的治標措施，所有這些改革都不能模糊革命政党的主要任務，也就是說，革命政党任何時候都不能在革命形勢面前束手無策。

魯道夫·希法亭(1877—1943)

在第二國際的許多理論家中間，魯·希法亭所留下的著作，幾乎具有最長的保存價值，他的著作也像考茨基在理論活動和革命活動初期的著作一樣，同他後期的政治活動是互相矛盾的。

希法亭在醫學院畢業以後，直到參加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後來又參加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才對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問題感到興趣。他和阿德勒一起創辦了著名的《馬克思研究》期刊；1906年他已經參加《新時代》雜誌編輯部工作，1907—1915年他是《前進報》的政治編輯。這個時期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後來和考茨基一起漸漸轉入中派；在戰爭期間他和考茨基一起參加了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創建工作，這個黨後來終於和謝德曼同流合污了。

除了經濟和經濟政策方面的許多論文以外，他於1910年在維也納出版的《財政資本》這本重要的著作占有特殊的地位，這本書

丰富了这个方面的馬克思主义理論。

希法亭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和列宁的观点是不同的，我們在后面将会看到这点；他的观点是从这样一种假設出发的：財政資本是流通过程发展的結果，也就是信用体系发展的結果。因此，这部著作一开始就談到貨幣理論，分析信用，闡述和研究股份公司的創立，即闡述和研究銀行的作用，最后以分析財政資本而結束。

虽然希法亭对貨幣的分析，像后来許多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不够詳尽、不够妥当的，可是他在后面的几章中却作出了非常中肯的、別出心裁的和成效卓著的分析和結論。不用特別強調，他的整个著作一方面以馬克思的《資本論》为依据，另一方面又以資本主义发展中所出現的新的事实和趋势为依据。

股份公司的建立，也就是資本的积聚和集中的問題，馬克思早就觉察出来并且对它們作过研究，希法亭通过对这些問題的分析，得出結論說：“随着股份公司制度的推广，經濟的发展摆脱了在財產轉移方面的个别偶然性；財產的轉移只牵涉到股票的命运，而不触及股份公司的命运。因此，企业的集中可能快于財產的集中。企业的轉移和財產的轉移各有其特殊規律，但是都存在着集中的趋势。只不过在財產的轉移中，这种趋势带有較多的偶然性和較少的强制性，并且在实际上往往为一些偶然因素所遏止。这种表面現象使某些人认为可以通过股票实现財產的民主化。工业的集中脱离財產的轉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样一来，工业的集中只要遵守技术經濟規律就行了，而不受个人財產范围的限制。工业的集中不是財產的集中，必須把工业的集中与由于財產轉移而出現的、并与財產轉移同时发生的积聚和集中分开。”^①

希法亭认为，由于財產轉化为股份財產，所有者的权利变小了，他只有权支配剩余价值，而无权支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这又

^① 希法亭：《財政資本》，1958年貝尔格莱德塞文版，第152頁。

使大量股票的持有者对小額股票持有者拥有无限的权力，而且使支配生产的人数不断减少。通过分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希法亭对于防止利潤率的平均化和由此产生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問題作出了如下的結論：“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銀行事业走向集中。集中起来的銀行体系反过来又成为一种重要的推动力量，它促使资本主义的集中达到最高的阶段，即組成卡特尔和托拉斯。后两者又对銀行体系发生什么作用呢？卡特尔或托拉斯是資本实力极其雄厚的企业。在资本主义企业相互依賴的情况下，这些企业誰隶属于誰的問題，首先是由資本的实力来决定的。已很发达的卡特尔化的过程，它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使銀行也进行合并和扩大，以免受到卡特尔和托拉斯的控制。因此，卡特尔化的过程本身加速了銀行的合并，而銀行的合并反过来又加速了卡特尔化的过程。”^①

希法亭在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新因素时得出結論說，卡特尔化意味着使参加卡特尔的企业收入更有保证，更加均衡。它排除了竞争，活跃了这些企业的股票行市，增加了投入这些企业的資本的稳定性。“这使銀行能够扩大工业貸款，从而較之过去，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工业利潤的分配。这样，銀行和工业之間的关系由于卡特尔化而变得更加密切，同时，工业投資的支配权日益轉入銀行的手中。”^②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工业对銀行的依賴。工业中愈来愈多的資本不再属于工业家，而另一方面銀行也需要把愈来愈多的資本投入工业，从而銀行日益变为工业資本家。“可見，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轉化为工业資本的銀行資本，即貨幣形式的資本，我把它叫做財政資本。这种資本，对于所有者來說，經常保持貨幣形式，所有者以貨幣資本的形式，也就是以能带来利息的資本的形式来存放这种資本，并且随时能够通过貨幣形式收回这种資

① 希法亭：《財政資本》，第263頁。

② 同上書，第265頁。

本。但是这样存入銀行的資本，絕大部分实际上都轉化成为工业資本，即生产資本(轉化成为生产資料和劳动力)，并且同生产过程发生联系。工业所使用的資本中，愈来愈多的部分是財政資本，也就是归銀行支配而由工业家使用的資本。”^①

希法亭根据上述的分析和发现，最后得出結論說，在这里，出現了資本联合，也就是出現了資本家的联合。随着財產集中的发展，“支配銀行的虚拟資本所有者愈来愈和支配工业的資本所有者合而为一。而且，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样，支配虚拟資本的权力日益落到大銀行的手里。

我們看到工业愈来愈依賴銀行資本，但是这决不是說，工业巨头也依賴于銀行业的巨头。相反地，正像資本本身在最高的发展阶段上成为財政資本一样，資本巨头，即財政資本家，通过控制銀行資本的方式，日益把控制全国資本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在这里人的联合起了重要作用。”^②

希法亭結合着卡特尔化和壟断化而考察和分析了另一个現象——資本輸出的現象。卡特尔化意味着形成大量超額利潤和集中大量銀行資本。同时卡特尔也意味着減緩投資速度，因为参加卡特尔的工业限制生产，而未参加卡特尔的工业則由于害怕利潤率下降而不敢进一步大量投資。“因此，一方面用于积累的資本数量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投資的可能性却减少了。这个矛盾需要解决，而且通过資本輸出得到了解决。資本輸出本身并不是卡特尔化的結果。这是和資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割的現象。但是卡特尔

① 希法亭：《財政資本》，第265—266頁。

② 同上書，第266頁。該書第345頁也同樣指出了这种联系：“財政資本意味着資本的联合。原先为分散部門的工商业資本和銀行資本，現在处于大金融資本家的統一領導之下，工业家和銀行家們都通过紧密的人事联合与这些大金融資本家保持联系。这种联合本身的基础，就是通过庞大的壟断性的联合会来消除个别資本家之間的自由竞争。当然，資本家階級对国家政权的态度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

化大大地加强了这种矛盾,而且使資本輸出的問題趋于严重。”^①

所有这些現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資本主义的政策本身以及資本主义对国家的关系。希法亭认为,財政資本的政策企图:第一,建立更大的經濟势力范围;第二,通过保护关税的办法抵制其他国家的竞争;第三,使这种經濟势力范围变成本国壟断組織进行剝削的地区。“但是这种思想体系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完全对立的;財政資本不希望有自由而希望控制;它不主張个别資本家独立存在,而主張束縛个别資本家;它厌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而要求組織起来,当然这只是为了能够进行規模愈来愈大的竞争。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为了保持和加强自己的优势,它需要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須用关税政策和稅收政策来为它保障国内市場,并且使它易于爭夺国外市場。它需要一个政治上强有力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自己的貿易政策中用不着考虑其他国家的敌对利益。最后,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能够使它的財政利益在国外受到重視,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威力迫使較小的国家訂优惠的定貨合同和貿易协定。它需要一个能够在世界上到处进行干涉,以便使整个世界都成为本国財政資本的投資場所的国家。最后,財政資本需要相当强大的国家,以便由这个国家来推行擴張政策和吞并新的殖民地。”^②

希法亭对于上述整个社会經濟变动所产生的后果作了非常明确而且生动的描述。与以前的自由主义相反,資產階級今天力求擴張、掠奪和宣布强权就是公理。要求推行擴張政策的願望改变了整个資產階級的世界观。“資產階級不再是爱好和平和主張人道的資產階級了。从前主張自由貿易的人深信自由貿易不仅是最正

① 希法亭:《財政資本》,第274—275頁。希法亭认为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談到資本輸出,即投到国外的資本仍然归資本輸出国支配,而且这种資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仍由資本輸出国的資本家支配(參看同上书,第361頁)。

② 同上书,第386—387頁。

确的经济政策，而且是和平纪元的开端。财政资本早就抛弃了这个信条。资本主义利益的和谐一致对它来说是丝毫不相容的，它知道竞争越来越变成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和平的理想黯然失色，人道的思想为国家至上和国家实力的理想所代替。……今天的理想是保证本民族对世界的统治：这种愿望就像资本追逐利润的愿望一样，是没有止境的，而且前一种愿望是由后一种愿望产生的。资本成了世界的征服者，每当征服一个新的国家，它只算是达到了一个需要突破的新的界线而已。这种愿望成了经济上的必然性，因为在这方面稍微处于落后状态，就要减少财政资本的利润，降低竞争能力，最后可能使较小的经济地区不得不向较大的经济地区缴纳贡物。这种以经济为基础的愿望，通过明显地歪曲民族的观念来为自己制造思想论据，民族的观念已经不再承认每个民族有政治自决权和独立的权利，也不再在民族范围内体现一切人平等的民主原则。相反地，垄断组织在经济上的特权地位，表现了本国民族应当享有特权的地位。这个民族就成了超越于其他民族之上的得天独厚的民族。由于征服其他民族是要靠暴力、也就是要靠十分自然的方法来实现的，于是就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统治民族是靠自己自然的特点，即靠自己的种族特点而取得统治的。这样一来，财政资本追求权力的愿望，就在种族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披上了自然科学的外衣；财政资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合乎自然科学的，是必要的。一律平等的民主理想被寡头统治的理想所代替了。”^①

希法亭通过卓有成效的分析所得出的最后结论就是，财政资本就其发展趋势来说意味着确立对生产的社会监督，但是这种社会化却具有对抗的形式，因为管理社会生产的权力保留在金融寡头的手里。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同时也就是资本巨头的专

^① 希法亭：《财政资本》，第387—388页。

政。它和其他国家資本的利益发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时日益严重地触犯到那些飽受財政資本剝削而且被迫訴諸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希法亭最后得出結論說，在“敌对利益的激烈冲突中，資本巨头的专政将轉化为无产階級专政”^①。

希法亭虽然有某些錯誤論点（这些錯誤論点特別是在分析財政資本中尚未过多地暴露出来），但是他的著作标志着重要的理論成就，这些成就列宁在他的論帝国主义的著作中曾多方面地加以利用。

我們看到，虽然希法亭把財政寡头的权力看作財政寡头的专政，看作必須經過冲突才能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結局的国内階級对抗的一个方面，但是他在自己的著作的某些地方却設想，通过財政資本的发展似乎可以結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在殖民政策和擴張政策的基础上似乎可以緩和危机。这些观点在《財政資本》这部著作中还不是主流，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自己主編的《社会》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著作中却愈来愈坚决地提出关于实行計劃經濟的、有組織的資本主义的主張。階級斗争的結局就在于通过議會多数取得集中的国家权力。

明确地指出当前发展阶段上的国家資本主义趋势，这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家們，特别是对于奧地利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倫納和鮑威尔）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所有这些人对于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对于緩和危机，消灭壟断組織的競争等等，以及对于今后階級斗争动态的問題，全都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在这个基础上他們都与資產階級合作，这种合作必然要在决定性关头使他們遭到惨重的失敗。

希法亭也是这样，他的斗争生涯在战前基本上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渡过的，他和考茨基一起宣布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是

^① 希法亭：《財政資本》，第 427 頁。

同右派合作，而不是同斯巴达克派合作；这事实上就等于同资产阶级合作，来扼杀无产阶级革命。后来他坚决不加入第三国际，而参加了德国政府，出任财政部长和社会民主党的議員。法西斯上台以后，他逃往法国，法国投降后，被拘留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且死在那里。

卡尔·倫納(1870—1950)

除了鮑威尔和希法亭以外，倫納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以自己的理論活动和政治活动对该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影响的第三位代表人物。他的改良主义使他进一步背棄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原理，并且直接与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右派合作，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些观点和活动提出了一套理論。倫納在本世紀初就由于发表論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的著作而負盛名，这本书直到今天几乎仍然是以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法律問題的仅有的尝试。倫納在这本书中特別研究了法和經濟的关系問題，即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和經濟基础的关系問題^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与庫諾夫和倫施一起，为帕尔烏斯所主办的《钟声》杂志撰稿，这就表明他在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就显然代表右派的方針。他早在1917年就在《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这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信条，他后来在其他許多著作中所提出的主要思想，都曾經在这本书中提到过。

^① 倫納认为法和經濟在历史进程中是矛盾的，并得出結論說：第一，“社会可以在不改变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得到改造”；第二，“法不是經濟发展的原因”；第三，“經濟中的变化不会直接和自动地使法发生变化”；第四，社会的基質就其本身來說沒有破裂和飞跃，只有进化，而沒有革命。在任何情况下我們都可以看出，法律上层建筑是受另一种規律支配的；我們可以看出，在規範的領域內革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而且革命也对基質发生反作用。”（《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1960年貝尔格萊德塞文版，第135、136頁）关于这个問題还可以參閱伊·布·帕苏坎尼斯的名著《法学概論和馬克思主义》（1924年）。

倫納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代表这样一派人，他們完全拒絕革命的斗争方式，并且企图創立一种理論，认为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其他某些組織形式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他們的某些思想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合作化的陈旧的思想，而另一些思想同样也是陈旧的，只是在新的条件下出現和披上了新的外衣而已（如拉薩尔早就着重指出过国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杠杆的問題）。

在倫納看来，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經不再存在。問題不仅在于使一系列的經濟部門实现国有化，而且还在于“使国家組織滲入私人經濟的骨髓”^①，因此要有意識地加以肯定和引导。这种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經濟措施来实现的国家领导，就必然每天与資本家的私有观念发生冲突，就必须約束和强迫資本家，逐漸排除他們的势力，最后取而代之。“国家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杠杆”^②，因此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也就等于使国家政权摆脱資本的統治。像通常一样，倫納在这里也引用馬克思的辞句，虽然他从来不願意談到馬克思的基本原理——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列宁是馬克思的基本理論的真正继承者，而倫納和他的其他同道者則是改良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者。

正因为如此，倫納的进一步的論点也就可以理解了。他虽然正确地认为无产阶级不是在任何时刻和任何国家都可能掌握政权，可是他由此而得出結論說，认为无产阶级通过迅速地破坏和改变制度，通过群众的政治变革就可以取得政权，乃是一种常見的幻想。同时，倫納认为“經濟的社会主义”和国家的相互作用是一个逐漸发展的过程，这一点我們在下面还将談到。倫納由于考虑到在战争期間国家大力干預资本主义經濟的現象（倫納把这种現象称之为“Durchstaatlichung”〔“全面国有化”〕），而得出結論說，“在战争期間直接和大量推行的、日益加强的經濟国有化，使得无产

① 倫納：《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1918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第12頁。

② 同上书，第28頁。

階級对国家的关系成了无产阶级政策的中心問題”^①。

但是倫納沒有遵循馬克思的观点，沒有明确地指出国家的階級实质，却企图使这些国家資本主义的萌芽日益具有某种超階級的意义，也就是把他們看做某种唯一的組織形式，一旦消除資本对国家的影响，这种組織形式本身就会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杠杆。虽然倫納和当时其他的社会民主党人清楚地看出国家資本主义的强大趋势，但是他們都根据自己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来修正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問題。倫納写道：“今天的国家从經濟上来看是一个經濟共同体，是經濟实体；国家在地面上所占的各个空間，就成为单独的經濟地区，国家在其境內所管轄的那一部分人口，成为經濟上的民族。”^② 而从这个問題的思想方面来看，倫納认为“国家是一个經濟地区的思想上层建筑，是这个地区內为了达到統一而形成的公开的合法組織。”^③

毫無疑問，这样一些理論观点只会模糊无产阶级和一般社会主义者正确地認識时代和对待資產階級国家以及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等主要問題。倫納不是根据現狀明确地教育无产阶级仍然必須把現代的国家看作自己的敌人的机构，而是教育无产阶级把国家的命运看做自己的命运。“随着国民經濟的日益国有化，我們必須認識到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一致的。”^④ 倫納引用了所謂工人階級的情感来证明这一点，这就是，工人階級不仅感到自己是人民，而且感到自己就是国家。因此，当然有必要把政权机构的国家与民族共同体（Volksgesamtheit）的国家分开。

但是，倫納并不认为資本主义会由于本身的內在規律而走向

① 倫納：《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第34—35頁。

② 同上书，第127—128頁。

③ 同上书，第128頁。

④ 同上书，第379頁。

社會主義。“一些社會主義者希望從資本主義的自動發展中期待一切，這是嚴重的錯誤。資本絕不能自行消失。資本主義不會按照內在規律而轉化為社會主義！”^①

倫納以及幾乎所有其他著名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都抽象地在理論上主張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兩種可能性：即和平的道路和革命的道路。他們對第二種道路雖然加以強調，但只是在書面上承認而已，我們在後面還可從鮑威爾那里看到，他們更多地把第二種道路看作防禦性的和最後的措施，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措施當然總是要遭受失敗的。倫納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在一個國家中可能不通過暴力革命突破一個缺口，而在另一個國家中，可能是在大多數的國家中，則只有通過與舊制度的代表進行暴力衝突才能突破一個缺口”^②，二者必居其一。不僅如此，“社會主義者必須經常準備實現後一種可能性，而首先要準備實現第一種可能性。”^③

毫無疑問，這是在理論上唯一可能的解決辦法，而且是徹底辯證的論點。但是倫納根據上述分析和下面我們將要談到的其他某些論點，却竭力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使工人階級的活動走向改良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經濟正在日益社會化（積聚、集中、國家的影響等等）。可見，在倫納看來打碎這樣的國家是不可理解的。而是恰恰相反！“顯然，我們主張把現存的托拉斯和康采恩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我們主張在沒有康采恩的地方由國家建立康采恩。”^④倫納的主要意圖就是使無產階級相信，國家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必不可少的組織，因此對國家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是一個極為有害的錯誤。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之所以捏造出這種對國家的“虛無主義”態度，只不過是為了掩蓋自己的改良主義和掩蓋他們同

① 倫納：《作為完整過程的經濟和社會化》，1924年柏林德文版，第370頁。

② 同上書，第370—371頁。

③ 同上書，第371頁。

④ 同上書，第373頁。

資產階級國家的合作。換言之，馬克思主義並不主張對國家採取虛無主義的觀點，所以不應當把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混淆起來。

倫納在他以後的著作《實現的途徑》中走得更遠了。國家的概念擴大為“合作社的國家”、“職工會的國家”、“經濟的國家”等等，這樣一來，任何比較廣泛的社會組織都具有了這種特點和性質。在以上著作中倫納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過程本身，認為它走着社會化的道路，為此必須首先掌握國家，而現在他又想出了另一些途徑，它們是資本主義發展內部的社會主義的主要體現者：合作社組織、工會組織、社會保險機構、消費聯合會等等。“可見，經濟上的民主的國家正在**全面地成長**：一個新的世界正在舊世界的卵翼下發展起來。長期以來社會主義的理論都盲目地只注意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結構的變化、資本主義的擴展和周期性不安，而且等待將來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一定時期經過突然轉變而降臨人間。這種社會主義理論也模糊地看到了我們所指出的經濟民主的各種個別現象，但是至今沒有**考慮到這些現象的總體**。這種理論尤其是忽略了，**在這種社會運動內部**，社會主義的巨大發展正在一步步地伴隨着資本。”^①

因此，在倫納看來，既要避免那種由於過分地指望經濟過程的自發作用而產生的政治上的無為主義，也要避免那種只考慮無產階級的政治作用（似乎通過一次打擊就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和實現社會主義）的超積極主義^②。因此在倫納看來，“在實現社會主義方面主要的實踐問題就是在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之間實行合理的勞動分工”^③。

因此，倫納把問題的實質事實上歸結為一系列的方法，他說這

① 倫納：《實現的途徑》，1929年柏林德文版，第128—129頁。

② 同上書，第129頁。

③ 同上書，第136頁。

些方法是新的东西，其实这些方法在当时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旧货色：这些方法是蒲鲁东的互助主义、英国的合作社运动、费边派的改良主义和拉萨尔的国家主义的混合体。我们并不想以此来否定现代资本主义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和工人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而对国家施加影响的必要性。而且这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之一。尤其是在目前国家日益处于独立地位的时期，这种斗争方式必然会显得更有成效和必不可少。但是另一方面他忽略了事物的真象，忽略了现代国家依然具有的明显的阶级实质，忽略了阶级矛盾及其尖锐性，并且散布幻想（在可能发生例外的条件下），认为资产阶级容许无产阶级通过一般的议会活动取得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因而要求无产阶级尊重国家——这在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狂的时期就意味着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归根到底，这就是宣传某种国家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无论过去和将来都不是社会主义^①。

从伦纳对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所作的评介，以及从他对于解决国家之间的敌视所采取的观点，也可以看出他对国家的崇拜到了何等地步^②。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时候，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是正确的。甚至当俄国爆发革命时，伦纳还在他1917年的著作中指出，看来如果附和季卜克内西的态度，就只会导致这样一个后果：德国崩溃，波兰和其他某些

^① 还必须着重指出，伦纳尤其是在他的后期著作《人和社会》（1952年）和《现代社会的变化》（1953年）中，清楚地看到，通过法令来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并没有消灭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和消灭剥削。排除资本家并不意味着排除轮流执政和轮流进行剥削的行政人员集团。伦纳认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并未实现民主自治，却造成了技术至上制度和官僚的无上权力。

^② “在爆发战争时，除了支持自己的国家，不可能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但是人们却不公正地、厌恶地把这种支持称之为社会爱国主义。那些信口谩骂的人们应当首先证明，在实践上和道义上有没有可能采取其他某种行动，在这种时刻有没有可能采取国际主义的行动！”（伦纳：《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第353页）

民族不会得到自由，而俄国的沙皇制度则会继续取得胜利。因此，“取得胜利的沙皇制度会在俄国战胜一切革命的尝试，可见备遭非难的謝德曼派的社会爱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也像布尔什維克的社会革命主义一样，都参加了俄国的革命”^①。

毫无疑问，这对“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玩弄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没有必要再列举出倫納的其他许多类似的观点：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的观点，关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前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观点，关于进一步为艾伯特和謝德曼的立场进行辩护的观点等等。只要着重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倫納后来出任了奥地利共和国的内阁总理，他完全有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意图。然而他却遭受到和所有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相同的命运：先是遭到多尔富斯的基督教社会党人的反动政权的驱除，继而又遭到法西斯党徒的驱除。

奥托·鮑威尔(1882—1938)

在奥地利馬克思主义者中间，鮑威尔在政治上和理論上几乎是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观点也就是这个党的政治活动的基础。由于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民族问题是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鮑威尔正是在这一方面对民族问题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但是他的这一著作就已经表现出某种动摇的理論观点；正因为他的著作有这样一个特点，才会在后来的事件中公然提出妥协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遭到彻底的失败，并使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得到胜利。鮑威尔論述民族问题的那本书，虽然是一部馬克思主义理論家的著作，但是它关于理論和实践问题的许多論点和結論，却完全没有

^① 倫納：《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第368頁。

这种性质。他认为“民族問題只有用**民族性格**的概念才能解釋”^①，这个出发点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心理主义的特色，而这种特色在許多方面对以后的分析打下了烙印。

鮑威尔的分析，不是从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政治、語言、文化等等的共同体出发（在这种共同体中，为了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利益等等，也必然会形成某种相对固定的性格特点），而是从結果出发，因此他首先把民族說成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民族是性格的共同体，因为从一定时期同民族大部分人的身上可以发现一系列彼此一致的特点，因为一切民族作为人來說虽然具有許多共同的特点，但各个民族毕竟都有一些使它們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的固有的特点；民族并不是**絕對的性格共同体**，而只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因为同一民族的人，尽管在全民族共有的特点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他們毕竟另外还有一些个人的特点（包括地方的、階級的和职业的特点），这些特点把他們彼此区别开来。”^②

接着鮑威尔指出，民族不仅仅是一个具有世代相傳的性格特点的性格共同体，而且首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一点并不是决定人們的民族性格的原因，因为人們的民族性格是由人們的命运决定的。所以民族的历史有两方面的作用：发揚性格特点和文化成果。“**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但这种命运的共同体的作用，一方面是从性格上继承由民族共同命运形成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傳遞由民族命运所特别决定的文化財富。**”^③

鮑威尔的基本概念、即他认为对民族有本质的影响的“民族性格”，是心理主义的。这种心理主义在他試圖从狹义上給这一概念下定义时，表現得尤为明显。这种狹义的民族性格概念，在除去了

① 奧·鮑威尔：《民族問題和社会民主党》。《馬克思研究》杂志第2卷，1907年維也納德文版，第2頁。

② 同上，第6頁。

③ 同上，第24—25頁。

各个民族的全部肉体的和精神的特点之后,所指的就“只是**志趣意向的差别**,即同样的动力引起不同的运动、同样的外界情况引起不同的对策这样一个事实”^①。另一方面,鮑威尔在闡述形而上学的和心理学的民族理論时,在同意大利的社会学家(他們大概举出了六个要素)进行論战时,又表示他也不否认說明民族特点的其他一些因素。“这样我們就不是一般地罗列民族的因素,而是首先提出了一个**体系**:作为动因的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創造文化的素材的共同来源,以及作为傳播共同文化的媒介的共同語言(語言一方面是共同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产生共同的文化)。”^②

根据以上所述,对下面这一情况就不会感觉奇怪和偶然:鮑威尔在民族解放和建立本民族国家等問題上,罗列了解放的心理因素以及文化因素,却忽略了解放的社会学因素。在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問題上,鮑威尔认为,这些国家各民族工人阶级的綱領性要求,应该是“**民族自治,民族自决**”^③。其实,在这里也表现出鮑威尔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表明他忽略了現代历史上已明确表现为建立各民族**独立**国家的趋势的历史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因此,鮑威尔不是从列宁理解的意义上把自治和自决理解为分离和完全的国家独立,而实际上是把它們理解为联邦。他說,“可以設想的实现民族自治的最简单的形式,就是**把民族組織为地域团体**(Gebietskörperschaft)。各个民族居住的地域,是彼此分隔的。各民族在他們的疆界以內建立国家,独立地考虑自己的文化要求,調节居住在这个地域之內的所有人的关系,即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整体的

① 奥·鮑威尔:《民族問題和社会民主党》。《馬克思研究》杂志第2卷,第111頁。

② 同上,第131頁。考茨基早在《民族性和国际性》一文(1907—1908年)中,就已經駁斥了鮑威尔的民族定义中的这种心理主义,他直截了当地譴責鮑威尔对建立民族国家这一趋势的力量估計不足。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和民族問題》一文(1913)中,列宁在就罗·卢森堡关于民族問題的观点而写的《論民族自决权》一文(1914)中也同样地駁斥了鮑威尔。

③ 同上,第319頁。

关系。奧地利境內的所有民族組成一个联盟的国家，由它来管理各民族的共同事务，保护各民族的共同利益。”^①

我們在下面还可以看到，在以后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关头，鮑威尔的观点总是暴露出一定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决性。鮑威尔和奧地利的一切其他馬克思主义者，都缺乏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总是寻找种种困难和障碍；据他們看来，由于存在困难和阻碍，必須正視并实现某些必要的中間阶段。鮑威尔在民族問題上不是采取极端彻底的立場，即不是采取宣布民族自决权的立場，而是提出这样的主張：在他认为民族原則还没有足够力量来摧毁多民族国家的时候，先成立联邦作为过渡阶段。虽然鮑威尔已經很清楚地看出，资产階級和帝国主义的現代政策，已不再是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而是建立居领导地位的民族剝削其他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但是他并没有放棄上述观点，只不过希望在联邦的范围内作某种不切实际的改善。鮑威尔設想，若是奧地利帝国完全崩潰，就意味着周圍列强的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也就意味着工人階級的失敗。由于存在着这种忧虑，他认为“奧地利境內各民族”工人的直接目的，“不是实现民族国家，而只是在現存的国家范围内实现民族自治”^②。鮑威尔在他这本书中第 532 頁上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拟定了在各民族民主联盟的国家(Nationalitätenbundesstaat)的基础上解决奧地利民族問題的綱領性原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十月革命爆发以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問題，对欧洲其他国家來說也已成为工人階級一切理論和实践所环绕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鮑威尔又采取了在理論上处于布尔什維克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之間的立場，以致最后在实践上終于走向考茨基的机会主义。

^① 奧·鮑威尔：《民族問題和社会民主党》。《馬克思研究》杂志第 2 卷，第 324 頁。

^② 同上，第 506 頁。

对民主的崇拜，使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家們受到如此强烈的迷惑，以致他們基本上不能正确地分清核心和外壳。他們根本不能从这些分析中得出馬克思主义的結論，根本不能像列宁一样得出这样的結論：一切民主实质上都是专政，无产階級专政实质上要比一切資產階級民主都更为民主，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議會中的多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是多数人的政权。

正当那些暴風雨般的事件如火如荼地发展的时候，鮑威尔写了一本关于苏維埃专政和民主問題的小册子。这本书的第一句話就是一个对問題的非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的提法。鮑威尔在文章的开头写道：“今天有一个大問題吸引住了各国的无产階級，这就是在今天引起爭論的关于民主还是苏維埃专政的問題。”^①我們在后面还可以看到，鮑威尔給民主下的定义虽然不正确，但是他却比別人（例如考茨基、倫納或伯恩施坦）更辯证地分析了革命途徑的問題。他正确地指出，應該考虑到經濟条件和其他情况的差别，因为它们們对各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事件有着不同的影响。所以不應該这样提出問題：“无产階級解放的真正手段，一般說来和就其本身說来，到底是苏維埃专政还是民主；也不應該这样提出問題：是否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必須以民主或专政作为前提。我們應該实实在在地提出問題：对我們的国家和我們的时代來說，真正的武器到底是民主还是专政。”^②

虽然問題的提法比考茨基正确得多，但結論仍然是一样的。鮑威尔也是根据形势錯綜复杂、国内情况严重等等分析，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宣布无产階級专政，从而使奥地利和俄国站在一起，那末这就意味着同协約国发生一場新的战争，而这就意味着这个精疲力尽的民族的灭亡。这样，他总是考虑到种种情况和存

^① 奥·鮑威尔，《苏維埃专政还是民主？》，1919年維也納德文版，第2頁。（我把Rätediktatur譯为苏維埃专政，而不是委员会专政，因为这样更清楚些。）

^② 同上书，第4頁。

在着重考虑，以致不能从一种典型的革命形势中（因为这里所谈的正是革命形势，而不是某种和平状态），不能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总崩溃中得出合乎逻辑的革命结论。鲍威尔在原则上并不否认苏维埃专政，他的结论是：就苏维埃的形势来说，民主是取得政权和最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

我们认为，问题正在于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左右摇摆和机会主义。无论在德国或奥地利，形势都是极其有利于革命的。谁想起“挽救”或“稳定”形势之类的作用，谁就会帮资产阶级的忙。而资产阶级正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复辟。资产阶级一点也没有被民主的幻想所陶醉。它需要自由民主，也需要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来当它的部长（鲍威尔本人就曾出任过部长），但以这样做能使它恢复元气为限。一到紧要关头，资产阶级总是极其粗暴地把这个饼头踢开。因此，这种情景并不能令人感到可怜和震惊，在多尔富斯发动进攻和取缔社会民主党之后，鲍威尔在流亡中对奥地利社会主义的兴衰发展过程作了一番描述和分析，他说：“和平的和‘安适的’奥地利怎么一下子会这样了呢？1918年旧的资产阶级王国崩溃了，当时除了一场一败涂地的战争、遭到破坏的经济、食品的极端缺乏和货币的飞速贬值（这一切简直像洪水一样地泛滥）之外，没有给在这个王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留下任何东西，但是当时在奥地利进行的巨大的改革，要比它的邻国和平得多。当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做到了不用暴力，而用和平的说服的办法平息了、制止了那些从战壕的血泊和泥潭中回到祖国的饥饿群众的愤怒情绪，并使他们在复兴国家的和平劳动中成为有用的人。当奥地利处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专政之间时，它是一个和平的孤岛，在它的东边和西边都在大量地流血。而现在，趾高气扬的法西斯主义却制造谎言，把那些在自己的全盛时代能够如此成功地使饥饿群众采取克制的态度、采取和平的温和态度的人们，说成是一群杀人凶犯，说他们除了给国家带

来血腥灾难之外，沒有起任何別的作用。”^①

工人階級先鋒队的革命政治家不應該抱有幻想，以为在革命形势下挽救資產階級和平息革命情緒的行为，最后会得到資產階級的慷慨賞賜。階級利益毕竟仍然是十分强烈的和起决定作用的，資產階級只是在自己的階級敌人无耻地卑躬曲节和下流地諂媚奉迎时，才奖賞他們。

鮑威尔也参加了布尔什維克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間的热烈的論战，他特意写了一本关于布尔什維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书。书中也表現出了我們在上面指出过的鮑威尔理論观点的特点。鮑威尔对俄国社会的发展作了分析，并試图說明俄国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特点。在这里他也采取了某种中間立場。他并不否认在俄国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也同样地不能丢掉考茨基主义的幻想：民主是根据平等的和自由的选举权产生的多数人的政权。对形式上多数的迷恋，已經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上根深蒂固，以致完全限制他們采取革命行动和对各种事件作出正确評价。鮑威尔也是这样，他不是采取具体的历史的态度来估計时局（这就是說，不問在人口和选票方面暂时形式上的多数屬于誰，欧洲无产階級当时已經先后处在实现革命变革的形势之下），却认为，俄国的发展路綫必然会使农民在政治上占优势，因为农民是大多数！俄国的无产階級专政是少数人的专政，等到广大人民群众有了高度政治觉悟的时候，这种专政一定会被民主所代替。“这一发展过程在最初可能是这样进行的：俄国农民逐渐学会行使苏維埃制度給予他們的各种权利，从而使苏維埃制度中的各种机关为实现农民的目的服务，把那个由于农民缺乏政治积极性才成为无产階級专政工具的苏維埃制度变成实现农民意志的工具。可是，农民的进一步兴起，最后定会使苏維埃制度丧失它的整个社会基

^① 奧·鮑威尔：《奧地利工人的起义》，南斯拉夫奧地利侨民救济总会 1934 年塞文版，第 6 頁。

础。因为苏維埃制度只是一种法律形式，它体现着无产阶级少数人的专政，而这种专政只是由于农民群众处于封建的愚昧无知状态才成为可能和得到支持。只要农民即国内絕大多数人本身掌握了政权，他們也一定会粉碎少数人专政的法律形式。农民政权可能暂时地采取依靠农民群众支持的愷撒主义的形式。但是国内大多人的政权即群众政权的持久的法律形式，却是民主。

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民主制度的胜利，而是走向民主的一个发展阶段。无产阶级的专制制度所負的历史使命是：提高俄国的农民群众，使他們摆脱在沙皇暴政下所处的不文明状态，从而为俄国实行民主創造前提。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像布尔什維主义的理論所說的那样，是俄罗斯国家的最后的、最終的形式，它将一直保持到国家完全‘消亡’为止。恰恰相反，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俄国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至多也只能延长到俄国人民群众在文化上足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为止。”^①

鮑威尔极其简单地解决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的問題。他认为原因实质上是俄国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文化落后^②。

鮑威尔也和德国的和奥地利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总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他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和少数人的暴力統治是两回事，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比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广泛的民主；他也不懂得，貧农和小农，不管他們的主观願望怎

^① 奧·鮑威尔：《布尔什維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1920年維也納德文版，第69頁。

^② 鮑威尔的原話如下：“正是俄国工人的文化落后說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由无产者群众本身的統治变成无产阶级少数先进人物的专制。专制的社会主义是在俄国农民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行政治民主，而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行工业民主的发展阶段上爆发社会革命的必然产物。专制的社会主义是俄国文化落后的产物。”（同上书，第63—64頁）

样,必然会是无产階級建設社会主义的同盟者。

因此他也会得出这样一个荒謬的看法(如果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來說):“工业自治制度(industrial selfgovernment)的建立,不是来自专政,而只能来自有計劃地由政治領域向国民經济領域扩大民主。”^①好像无产階級专政真的沒有实行經济民主即一般社会民主的任务,好像已經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总还不是无产階級专政!

所以毫不足怪,鮑威尔根据这些观点就給民主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国家权力的分配,只是由社会力量因素所决定,而不会遭到暴力物质手段的破坏,以致有利于某一階級。”^②鮑威尔仅仅是从形式上来理解民主,而不能理解民主的本质。他虽然也看到,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在內,都是以暴力作为基础的,但是他认为国家使用这种暴力,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法律規章得到尊重,以防少数違法分子。而这些法律、命令、規章的内容,在他看来,不是由一个階級的暴力决定的,而是仅仅由各階級的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因此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一种看法:資产階級只要在議會中占有多数,也就有权使用暴力来維護現行的法律,而无产階級如果在革命后建立起譬如苏維埃专政,就是沒有实行民主。这样一来,資产階級的政权倒是民主的,而工人階級的政权,由于使資产階級的权利受到限制,却是不民主的!鮑威尔对这点也作出明确的結論說:“和其他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样,苏維埃专政的基础也是由一个階級(在这里就是无产階級)用武力强迫社会接受这样一种宪法,这种宪法保证統治階級所拥有的力量,比它在民主制度下、即在各种社会力量因素自由发生作用的条件下所能拥有的力量要强大。……和一切不民主的制度

① 奧·鮑威尔:《布尔什維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第99頁。

② 同上书,第109頁。

一样,苏維埃专政也是靠暴力压制被統治階級,即靠打內战的方法建立起来的。”^①

結論也和考茨基的一模一样。这就是:为了避免发生內战,就要走議會民主的道路。于是內战好像是无产階級专政的必然結果,而資产階級好像在有可能推翻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时候也决不会发动內战。

鮑威尔观点的一个明显的特點就是,和典型的右翼社会党人不同,他在理論上承认,在主要階級之間的力量对比由于階級矛盾的尖銳而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无产階級专政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如果民主机关不能繼續發揮作用,資产階級或无产階級就会用暴力手段来建立本階級的統治。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階級专政是阻止資产階級粗暴的反革命专政的唯一手段。”^②

在鮑威尔看来,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实际上也是一种防禦性的手段。这里的唯一的缺点(唯一的但也是最主要的缺点),就在于他沒有看到,这样較量力量,一般地說,无产階級非打敗仗不可,因为軍队、警察、武器等等事先都掌握在資产階級国家和資产階級的手里。硬让无产階級去維護議會民主和防止資产階級的不良意图,这就是向无产階級提出了一个低于历史要求、低于工人階級和社会主義者在現代社会中所負的使命的任务。这种“机会性”(eventualnost)的政策,直到今天始終只能遭到失敗。

鮑威尔承认,問題变得更空洞和更模糊的一个情况是,即使以民主的方式取得政权,无产階級的統治也会遭到資产階級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議會應該采取暴力手段来粉碎資产階級的积极反抗。“这也可以叫做无产階級专政,但是这是和布尔什維主义的专政全然不同的一种专政。这不是反对民主的专政,而是民

① 奧·鮑威尔:《布尔什維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第 112 頁。

② 同上书,第 114 頁。

主的专政。”^①

鮑威尔的这些观点可以归納如下：用民主方式爭取政权，但准备在資產階級反抗时实行无产階級专政。鮑威尔后来把这些观点列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原則。例如他在1926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林茲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就談到了这一点。鮑威尔在解釋該党的綱領时说：“但是我們知道，資產階級甚至在它已失去多数人民时，也不会輕易地撒手丢开政权。今天实行民主統治的資產階級，到那时候就会成为反民主的、君主专制的或法西斯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将使用一切手段来保持政权。我們决不能上当。當我們以民主方式夺取政权的时机成熟的时候，資產階級将企图破坏民主制度，建立法西斯专政。那末我們應該怎样来防备这一点呢？我們應該进行教育，为自卫作好准备。我們的新的党綱指出：**只有在資產階級不敢进攻民主的情况下，我們才能用民主的手段取得胜利。**可是，如果資產階級敢于破坏民主，那末无产階級就沒有別的选择，只好用暴力夺取政权。”^②

暴力的作用成为純粹防御性的，这就是說，无产階級的策略和斗争的目标首先是寄托在議会主义上，寄托在对选举胜利的陶醉上。无怪乎到了紧要关头，例如在1934年在奥地利出現的时机下，甚至在得到奥地利的保卫同盟这一武装組織的帮助下，社会主义工人党也仍然是軟弱无能的。

鮑威尔在他后来的一些著作中在批評苏联的某些从整个国内

^① 奥·鮑威尔：《布尔什維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第113頁。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把所有这些論点痛斥了一頓，他指出，这一切只不过是孟什維主义在德国的翻版：“德国人可以从这本书里清楚地看到，究竟什么是孟什維主义。孟什維主义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可耻作用，各国工人都是很了解的。尽管奥托·鮑威尔把他对孟什維主义的同情掩盖起来，可是他写的这本书却是道道地地的孟什維克式的詆毀”。（《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0頁）

^② 奥·鮑威尔：《世界社会主义的形势和社会民主党的綱領》。轉引自《工人团結》，第22頁。

外情况来看已不再像列宁时代那样是必然性反映的措施时，也和其他許多社会党人一样，很好地指出了这些措施的錯誤。他在关于战后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中指出，只有恐怖的专政才会强行推广农民集体化，这在經濟上必然会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在这种集体农場中，劳动的质量一定很差。这种集体农場只有当拥有良好的农业技术装备时，才能从内部巩固起来。鮑威尔把这种所有制看作是国家資本主义性质的經濟，并认为經過劳动群众的努力，这种国家資本主义专政必然会轉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組織。“当掌握国家生产机关的专政被劳动群众的民主所廢除的时候，就会从专政的国家資本主义中产生出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組織。”^①在这部著作中鮑威尔仍然坚持工业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主張同工业官僚和农民合作。同时也重复提到，如果資产階級企图用暴力手段破坏民主制度，就用暴力夺取政权。

所有这些观点多半都被宣布为第二半国际的基本原则。这个国际正是在奧地利社会党人希法亭和鮑威尔以及俄国孟什維克馬尔托夫等人的领导下成立的。1920年12月7日他們向世界各国的社会党人发表了一个宣言，于是除了奧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党之外，还有法国社会党人、瑞士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和德意志—捷克社会民主党参加了这个国际。这个宣言的主要論点之一就是：“专政到底采取什么形式，这要根据各国一定的經濟、社会和政治条件而定。如果无产階級以民主手段掌握政权，那末在資产階級反抗时，这个民主的国家政权也不得不实行专政。但是，如果在爭夺政权的决定性阶段，民主制度由于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而被推翻，那末专政就應該采取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組織的专政的形式。专政的机关則按照各国的情况可以是工人苏維埃、士兵苏維埃、农民苏維埃、地方自治单位(公社)或該国所固有的其他

^① 奧·鮑威尔：《世界大战后的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第1卷，1931年維也納德文版，第223頁。

的階級組織。”^① 这个宣言同样地还宣布了一个本身是正确的提法：“正像各个国家的資產階級革命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实现的一样，各个国家的无产階級革命也将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实现，因为資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在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②

与上述这些正确的論点相反，第二半国际的理論和实践基本上是与鮑威尔的理論观点的主張相适应的。这个国际由于对資產階級采取了动摇的态度，对俄国发生的事件采取了孟什維主义的观点，所以很快它的成員就发生分化，有的加入了第三国际，有的又回到了第二国际。最后在 1923 年，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终于在汉堡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这个国际对布尔什維克和第三国际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它強調了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創造作用，认为社会民主党在战后許多国家中对恢复正常生活作出很多貢獻，因此要求让社会民主党参与国家和經濟問題的决策。于是联合政府的制度就被宣布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即民主的道路，这条道路在經濟方面要求有一种联合劳資双方的附屬組織。

这样就出現了社会主义的新的时期和深刻的分裂。这次分裂达到了这种地步，旧国际的社会党人和新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共产党人都把他們之間的分歧看得非常严重，以致双方完全模糊了这样一种危險：这种危險對他們双方來說都是主要的階級对立面。由于他們不团結和不清醒，法西斯主义首先在意大利、随后又在德国和奥地利取得了胜利。奥地利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鮑威尔所設想的一种可能性被证实了。但这并没有证实，在这样的形势下采

① 引自卡尔·迪耳：《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922年耶拿德文版，第424—425頁。

② 引自同上书，第425頁。卡·迪耳另外还写了一本关于无产階級专政和苏維埃制度的著作：《无产階級专政和苏維埃制度》，1920年耶拿德文版；这本书也屬於資產階級科学中对这些問題作客观主义論述的一类著作。

取防御性的革命策略是对付资产阶级反动的历史药方。在资产阶级掌握着军队、警察、报刊和被收买的自由派报刊代理人，而且自由又是一种不负任何道德和历史责任的自由的情况下，任何反抗都必然是失败。奥地利社会党人偶尔进行的一些为时过晚的反抗，也像老老实实地把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头颅放到法西斯主义斧钺下去受死一样，只能遭到同样的失败。

看来这一切以及后来的一些悲剧性事件，还没有使国际社会主义受到足够的教训！

第四章 馬克思主义在俄国

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最初阶段

从第二国际时期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来看，俄国肯定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国家之一。在十九世纪中叶，当俄国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法预见，不久以后，正是这个国家不仅会成为发生尖锐的阶级冲突的场所，而且和它的经济政治落后状态相反，它会成为发展真正的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地方。

七十年代初期^①俄国刚从法律上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而直到七十年代还谈不上工业的较大规模的发展，因而也谈不上工人阶级的比较明显的集中。与此相反，俄国却存在一批朝气蓬勃、英勇无畏、很有理论修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特别是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巴枯宁等人，企图至少从思想上（如果不能从历史上）达到欧洲所发生的事件的水平。后来的俄国馬克思主义思想，都以他们作为自己的先驱者。这些人也都各自经历了由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而到达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发展过程，因而实际上他们和馬克思的某些观点已经非常接近了。

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落后，他们的社会思想必然会在一定的意义上带有空想的性质，这特别表现在他们把“俄国村社”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一观点上。由于没有比较强大的工人阶级

^① 原文如此，应为六十年代初期。——译者注

組織，这就影响了他們对資本主义发展和斗争方法的想法。

因此六十和七十年代在革命知識分子的队伍中占上風的思想是：資本主义并不是俄国发展的必經阶段，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可以指望通过俄国农民村社的共产主义傳統而实现。

除了車尔尼雪夫斯基之外，这一方面最著名的人物是彼·拉甫罗夫。拉甫罗夫曾經当过上校和軍事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民粹派知識分子的革命运动的主要理論家。

拉甫罗夫的观点虽然在不能指望得到某种比較广泛的革命支援的形势下喚起了革命热情，但它是不切合俄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趋势的。他认为，少数有觉悟的个人是历史上的主要角色，只有他們能喚起和推动群众。但是当这种“到农民群众中去”的运动遭受失敗时，1878年建立的革命組織“土地和自由党”很快就分裂为两派，其中“民意党”完全采取了恐怖主义的行动。俄国革命者尽管犯了恐怖主义的錯誤，但在这时却表現出了非凡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安·热利亚鮑夫、索菲婭·彼洛夫斯卡婭、基巴耳契奇、季·米哈伊洛夫等人的形象，将永远是人們的英雄主义的榜样。

当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里民意党人还在制造密謀和暗杀事件时，資本主义却在俄国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了，从而历史现实本身证明民粹派思想是沒有前途的。八十年代中期在彼得堡也出現了第一批工人游行示威，此后不久，整个俄国都被工人階級的声势浩大的罢工弄得动荡不安了。俄国已經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点也必然反映在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上。

即使在此以前，俄国对馬克思主义也不是陌生的。馬克思《資本論》的俄譯本比欧洲其他国家都出得早，而且許多民粹派分子都和馬克思保持着个人接触或通信联系（特别是彼·拉甫罗夫和尼·丹尼尔逊）。社会經濟的整个发展过程和对理論研究的活跃气氛，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認識：俄国也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

走着同样的道路；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任務，是大致相同的。这时有一個人不仅最早地認識到馬克思主义能从理論上解决俄国的問題，而且通过自己的理論活动成为当时最出色的理論家之一，这个人就是格·瓦·普列汉諾夫。

**格奥尔基·瓦連廷諾維奇·
普列汉諾夫(1856—1918)**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普列汉諾夫就开始参加俄国的革命运动，在“土地和自由党”和“土地平分社”的民粹派組織和文艺机关中工作，及至民粹派的宣傳鼓动失敗之后便逃往国外。普列汉諾夫在他学术活动的初期，首先研究的是經濟和政治問題。他在西欧了解了已經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和馬克思主义之后，就坚决地轉向馬克思主义的立場。普列汉諾夫根据这些認識写出的最早的一些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我們的意見分歧》，1885年），必然是反对民粹派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和他們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的。随着这些著作的发表，普列汉諾夫就成为俄国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这就是說，普列汉諾夫在进行这种理論活动的同时，还在瑞士建立了第一个俄国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組織“劳动解放社”。参加这个組織的还有利·多伊奇、維查苏利奇、巴·阿克雪里罗得和瓦·伊格納托夫（参加后不久就去世了）。他們首先进行的工作是：通过发表自己的理論著作、翻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行讲学等等来傳播馬克思主义，以促进俄国流亡者在政治上的发展。

普列汉諾夫在一段很长的时期里一直是俄国馬克思主义的首屈一指的領袖。波克罗夫斯基早就正确地写道，普列汉諾夫是“十九世紀末俄国的最有學問、最有教養和最有天才的政論家”^①。为

^①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史》，1935年薩格勒布塞文版，第219頁。

了順利发展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当时在俄国必須首先澄清資本主义发展的問題和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理論。普列汉諾夫的历史功績，就在于他在上述著作中以及在以后写的一些著名的著作中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些著作直至今天还具有理論意义。

1895年普列汉諾夫以恩·別尔托夫的笔名在彼得堡出版了他最出色的著作之一《論一元史观的发展問題》，这部著作是当时世界文献中闡述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和理論根源的一部最出色的著作。那时候普列汉諾夫就已經基本上克服了第二国际的其他理論家的一个突出的缺点：对哲学問題的无知。直到今天还很少有人像普列汉諾夫那样对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辯证法的哲学先驅者进行过切切实实的研究，他在这部著作以及后来的一部著作^①中就專門地研究了十八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并批判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尼·伊·卡列也夫、謝·尼·克利文柯等人的民粹派的唯心主义社会学观点。

普列汉諾夫在当时就清楚地看出了唯物主义思想和德国唯心主义辯证法对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所以沒有追随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的做法——把馬克思归結为康德。普列汉諾夫也和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奧拉一样，无疑是最了解馬克思主义的这些問題和它的社会学观点的人。但是他和他們有所不同，他更深刻地懂得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哲学观点的意义，并且試图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虽然这一点做得是有限的。同时，普列汉諾夫也以他的淵博的文化知識和卓越的政論才能使得闡釋馬克思主义的工作在俄国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科学水平，并以当时的大量科学文献做根据。

如果說《論一元史观的发展問題》明显地具有历史的性质，也就是說，它非常詳尽地分析了馬克思的理論先驅者和他們对他的

^① 一年以后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唯物主义史論丛》(1896年)，在这部著作中对霍尔巴哈、爱尔維修和馬克思作了分析。

影响,并分析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問題,那末在紧接着此书之后发表的另外两本篇幅較小的著作中,普列汉諾夫又結合着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以独到的見解着重研究和解决了某些問題。第一篇文章是《論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給拉布里奧拉的著作《論历史唯物主义》写的书評。在这篇文章里,普列汉諾夫批判地分析了因素論,指出,把这种或那种因素当作唯一因素的社会学理論是常見的抽象空論^①。和因素論相反,普列汉諾夫提出了辯证的社会观,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其中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各种作为抽象东西的因素,而是存在着包括各种因素的社会整体。“从因素論的观点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重担,由一些不同的‘力量’——道德、法律、經濟等等——各自从它自己的方面沿着历史的道路拖曳着。而从現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看来,这件事有着一个全然不同的面貌。历史的‘因素’是一些純粹抽象东西,等到撥开了它們周围的云雾,事情便变得很明显,人們並沒有創造出若干种不同的历史——法律史、道德史、哲学史等——,而是只創造了一种历史,他們自己的社会关系史;这些社会关系是由每个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所謂的意識形态只不过是这个唯一的和不可分的历史在人头脑中的各式各样的反映而已。”^②

^① 普列汉諾夫写道：“社会历史因素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关于这一因素的观念，是通过抽象而产生出来的。由于抽象过程，社会整体的各个不同方面才成为单独的范畴形式，[社会的]人的活动的各种表现——如道德、法律、經濟形式等——才在我們心中轉化为一些特殊的力量；这些力量似乎引起了这种活动，决定了这种活动，并成为这种活动的根本原因。因素論一出現，就一定要发生究竟哪一个因素是决定性因素的爭論。”（《論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参閱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5頁）

^② 同上书，第294頁。后来普列汉諾夫在他的一本关于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問題的著作中特別強調指出：“馬克思虽然用社会經濟的发展来解釋一切社会运动，但是他往往只是在最后才用社会經濟的发展來說明，就是說，他要用許多其他各种‘因素’的中間作用来作前提。”（《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88頁）

同样地，普列汉諾夫也表述了关于人类制度和人类本性問題的深刻的辯证观点。普列汉諾夫对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克魯泡特金的观点(这些观点想要按照某种理想的人类本性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抱批判的态度并予以坚决的駁斥，他同时也得出合乎馬克思观点的結論說：“現代唯物主义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經濟制度**，这种**經濟制度**似乎是唯一合乎人类本性的，而一切其他的社会**經濟制度**則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人性的結果。按照現代唯物主义者的学說：**任何一种經濟制度**，只要合乎当时生产力的状况，就合乎人类本性。反之，任何一种**經濟制度**，只要与生产力的状况发生矛盾，就立刻开始与人类本性的要求相抵触。”^①

普列汉諾夫在另外的一些著作中还花費很多精力研究了自然界、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問題。尽管有时候对这些因素有点过分強調，但他基本上对这种关系作出了正确的馬克思主义的解釋，注意到了前人在作这种解釋时几乎一貫忽視的因素。因此，正像我們在后面还将看到的，他总是努力指出各种因素在人类历史生活中的綜合的相互作用，并明确提出自己对种族因素的看法：“我們已經知道，人为的环境是非常有力地改变着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的。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从直接变成了間接。不过自然的影响并不消失。每一个民族的气质之中，都保存着某些为自然环境的影响所引起的特色，这些特色，可以由于适应社会环境而有几分改变，但是决不因此完全消灭。这些民族气质的特色，形成所謂**种族**。种族对于某些意識形态的历史，譬如艺术史，給予一种毫无疑問的影响；科学地解釋意識形态本非易事，这样一来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②

① 《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68頁。

② 同上书，第273—274頁。

普列汉諾夫在这个时期写的另一篇文章是《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他屬於最早特別注意這個問題的人之列。在这里普列汉諾夫仍然是首先批駁民粹派的各种各样唯心主义观点。普列汉諾夫捍卫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在历史实践中的积极的創造作用的論点，他既反对那种最后把主体归結为消极无为的东西的抽象的經濟决定論，也反对那种认为英雄偉人具有决定一切的作用的主观主义观点(这一点是黑格尔、鮑威尔派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和著有英雄論的卡萊尔等人所坚决主張的)。普列汉諾夫也和他的先行者別林斯基一样，是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着眼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說：总之，“領導人物的个人特点能决定各个历史事变的局部面貌，所以我們所說的那种偶然成分在这种事变进程中始終表現着相当的作用，但这种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所謂普遍原因来决定，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轉移的人們在社会經濟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偶然現象以及著名人物个人的特点，其表現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显著得无比。”^①

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諾夫經過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一般性的論断：“大人物凭靠他們那种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各个事变的单个外貌及其某些局部后果，但終究不能改变事变的一般方向，因为这种方向是由別种因素决定的。”^②

与普列汉諾夫同时，也迅速涌現出一代新的俄国資产階級知識分子，他們試图根据西欧的革命經驗和理論經驗來說明本国的

① 《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69—370頁。

② 参閱同上书，第365頁。在同一篇文章中普列汉諾夫又对偉大人物的作用作了这样的規定：“一个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并不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各个偉大历史事变具有其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自己所具备的特性使他自己最能致力于当时在一般和特殊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偉大社会需要。”(同上书，第373頁)

情况。九十年代初期，資本主义已經成为严酷的现实，而馬克思主义已經成为从理論上战胜資本主义的最有力的方法武器。所以这一代知識分子开始受到馬克思主义的鼓舞，这是毫不奇怪的。民粹派分子(特别是米海洛夫斯基、卡列耶夫、瓦·沃龙佐夫)和所謂的“合法馬克思主义者”的七巨头(其中最著名的是彼·司徒卢威、杜岡—巴拉諾夫斯基、謝·布尔加柯夫)在理論上的論战，在这些年代里成了沙皇俄国学术界的主要問題。后来罗·卢森堡写道：“这场有些地方相当精采的斗智，十分有力地吸引住了九十年代俄国的社会主义知識分子，并以馬克思主义学派的肯定的胜利而告終，它使馬克思主义正式作为一門历史—經濟理論而走进俄国的科学領域。‘合法’馬克思主义那时公开地占据了俄国各大学、各杂志和經濟書籍市場，但也带来了这种状况的一切阴暗的方面。十年以后，当俄国資本主义在无产階級革命起义的街头上表现出乐观主义的反面时，在馬克思主义的乐观主义者的七巨头中，除一人例外，没有一个能够留在无产階級陣营內。”^①

“合法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对俄国資本主义发展的估計上，是和普列汉諾夫甚至和列宁站在一起的。但是，在对待革命問題、即革命斗争的实际問題的态度上，这帮人始終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这一点，正如我們以后还要談到的，列宁早在这场理論論战方兴未艾的时候就已清楚地看到了。

他們在实践中的机会主义立場，使他們很快地变成了理論上的修正主义。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和別尔嘉也夫很快地就拋棄了唯物主义的和辯证的理論观点，而投入了当时广为流行的一种資產階級哲学理論——新康德主义——的怀抱。司徒卢威最后甚至公开地主張客观唯心主义，而別尔嘉也夫在俄国唯心主义者索洛維約夫的影响下最后竟滾入神秘主义的泥潭。

^① 卢森堡：《資本积累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12頁。

罗·卢森堡在上述著作中很机智地說道：“俄国合法馬克思主义者无疑地对他們的論敌‘民粹派’取得了胜利，但他們的胜利超过了限度。在論战的热烈气氛中，这三个人——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和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把他們的論点說得过火了。本来的问题是：資本主义就一般而論以及資本主义特別在俄国是否有发展的可能；而这些馬克思主义者在論证資本主义有发展的可能时，竟然从理論上证明資本主义能够永世长存。”^①

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特别是在俄国一出現，普列汉諾夫就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論战，并表现出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个也能够和那些主要是新康德主义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在專門的哲学方面（不单纯在政治經济学或社会学方面）进行辯論的理論家。普列汉諾夫在这场論战中，也和后来他在反对馬赫主义及其他一些場合下一样，试图对某些問題作独到的論述和解决^②。

在哲学观点方面，普列汉諾夫是一个特别是恩格斯在他晚期著作中所提出的观点的彻底的继承者。从这种意义上說，他在辯证唯物主义方面沒有提出任何比較带有根本性的新的东西。虽然如此，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在他的大量的論战著作和理論著作中，毕竟也对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看法。

例如，第二国际的大部分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馬克思主义仅仅包括政治經济学和社会学；而普列汉諾夫，特别是在他比較成熟的阶段，却不断地強調指出認識論和本体論問題对整个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这些問題上，普列汉諾夫所遵循的，基本上是恩格

① 卢森堡：《資本积累論》，參閱中譯本，第255頁。

② 在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对普列汉諾夫的哲学观点作了最詳尽的分析的，是加·佩特罗維奇的著作：《普列汉諾夫的哲学观点》，1957年薩格勒布塞文版。在俄国的現代著作中，唯一的一部篇幅較大的著作是伏·阿·福米娜的《格·瓦·普列汉諾夫的哲学观点》，1955年莫斯科俄文版。但这本书还没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局限。

斯解决这些问题的路綫,例如他认为:“哲学是在一定时代所达到的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上概括人类全部經驗的綜合观念的体系。簡言之,哲学就是一定时代的已知的现实的綜合。在下面我們就会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出的結論,和我們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①

这个定义也和恩格斯的定义一样,虽然今天从一定的意义上看有些过于狹窄,是本体論的,因为它忽視了人道主义关于人的問題;但是,从人类发展的每一个时代人們需要不断地对世界作哲学观察这一点来說,这个定义还是正确的。

在涉及物质定义的問題时,普列汉諾夫提出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后来也被列宁接受了),这就是:“我們所說的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們的意識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們的感官时喚起我們一定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們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及它們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②

这个物质定义直到今天仍然是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所公认的。

还必须指出,普列汉諾夫特別坚决地主張研究辯证法,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个出色的辯证論者。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个实际上黑格尔已經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的老問題,这就是关于形式邏輯和辯证法的关系問題。普列汉諾夫在为恩格斯的《費尔巴哈論》一书所作的注釋中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比俄国現代的斯大林派的所有哲学家都深刻得多。他沒有把形式邏輯和辯证邏輯对立起来,而把形式邏輯的思維只看作是辯证思維的个别情况。“儼靜止是运动的个别情况一样,以形式邏輯的規則(思維的“基本規律”)

① 《馬克思的哲学演变》。《普列汉諾夫全集》第18卷,俄文版,第325頁。

② 《战斗唯物主义》。《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50頁。

为依据的思維也是辩证思維的个别情况。”^①

普列汉諾夫在对这一問題作进一步分析时，提到了特倫德倫堡和宇伯威希的形式邏輯观点，并在解釋由一种运动形式轉化为另一种形式时，最后作出了这样一个結論：“因此可以再一次得出結論，辩证法沒有廢除[形式]邏輯，而只是取消了形而上学者所附加給[形式]邏輯的規律的絕對意义。”^②

普列汉諾夫的象形文字观点，在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著作中引起了一場大爭論。普列汉諾夫在为恩格斯的《費尔巴哈論》一书作的注釋中，以及后来在反对修正主义者的論战中和在《战斗唯物主义》一文中，都对这一認識論問題作了說明。

虽然我們能够从普列汉諾夫的著作中找出可以解釋为不可知論的表現的段落^③，但是他有关这个問題的全部哲学論据表明：他駁斥了不可知論，坚持了关于世界可知性的唯物主义观点，而且在反映論中尽力摆脱素朴的实在論。例如他在和康拉德·施米特論战时，在《再論唯物主义》一文中这样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說空間和時間是意識的形式，說因此它們的第一个特性是主观性，这在托馬斯·霍布斯就已經知道，而且現在也沒有一个唯物主义者肯否认这点。全部問題在于，物的某些形式或关系是否与意識的这些形式相符合。不消說，唯物主义者对这个問題的回答不能不是肯定的。当然，这并不是說，他們承认了康德主义者（其中也包括施米

①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书俄譯本第二版的譯者序言》。《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84頁。

② 同上书，第86—87頁。

③ 例如在批判馬薩利克的关于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一书时，普列汉諾夫針對着馬薩利克提出的关于一切东西，包括物质的东西和人的头脑，最初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問題写道：“这个幼稚得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又一次证明，这位教授先生連最起碼的唯物主义概念都沒有具备。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沒有說过他們的学說可以回答这些問題。他們一向认为这些問題是属于知識范围之外的”。（參閱《反对修正主义》文集，1953年薩格勒布文化出版社塞文版，第405頁）

特先生)以天真的殷勤强使他們接受的那个糟糕的(确切点說,荒謬的)同一性。不是的,自在之物的形式和关系不会是我們看起来的那种样子,就是說,不会是在我們的头脑中‘被翻譯过’以后我們所感觉到的那种样子。我們关于物的形式和关系的表象,不过是**象形文字**而已;但是这些象形文字是准确地标記着这些形式和关系的,而这就足以使我們能够研究自在之物對我們的作用,也足以使我們能够对自在之物发生作用。我再說一遍,如果客观的关系和它們在我們头脑中的主观映象(“翻譯”)之間沒有真正的符合,那末**我們的存在本身就会变成不可能的。**”^①

后来,在恩格斯《費尔巴哈論》一书俄譯本再版时(1905年),普列汉諾夫已不再使用象形文字这个来自謝切諾夫的術語,虽然他並沒有放棄自己对主客观符合問題的观点。在后来的俄国哲学界,米丁、福米娜等人特別指責普列汉諾夫,說他因此放棄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論。而实际上,倒是这些人自己沒有在思想上认真地理解反映論,沒有看到:对一个唯物主义者來說,反映和符合并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因素,而恰好是两个互为前提的因素。

另一方面,普列汉諾夫非常正确地看到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別(这是一切批判现实主义者所必須懂得的),认为不能把心理的东西(反映)和物质的东西(事物)等同起来,而且也看到了認識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尽管如此,認識毕竟是認識;尽管表面上有矛盾和不符合,人还是通过那些符合的东西認識世界。普列汉諾夫也和自己同时代的馬克思主义者(其中也包括在一定时期的列宁)一样,沒有能更深刻地考察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极端重要的范疇——实践問題,虽然他在区分上述概念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正确的。

^① 普列汉諾夫:《再論唯物主义》。《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58頁。

在同德国和俄国的修正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馬赫主义者进行的这些論战中，普列汉諾夫無論在哲学上和思想上都占了上風，这不仅說明普列汉諾夫从总的精神实质上很好地領会了馬克思的思想，而且也說明他善于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在极端复杂的問題上运用馬克思的思想。因此普列汉諾夫在二十世紀初对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上面已經介紹了普列汉諾夫对唯物史观所作的独到的解釋的某些方面。

在这个問題上还必須指出，普列汉諾夫对整个唯物史观問題的看法要比后来在三十年代时批評他的人正确得多。普列汉諾夫不是御用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他并不因为社会学这个術語在資產階級科学中已經有了习惯用法而害怕使用这个名詞。相反的，普列汉諾夫完全正确地认为：“社会学要能变成科学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它能把社会人的目的的发生（社会的“目的主义”）了解为社会过程的必然結果，而社会过程归根到底是由經濟发展[的行程]来决定的。”^①

在实现社会学所面临的这一任务和目的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用普列汉諾夫的話來說，为未来的一切科学的社会学提供了序言。

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普列汉諾夫根据人类在各个活动領域內的丰富的文化和对各种現象的大量知識，特別坚决地主張克服在解釋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所常出現的片面性和机械論（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是存在的）。拉布里奧拉就曾指出分析社会心理的意义（社会心理对于有关的各个集团是各不相同的）。普列汉諾夫同意他的意見，也主張要确切地規定經濟和意識形态的高級形式之間的媒介。例如，他在《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一文中就

^① 《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11頁。

闡述了这个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如果我們想簡短地說明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現在很有名的‘基础’和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見解，那末我們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

(一)生产力的状况；

(二)被生产力所制約的經濟关系；

(三)在一定的經濟‘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由經濟所[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經濟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意識形态。

这个公式是十分广泛的，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足够給一个相当的位置，同时是跟折衷主义完全无緣的，这种折衷主义除了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影响之外，就不能更进一步，甚至它沒有怀疑这些力量之間的相互影响的事实还完全沒有解决它們的起源問題。这是一元論的公式。这个一元論的公式彻头彻尾貫穿着唯物主义。”^①

虽然对这个“公式”还可以加以指責，說它不够細致詳尽，或者說它沒有很清楚地規定出意識形态和其他因素之間的关系，但必須注意，普列汉諾夫所想提出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只是最概括地提出了我們在分析錯綜复杂的社会现实时所必須注意到的一些媒介。在这个公式中特別忽視了“个別的东西”（个体、个人），而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和活动中不仅表現出社会心理或者一定阶层的心理，而且也表現出自己本人的心理——一个人的心理，而个人心理給意識形态的形成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普列汉諾夫的很大一部分理論活动，是研究艺术和美学的問題。他独到地解决了这些領域中的一些問題。而这些領域無論在他以前或以后，在馬克思主义中都是很少涉及的。

^① 《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參閱《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5—196頁。

普列汉諾夫在《沒有地址的信》中，已經就艺术的性质和起源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普列汉諾夫在分析托尔斯泰把艺术看作是通过动作、綫条、色彩等来表达感情的观点时，指出：“还有一点也是不对的，那就是认为艺术只是表現人們的感情。不，艺术既表現人們的感情，也表現人們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現，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現。这就是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①

普列汉諾夫正当地坚持了艺术作品和艺术表現中的理性因素，从而必然要在美学領域內同康德的和新康德主义的形式主义发生冲突。普列汉諾夫在分析康德把审美判断看作是不以一切利害关系为轉移的判断的观点时，得出了一个试图把美学功利主义和美学形式主义結合起来的观点。他說，“应用在单独的个人身上”时，他同意康德的观点：“如果喜欢某一幅画只是由于我可以高价出售它，那末我的判断当然决不是純粹的鉴赏判断。但是如果我們是从社会的观点出发，那末問題就不一样了。对原始部落的艺术的研究证明：社会的人最初都是以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現象的，只是后来对待某些事物和現象才轉向审美的观点。这給艺术史增添了新的光輝異采。”^②

普列汉諾夫的这个分析，一般地說不是很細致的，也沒有作充分的說明。不过他並沒有想以此来把美和利益等同起来，而是首先想強調指出，对一个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的社会人來說，他认为美的东西，只能是对他有利的东西，只能是在这一斗争中有意义的东

① 普列汉諾夫：《沒有地址的信》。《沒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頁。在同一段話中，普列汉諾夫又对这种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具体說明：“我认为，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喚起他在四周現實的影响下所體驗过的感情和思想，并給予它們一定的形象表現的时候。不用說，在絕大多数場合下，一个人这样作，目的是在于把他重新想起和重新感到的东西傳達給別人。艺术是一种社会現象。”（同上书，第4—5頁）

②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十八世紀的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繪画》。《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33頁。

西。因此，普列汉諾夫并不容許把美的領域和利的領域等同起来，他着重指出，前一个領域要比后一个領域广闊得多，美的享受的主要特点是直接性。他最后得出結論說：“但是，利益毕竟是存在的；利益毕竟是美的享受的基础（大家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如果没有利益，也就不会觉得事物有什么美。”^①

普列汉諾夫在这里沒有从审美观点来研究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由以功利作为基础的社会人的审美判断过渡到个人的鉴赏的审美判断的特点和基础，而后一种判断“**当然是以作判断的个人沒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为前提的**”^②。

普列汉諾夫虽然对后一方面以及对过渡本身沒有多加說明，但在談到前一方面时却对这个問題作了独到的唯物主义的分析。普列汉諾夫在解决这个問題时运用了丰富的民俗学和社会学材料，并且联系着談到了卡·毕歇尔的极其卓越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劳动与节奏的著作，以及格罗斯的游戏應該先于劳动的理論。

尽管毕歇尔对游戏、劳动和艺术的关系作了非常有意义的分析，尽管他有时也作出結論說，游戏来自劳动，而且艺术本身也是这样；但他的基本論断是：游戏先于劳动，而艺术則先于有用的东西的生产。因此他就不是从人的本质要素出发把劳动作为研究的中心，而是把人的活动的另一些形式作为研究的中心。普列汉諾夫根据卡·馮·登·施泰因能、拉采尔、卡特林等人在当时作的最新的习俗調查，对原始民族的这些現象作了詳細的分析之后，得出結論說，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不把握着这种思想，即**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現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来看待它們**，那末我們將一点也不知道原始艺术的

^①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十八世紀的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繪画》。《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34頁。

^② 同上。

历史”^①。

毫无疑问，这是正确观察和研究艺术与审美现象的起源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结论。普列汉诺夫从劳动是人的实质、是人的“典型本质”这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论点出发，令人信服地指出，人的其余的一切极其重要的表现，都是从人的劳动和意识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都不能具有独立的和主导的性质。

普列汉诺夫既然在研究艺术的起源和性质的问题，就必然会参加当时展开的一些争论，这些争论当时已由纯粹的形式主义走向极端的唯社会学的观点。直到今天对马克思主义还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普列汉诺夫指出艺术依存于社会生活，从而指出人们创造的任何领域都不是绝对独立的，个人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社会的。这个提法成为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并成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无怪乎当时一些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都主张对艺术作这种多半是社会学的解释。无论拉法格或者梅林，都没有更进一步。普列汉诺夫也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尤其是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美学也已经出现了用社会学观点解释艺术的重要代表人物^②。

^① 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第106页。普列汉诺夫在同一著作中对功利观点和审美观点的关系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谈的是使用价值，那就可以满有把握地说，那些为原始民族用来作装饰品的东西，最初被认为是有用的，或者是一种表明这些装饰品的所有者拥有一些对于部落有益的品质的标志，只是后来才开始显得是美丽的。使用价值是先于审美价值的。但是，某些东西在原始人的眼中一旦获得了一定的审美价值之后，他就专为这一价值去努力获得这些东西，而忘记了它们的这种价值的来源，甚至连想都不想。”（同上书，第14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在《二十年》文集的自序中特别强调地指出：“作为一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拥护者，我认为批评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一件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的语言翻译成社会学的语言，探寻可以称之为某种文学现象的社会学等价物的东西。”（《〈二十年〉文集第三版序言》。《艺术与文学》第1卷，1949年贝尔格莱德塞文版，第235页）然而必须立即指出，普列汉诺夫也清楚地看出对艺术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必要

但是，泰恩的一般观点和普列汉諾夫的馬克思主义观点之間有着本质的差别。泰恩从来沒有能够把社会經济基础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础，看作是本身也具有矛盾的一种基础；而普列汉諾夫却注意到了馬克思主义的这一要素，从而比泰恩以及和所有那些机械地用反映論來說明艺术的人要高明得多。普列汉諾夫在論法国戏剧和繪画的文章中写道：“第一，說艺术也和文学一样，是生活的反映，这虽然說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但它毕竟还是一个十分不明确的思想。要想懂得艺术是怎样反映生活的，就必须懂得生活本身的结构。而在文明民族的生活结构中，阶级斗争是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只有看到这种动力，只有注意到阶级斗争，并研究了它的种种曲折变化，才能够比較令人滿意地說明文明社会的‘精神’历史，因为‘文明社会的思想发展过程’反映出該社会的阶级的历史和阶级相互斗争的历史。”^③

普列汉諾夫从这种方法論出发，对“为艺术而艺术”和“不承担社会义务的艺术”的問題作了特別精辟的分析。普列汉諾夫提出一个問題：一些人对艺术的性质和意义持有一种观点，而另一些人却持有全然相反的观点，那末发生这种現象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呢？他主要根据十八、十九世紀法国艺术和十九世紀俄国艺术的材料得出結論說：“凡是在艺术家和他們周圍环境之間存在着不协

性，他把这种分析看作是唯物主义批評的第二步必要的工作：“如果这种批評不懂得問題不能只限于探寻这种等价物，社会学不應該把美学关在門外，而相反的，應該向它敞開大門，那末这种批評在努力探寻某一文艺現象的社会等价物时就会丧失自己原来的性质。彻底的唯物主义批評的第二步工作應該是：也和唯心主义批評家的批評一样，对被分析的作品的美学价值进行評价。如果一个唯物主义批評家竟以他已經找到該作品的社会学等价物为口实而拒絕作这种評价，那末这只是說明他沒有懂得他所想坚持的那种观点。……換句話說，唯物主义批評的第一步工作不仅沒有取消进行第二步工作的必要性，而且要求以第二步工作作为自己的必要的补充。”（同上书，第241頁）

③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十八世紀的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繪画》。《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俄文版，第433頁。

調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傾向。”^①

同样地,“所謂的功利主义艺术观,即是使艺术作品具有批判生活現象的意义的傾向,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乐于参加社会斗争的决心,是在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和多少对艺术創作真正感到兴趣的人們之間有着相互同情的时候产生和加强的”^②。

虽然普列汉諾夫的观点仍然停留在一定的素朴的现实主义的水平綫上(当时由于艺术本身的活动就局限在这样的水平綫上,所以普列汉諾夫也无法超过),虽然我們今天已不能再同意这些艺术标准,因为它们过于狹窄(例如,他在分析《金发女人》一书的艺术形象时就夹杂进去一个素朴现实主义的标准,这又是符合現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观点的!”)^③,但是普列汉諾夫通过上述的理論观点和分析,毕竟对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論和艺术分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此外,如果再看到他同狄慈根主义者、资产階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馬薩利克、克罗齐、李凱尔特、文德尔班、柏格森等)进行的多

① 普列汉諾夫:《艺术与社会生活》。《沒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文版,第205頁。

② 同上书,第215頁。当然,这并不是說,功利主义艺术观必然会是革命的。普列汉諾夫在同一篇著作中写道:“根据这一切可以十分确凿地得出結論說,功利主义艺术观不論与保守的情緒或革命的情緒都能很好地适应。只要对某一种——不論哪一种都一样——社会制度或社会理想具有濃厚和强烈的兴趣,就必然会傾向于这种观点;要是这种兴趣由于某种原因沒有了,那末这种傾向也就消失了”。(同上书,第222—223頁)

③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普列汉諾夫的这些狹隘的现实主义观点,博得了現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論家們的高度贊賞,而他反对艺术批評有权說艺术应当做什么,必須怎样做和必須按照什么方向去做的見解,却受到了指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主义的理論家不能够放棄由批評来控制艺术的观点,因为批評实际上是按国家官僚的眼色行事的。普列汉諾夫认为,艺术是现实事物的反映;但把握什么和塑造什么,怎样把握和怎样塑造,則取决于艺术家和他的自由。艺术“必須”指出按照健全理性的要求应当存在的某种东西。批評当然可以而且應該說明对艺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許多因素和反应,但絕不能規定艺术創作的界限和范围。

次辯論和論戰，如果再加上他的优秀的文化史著作和他对俄国由別林斯基到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和理論思想的分析，那末就只能觉着普列汉諾夫这个全面发展的馬克思主义者的学識淵博和意义重大。

普列汉諾夫的著作培养了一整代的俄国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列宁也特別強調指出过。而且有些比較著名的俄国馬克思主义理論家，自认是普列汉諾夫的学生，如柳·依·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阿·莫·德波林、奥·勃柳姆、阿·阿夫拉莫夫等人。

虽然普列汉諾夫是第二国际时期最有才能的和最有教养的馬克思主义者之一，并且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奠基人，但是自从1903年該党分裂为孟什維克派和布尔什維克派以后，他主要是倒向孟什維克派一边。和列宁相反，普列汉諾夫支持当时流傳相当广泛的关于（不是純粹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自发性的思想，即认为俄国面临的首先是資产階級革命的思想，从而他譴責了1905年的武装起义，而在大战初期，他也和第二国际的其他許多領袖一样，采取了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場。普列汉諾夫也和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許多領袖一样，沒有理解无产階級革命的問題和历史上存在的可能性。由于这些原因，普列汉諾夫在他的晚年在政治上沒有再發揮任何重大的作用。普列汉諾夫逝世于1918年，即当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快要实现的时候，虽然他並沒有理解到当时这些理想已开始变为现实。

許多革命家的命运都帶有这种离奇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說是悲剧性的烙印。但是尽管如此，普列汉諾夫始終是馬克思主义史上这个时期的最偉大、最有意义和最成熟的人物之一。

不过，普列汉諾夫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屬於第二国际的範圍。这是工人运动和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就其广泛的規模來說，这是一所社会主义的大学校；就其民主精神和党内民主制

度來說，这是思想观点的一个偉大的里程碑，这也就对科学特别是对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第二国际在政治和理論战綫上都造就了一系列杰出的人物，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完美的个性和創造性，只是由于有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原則和前提之一。

这种广泛性和偉大的自由主义也具有另一个方面。在理解馬克思主义的整体上的明显的缺点（而且对馬克思主义辯证法缺乏深刻認識，这几乎是第二国际所有理論家和領導人的一个突出的缺陷），就是这种自由主义最后导致不坚决反对典型的机会主义和背离馬克思主义的某些根本原則的行为的基本原因之一。

由于这个弱点，由于对議会抱有幻想，以及由于沒有能力对革命前夕的一些事件作出坚决的和切实的評价，結果就在一个历史时期的最關鍵性的問題——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上完全束手无策。

在这方面表現出来的无能，以及缺乏坚决承认錯誤的批判精神，使得当时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繼續执行了改良主义的政策，并彻底地拋棄了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和革命实践的原則。

这样，第二国际的历史事业就終結了。但是当时有一个人，他比第二国际的所有著名的領袖都出色，在他身上的思想才能、理論才能和革命政策的才能达到了惊人的統一和一致。这个天才的人物就是列宁，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使当时的所有“馬克思主义权威”黯然失色，他比任何人都名副其实地創造了历史。

通过列宁，馬克思主义走上了一个特殊的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烏里揚諾夫·列宁

第一章 社会主义运动和党的問題

正如馬克思是十九世紀在政治和理論方面占統治地位的革命人物一样，到了二十世紀上半叶，列宁也是这样的人物。如果把列宁的出現主要仅仅归結为沙皇俄国的历史情况（当时的特点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已从西欧轉移到了俄国”），这也就是忽視了这位人物身上的主要之点：他具有超人之处，無論在理論方面或是革命实践方面都具有天才，他是一个十分完整、全面、異常光輝和富于革命精神的人物。

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时期內几乎未曾有过真正的无产階級革命領袖，特别是未曾有过这样的人物，他既有不同寻常的高深的理論，又能洞察每一个历史时机。倍倍尔和盖得缺少前一种因素，拉法格缺少后一种因素，而只有罗·卢森堡在天才方面与列宁有些近似，但是在这方面也还有很大的差别。

列宁和許多最有威望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領袖人不同，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即研究过去的某些文化历史問題，这对发展馬克思主义思想和科学地闡明过去的历史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这必然会妨碍他們完全献身于他們所面临的具体历史任务（例如考茨基、梅林、普列汉諾夫等人）。他們是理論家和知識淵博的作家。列

宁既是这样的人物，又比他們要更高一些——他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領袖，也是一个进行革命的領袖。

列宁还在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的初期就参加了这一运动。早在1891年和1892年間他就加入彼得堡的秘密馬克思主义小組，1894年在法律系毕业后，他起来反对民粹派，首先是反对瓦·沃龙佐夫。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和《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評》(1895年)^①中，繼續了普列汉諾夫已有成效的反对民粹主义思想的論战。他在这些著作中不仅駁斥了民粹派的观点，特别是关于俄国的資本主义問題的观点，而且还尖銳地批評了当时为普列汉諾夫所正面肯定的合法馬克思主义者。

列宁特別強調社会学关于社会經濟形态的范疇，这在理論上是值得注意的。这个从馬克思开始、但一直到現在还没有得到彻底全面分析的概念，是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因为它既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特殊規律的問題，也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結構的綜合。列宁強調指出，馬克思的理論以生活資料的謀得方式作为出发点，而生活永远是在人与人之間的一定的关系下展开的，由此列宁得出結論說：“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每一种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轉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規律。……重要和不重要之間的区别已为社会經濟結構这一內容和政治、思想形式之間的区别所代替了：由于以往那些在仅仅有特殊的历史上一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規律的地方看出自然界規律的經濟学家的观点已被推翻，經濟結構这一概念本身也就得到了确切的解釋。”^②

^① 应为1894年。——譯者注

^② 《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評》。《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88—389頁。

列宁当时非常热情地参加了圍繞民粹主义、經济发展、馬克思主义等問題所展开的論战，他作了一系列的报告，写了大量的文章，为他以后对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問題进行巨大的、重要的研究工作准备了很多材料。列宁通过这些工作联系了工人，組織了小組，到1895年还建立了第一个革命組織“工人階級解放斗争协会”。在筹办秘密报刊“工人事业报”期間，列宁被捕了，1897年初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三年。在那里，列宁完成了自己的一部巨著《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这本书不仅深刻地分析了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坚决打破了沃龙佐夫、卡雷舍夫、丹尼尔逊以及其他民粹派的幻想，而且通过对这一問題的研究，使列宁自己比其他一切馬克思主义者都更深刻地看到俄国社会的真实动向和这个社会的結構，无疑地，这就是列宁能够如此正确和明了地估計当时俄国具体历史情况的一个前提。

在列宁流放期間，即1898年，在明斯克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00年列宁流放回来，立刻动身出国，他联合了侨居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并着手創辦《火星报》，即需要用以澄清很多爭論問題并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的机关报。

无产階級和自发的群众运动的强大发展，以及在第二国际发展的这一时期修正主义的流行，都在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在关于“自发性”、“經济主义”的理論方面，以及在把馬克思和康德結合起来的問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列宁用簡洁而俏皮的、但同时又是尖銳的方式指出1897年开始的这个时期是“混乱、分散和动摇的时期。人在少年时代，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这个时期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了不正的声調，这种声調一方面表現在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維奇、布尔加科夫和別尔嘉也夫等先生的著作中，另一方面表現在弗·伊一申和尔·姆·、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馬尔丁諾夫的著作中。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走的只是領導者，而运动本身还是繼續增长，大步向前迈

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把一些(俄文是“愈来愈多的”。——译者注)新的工人阶层包括进来,并且扩展到全俄各地,同时,又间接地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但是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屈服在广阔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了;这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优势的已经是另外一批领导人(俄文是“活动家”。——译者注),他们差不多仅仅是靠‘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教育出来的,而群众的自发性对他们的自觉性的要求愈高,这样的刊物也就愈加显得不够。领导者不仅在理论方面(“批评自由”)和实践方面(“手工业方式”)都落在运动的后面,并且还企图用各种响亮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落后性辩护。社会民主主义被那些出版公开刊物的布倫坦諾派和出版秘密刊物的尾巴主义者降低为工联主义”^①。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进行的理论斗争首先在确定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作用和性质方面具有伟大的意义。列宁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一著名的論点,他以自己天才的洞察力对俄国无产阶级在当时历史情况下的任务、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性质所作出的論断,超过了当时人们所想到的和可能想到的一切。^③

工人运动的自发論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而且基本上是同改良主义、工团主义和工联主义这些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普遍现象相联系的。列宁尖锐地提出另一个論点,即作为这个运动的领导力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0页。

② 同上书,第336页。

③ 列宁从自己的分析中勇敢地得出的那些論断真是使人吃惊的。列宁在上述著作中探讨了恩格斯对德国无产阶级作用的分析,在恩格斯的分析里提出了在今天具有如此迫切和重要意义的思想,即“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在列队行进时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恩格斯語),列宁因此推断說:“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更严重得多的考驗,将需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特别法同这个怪物比較

量的社会民主党应该是一个坚强的和自觉的組織。“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輕視，都是——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④ 列宁当时还同意考茨基的观点，即在工人运动开始时，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仍然必須由参加这个运动的知識分子来建立，因为分工的客观原因不允許工人比較緊張地从事理論問題的研究，同时列宁尖銳地提出只能两者取其一：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由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正是朝着蒙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影响的方向进行的，因此，列宁得出結論說：“我們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⑤

自发性的概念主要是在“經濟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論中形成的，这种理論在頗大程度上也已經成为一种国际現象，它是由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派別产生的。列宁并不是反对經濟斗争，而是強調指出，孤立地进行經濟斗争只能引导工人去注意政府同工人阶级的关系問題，因此，仅仅在經濟斗争之内来发展工人阶级

起来，真是小巫見大巫。历史現在向我們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毀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們現在可以这样說）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鋒队。而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只要我們能够用我們的先驅者即七十年代的革命家們那种无比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們的比当时更廣闊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們就一定能够获得我們的先驅者在当时已經应享有的这个光榮的称号。”（同上书，第340頁）这段話最好不过地說明了列宁对那种形势的估价，也最好不过地說明了列宁正是要爭取建立一个在他以后的一切著作和論战中所提到的那样的党。

④ 同上书，第350頁。

⑤ 同上书，第352頁。

的觉悟，这个范围就太狭窄了。

“阶级政治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我们对于为了给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提出往往可以使一般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俄文是“政治觉悟”。——译者注），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①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同时也由于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特殊而困难的条件，列宁坚决主张，党应当是一支革命家的严密组织起来的队伍，它在组织问题上不应当由于广泛发展和自由主义而涣散。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已经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不久以后，在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这个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引起了尖锐的争论和分裂）：“相反地，革命家的组织所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所以我讲革命家的组织时，是指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而言）。就这种组织的参加者的这种共同的特征来说，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都应当完全消除，更不必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②。

列宁的这个观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不仅是因为在社会民主党涣散时期他提出了这个至少是对俄国以及类似情况唯一能够行之有效的原则。列宁是从正确的分析出发的，他认为工人运动正在进入革命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必须锻炼出一支无产阶级的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91页。

② 同上书，第422页。

突击力量。無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內或党外，所有站在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立場上的人都必然要反对列宁这一激进的主張。

1903年在布魯塞尔和倫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立即发生了激烈的爭論，特別是在党章第一条条文的問題上，因为这个条文有两种提法：一种是馬尔托夫的提法，一种是列宁的提法。馬尔托夫提出对党的組織問題的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列宁則不仅要求某人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而且要他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組織內工作。后来列宁在闡述这次代表大会的著作中写道：“无产階級在爭取政权的斗爭中，除了組織而外，沒有別的武器”^①，正因为如此，組織問題是中心問題之一，而在某些历史时刻它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問題。从這個問題来看，列宁比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領袖的眼光要高得多，他对当时一些重要問題的看法比这些領袖要深刻得多。

由于這些問題，在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列宁获得了多数，但是党的机关报《火星报》却落到了少数派(孟什維克)手中，普列汉諾夫后来也成了孟什維克。列宁在上述著作中簡要地說明了問題的实质：“其实，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者的整个立場，还在討論党章第1条条文时就表現出来了：当时他們拥护散漫的、团结得不紧的党組織；他們反对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建党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他們主張自下而上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学生以及‘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封为党员；他們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必須加入党所承认的某一个組織的所謂‘形式主义’；他們傾向于只願意‘抽象地承认組織关系’的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他們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談；他們傾向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現在新《火星报》上流行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們最

^①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0頁。

初所犯的錯誤。”^①

在土地問題上也出現了分歧。列宁提出农民是无产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軍的論点。以后不久，即在俄国 1905 年的革命期間，产生了更为尖銳的分歧。

俄国沙皇制度在日俄战争中的惨敗（这再一次表明俄国专制制度的衰弱和落后）和对参加和平示威游行的工人的一月大屠杀，引起了自发的暴动，并轉变为革命。

从理論观点来看，对待这次革命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列宁是一种态度，而普列汉諾夫和孟什維克則是另一种态度。普列汉諾夫作出結論說，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該輪到資產階級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和推翻沙皇制度了，因此，他就陷入了形式主义地、抽象地解釋历史的地步；而列宁則是从小具体条件，从力量和关系的各种情况出发，他提供了对一定形势进行深刻的辯证分析的杰出范例，而形势从来也不是仅仅按照抽象的一般公式来发展，而是由于特殊的因素和非常重要的个别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变化和受到制約的。

这次革命的性质必定是資產階級的。但是，正是因为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的具体的特殊地位，这次革命必然具有特殊的性质。列宁就这一問題写道：“我国資產階級革命的胜利，要作为資產階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农民占大多数，农民受农奴制大地主残酷的压迫（占一半），已經組成社会主义政党的无产階級的力量和自觉性——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国的資產階級革命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一特点并不排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质（而馬尔托夫和普列汉諾夫在他們对考茨基的立場所作的最不成功的批評中却企图說明是排斥的）。这一特点完全决定

^①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190—191 頁。罗·卢森堡在《新时代》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批評这本书，在这篇文章中譴責列宁自己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某些观点（中央委员会的万能、中央委员会的壟断、雅各宾主义等等），对此列宁曾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答复，該文当时沒有发表。

了我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质和为了在这样的革命中取得胜利而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必要性。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列宁后来在十月革命期间和十月革命以后又加以补充的这些分析，几乎是列宁对革命力量的遗训中最宝贵的部分，它在斯大林主义时代被忘得一干二净。这种分析就是：不要用现成的死板公式来对待历史，不要把现成的公式强加在变动极大的、作为许多事件的特种综合的历史身上。列宁在同普列汉诺夫论战时完全正确地谴责了普列汉诺夫，他说：“普列汉诺夫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概念’得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对立宪民主党的具体态度的结论；而不从研究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特点得出现代俄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的结论。”^②

俄国实现了现代历史的普遍规律即过渡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但是，这个普遍规律是在完全特殊的情况下实现的：资产阶级不仅置身于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已经面临着强大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这就是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的

① 《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列宁全集》第15卷，参阅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页。

② 《〈威·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一书的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9页。列宁在考茨基论俄国革命的小册子的俄译本序言中，对革命问题的这种非辩证的观点提出了更尖锐的警告，虽然考茨基当时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分析和评价还是很不错的。列宁从分析一定的革命形势得出下列基本的方法论的观点：“从泛泛的空谈得出关于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一定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各政党的态度，关于革命‘一般性质’的具体原理，却不从精确地分析俄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利益和地位的具体材料，得出这个‘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的结论；——难道这不是捏造吗？难道这不是公然朝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吗？”（《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5页）

根本不同之点，这种特性对将来任何一个类似的情况都会是适用的。列宁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而对这种资产阶级的性质不抱任何幻想，而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则对历史的顺序作了形式主义的说明，并让已经显然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来进行革命，正如包括同一个考茨基在内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的情况一样，考茨基在此以前尚能很好地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一定的历史现象。

列宁在分析和评价历史发展和十分具体的情况时充分发挥了的非凡的辩证思想，在革命的进程中作出了真正精辟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一书中举出这样一段话作为例子：“我们应当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反对‘沙皇制度’（这是一个完全实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社会力量）（俄文此处没有“社会”两字。——译者注），并且能够‘彻底战胜’它。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决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愿意彻底胜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不，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彻底战胜沙皇制度’的力量，如果我们就是主要的巨大的力量而言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算到这两种力量中去的话。‘革命彻底战胜沙皇制度’，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早已由《前进报》指出过的结论，是我们的新火星派怎么也无法避开的。除此而外，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彻底战胜沙皇制度。”^①

^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页。

1905年的俄国革命使列宁能更透彻地去說明无产阶级的策略，在这种革命情况下，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彻底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然后，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变革，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此外，列宁把在革命中产生的苏维埃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基础。

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分析，不論过去或現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义，因为它說明了怎样根据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观点来解釋一定的历史情况，从而制定革命力量的一定的策略。而这对現代历史仍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 哲学問題

俄国革命的失敗必然影响到社会民主党，这也反映在当时日益加剧的思想动摇上。在此时期以前就已存在着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有些人已經完全拋棄了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其中有布尔什維克，也有孟什維克）則受新康德主义者、奥斯特瓦尔德或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影响。波格丹諾夫写了自己的著作《經驗一元論》，而在1908年又出版了巴札罗夫、波格丹諾夫、卢那察尔斯基、別尔曼、海尔方德、尤什凱維奇和苏沃洛夫的論文集，題为《馬克思主义哲学概論》，在这本論文集里充滿了哲学上的經驗批判主义观点。別尔曼在《从現代認識論来看辯证法》一书中、尤什凱維奇在《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論》一书中和瓦連廷諾夫在《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一书中，也傳播着同样的观点。普列汉諾夫已經开始同他們，特别是同波格丹諾夫进行論战，但是，列宁对这种論战还不十分滿意。列宁在1908年3月24日給馬·高尔基的信中写道：“普列汉諾夫反对他們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不会或者不想或者懶于**具体地、細致地、簡明地**說出自己的看法，而是用深奥的哲理来吓唬这些人。我无论如何要**按自己的方式**說出自己的反对意見。”^①

波格丹諾夫、巴札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曾經是布尔什維克，列宁不希望由于哲学上的分歧而引起政治上的分歧和决裂。因此，列宁特别是在給高尔基的信中強調了这种情况，他认为，如果在革

^① 《給阿·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5頁。

命、无产階級专政和社会主义問題上基本上是一致的话，那末，这种分歧总是会有办法解决的。

但是，列宁不能放过这样的論点，即认为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應該由經驗批判主义的認識論来代替，认为恩格斯的辯证法是神秘主义，唯物主义已被科学的最新成就所駁倒等論点。1908年初，列宁就开始写他的名著《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他是在倫敦和巴黎写的，于同年年底写成，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

該书显然是論战性质的。列宁首先要澄清情况，即指出打着馬克思主义招牌的所有这些問題，都是完全違反馬克思主义的，并指出馬克思主义同任何一种唯心主义都是絕對沒有联系的，因此同馬赫主义也是絕對沒有联系的。所以，在評价列宁的这本著作时，應該首先看到这一点。

列宁詳細地分析了他們的全部观点，分析了阿芬那留斯、馬赫以及其他馬赫主义者的观点，同时并指出了他們的观点的一致的地方，即他們的唯心主义。馬赫主义的基本論点是：客观世界是感觉的复合，主体和客体是不可分割的同格。与此相反，列宁和普列汉諾夫都指出，这个論点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列宁在全书里主要提出以下观点：“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識、思維、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因为明显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物质)有联系，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①。

列宁在这里不得不从根本上提出問題：或者是走唯物主义的路綫，承认物质的现实是第一性的，因而是不能依赖于意識的；或者是走唯心主义的路綫，把客观的现实变成感觉的复合。列宁分析和批評的重点就在这里，因为这就是基本問題。因此，列宁一貫坚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頁。在第86頁上也表現了关于“反映”是物质的特性的这个观点：“假定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这是合乎邏輯的。”

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着重強調唯物主义,是因为以后还要談到这个問題),这些观点在列宁的这本书里以各种形式得到了表述。“这也就是唯物主义:物质作用于我們的感覺器官而引起感覺。感覺依賴于大腦、神經、眼網膜等等,即依賴于按一定方式組成的物質。物質的存在不依賴于感覺。物質是第一性的。感覺、思想、意識是按特殊方式組成的物質的高級產物。這就是一般唯物主義的觀點,特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①

對於列宁的這些觀點,特別是對於從上述觀點必然產生的反映問題進行了很多爭論並且有許多想法,所以在這裡必須立即作一個解釋。列宁根據他所處的環境,想要首先指出應當唯物主義地來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從這一點來看,他有理由說這些觀點是一般唯物主義的觀點,從而也必定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②。

但是,列宁當時還不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特有的觀點來強調指出這個問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不是一般唯物主義的觀點,而首先是馬克思所特有的觀點。也就是說,列宁仍然是從古典唯物主義關於主體和客體的關係的概念出發,而不是從實踐這一被馬克思主義用來說明人和認識的基本和主要的標準出發。

因此,在這部著作里,當談到實踐時,仍然是首先把它作為真理的標準,雖然這個問題是次要的。但是在研究標準問題時,列宁

①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宁全集》第14卷,第44—45頁。

② 凡承認現實不依賴於人的意識而有賴於自己固有的規律和形式的任何一種哲學,都必定會贊同各種反映論中的一種。列宁對反映論的表述同恩格斯和普列漢諾夫的表述是一致的:“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意識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沒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賴於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主義自覺地把人類的‘素朴的’信念作為自己的認識論的基礎。”(同上書,第61頁)他在另一處寫道:“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確的復寫,可是如果說它們是同一的,那就荒謬了。意識總是反映存在的,這是整個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看不到這個原理與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聯繫,這是不可能的。”(同上書,第341頁)

敏銳地看到，不能把實踐的標準變成絕對：“生活、實踐的觀點應當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基本的觀點。這種觀點必然會導致唯物主義，而把教授的經院哲學的無數臆說一脚踢開。當然，在這裡不要忘記：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於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无情的鬥爭。”^①

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列寧基本上是站在費爾巴哈和普列漢諾夫的立場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站在恩格斯的立場上），這是認識論方面的批判實在論的觀點，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論點超越了這一觀點。

因此，當斯大林主義時代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堅持認為只有這些觀點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時，他們的看法就加倍地不正確：因為他們把列寧當時的某些觀點絕對化了（列寧自己從來也沒有把這些觀點絕對化，相反地，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他後來還克服了這些觀點）；同樣還因為他們把一般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宣布為馬克思主義特有的觀點，其次又把實踐的範疇片面地理解為僅僅是認識論的範疇，同時在認識論內部把它片面地只是理解為真理的標準^②。

我們很快就要看到，列寧在後來研究黑格爾和其他一些哲學家時重新又回到這個問題上，邁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並要求繼續前進的一步。

列寧在同經驗批判主義論戰時，還提出並解決了一些應該着重指出的問題。例如，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問題，雖然恩格斯和狄慈根已經加以研究過，但列寧更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列寧在批評波格丹諾夫對這一問題的解釋時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一）

^①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14卷，第142—143頁。

^② 關於這一點，在馬克思主義在蘇聯這一章中將要詳細論述。

有沒有客观真理？就是說，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賴于主体、不依賴于人、不依賴于人类的內容？（二）如果有客观真理，那末表現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絕對地表現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現它？这第二个問題就是关于絕對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問題。”^①

列宁遵循并贊同恩格斯关于这种关系的論断，同时指出，我們的知識向客观的、絕對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約的，然而他也指出，这些真理无疑是存在的，也就是說，我們意識中的映象是客观存在着的模特儿的反映。

因此，列宁同黑格尔、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致的，既排斥相对主义，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接受它。排斥它是因为仅仅坚持相对主义，它就会成为各种詭辯論的根据，接受它是因为其中也包含有絕對因素。“辯证法，正如恩格斯（俄文是“黑格尔”。——譯者注）早已說明的那樣，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論的因素，可是它并不歸結为相对主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辯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歸結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說，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們的知識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約的意义上，承认我們一切知識的相对性。”^②

在这部著作里，列宁对当时的物理学危机和打算以这种危机为根据而得出唯心主义結論的企图所作的分析，是很重要的。二十世紀初，由于对原子构造和光学性质有了新的理解，使得那些已經权威地統治了两个世紀之久的观点动搖了。正如列宁所断言的，在这样急剧轉变的时候，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此以前对物质的理解还是很不辯证的，現在常常为新的理解所补充。能量、电力等等成为只是丧失物质性的新的实体。与形形色色的非唯物主义的意图相反，列宁用自己的解决方法說明了什么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0頁。

② 同上书，第136頁。

是解决这一問題的彻底的辯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說：迄今我們認識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們的知識正在深化；那些从前以为是絕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慣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現在它們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們的意識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①

列宁的这些观点进一步明确地闡述了恩格斯和狄慈根对这些基本問題所作的辯证的解釋。在理解“实体”、“不变的实质”等等方面的机械論和形而上学(这是非辯证的唯物主义和几乎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的特点)，被一劳永逸地克服了。“承认某些不变的要素、‘物的不变的实质’等等，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辯证法的唯物主义。”②“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們只表現人对客体的認識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辯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認識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阶段(俄文为“里程碑”。——譯者注)都具有暫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絕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識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辯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論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③

对科学真理的非絕对性的認識，正是过去和現在都引起科学家队伍中的混乱的問題，这也正是馬克思主义对世界和認識所作的解釋的正确性的最有力的证明。列宁完全正确地強調指出新物理学陷入了唯心主义，这正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辯证法，他們把形而上学的旧唯物主义的論点看成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論点，他們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5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77頁。

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轉化为在我們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調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①。

列宁經過很好的分析綜合，对自然科学的当前情况作了估計，并对一方面打破旧观念，同时又滾向不可知論和唯心主义等方面去的危机作了分析。列宁特別根据萊伊和杜恒的文章发现了这个过程的一个根源，即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影响和作用愈来愈大，他指出，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使他們不可能正确地表述相对性的問題，并且必然把他們导致唯心主义。

一般來說，第二国际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对整个馬克思主义的了解非常不够。在經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論战还是最多的，这些論战表明，不論是批評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批評家布倫坦諾、巴尔特、施塔姆列尔、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桑巴特、伯姆—巴韦克、馬薩利克，或者是我們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些人，都沒有理解，而且从资产阶级的角度也不可能理解馬克思的經济学說的实质。至于說到用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历史的問題，大部分批評家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观念简单地归結为机械的經济主义，归結为认为上层建筑单方面地依赖于基础的观点，然后又来热心地反駁这些基本观念。

要证明这种看法的毫无根据，这对馬克思主义者來說是并不困难的。上面提到的每一个著名的馬克思主义者都同这些人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論战。

然而，在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問題方面，我們几乎可以确实断言，这个問題还没有被認識。如果在当时社会民主党內对这个問題就不是特別感到兴趣，相反地把馬克思主义哲学归結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的某一个派別，那末，在资产阶级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6頁。

的官方哲学队伍里，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的学者中間，对这一問題知道得很少，就毫不奇怪了。

由于这种情况，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結果：某些理論家(萊伊、杜恒)在企图解釋最新成果(例如物理学的最新成果)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实际上有时是在敲着敞开的大門。另一方面，由于不懂得辯证法，所有这些困难和怪論使他們經過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列宁在結論里簡要說明了自己的分析，指出經驗批判主义在整个認識論問題上的反动性质，指出它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和內在論者(舒貝特—索尔登、萊克列尔、舒佩)是密切联系的。同时列宁指出：“最新的哲学像以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哲学派别的对抗归根到底表现为階級的对抗。”^①

^① 这个結論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片面的，特别是考虑到唯心主义的历史作用的时候。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列宁后来对比作了修改。“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來說，是两个斗争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詞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圓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着，它拥有庞大的組織，它繼續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9頁)后来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人們把列宁的这些观点絕對化了，企图完全机械地來說明哲学思想的发展，而列宁本人在自己的筆記中对这个問題早已采取了另外一种看法。列宁写道：“从粗陋的、簡單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說。相反地，从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認識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Dietzgen)发展(膨脹、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絕對。唯心主义就是僧侶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經過人的无限复杂的(辯证的)認識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侶主义的道路。”(《哲学筆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1頁)列宁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的摘要中同样写道：“聰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聰明的唯物主义。聰明的唯心主义这个詞可以用辯证的唯心主义这个詞来代替，愚蠢的这个詞可以用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糙的、不动的这些詞来代替。”(同上书，第305頁)这已經对他本人的观点作了重大的修改，也是对他的信徒后来在解决这个問題时的荒謬作法的重大否定。

列宁的这本书是他所发表的唯一篇幅比较大的哲学著作，因此，应该用列宁本人所采用的那种方法，即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任务的整个错综复杂的情况，来研究和评价这本书。而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正如十年前反对新康德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一样，是要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一切马赫主义的解释，以及与此有关的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倾向都是毫无根据的。这部著作的意义正是在于它彻底完成了这个任务，加强了人们对俄国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正确性的信念，从而促进了俄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我在上面提到的某些局限性并没有贬低这部著作的意义，而只是降低了这样一些思想懒汉的声誉，他们不遵循列宁把革命的辩证法思想不断地运用到自己的成果中去的榜样，而是顽固地、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些东西。

列宁通过对过去的伟大的辩证论者、特别是对黑格尔的研究，在自己出色的哲学笔记中作了各种批注、评语、记号和注解，以此提供了这种榜样。列宁还在青年时代就看到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1905年以后的时期，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出现了动摇和把经验批判主义（即唯心主义的一种）同辩证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并以前者来代替后者的倾向时，列宁首先起来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方面。

但是，列宁并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外一个方面。当重新又出现引起国际冲突的历史因素时，当必须准备进行决定性的革命战斗（在这种战斗中要求巧妙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时，列宁再次对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给予极大的重视。在1914—1916年期间，列宁详细地研究了黑格尔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大《逻辑》和《哲学史》，列宁同时还研究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这就是说，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在其著作中包含了大量的辩证法问题的所有那些哲学家。

通过閱讀大量的哲学著作而写下的所有这些札記和批注，后来汇集起来編成一本專門的书出版，这就是《哲学筆記》。因此这本书不是一部專門的有系統的著作，而是列宁在自己研究哲学的过程中記下来的零散的想法、評語、片断和个别論点。但是这些札記、特別是在1914—1916年期間所写的札記的中心問題是辯证法問題。

在恩格斯以后，沒有一个馬克思主义者能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基本問題。特別是思維領域从馬克思主义方面來說还是所謂在理論上原封未动的領域。連普列汉諾夫本人——那一时期馬克思主义思想最著名的代表者之一——也沒有更广泛地来闡明这个問題，而在大多数場合是停留在对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各种文化历史問題和現象进行研究。

因此，列宁特別在自己关于辯证法的短文中坚决主張按邏輯方法来研究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而不是只停留在應該說明某一原理的举例上^①。

列宁对認識論和邏輯学特別感到兴趣。他在一个批注中指出，

① 应当立即着重指出，列宁的真正的、独创的、确实是創造性的哲学遗产正是包含在《哲学筆記》的这些片断中。这些丰富的思想、批注和指示在馬克思主义中还没有得到詳細的闡述，还没有得到执行，同时研究得也不够。

例如联系到对立面渗透的辯证規律問題，列宁对恩格斯也采取了批評的态度：“統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認識（參看拉薩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第3篇（“論認識”）开头所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話），是辯证法的实质（是辯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問題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經常在这周圍兜圈子，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

辯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須由科学史来檢驗。对于辯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普列汉諾夫）沒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作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被当作認識的規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規律）。”（《哲学筆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7頁）

在研究和闡述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和辯证法时，应当注意专门科学的历史、动物的智力发展史、語言史、感觉器官的生理学和心理学。

然而对列宁來說，其中什么是主要的以及他是怎样对待这些問題的呢？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任何事物和任何現象都是辯证的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在客观现实的任何一个情况中都可以說明辯证法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要素。

既然人的思維只是物质现实存在的一种形式（虽然是最高的形式），那末它自身必然是辯证的。一方面應該考察从有邏輯以前一直到現在我們思維的辯证发展；另一方面，應該同现实本身的形式和規律联系起来考察思維的形式和規律，因为思維不仅仅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且也反映这个现实。

列宁依照黑格尔对邏輯学問題所作的深刻分析，提出判断的問題，在判断中发现一般和特殊、个别和一般、必然和偶然等等的統一。判断作为我們思維的一种形式，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是某种自在地存在的東西，而是一种本身具有辯证性的思維形式。它之所以是辯证的，是因为它反映着辯证的现实。因此，在判断中个别和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統一（例如，玫瑰是植物）是一个现实的、客观的内容在思想上的反映，是組成客观现实本身的个别和一般的对立面的統一在思想上的反映。

列宁在《哲学筆記》的著名短文《談談辯证法問題》中是这样理解和批注的：“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綠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經有辯证法：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說，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論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

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經過千万次的轉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現象、过程)相联系。諸如此类等等。在这里已經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这里已經有偶然和必然、現象和本质,因为当我们說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我們就把許多特征作为偶然的東西抛掉,把本质和現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可見,在任何一个命題中,好像在一个基层的‘单位’(“細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辯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辯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認識所固有的。……”^①

这只是列宁为了辯证唯物地研究人类思維而提供要素的一个实例。他在自己的这些主張中明确地指出,研究思維不能离开唯物辯证法,而邏輯学和認識論的問題本质上也正是辯证法的問題^②。

在这些主張中,列宁的想法和意图同恩格斯在《自然辯证法》一书中的論述是一致的,只是在很多問題上列宁看得更远一些。从上面所引的短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并不主張把邏輯学問題分为形式邏輯和辯证邏輯的問題,而主要是把它理解为辯证邏輯的問題,我們的任何一个思維命題都說明这一点。如果思維是现实的一种形式,那末由于它是现实的一部分,由于它反映辯证的现实,因此它自身同样也是辯证的。“真理就是由現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們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轉化=矛盾)=邏輯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轉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現出来的。事物的辯证法創造观念的辯证法,而不是相反。”^③ 列宁在《談談辯证法問題》一文中非常

① 《哲学筆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9—410頁。

② 因此,列宁在这一段的最后提醒說:“辯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正是問題的这一‘方面’(这不是問題的一个“方面”,而是問題的本质)普列汉諾夫沒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說了。”(同上书,第410頁)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頁。

明显地指出一般判断（其中反映了现实的辩证法）的复杂的辩证法。任何一个普通的个别在我们的判断中表明它同另一个个别有共同的宾词，因此，就表明它可以通过自己的个别性转变为特殊性和共同性，表明它同那种不仅为它本身所固有，而且也为另一些同样的个别性所固有的情况是等同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判断都不仅指出同一性，而且还指出差异性、对立面和转化，因此，一般不能讲形式上的抽象性，而是讲真正的辩证性。

在所有这些论述中，作为唯物主义者的列宁所感到兴趣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被忽视了的东西——辩证法。因此，他的意图是要指出一般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的重大区别。所以列宁坚决主张辩证地来研究我们的认识、概念、范畴等等。如果这样理解认识问题，那末就不会停留在机械地理解反映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发表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评论和思想。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写道：“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①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同上书，第411—412页）

这就是说，列宁在这里又一次修改了自己以前的观点，同时出色地阐明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源”，指出唯心主义不只是某种阶级的思想体系，而且是一定的认识上的结果，虽然它是片面的和直线的等等。

因此，列宁在很多地方強調指出的正是这种既要辯证地了解反映本身，也要辯证地了解我們的認識的必要性。“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沒有运动的，不是沒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①

列宁的这些观点在他的筆記中很多地方都能見到，这些观点的基本特点是列宁要求并坚决主張尽量灵活地、活动地和辯证地来理解認識。列宁在一个地方写道：“智慧（人的）对待个别事物，对个别事物的摹写（=概念），不是簡單的、直接的、照鏡子那样死板的动作，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活动；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使抽象的概念、观念向幻想（最后=神）轉变（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人們意識不到的轉变）。因为即使在最簡單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一般“桌子”）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②

列宁从这方面去考虑，就找出了具体的一般和抽象的一般的重大差別，现实本身所包含的一般同我們的概念和范畴（即对这个具体的一般的認識）的重大差別。列宁一方面把概念了解为判断的“紐結”，把范畴了解为“現象之网的网上紐結”^③，另一方面，列宁着重指出，我們的任何一种認識都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維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④。正因为我們的思維不可避免地具有抽象的、不完全的、主观的性质，所以“一般概念、規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頁。

② 同上书，第421頁。

③ “在人面前是自然現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沒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則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認識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們認識和掌握自然現象之网的网上紐結。”（同上书，第90頁）

④ 同上书，第285頁。

全的**具体事物**”^①。但是同时列宁（同黑格尔一致）得出結論說，当思維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如果思維是正确的话，那末它不是离开现实，而是和现实接近。抽象的力量就在于此，因为一切科学的抽象比一般观察的認識更深刻、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因为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概括了主要的和本质的因素^②。

列宁非常注意的其次一个问题是实践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样克服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并且发现了在他以前没有被提起的某些因素。例如在构成、創立和形成我們的思維、一定的原則、規律和公理的問題上，列宁把实践作为可以借以构成我們思維的整个鎖鏈的基础。列宁在評論黑格尔的一个非常模糊的思想时指出：“如果黑格尔力求——有时甚至极力和竭尽全力——把人的合目的性的活动归入邏輯的范畴，說这种活动是‘推理’，說主体（人）在邏輯‘推理’的‘格’中起着某一‘項’的作用等等，——那末这**不全是牵强附会，不全是游戏。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純粹唯物主义的内容**。要倒过来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須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識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邏輯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这点**应注意**。”^③

这里列宁直接指出經驗論和唯理論之間的历史性論战的解决办法，他指出任何一方都沒有完全的真理。經驗論者和唯理論者都完全不懂得实践的要素，因此，必然不是陷入片面的后驗論就是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0頁。

② 同上书，第181頁。

③ 同上书，第203頁。联系到这一将实践作为認識过程的組成要素（因此这是按照馬克思的思想彻底理解了的实践）的观点，应该指出，列宁在这个問題上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常常被錯誤地引用，这个观点认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維，并从抽象的**思維到实践**，这就是（俄文有“認識真理、”几个字。——譯者注）認識客观实在的辯证的途徑”（同上书，第181頁）。实践的因素在这里說明得还不够，还是更多地被理解为真理和我們的認識的某种补充的标准。因此，更确切的提法应该是：从实践和直感到抽象的思維，并且再到实践。

陷入片面的先驗論。

关于這個問題，列宁在革命以后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进行的一次关于工会問題的爭論中，曾經回到这个重要的問題上来。列宁在举“玻璃杯”这个简单的例子时，首先指出，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多质的，一个定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它的一切方面和一切关系。其次，他指出实践本身也从根本上确定在一定的情况下我們將擇取哪些方面，舍棄哪些方面；在这以后，列宁得出以下結論：“学校里讲的形式邏輯（学校里只能讲形式邏輯，而且只应当对高年級^①讲，并且在讲解时还要加上修正）是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見的东西来做形式上的定义，而且只是这样做定义。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們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圓筒，又是飲具），那末我們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

辩证邏輯則要求我們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們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邏輯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說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就玻璃杯來說，这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用处，它同周圍世界的联系，都是常常变化的。第三，必須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滿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邏輯教导說，‘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諾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說法这样說。”^②

^① “高年級”，在列宁的原文中为“低年級”。——譯者注

^② 《再論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3—84頁。

由此可見，列宁在这个时期的評論和筆記中对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問題（这是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部分）的理解，比当时所有其他的馬克思主义者都要深刻得多，他以这些論点超越了第二国际的水平。他的这些思想远远超过了他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书中所提的問題和某些解答（特别是在反映和实践的問題上）。如果說他的前一部著作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下所解決的問題，那末，《哲学筆記》在哲学上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則是因为它是用馬克思主义观点来进一步研究和深入哲学問題的重要部分的綜合性的指南。

第三章 帝国主义問題

由于很多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对列宁和整个社会民主党来说是艰苦的年代。因为革命失败后反动派的猖獗，列宁首先碰到的任务是反对孟什维克取消秘密党的企图，随后不久又必须反对某些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拋棄一切合法措施和公开斗争方法的左倾激进的要求。无论前者(取消派)或后者(召回派)最终都联合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所谓八月联盟中去了，这种情况终于促使列宁在1912年1月召开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組成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

使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第二国际面临困难问题的第二个因素，是帝国主义的因素，是战争冲突从而以及革命搏斗的临近。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后来的巴塞尔代表大会(1912年)已经明显地表明社会党人的队伍及其观点的不一致。帝国主义这一现实情况和民族对抗在社会民主党队伍内部引起了非常尖锐的分歧。

队伍内部的思想是很不相同的。一种人坚持保卫祖国的观点(社会沙文主义者)，第二种人坚持认为帝国主义有进步性，因而为列强的扩张政策进行辩护(庫諾夫)，第三种人幻想超帝国主义(考茨基)，第四种人否认任何民族进步战争的可能性，从而也否认民族自决权(罗·卢森堡)等等。

列宁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把形形色色的这种争论阐述得非常清楚，并为解决这一思想上的普遍混乱提出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列宁在同罗·卢森堡进行论战时，在自己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并证明民族自决权是现代历史发展和无产阶

級革命的重要問題之一。列宁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是不能得到解放的这一观点，在自己的分析中指出，从这个問題来看，俄国无产階級負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国家建設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各种民族主义胜利地进行斗争，必須坚持无产階級斗争和无产階級組織的統一，使它們不顾資产階級的民族独存的傾向而极紧密地溶合为一个国际整体。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溶合起来，——这就是馬克思主义教导給工人的民族問題綱領，全世界經驗和俄国經驗教导給工人的民族問題綱領。”^①

两年以后(1916年)，列宁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問題的文章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列宁尖銳地批評了倫納和鮑威尔的关于“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張以及庫諾夫、帕尔烏斯和考茨基等人对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写道：“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②。列宁把受压迫民族的解放看成是爭取社会解放的斗争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因而为現代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論上、思想上的前景。所以他同时也激烈反对把这个問題“拖延”到社会主义时期去解决。換句話說，他的意思是：“正如人类只有經過被压迫階級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階級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經過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們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③

① 《論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6頁。

②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頁。

③ 同上书，第141頁。

与这个问题密切相联系,当时还进行了关于战争問題的爭論。很多非常有名的社会党人坚决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有正义的战争。于是列宁向革命力量指出如何正确地来看待这个问题。列宁在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論点以后得出結論說,一个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斗争是正义的和进步的^①。整个世界最近四十年来的历史,特别是当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解放的历史进程,证明这个观点具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

列宁在《无产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一文中,又一次批評了“国际派”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再发生任何民族战争的論点,罗·卢森堡曾对这个論点表示贊同,她认为任何一次这样的战争都立即会被其他某个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从而又把它变成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反駁了这种看法,并在战争期間(1916年)在同一篇文章中得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結論: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內同时获得胜利,因为資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論上是不正确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錯誤的,而在实践上則无異于欧洲沙文主义:我們是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民的民族,我們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說,它們进行反对‘我們’民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誰承认阶级斗争,誰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繼續、发展和尖銳化的自然表現,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

^① 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对于“防御的”和“正义的”战争的理解作了如下的具体說明:“例如,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那末不管誰先进攻,这些战争都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而一切社会党人都会同情被压迫的、附屬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希望它們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0—281頁)

現。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記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个国家內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預計到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結論：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內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內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个相当时期內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会引起磨擦，而且会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公开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就我們方面說来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爭取社会主义、爭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給考茨基的信中直接认定已經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他是完全正确的。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进行自卫。……如果忘記一切战争都不过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繼續，那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現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大强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策的繼續，而这种政策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造成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要产生和造成反对民族压迫的政策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因此也就可能并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融合等等。”^①

^① 《无产阶级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4—75、76頁。一年以前，列宁在論欧洲联邦一文中已經得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內获得胜利这一十分重要的結論。“經濟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絕對規律。由此就应得出結論：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內获得胜利。”（《論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1頁）

沒有必要来特別強調，列宁的这些創造性的观点如何决定性地使社会主义力量不仅在各民族爭取社会解放、而且还在爭取民族解放的現代斗争中找到了明确的观点和方向。

在这些年代里，由于整个世界的局势、帝国主义的战争和第二国际（它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的看法日益模糊）的彻底瓦解，列宁坚决主張向共产党人說明作为一种制度（而不仅是作为一种政策）的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和基本特征，并根据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国际地位来从中作出某些重要的結論。

在列宁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約·阿·霍布森和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已經对这个問題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列宁的分析則达到了頂点。列宁同意他們說的帝国主义就其經濟实质來說是壟斷的資本主义的意見，但他立即又指出，这一点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也就是說，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帝国主义的壟斷，就其本身來說就意味着向更高级的社会經濟形态的过渡。

列宁指出，壟斷的資本主义是在二十世紀初从自由竞争的資本主义成长起来的，他同时确定：壟斷是从发展到极高阶段的生产集中成长起来的；壟斷引起了加紧对最主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尤其是主要工业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壟斷是从銀行和殖民政策成长起来的^①。

列宁在分析这些問題时首先分析了銀行在資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对当时來說）阶段上的作用，同时指出銀行同工业資本有着联系，而且工业資本愈来愈完全地依赖于銀行。列宁指出，这个过程的后果是形成了財政資本和財政寡头，它們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的、新的因素。“資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所有权同資本对生产的投資权分离，貨幣資本同工业資本或生产資本

^①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2—293頁。

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分离。帝国主义或财政资本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财政资本处在一切其他形式的资本之上，这表明食利者和财政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财政‘实力’的国家处在其余一切国家之上。”^①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资本输出。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的标志是商品输出，而现代资本主义时期占统治的则是资本输出，通过这种方式，愈来愈多的国家更加紧地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但同时又日益依赖于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瓜分世界；它们之间进行着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各种类型的殖民主义是现时代的特征。列宁就这个问题特别强调指出，依赖的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时必须指出，财政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列强为了在经济上政治上分割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赖形式。这个时代的标本国家形式不仅有两种基本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各样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其实在财政和外交方面却处处依赖于他国。”^②

因此，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主要是：帝国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特性的终结和直接的继续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被与之并存的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并引起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制度的过渡。当然，一个定义永远不可能详尽无遗地说明一个事物，因此它就應該包括基本的、主要的特征以及某些上述的其他特征。“因此，一方面要记住，所有一般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30—231页。

② 同上书，第255页。

远也不能包括現象的全部发展上各方面的联系，同时也應該給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主要特征：（1）生产和資本的积聚已經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壟断組織；（2）銀行資本和工业資本已融而为一，在这个‘財政資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財政寡头；（3）与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已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4）分割世界的資本家的国际壟断同盟已經形成；（5）最大資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資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壟断組織和財政資本的統治业已确立，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資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領土瓜分完毕。”①

列宁和希法亭不同，他在帝国主义的发展中还看到一个重要因素，即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列宁确认，任何壟断必然要引起停滞，产生一种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的經濟力量。正如列宁自己所着重指出的，这一点也不会完全实现，竞争也必然迫使人們采用技术上的成就，“但是壟断所特有的停滞和腐化的趋势还是繼續在发生作用，而且有时还会在个别工业部門、个别国家占上风”②。

这整个运动和发展的結果是貨幣資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加和不管理企业的食利者阶层增加了。与此相似的是最强大的国家成为“食利国”，它以自己大量的超額

①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8—259頁。

② 同上书，第269頁。列宁从来没有认为資本主义因此就沒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相反地，以事实为依据，列宁在同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向排除了資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可能，那就想錯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門，个别資產階級阶层，个别国家，各以或多或少的强度时而表現着这种趋向，时而又表現着那种趋向。整个說来，現在資本主义发展的迅速是从前远不能相比的，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不平衡也特別表現在資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同上书，第293—294頁）

利潤严重地影响着工人运动。

列宁就这个问题在和帝国主义的辯护士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尖锐的論战时，分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一些非常重要的現象，即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同资产阶级合作等等。列宁指出，资本家的高額利潤提供了收买某些工人阶层的可能性，使他們站到一个工业部門或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方面来反对其他一切工人阶层。列宁不久以后在同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有了这样巨量的超額利潤（因为这个利潤超出了资本家从“自己”国家的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潤），自然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領袖和上层工人貴族。‘先进’国里的资本家，就是这样千方百計地、直接間接地、公开与秘密地收买他們。

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資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說来已經完全市儈化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而現在則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不是軍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在工人中間的代理人（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傳播者。在无产阶级的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們中間必然有不少人是要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巴黎公社活动家’的。

如果不懂得这个現象的經濟根源，如果不估計到这个現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末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际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①

①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185—186頁。这篇序言是1920年用法文和德文出版論帝国主义这本书时所写的。列宁在以前、特别是在分析第二国际的破产时，曾以同样方式从經濟上和政治上来說明这些現象。“为了說明整个运动的危机，必須考察：第一、当前政策的經濟意义；第二、作为这种政策基础的思想；第三、这种政策同社会主义各个派別历史的联系。

1914—1915年战争期間护国主义的經濟实质是什么呢？各大强国的资产阶级进

列宁論述帝国主义的这本书是在俄国已处于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出版的。1917年的二月革命已經完成，統治了那么久的沙皇制度永远退出了俄国舞台。列宁当时还住在瑞士，他写了著名的《远方来信》，在这些信中他說明了这些事件的意义，給俄国工人阶级指出了进一步斗争的远景。同时他力求尽快地返回俄国，终于在1917年4月回到了俄国。可以說，从这时候起俄国的革命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列宁通过著名的四月提綱和以后的一系列文章、演說和小册子等，勇敢地、英明地领导布尔什維克和人民群众从革命的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

虽然列宁主要是由于克倫斯基临时政府的搜捕而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但是他不仅领导了布尔什維克的全部活动，不仅注意到人民群众的信任的变化和反革命分子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报复的情况，而且——可以毫不夸大地說——他以自己敏銳的革命洞察力真正認識到了决定性的时机，并以自己很高的威望使中央委员会相信情况的紧急，必須采取行动。如果注意到布尔什維克最高中心的很多成員已經动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甚至在非党的《新生活》杂志上暴露了布尔什維克在准备起义，如果进一步注意到俄国無論前綫或后方的情况都非常困难，几乎是毫无出路，那末，列宁对这个时机的估計以及他在这一决定性的日子的前夕給中央委

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瓜分世界和剝削世界，是为了压迫各族人民。一群为数不多的工人官僚、工人貴族和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可以从资产阶级的巨額利潤中分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阶级背景是一样的，都是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同‘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走狗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剝削的阶级。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內容也是一样的，都是主張阶级合作，放棄无产阶级专政，放棄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法制，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是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米勒兰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的直接繼續和完成。”（《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104頁）

員的信不仅是非常生动的文件，而且是极有意义的历史性行动。列宁的不可超越的偉大之处就在于此^①。

① 我們认为，十月革命是列宁最偉大、最英明和最有意义的事蹟，我們不願意使这部历史遺漏这封写給中央委員的信件，所以至少要摘引几段：“同志們！我写这几行字是在 24 日晚上，情况已經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現在拖延起义真的就等于死亡。我尽力向同志們說明，現在正是千鈞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問題决不是會議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維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科尔尼洛夫分子展开的資產階級进攻，維尔霍夫斯基的离职，都說明等待是不行了。無論如何必須在今晚逮捕政府人員，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們抵抗，就消灭他們），等等。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無論如何不能让克倫斯基及其同党把持政权到 25 日，一定要在今晚解決問題。历史不会饒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們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許多、丧失一切的危險。……等待 10 月 25 日不一定举行的表决，就是拘泥于形式，就是自取灭亡；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問題；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們。……政府正在动摇。必須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潰它！拖延发动就等于死亡。”（《給中央委員的信》。《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14—215 頁）

第四章 国家、革命和社会主义問題

在俄国和世界上这些历史事件非常集中的时候，在国内革命沸騰和阶级关系日益尖銳的情况下，列宁在秘密状态中写了一部著名的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論著作。

这部著作所研究的，正是一些最迫切的問題，如立即行动的問題，解决現代历史基本問題的的問題。只有当我们考虑到馬克思关于国家和革命的观点在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一时期的命运，才能比較清楚地了解这部著作的意义。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第二国际的領袖們当时对这个問題写了些什么，如果我们注意到，当时馬克思主义的理論界有一种明显的傾向，企图把国家理解为超阶级的組織，以形式法权的方式把民主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釋为拥有多数选票和議會席位的无阶级的政权，把通过議會来取得政权的斗争绝对化而拋棄其他一切斗争，那末，列宁对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闡述和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意义才会真正被我們所了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阶级的組織，是統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它是典型历史性的和暫时的現象。列宁彻底捍卫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思想，同时指出，关于国家的任何其他观点都不能說明这个問題的实质，都不能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以及进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指出历史的前景。其次，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統治永远是一种暴力，因此，任何一个阶级的国家都只能是专政，而不能是别的。列宁在这方面扼要地說明了这个論点：“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資

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由此可见，列宁不同于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他首先指出了某些主要的历史事实：第一，对资产阶级国家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即使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同样也是一种专政；第二，正由于国家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必不可少地需要的，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制也必然是一种专政。这样，列宁就摈弃并粉碎了考茨基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这种观念认为“民主制”不是“专政”，认为政权是某种其他的东西，因为它用选票获得的。

列宁大声疾呼地写道：“不是的。民主制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制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强力的组织。”^②

因此，列宁必然得出同马克思一致的结论，认为需要和必然要由革命来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把这看作是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前提。但是列宁不同于马克思后来的某些信徒，他从来没有绝对地认为只有一条革命道路是必然的和唯一可能的。相反地，特别是在后来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一书中，列宁特别提醒共产党人要注意历史的辩证法，对待历史实践必须有最大的灵活性。在这方面列宁写道：“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引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前进，以争取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胜利。这是无可争辩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0页。

^② 同上书，第442页。

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錯誤。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什么我們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們不容許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会造成錯誤，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經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傾教条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視新內容，結果遭到了完全的破产。左傾教条主义則固执地絕對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們共产主义者的責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們的策略适应任何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是（列宁的原文为“并不是”。——譯者注）我們的階級、我們的努力引起的。”^①

这些观点具有非常偉大的理論意义和实践意义，因为列宁以此警告革命力量在革命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不要陷入任何刻板的公式和教条中去。正是这些观点，在以后斯大林主义的实践中完全被拋棄了，这就是产生比較严重的历史后果的原因。

列宁由于深刻地掌握了辯证法，所以在理論上和实践上比任何人都善于克服抽象地对待問題的方法，而这种抽象地对待問題的方法永远不能从一般和总体中看到特殊和特点，正如实用主义不能从特殊中看到一般一样。在同一本书里列宁強調指出，應該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則应用到各階級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頁。在这方面列宁強調指出，历史，特别是革命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和先鋒队所想像的要更丰富，更多样化，更“巧妙”，因而列宁得出两个实际結論：“第一、革命階級为了實現自己的任务，必須善于毫不遺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有时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冒着巨大的危險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沒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階級必須时刻准备着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同上书，第77頁）

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們應該善于研究、探求和猜透这种特点”^①。在同一书中稍后一点写道：“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徑来解决**統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与左傾教条主义，推翻資产階級，建立苏維埃共和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时候，都必須考察、研究、探索、揣測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性，这是一切发达国家（而且不仅是发达国家）^②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③

这种非凡的辯证性和灵活性是列宁历史活动的基本特点。他是思想上的明确性、气质上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的特殊結合体。在革命事件中他应付自如，从不丧失前途，从不在不可避免的低潮面前低头，在这种情况下他目光敏銳和态度激进，从不把这些因素絕對化，从不忽略革命运动的基本的社会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远景。列宁完全正确地坚持无产階級专政和坚持在現代条件下尖銳的階級斗争的必然性，但同时也強調无产階級专政的另一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因此他在革命后写道：“无产階級专政是新階級对較强大的敌人——資产階級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資产階級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10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資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現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經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資本主义和資产階級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階級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經過持久的、頑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經過坚持不懈、紀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統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資产階級。”^④

列宁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情况下也写过一系列的这样的話和重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1頁。

② “发达国家”，在列宁原文中为“先进国家”。——譯者注

③ 同上书，第74頁。

④ 同上书，第6頁。

复过这些观点，同时看到俄国艰难的、十分尖銳的形势，也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当前地位和发展水平，从中必然得出下列結論：这场阶级搏斗决不可能是历史的田园詩^①。

但是，尽管这个问题无论对列宁或是对馬克思主义來說都是根本没有爭論的，但是在列宁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論的进一步发展中，它却成了爭論的問題，这是由于这一观点被絕對化，被說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內容。

因此，十分重要的是要指出，列宁也常常提醒說，这个因素不是主要的，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問題是要将新的无产阶级政权帶进社会关系中去，使社会关系变成新的、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組織，以至新的、更高类型的一般社会关系。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問題，由此还将得出另外一些重要的結論。“我曾屢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兵农代表苏維埃會議上講話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剝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經濟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資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組織。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力量的泉源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②

暴力是任何国家、因而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因素。但是，它不是主要的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首先应该很好地区別对誰实行暴力，由誰实行暴力以及为什么实行暴力。列宁在这些問題上是沒有任何犹豫的。列宁坚决地捍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权是“組成为統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馬克思語）的論点，同时他又从

^① 特别是在《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点。在同考茨基的論战中，这种观点表現得最为激烈：“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8頁）

^② 《偉大的創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1頁。

这里得出所有的基本結論。既然无产階級专政必然还意味着实现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組織，也就是更高类型的社会关系即社会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是劳动者的政权，而不是凌駕于他們之上的政权，那末，整个权力的集中不能只停留在某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器上，正如整个过程发展的目的也不应是为了加强这种必然会因此变成騎在劳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强力的机器一样。在这方面，列宁始終是坚持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不能不是消亡的国家这一卓越的思想。“无产階級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說馬克思的学說就是如此，但是‘忘了’补充：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需要建立一个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无产階級’。”^①

由于各种情况的凑合和俄国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問題就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理論和实践的一个中心問題，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要讲到。这里重要的是要強調指出，在这个問題上，列宁的思想也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沒有以国家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問題。列宁所向往的基本点就是逐渐消除对人的統治并建立对物的統治的人們的劳动集体：“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組織有系統的强力，消灭任何加在人們头上的强力。我們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的社会制度。但是，我們向往社会主义，我們也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就沒有任何必要对人們使用强力，沒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們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碼条件，而不需要强力和服从。”^②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0頁。

② 同上书，第442—443頁。

为了开始这种真正社会主义的对社会关系改造的过程，列宁在苏維埃政权初期立即开始采取許多相应的措施。早在1917年11月，也就是刚刚夺取政权以后，列宁就写了关于工人监督的指令，其基本思想是：在拥有工人和职员五人以上，或每年资金周轉在10,000卢布以上的一切工业、商业、銀行和农业等企业中，实行工人监督，这种监督由企业的全体工人和职员直接实行，如果企业規模大，則通过他們选出的代表来实行。非經选出的代表許可，禁止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停工，以及对生产过程作任何改变。“一切賬簿和文件，以及一切倉庫和庫存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等，应毫无例外，一律对选出的代表公开。”^①

从列宁在很多文章里多次对这个問題的說明来看，他在任何方面都把这个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中心問題。我們將要举出的只是比較突出的一些例子。特别是在关于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也就是在革命事件以后不久(1918年4月)就写成的这篇文章和列宁在其中給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下了定义并指出它們的实质和远景的文件里，很明显看到，重点不在于加强作为国家(即政权机关，而不是人民本身)的国家，而在于劳动人民在公社这一組織单位里如何实行直接管理。“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它已經成为一个由許多生产消費公社构成的体系，而这些公社都能誠实地計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費，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够把每日劳动時間减少到7小时或6小时以至于更少。”^②

^① 《工人监督条例草案》。《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4頁。在草案中讲到，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的决定，企业主必須服从，只有各部門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才能取消他們的决定，所有企业主和所有代表均应对国家負責，維持最严格的秩序和紀律并保护财产。列宁一直到逝世前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参見列宁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議《怎样改組工农檢查院》(1923年)和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

^② 《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頁。

列宁在同一篇文章里还精确地规定了公社的涵义是什么。“每个工厂、每个乡村都是一个生产消费公社，都有权并且应该按照自己的方法实行一般的苏维埃法规（所谓“照自己的方法”，并不是说违反法规，而是说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实行这些法规），照自己的方法解决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统计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个别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私事’。在苏维埃政权下，这就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①

列宁正确地把苏维埃、苏维埃政权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阶级的国家的组织形式，而这个工人阶级的国家自己基本的历史要求是：吸引广大的和最广泛的人民阶层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同时，列宁正确地激烈反对和摒弃用社会主义来说明这个问题时出现的两种倾向：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纯粹民主论，它后面隐藏的正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性；另一种是官僚国家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是从国家（即使它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身的地位、任务、困难和性质中而必然产生的。列宁在自己的很多文章里都正确地指出，苏维埃民主制即使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但比起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来也还要深刻得多。其所以深刻得多，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群众本身有权决定选举和可以自由地撤销被选举人；因为通过苏维埃政权能吸引最广泛的被剥削的群众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并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因为这样就“第一次使真正的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国家，并且开始管理国家”^②。

因此，列宁完全正确地认为这种民主制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胜过资产阶级社会政治上的徒具形式的民主制。但是要实现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必须真正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工作，从而防止官僚主义地去理解政权，防止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专政。“必须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8页。

② 同上书，第250页。

努力不懈地发展各地的苏維埃組織和苏維埃政权組織。現在有一种使苏維埃代表变为‘議會議員’，或变为官僚的小資產階級趋势。必須吸引**全体**苏維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許多地方，苏維埃的各部逐漸与各人民委員部合并成了一个机关。我們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貧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應該詳細地記載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統化，用更多的經驗来檢查它，并且定为法規。我們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8小时‘份內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報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別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①

列宁經常注意官僚主义問題，并把它看成是苏維埃政权发展中的莫大的禍害。我們这里提到的只是列宁在論实物稅一文中对官僚主义的分析，列宁指出，早在1919年3月的新党綱中已經公开地、勇敢地承认官僚主义在苏維埃制度內已部分地复活起来。列宁认为，这种官僚主义的經濟根源不同于資產階級社会里的官僚主义，它在于“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們的貧困、不开化，交通的閉塞，文盲現象的存在，工农业間的缺乏流轉，缺乏联系和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1頁。在同一个地方列宁还写道：“苏維埃与‘人民’，即与被剝削劳动者保持着穩固的联系，保持着灵活的和能伸縮的联系，就可以防止苏維埃組織受官僚主义的毒害。”（同上书，第252頁）

同样，在关于党綱的报告中，列宁批評布哈林关于这个問題的报告时強調指出，对官僚主义的埋怨早就听到了（这是在1919年），列宁写道：“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这在資產階級共和国里，不仅不可能，而且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做。最好的資產階級共和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撓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我們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們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維埃虽然在綱領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產階級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綱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6頁）

协助。这大部分是国内战争的结果”^①。“应当大胆承认这祸害，以便更坚决地同它作斗争，以便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做起——在将来我国一切建设部门中，我们还不得不多次反复地从头做起，改正没有做好的事，选择各种完成任务的道路。”^②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彻底说完了列宁的理论活动的丰富思想，特别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暴风雨般的错综复杂的时期的丰富思想。当时必须善于马克思主义地、大胆地掌握住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舵，来通过空前未有的国内外的困难。从和平法令和土地（国有化）法令开始一直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饥饿、国家的破坏、官僚主义等等——列宁是唯一能从这些困境中看到出路并以自己英明的力量使其他布尔什维克也确信这些道路是正确的人。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整个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州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有布哈林、洛莫夫、斯图科夫等）都反对和约，主张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和毁掉他们认为当时是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③，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同一问题上，作为外交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提出不和不战的论点，从而更加加剧了这种严重的情况，那末，列宁的思想和威信的全部意义就明显了，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既不用行政官僚主义的方法，也不用对自己党内的同志施加强力的方法来处理事情。

在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斗争正熾热的时候，列宁善于团结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全部力量并把国内战争一直进行到彻底胜利。同时他作为主要发起人建立了第三国际并指出了它的明确前景。

① 《論粮食稅》。《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3頁。

② 同上书，第343—344頁。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这从他要求最严厉地惩罚，甚至就地枪决那些时常違法乱紀、行为恶劣以及欺压农民的一切旧官僚、地主和资产者就可以看到（參見第347頁）。

③ 《奇談与怪論》。《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4頁。

在一篇闡述这个問題的文章里，列宁簡要說明了各个国际之間的不同点：“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爭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

第二国际是給工人运动在許多国家的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

第三国际承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领导世界上最革命的运动即无产阶级推翻資本压迫的运动的政党的国际联合，现在有了空前巩固的基础；有了几个苏维埃共和国，它們在国际范围内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对資本主义的胜利。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馬克思的一个最偉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百年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天才的預見、这个天才的理論已开始成为现实。”^①

在这些問題和其他一系列問題上，列宁生前給第三国际的活动指引了方向。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而在其他很多不发达的国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情况就不一样。这里至少必須簡略地闡述一下列宁是怎样看待这一問題的。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提綱中提出下列观点：“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去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胜資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現象。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

^①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4—275頁。

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圍繞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資產階級反对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維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經驗，深信除了苏維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他們別无生路。

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須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維埃俄国建立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①

列宁有远見地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人民的斗争实际上也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为在资本主义殖民者的統治下，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人民的斗争必然会促使他們去粉碎这种使他們有过惨痛体验的制度；另一方面，参加这种斗争的还有已經在不同程度上組織起来的无产阶级。現代殖民地人民解放的蓬勃过程最好地证明列宁思想的光輝。

在成功地战胜反革命以后，必須使国家从落后和破坏等全面混乱的状态中站立起来。列宁并不害怕必然出現的轉折，如果这是进步运动的鎖鏈上一个必要的环节的話。同时列宁对苏維埃社会的情况和結構并不抱有任何幻想。在上述論实物稅一文中，列宁以自己固有的明智和信念來說明并证实：当时社会处在过渡时期，因此，这个过渡必然包含各种社会經濟形态的成分，小資產階級經濟上的散漫性是社会主义的最大敌人，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对工人階級所掌握的苏維埃国家來說是前进了一大步。列宁知道这

^①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6頁。

个論点也将会在党的队伍里引起混乱和叫喊,他解釋說:“第一,应当分析一下,这个使我們有权利、有根据自称为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应当揭露那些竟看不到小資产階級經濟条件和小資产階級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主要敌人的人的錯誤。

第三,应当很好地了解在經濟上与資产階級国家迥然不同的苏維埃国家的意义。

我們来研究一下这三种情况。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經濟問題的人否认过这种經濟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維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現在的經濟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那末过渡这个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經濟上是不是說,在这制度內既有資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誰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現有各种社会經濟結構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問題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現在我們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經濟;(2)小商品生产(这里是指大多数的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資本主义;(4)国家資本主义;(5)社会主义。

俄国如此辽阔广大,如此五光十色,以致社会經濟結構的所有这些不同类型都錯綜在它里面。特点就在这里。”^①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活跃已經停滯的經濟,列宁清楚地看到大工业是主要前途,他提出关于新經濟政策的論点,允許活跃資本主

^① 《論粮食稅》。《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0—321頁。关于国家資本主义問題,列宁在很多地方都談到过,特别是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談到过。

义成分,但是必須是租让制并且是在苏維埃国家的监督之下。

列宁提出加紧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认为这是发展的基本前途。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只要提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够了:不实行这些措施,就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方式,因此也就不能使生产力达到这样的发展程度,即根据产品和缩短劳动日的结果将能够消除分工。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景与这些措施是有机地联系着的。

另一方面,列宁考虑到俄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特点,就这个问题留下了明确的指示:剥夺大资本家和大地主,使贫农靠近苏維埃政权,应该对中农进行工作,尽力把他们当作同盟者加以保护(尽管列宁认为农业的主要前途和农业的解决办法在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农业)。但是这里不应使用暴力。“**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中农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千百万人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任何地方的中农都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里技术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铁路交通特别发达,那里最容易产生用暴力对待中农的思想,可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主张用强制手段对待中农。……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这里的经济任务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这里没有上层可以拆去,而留下整个基础和整个结构。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上层,即资本家。**在这里采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这里需要长期的教育工作。农民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应当拿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康姆尼’是最好的东西。……这里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过渡到最好的制度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①

列宁的观点和做法与他死后几年别人的一些做法比较是多么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1919年3月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1—182页。

的不同！列宁在苏維埃国家历史上的最困难和最具有决定性的时刻也是多么高地站在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原則的高度上（特别是在对待劳动者和战友方面）！几乎没有一个問題列宁沒有发表过自己的意見，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見强加于人，从来不自命为不犯錯誤和不可侵犯的人。列宁的天才也正是代表了斯維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捷尔任斯基、李可夫、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协助他一同造成的思想上坚定明确的气氛和合作共事的精神。在这些极有能力的战友中列宁是主导人物。如果在我們这个世紀里有人在智力的敏銳、文化的淵博和革命的思想方面能与馬克思相比的話，那末这个人只能是列宁。1924年1月21日当这个革命的思想實驗室永远停止創造时，人們很快就意識到一个最偉大的历史人物过早地从历史舞台消逝了。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